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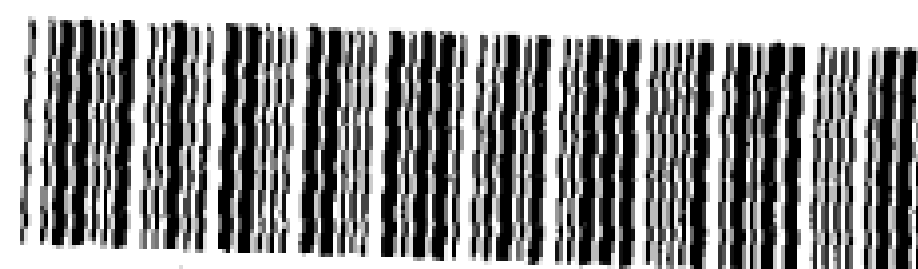
窝囊废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萨洛姆·贝赛拉 著

刘习良 笄季英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70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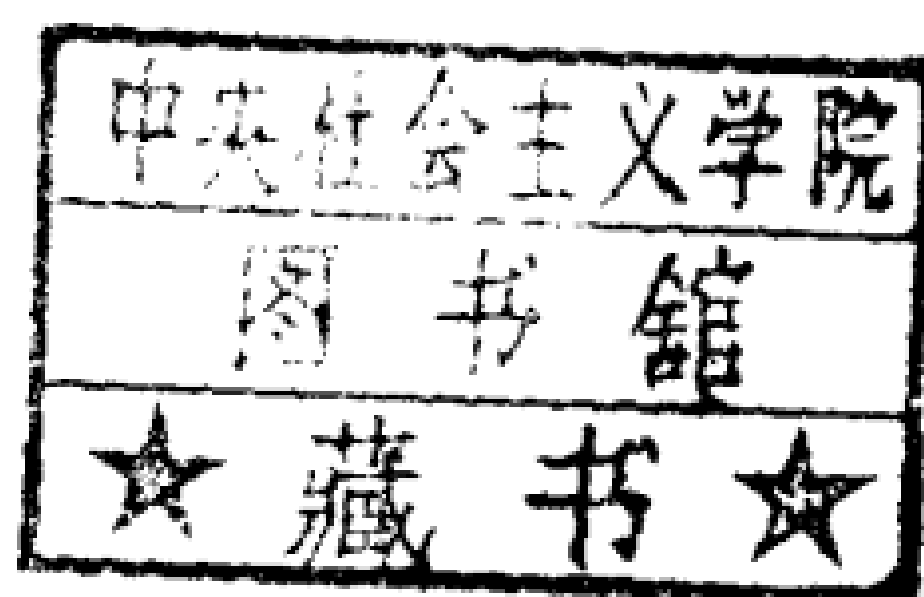


200412393

2

窝 囊 废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萨洛姆·贝赛拉 著
刘习良 笄季英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资源分享网
PDG

Alvaro Salom Becerra
UN TAL BERNABE BERNAL

根据“第三世界”出版社1976年11月第十一次再版译出

窝囊废

Wo nang fei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萨洛姆·贝赛拉 著
刘习良 笄季英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75,000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

ISBN 7-5302-0031-3/I·32

定价: 2.4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哥伦比亚近六十年的社会历史生活为背景，以主人公贝纳贝·贝纳尔的一生经历为线索，全面揭露了哥伦比亚政界、军界、党派以及司法部门的阴暗面；鞭笞了各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客们贪赃枉法、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罪恶勾当。主人公贝纳贝·贝纳尔出身于平民阶层，为人正直、善良、聪明，而且很有才华。为了能在生活的最底层挣扎下去，他只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各式各样的政客卖命。他处处遭受人们的嘲弄和奚落，被称为窝囊废，度过了无限辛酸的一生。

人物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入木三分。文笔典雅而幽默，一部立意严肃的政治讽刺小说，写得妙趣横生，毫无枯燥之感，可读性强。





—

每月五号是国家老职工领取退休金的日子。银行要到上午九点才开门营业，可是从六点钟起，几百名年纪在五十到八十五岁之间的男男女女就开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聚拢到银行门前。有的人弯腰驼背，面色阴郁，身上穿的厚呢大衣使人想起阿瓦迪亚·门德斯博士^①执政的年月，头上戴的帽子让人回忆起卡洛斯·加德尔^②走红的时代。这些人手里拄着四十年前在理查德百货公司买来的手杖，或者在托切特大商店买来的雨伞。他们费力地拖着一双腿，板着面孔，一语不发，脸上挂着一丝悲戚的苦笑。另外几位年轻一些的挺直腰板儿，显得风度潇洒，颇为自豪地光着头发斑白的脑袋。他们满面春风，身穿儿子的运动服，似乎拼命要阻止住时间的不可逆转的前进步伐。有几位老太太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年岁。她们寡言少语，性情孤僻，穿着本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服装，眼睛里流露出充满怨

① 米格尔·阿瓦迪亚·门德斯，自由党人，在1926年到1930年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② 卡洛斯·加德尔（1903—1935），阿根廷著名演员和歌唱家。

2016/10

恨的，疑神疑鬼的目光。只有少数几位还是那么多嘴多舌，故作媚态。她们竭力借助麦克发脱化妆品和《时装》杂志希图留住一去不返的青春。来到银行门口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行。过去在同一个行政部门任职的熟人用揶揄的口吻互相寒暄着：

“嚯！您显得更年轻啦！”

“哪儿像您啊，在您身上时间好像没动窝儿嘛……！越来越帅啦！”

两位老人听了这几句“奉承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在这群五色斑斓的老人队伍中，并非总是那么互相谦让，以诚相待。一个哆哩哆嗦的老头儿打算在队伍前头夹个塞儿，立刻听到厉声斥责：

“排队去！我们都起得这么早，你也早起点儿啊！老了老了，还这么瞎胡来！”

“先生们，可怜可怜我吧！”老头儿苦苦哀求，“我病得挺厉害，工夫大了站不住……”

“站在这儿的全是上岁数的，谁没病啊！排队去！”一个人代表大家嘟嘟囔囔地提出抗议，围着银行大楼四周排队的人立即随声附和。

有的人利用无休无止的等待时间看报纸。有的人默默地抽烟。大多数人兴致勃勃地闲聊天。话题嘛，反正是老一套，什么生病啊，什么某个领养老金的人故去了啊，什么物价上涨啊，什么要提高退休金啊。还都念念不忘昔日的宦海生涯。一个看样子有八十岁的人一边咳嗽，一边不住吐痰。站在旁边的那位约摸有五十五岁，问他：

“您这个病，怎么总不见好啊？”

“还是老样子。唉，一天不如一天。”被问的人回答说，“凭银行那几位大夫，哼……再加上他们开的药……拿五片阿司匹林、一片小苏打，排的队比这儿还长……退休金本来就少得可怜，他们还扣去百分之五，这他们倒是忘不了……！”

“今天有人领不了钱了，二位知道是谁吗？”一个肤色黝黑的瘦干猴儿模样的人用浓重的托利马口音问两位队友。“埃斯塔尼斯劳·丰塞卡！知道为什么吗？唉，八天前他故去了！葬礼我去了……”

“真没想到！可怜的埃斯塔尼斯劳！”听话的人说，“那可是个大好人……我们在部里共事十五年，从来没拌过嘴……可话又说回来啦，咱们早晚还不都得到那儿去吗……”

“喂，拉米雷斯先生，物价这么涨，您有什么看法？”一位年约六旬的老妇人问。她身上穿的那件大衣、头上戴的那顶帽子还是爱弥莉娅·妮埃托·拉莫斯当“校花”的时代流行的式样。

“简直无法容忍！”拉米雷斯先生用纯正的波哥大口音回答说，“今天租幢房子的钱，过去足够买幢房子。洗件衣服的钱，几年前能买件衣服……吃的就更甭提了！……堂娜·宝莉娜，您听没听说最近有个笑话？有人说，女秘书想吃鸡蛋，得自个儿下一个……可政府还一个劲儿地说，情况很好，生活费用在下降……”

“各位听没听说要提高退休金啊？”一个老头儿问。他长得又高又瘦，活像堂·吉诃德。

“压根儿没听说过！”一个面目和善的秃顶矮胖老头儿回答说，“我不抱任何幻想。国家预算只供议员们游山玩水，购买‘海市蜃楼’飞机、‘奔驰’汽车……咱们啊，等着入土为安

吧……”

“你到咱们原来的办公室去过没有？”一个戴着厚厚的眼镜、中等身材、满头白发的人问一位朋友。

“去过啦！”那个人回答说，“全变了。还记得咱们那会儿是怎么工作的吗？那股认真劲儿！那股至诚劲儿！那是什么效率！现在……顶好你亲自去看看……办公室成了波斯市场啦，成了狂欢节啦！现任科长是从沿海省份来的，用不着说，他把自己的同乡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吹口哨的、唱歌的、跳舞的、蹦蹦跳跳的，没人干正经事儿……还听说，办公室里的拉锯声吵得四邻不安……可怜的丧葬科啊，见鬼去咯！”

排队的人年龄各异，但如今社会处境完全相同。不管是前部长还是过去的清洁工，不管是前大使还是过去的司机，不管是前法官还是过去开电梯的，全都混杂在一起。阶级的差别明显地反映在面孔上，反映在言谈话语、举止服饰上。这些老人当中，有的毫不掩饰自己的老态；有的羞于上了年纪，强做欢颜，故意显得年轻一点。有的风度翩翩；有的衣衫褴褛。然而，在所有人的头上都弥漫着一股惆怅的空气，笼罩着一片沮丧的气氛，悬挂着一个疲惫的光环。他们是一支被时间这个无情的万能敌人拖垮的队伍。风湿病、动脉硬化、前列腺炎、心肌梗塞这些老年人的死敌正在队伍中串来串去，寻找牺牲品。死神像只不祥的大鸟在他们头顶上盘旋飞舞，正在挑选几天后——或许是几小时后——将要栖身其上的对象。

头天晚上，贝纳贝·贝纳尔就和朋友卢佩托·梅德拉诺和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打过招呼，提醒他们说：“别忘了明儿个是领退休金的日子。说好了，咱们在拉门塔希奥内斯墙见面，准八点。千万别晚了。要不早早儿去排队，领不着钱，

只好喝西北风啦……我看……”

三位朋友都是波哥大人，所以谁也没有准时赴约。贝纳贝·贝纳尔是八点二十到的。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是八点半到的。卢佩托·梅德拉诺是八点四十五分到的。不用说，三个人都表示“遗憾死啦”，也都想出各自的托词。冈萨雷斯说，他搭乘的公共汽车中途抛锚，所以来晚了。梅德拉诺说，昨儿晚上做了个噩梦，到早晨没醒过来。贝纳贝·贝纳尔说，他的表停了，所以迟到了。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抓住贝纳贝·贝纳尔的托词开了个玩笑：“在你这个岁数，有只不会走的表也算是福气啊……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嘛……”

三个人排进队伍里去。这时候，队伍已经长达一百八十米了，向前移动的速度大体上相当于一场三级审理的官司。每隔十分钟，排队的人向前迈一步。波哥大的绵绵细雨打湿了老年人憔悴的面孔，淋湿了他们的衣服。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带着雨伞。气温是摄氏六度。有的人大声咳嗽，有的人使劲擤鼻涕，好多人紧着搓手。没有一个人不诅咒波哥大的鬼天气和银行迟迟不开门。

“按说政府该把这份施舍送到咱们家里去……费得了什么事！省得咱们在这儿一站就是五个钟头，弄不好还会闹肺炎！”有人说。

“就说呢！这是催着咱们快死呐！……”另一个人接上来说，“您没看过财政部长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的声明吗？说咱们游手好闲，是寄生虫，是国库的吸血鬼。”

“部长忘了他马上也要跟咱们一块排队啦。我算计着，再过几个月他也该卸职养老了……”第三个人说。

“这些寡头们叼住奶头儿不松嘴！”另一位老人说，“交通

部长干了四十年，从不撒嘴……！让大家伙儿说说，从打在拉腊特女子学校开始读书识字起，我就认识他……”

等了整整四个小时，贝纳贝·贝纳尔和他那两位朋友总算挨到一张小桌子跟前。桌子周围坐着三位社会保险局的职员在发放退休金。贝纳贝·贝纳尔等三人先递上身份证，在名单上签字，然后领到支票。紧接着，他们又排进第二个长长的队伍去换现金。又过了四十五分钟，三个人拿着钱，离开了银行。贝纳贝·贝纳尔领到二千七百八十五比索零三十分。卢佩托·梅德拉诺领到二千四百三十三比索零五十分。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领到一千八百六十比索零七十五分。每个月的艰难历程到此结束。

“可把我累坏了！再也挺不住了……”贝纳贝·贝纳尔说。

“我都冻成冰棍啦！膝盖以下全僵了……”卢佩托·梅德拉诺说。

“我的腰疼起来了，准是坐骨神经疼又要发作……”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上个月也是这样，在床上整整躺了八天……真没办法！”

“找个地方坐会儿，怎么样？……我请二位喝点咖啡。”贝纳贝·贝纳尔说。

“光喝咖啡？今儿个可是发钱的日子！”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问道，“依我说，还是到内格拉·伊菲赫妮娅那儿喝几杯啤酒吧……”

“行啊！他妈的！得花钱时且花钱……”卢佩托·梅德拉诺回答说，“再说，我快渴死啦……”

内格拉·伊菲赫妮娅是个改恶从善的烟花女子。资本主义

制度是不公平的，她的大多数常客都领退休金，唯有她一分钱也拿不着。四十年前，她容貌俊美，腰肢婀娜，是一位黑里带俏的美人。小时候，她在家乡被一个恶棍蹂躏过，以后又屡遭毒手。一来为生活所迫，二来也出于个人的癖好，她选择了人世间最古老的职业。她在全国各地接客，名噪一时，最后在波哥大定居下来。多年来，对馋涎欲滴的单身汉、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丈夫和寻求慰藉的嫖夫来说，她的家是个安乐窝。内格拉·伊菲赫妮娅不但舍得出自己的肉体，在花钱上也十分慷慨。所以钱挣下不少，可很快就装进那些专吃倒贴的花花公子的口袋里。到后来，年老色衰，家境拮据，只好把自家的厅堂改成酒馆。平时，伊菲赫妮娅两肘支在古旧的柜台上，招待围坐在六张小桌子旁的年轻时代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回忆逝去的韶光。

想当年，内格拉·伊菲赫妮娅的魅力逗引得漂亮小伙子们整天围着她转。如今，人老珠黄，只剩下从事这种职业的女人特有的那股亲切劲儿。她们的职业就是让人称心如意，心旷神怡。此外，她还知道说不完的风流韵事、桃色新闻。顾客们左一杯、右一杯敬了她不少白酒。借着酒劲儿，她拨动吉他，轻舒歌喉，唱道：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胡猜乱猜，
说什么忌妒的泪水
在我眼中来回徘徊……

她时常夸耀自己曾经迷住过上流社会的许多头面人物。什么银行家、工商界名流，什么杰出的医生、受人尊敬的律师，

什么才华出众的作家、文思敏捷的诗人，什么威名赫赫的政治家、战功卓著的军官，真是应有尽有。每逢谈起这些大人物的艳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内格拉·伊菲赫妮娅总是毫不客气地逐个点名，一个不漏。她把新顾客让到自己的卧室里，请他们观赏那张金碧辉煌的旧床——在这个“战场”上，曾经进行过无数次情意缱绻的拼斗。她以法国导游向旅游者介绍拿破仑墓时使用的那种自豪口吻，对大家说：“我很高兴，波哥大和哥伦比亚的大人物曾在这张床上列队游行。政府应该拿出至少一百万比索买下这张床，送到博物馆展出……”

内格拉·伊菲赫妮娅和七个相好的生下七个孩子。回顾往事，大儿子和母亲一样也有一种虚荣感。他常说：“您别看我在这儿，我差点成了共和国一位前总统的儿子。当时，他住在翁达，正赶上我妈妈红极一时……”

本世纪初波哥大的典型生活方式，如今已经不多见了。内格拉·伊菲赫妮娅酒店就是最后的几个堡垒之一。在那里，人们还在朗诵胡利奥·弗洛雷斯^①和恩里克·阿尔瓦雷斯·埃瑞的诗作；还在追忆“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②的故事；还在吟唱埃米利奥·穆里约^③的说唱剧和“班布哥”^④的唱段；还在谈论赫内拉尔·马萨·伊·贡萨龙的小说；还在回忆卡罗^⑤先生的尖利的笔锋和堂·何塞·马利亚·瓦加斯·维拉^⑥的放荡不羁；还在谈及

① 胡利奥·弗洛雷斯(1865—1923)，哥伦比亚诗人。

② 卡斯托耳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廷达瑞俄斯和勒达的儿子；波吕丢刻斯是卡斯托耳的异父兄弟。

③ 埃米利奥·穆里约(1880—1942)，哥伦比亚作曲家。

④ “班布哥”是哥伦比亚的一种民间舞及其乐曲。

⑤ 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1843—1909)，哥伦比亚著名作家、政治家，1894年至1898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⑥ 阿塞·马利亚·瓦加斯·维拉(1860—1933)，哥伦比亚小说家。

“千日战争”^①和乌里维·乌里维将军^②的惨遭杀害。不管什么天上人间，大事小事，一律讽刺挖苦。进入这个小小的酒馆的唯一要求就是彬彬有礼，谈笑风生。在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小酒馆不啻是一个孤岛，一个四面八方被现代化包围的历史陈迹。

看见贝纳贝·贝纳尔和他的朋友梅德拉诺和冈萨雷斯走进来，内格拉·伊菲赫妮娅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摊开双臂，对他们说：

“哎哟，我亲爱的小老头儿！是哪儿来的这股仙气啊？几位长得少相啦，都成了风流潇洒美少年啦！”

“拿眼下年轻人的话来说，你才真‘够派’呐……”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着话拍了拍她的屁股。

“老树发绿芽，又动手动脚啦……”贝纳贝·贝纳尔说。

“顶好别提什么老不老的……”冈萨雷斯反驳说，“咱们四个人加在一块儿能够上三百岁……至于颜色嘛，我可一直是蓝色的，不像别人那样变来变去^③……”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瞟了贝纳贝一眼。

“像雷耶斯将军^④说的，‘少谈政治，多讲管理’……伊菲赫妮娅，来点实在的吧！”卢佩托·梅德拉诺吩咐说。

“托仁慈的上帝的福，你们几位总算来啦。今儿个还没人上门呐……想喝点儿什么？”伊菲赫妮娅问道，“不过，有一条，

① 指1899年哥伦比亚的自由党人对执政的保守党发动的一次战争，战争延续了三年，到1902年结束，史称“千日战争”。

② 拉法埃尔·乌里维·乌里维(1859—1914)，哥伦比亚自由党人、军人、作家。

③ 保守党用蓝色，自由党用红色。贝纳贝曾加入过保守党，又加入过自由党，所以冈萨雷斯用这句话讽刺他。

④ 拉法埃尔·雷耶斯，哥伦比亚政治家，1904年至1909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现钱交易……其他都无关紧要。我的亏空比政府的赤字还厉害……”

“虽说我们都是……病恹恹的老头子，可今儿个绝不赊欠，逮钱就花……”贝纳贝·贝纳尔说。

“我要一杯冰镇的‘海边酒’……”卢佩托·梅德拉诺说。

“冰镇的‘海边姐儿’？没听说过！”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海边姐儿个个热情奔放……我也要个‘海边姐儿’，热热和和的……”

“我倒无所谓，”贝纳贝·贝纳尔表示，“说来说去，喝啤酒的人不过是把杯中物喝进去，再往尿盆里撒出来，如此而已……你呢，伊菲赫妮娅，喝点什么？”

“我来杯白兰地吧，”伊菲赫妮娅回答说，“你们几位知道，我不是在小摊儿上喝啤酒的角色……我行时那会儿，爱喝香槟酒。记得里卡多爱喝‘红带牌’的，卡米罗喜欢‘彭梅瑞牌’的……唉！那是什么时候啊……”话没说完，她深深叹了口气。

“用不着唉声叹气的，总能混得下去嘛……”卢佩托·梅德拉诺说，“那会儿一瓶香槟酒卖五个比索，现在卖五百；那会儿里卡多和卡米罗是大财主，我们都是穷光蛋。区别就在这儿……要是有钱喝香槟酒，我们就去赛马俱乐部，不上这儿来了……”

“呜！老头子真有你的！”伊菲赫妮娅反驳说，“愈老愈爱多心……我连想想过去的权利也没有啦……能原谅我吗，老爸爸？”说着，她抚摸了一下卢佩托·梅德拉诺的脑袋。

“原谅是可以的，”卢佩托说，“可千万别管我叫爸爸。幸好我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不……不算坏的女儿……！”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行啦，该喝酒了！干杯！”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举起泛着白沫的酒杯，高声说道。

“干杯！”贝纳贝·贝纳尔和卢佩托·梅德拉诺高举着酒杯应声说。

“干杯！”伊菲赫妮娅也举起了酒杯。

共同的处境把三位朋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同时代人，贝纳贝·贝纳尔六十二岁，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五十九岁，卢佩托·梅德拉诺六十四岁。三个人都是波哥大人，第一位出生在拉斯·阿瓜斯区，第二位出生在圣·阿古斯丁区，第三位出生在贝伦区。三个人的父亲都是老实巴交的正派人，一辈子穷得叮当响。在经济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等阶级代表人物。家里实在交不起学费，他们都没能读完高中。因为找不到合适职业，只好投身官府，混口饭吃。命运之神把他们汇集到一起。多年来，三个人在同一个国家机关里任职。又前后脚得到退休权。除此而外，三个人性情相仿，习惯近似，爱好也差不多。他们生来爱说爱笑，关心社会问题，喜爱诗歌和古典音乐。他们不是成天喝得醉醺醺的酒鬼，只是隔三差五地喝几杯啤酒。逢到这种时候，总要一起来到内格拉·伊菲赫妮娅的酒馆。好多年前，伊菲赫妮娅曾经和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相好过十五天。对卢佩托·梅德拉诺也曾格外施恩。那一夜卢佩托·梅德拉诺真是没齿难忘。不久前，她又结识了贝纳贝·贝纳尔。两个人之间只有真挚的友谊。“在这个岁数上，”贝纳贝·贝纳尔常对她说，“咱们最多只能交个朋友。可惜啊，从前您不认识我！您不知道错过了多少……”

虽然贝纳尔、冈萨雷斯和梅德拉诺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可又是各不相同。

贝纳贝·贝纳尔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得十分匀称。他动作缓慢，举止稳重，走起路来颇有风度。密匝匝的满头白发。面部突出的特征是那双眼睛和永不消逝的微笑。他那双眼睛不光是富有表情，而且还会说话。只有那些感情丰富、勤于思考的人才有这样的眼睛。从他“心灵的窗子”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聪明睿智又胆小怕事，离经叛道又软弱可欺，富有理想又畏畏缩缩的人。他的笑容既显得睥睨一切，又显得满腹狐疑，和盘托出了他的内心世界，表明他是个无能之辈，既不为人了解，又处处吃败仗。

在人类当中有许多人——全世界有几亿吧——明知自己有能力，但在战斗打响之前已经低头认输。贝纳贝·贝纳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世上有无数人在关键时刻犹疑不决，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只知道屈从、妥协，驯顺地随着生活的大溜朝前走。贝纳贝·贝纳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属于那支手持利刃，但又不战而降的军团。

拿贝纳贝·贝纳尔来说，他是个聪明人，然而既缺乏激情，又没有雄心，才智全被怯懦压扁了。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把自己的头脑廉价地租了出去。他的思想只用来为别人的成功服务。他自学得来的知识不过是别人用来向上爬的阶梯。他熟读希腊和拉丁、西班牙和法国、英国和德国古典作家的作品，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学修养。而且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种把深沉的思想和典雅的形式结合起来的风格。许多使政治家名扬四海、声誉大振的伟大的演说、许多为冒牌的作者打开成名的大门的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通晓管理学，不少基本改革法案是他的作品。为此，他的顶头上司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祝

贺。他擅长构思和起草判决词，使几位法官从无名小辈一下子变成烜赫一时的人物。总而言之，在四十年当中，他为了几枚可怜的比索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作为一名官僚，他本能地偏于保守。他曾两次加入一个传统政党，又两次跳党成为另一个传统政党的成员。1930年以前，他是保守党党员。从1930年到1946年，他是自由党党员。从1946年到1958年，他再一次加入保守党。1958年以后，又一次加入自由党^①。在得到退休权的时候，他宣布自己不问政治，但又毫不掩饰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好感。然而，看到社会主义思想有可能在哥伦比亚占上风的时候，他又吓得不得了。

他和一个性情暴躁、粗鲁专横的女人结了婚。婚后生活不啻是个没完没了的痛苦万分的苦难历程。三十年来，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承受老婆的辱骂和责打。他管她叫“我那位冤家”。一有机会她就骂他是胆小鬼、软骨头、废物鸡。她把家庭生活贫困、孩子品行不端一古脑儿都算在他的帐上。在孩子们眼里，爸爸是个可怜虫，是个只会惹人讪笑的苦命人。他们既可怜他，又瞧不起他。

波哥大人的俗话里，有一个表现力很强的词。在形容某些人的时候，它的表现力胜过千言万语。有了这个形容词，所有用来描绘贝纳贝·贝纳尔的人品的词儿都显得苍白无力，相形

^① 哥伦比亚两大传统政党是自由党和保守党，均成立于十九世纪中叶。进入二十世纪后，1930年以前，主要是保守党执政；1930年到1946年自由党执政；1946年到1953年保守党再度执政；1957年，两党达成一项协议，建立“全国阵线”，决定从1958年起的十二年（后改十六年）内两党轮流担任总统，并均分内阁部长和议会中的席位。

见绌。它只有三个音节^①，但却包括了全世界所有贬义词的含义。这个词就是：窝囊废！

大家一致公认贝纳贝·贝纳尔是个窝囊废。一些人说：“贝纳贝·贝纳尔是聪明人，可就是个大窝囊废！”另一些人说：“贝纳贝笔头子硬，可惜是个窝囊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贝纳贝为人非常老实，可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有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不光把这个坏词加在他的身上，而且还涉及他身体最隐蔽的部位，极力夸大他性腺的体积。赫雷米亚斯·罗德里格斯常说：“看啊，贝纳贝·贝纳尔来了，睾丸一准装在后面的卡车上……”赫拉迪诺·希富恩特斯说：“赶哪天贝纳贝需要悬带，他准得买张吊床。”倒霉的贝纳贝·贝纳尔不动声色地忍受着一切戏耍和嘲弄，脸上仍然挂着永不消逝的高深莫测的微笑。

简言之，贝纳贝·贝纳尔就是这样一个人；熟人对他就是这么个看法。

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长得又高又瘦，没有一点风度。他面色黧黑，鼻子高耸。眼睛里闪烁着大胆的人特有的挑战的、逼人的光芒。如果说贝纳贝·贝纳尔满头白发，显得德高望重，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满头白发，却显得阴险狡狴。他是个肆无忌惮的自私鬼，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此人要求不高，胃口不大，很容易得到满足。他的文化素养只限于知道近年国家的政治“小史”，读过几首诗，从“象征洞”听来一些庸俗的笑话。冈萨雷斯是个宗派情绪颇强的保守党人。出于宗派狂热，他

^① 西班牙语为：pendejo；这里原文是“只有三个音节、七个字母”。

对同党的积极行动和无所作为一律倍加赞扬，对他们的错误和罪愆一律加以美化。对他来说，自由党人是一伙杀人犯和强盗。例如，他说乌里维·乌里维将军是土匪，说他要对十万名哥伦比亚人的死亡负责。而行刺乌里维将军的人——加拉萨和卡瓦哈尔——则是替天行道的掌刑人。劳雷亚诺·戈麦斯^①是他的最高神灵。他认为，多少世纪以来，人类只产生过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劳雷亚诺，另一个是耶稣基督。

他的宦海生涯是不住地耍阴谋、拍马屁、当奴才。他的智能和权欲、财欲不成比例，因此他总是那么忿忿不平。他常拿老婆孩子出气，骂他们，打他们。他忌妒贝纳贝·贝纳尔的才干，一有机会就责怪他消极被动。他不能原谅贝纳贝·贝纳尔两次背弃保守党的神圣学说的罪行，十分得意地用尖刻无比的话语挖苦他。但是，领退休金那天，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口袋里装着两千多比索，他觉得自己成了无所不能的人。什么壮志未酬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夙愿未偿啊，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一心只想着饮酒取乐。每次都是他主动建议朋友们一起到内格拉·伊菲赫妮娅的酒馆去。

从外表上看，卢佩托·梅德拉诺颇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些人物：秃头、身体肥胖、面色红润、举止安详。一双小眼睛在眼镜后面不住地欢蹦乱跳。眼神活泼，喜气洋洋，像个小孩子。有些人在人世间转了一圈，可是不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卢佩托·梅德拉诺就是这么个缺心少肺的人。当然，他没参加过

^① 劳雷亚诺·戈麦斯(1889—1965)，哥伦比亚保守党领袖，1949年至1953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发明火药。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热爱，也不懂什么是痛恨。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激烈的变故。他有个亲戚，是位政治家。此人像给瞎子带路的人一样领着他从一个国家机关转到另一个国家机关。无论在什么地方，卢佩托一直是个收入微薄的小职员。从父母身上，他只继承下一份遗产，那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然而，卢佩托压根儿不了解什么是自由主义思想，哪些是自由主义思想。从性格来说，他远不是个热情奔放的人。然而，一听到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诋毁自由党的领袖人物，他立时耐不住性子，大放厥词。他反驳说，和劳雷亚诺·戈麦斯、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①以及何塞·安东尼奥·蒙塔尔沃相比，莫里约、^②萨马诺^③和博维斯^④都成了小天使。他十分敬佩贝纳贝·贝纳尔，真心实意地怜悯他。他喜欢自己的妻子，钟爱惟一的女儿，作为一个六十四岁高龄的人，身患风湿病，月收入二千四百三十三比索零五十分，也算能够自得其乐了。

晚上八点钟，内格拉·伊菲赫妮娅的酒馆里座无虚席。在他们后面，陆续又来了二十位顾客，坐满了另外五张桌子。贝纳贝·贝纳尔、冈萨雷斯和梅德拉诺还坐在那张桌子周围，桌上匀称地摆着几打空酒瓶，还有三个瓶子装着半瓶酒，三个烟

① 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1891—1976)，哥伦比亚保守党领袖，1946年至1949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② 巴勃罗·莫里约(1777—1838)，1815年被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派往新格拉纳达镇压革命。他屠杀了许多革命党人，焚毁大量不是用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的书籍。

③ 胡安·萨马诺是西班牙准将，在新格拉纳达以残酷镇压革命而出名。1817到1820被莫里约任命为总督。

④ 托马斯·博维斯，西班牙人，曾和委内瑞拉的争取独立的革命者作过战，死于1874年。

灰缸里满是烟蒂。酒馆烟雾腾腾，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拉·伊菲赫妮娅满脸堆笑，格外勤快地跑来跑去，给大家上啤酒。主顾们个个喝得醉醺醺，正在高谈阔论，纵声大笑。贝纳贝·贝纳尔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朝酒店老板娘称之为 pipi-room^① 的地方走过去。

“他这一去且回不来呢，”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贝纳贝历来是一骨截一骨截儿地撒尿……可怜啊！干什么都是窝囊废……”

“我对他很有好感，”卢佩托·梅德拉诺说，“你看他多聪明，多有文化，本来他可以成个大人物……”

“聪明也好，有文化也好，这些都应该用来赚大钱，往上爬……”冈萨雷斯反驳说，“可这对贝纳贝有什么用？只能写些个窝囊话……”

“对不起，安布罗希奥，我认为他写的不是窝囊话，”梅德拉诺回答说，“要是没有贝纳贝代为起草竞选演说，蒙德拉贡博士就进不了参议院。魏兰迪亚博士进不了最高法院，要是贝纳贝……”

“你的话恰恰证实了我的看法，”冈萨雷斯说，“贝纳贝拿笼子，剥削他的人拿小鸟……这正好说明他是个笨蛋！”说着话，他把啤酒杯举到嘴边。

“你对他太狠了，”梅德拉诺说，“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有什么过错？他生来如此，到死还是这样……”

“二位谈什么呐？”贝纳贝·贝纳尔回到桌旁时问道。

“我们在谈政治……跟往常一样……谈起治国来……”安布

^① 小便处。

罗希奥·冈萨雷斯回答说。

“我顺带问一句，你们二位对形势有什么看法？”贝纳贝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倒进杯子里又问。

“只有‘委托合同’是明确的，其他全都不清不楚……”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回答说。

“说‘委托合同’是明确的，这是糊弄人。”贝纳贝·贝纳尔大发议论，“我们这些委托人向受托人提出的委托合同历来是明确的，请他们把我们治理好。可他们从来完不成……”

“算了吧！”冈萨雷斯高声说，“保守党就干得不错嘛！”

“你别惹我发笑啦，我嘴唇上裂了个口子……”卢佩托·梅德拉诺说，“咱们国家最蹩脚的政府就是卡罗先生、马罗金先生^①、堂·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②和阿瓦迪亚·门德斯博士的政府……本世纪以来，最出色的总统是奥拉亚·埃雷拉^③、阿方索·洛佩斯^④、爱德华多·桑托斯^⑤和卡洛斯·耶拉斯^⑥……”

“就是啊！启示录的四骑士嘛！”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用讥讽的口吻说，“二位还记不记得在桑坦德和博亚卡死去的那

① 何塞·马努埃尔·马罗金（1827—1908），作家，保守党人，1900年至1904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② 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1855—1927），哥伦比亚作家，保守党人，1918年至1922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③ 恩里科·奥拉亚·埃雷拉，自由党人，1930年至1934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④ 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1886—1959），哥伦比亚自由党领导人，1934年至1938年任哥伦比亚总统，1942年至1945年再任哥伦比亚总统。

⑤ 爱德华多·桑托斯（1888—1974），自由党人，1938年至1942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⑥ 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自由党改革派领袖，1966年至1970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些人？马马托科的暗杀事件？汉德尔谈判？加切塔事件？法杜尔和佩尼亚洛萨的丑闻？他们是怎么夺去罗哈斯·皮尼利亚^①的总统宝座的？”说完，他一憋气喝下一碗啤酒。

“你们二位似乎都是波旁家族的人，新东西学不会，旧玩意儿又忘不掉，”贝纳贝·贝纳尔开口说话了，“成天价抱着古老的偶像、陈旧的神话不放。你们啊，尽用本能代替思考。安布罗希奥，你其实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加入保守党。卢佩托，你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加入自由党。‘橄榄青果，一路货色’，这句话你们二位都不相信。这些人上台也罢，那些人上台也罢，大家一起上台也罢，反正有钱的照样有钱，受穷的照样受穷。咱们这些穷人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老婆住不起医院，孩子进不了大学。咱们家死了人，连坟地也找不着……”他呷了一口啤酒，又接着说，“人类的前途要靠马克思主义。不过，凭我的年龄、性情，我不会冒风险搞什么革命……那是有胆量的人干的，我可是个胆小鬼！革命是要流血的，我呢，看见流鼻血都得恶心半天……”

“恶心？咱们都恶心？”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问道，“你当过两次保守党，又当过两次自由党，现在……又成了共产党！你就差当共产党了！幸好我有我的信念，而且根深蒂固。我说，咱们还是换个话题吧。喂，干吗不让内格拉给咱们唱个小曲儿听听呢？”

“我得走啦……”贝纳贝·贝纳尔说，“我觉得有点儿醉了。时候不早啦，我那位冤家又该大发雷霆了……”

“别那么窝囊！什么时候你能系紧裤子，当家管事呀？”安

^① 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1900—1975)，哥伦比亚全国人民联盟创始人，1953年至1957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要想安静，抡棍子拼命。我怎么干，你就怎么干。照你老婆屁股上踢两脚……保管万事大吉。”

贝纳贝执意要走，朋友们留也留不住。事情总是这样。到了一定钟点儿，一想到要和妻子见面，他就吓得浑身发抖。他害怕妻子，就像犹太人害怕集中营的头目一样。贝纳贝·贝纳尔付了钱，一共是四十七比索零八十分。然后，告别两位朋友和内格拉·伊菲赫妮娅，走出酒馆。

“我敢打赌，赌多少钱都行，”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说，“今儿晚上，他老婆准得揍他一顿。那个老婆子，可凶呐！他呢，又那么老实巴交的……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窝囊的人……伊菲赫妮娅！伊菲赫妮娅！怎么不给我们唱点什么听啊？”

贝纳贝·贝纳尔步履蹒跚地走上街头，直觉得四下里的东西全都围着他团团打转。这顿酒前后喝了十个小时。他灌下去三十瓶啤酒，至少吸了五十支香烟。他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叫唤，自打吃过早饭，他和两位朋友还粒米没沾牙呢。贝纳贝朝前走了几步，又站了下来。得叫辆车送他回家去。天气很冷。阵阵寒风抽打在脸上。他猛然想起今天刚领了退休金，钱就带在身边儿。一想到可能遭人抢劫，他吓得打了个冷战。找个警察保护吧，周围根本没有警察。贝纳贝把手伸进裤兜儿里，使劲攥住那卷钞票。从身旁走过的人，他都觉得行迹可疑。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走上来，问他几点了，他差一点吓死过去。走到大街拐角儿，他停下脚步。从那里可以听到内格拉·伊菲赫妮娅唱歌的余音和顾客们的掌声。

人们叫我“监狱姑娘”

因为我父亲看管牢房……

他猛地想起，还是回酒馆去吧。可一想起老婆，浑身又立时僵住了。他得尽快赶回家去。回去得越晚越糟糕。贝纳贝·贝纳尔冲着一辆出租汽车招了招手。司机停住车，对他说：

“您要是奔北去，我就捎着您……”

“不，先生，”贝纳贝回答说，“我是穷人，家在南边儿住……”

等了半个小时，最后总算找到一辆顺路的出租汽车。司机满脸流里流气，连鬓胡子准有四天没刮了，眼露凶光，声音低沉，头戴一顶大檐儿呢帽。要是哪位电影导演看见这位司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中他在西部片里扮演强盗的角色。恐惧感又一次攫住贝纳贝。他心里想：这个家伙准得把我带到背静地方。一到那儿，准会掏出手枪，或者拔出匕首，抵住我胸口，要我交出身上带的所有的财物。抢走钱，也许还不甘心，还要杀人灭口。“怎么办？”贝纳贝·贝纳尔暗暗问自己，“在拐弯儿的地方下车？甭等他要就把钱给他？卡门圣母啊，千万保佑我！耶稣的圣心啊，我全靠你啦！”贝纳贝唔唔啾啾地叨念着。想必是圣洁的圣母和高贵的心脏听到了贝纳贝的虔诚祈祷，因为司机开着车，按照乘客指定的方向一路驶去，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贝纳贝·贝纳尔的不祥预感没有应验。这时候，贝纳贝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他又琢磨起回到家里等待他的该是什么样的场面。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像抽风一样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司机觉出来了，转过脸来问道：

“您老先生觉得很冷吧？要不，您是得了癫痫啦？”

“不，先生。没什么，因为我快到家了……”贝纳贝回答说。

司机吃惊地瞅了贝纳贝一眼，心想这位乘客大概是犯疯病

了。最后，出租汽车停了下来。贝纳贝·贝纳尔按照计程表付完车费，下了车。“谢谢，先生！”他抬眼望了望天空。“现在该对付我那位冤家啦！”

一个波哥大公民身上带着钞票、手表、戒指、自动铅笔和披风，在深夜十二点回到家里，居然没出什么意外，这也算得是奇迹一桩吧。

贝纳贝·贝纳尔的家是一幢老房子。一眼可以看出，不是他自己的房子。在拉·坎德拉里亚区、圣·阿古斯丁区、圣·巴巴拉区、拉斯·克鲁塞斯区以及其他几个区，还残存不少这种古旧的房屋。在拉斯·阿瓜斯区、拉斯·内维斯区和恰皮内罗区，则已经寥寥无几了。这种房屋都是平房，窗户外面围着低矮的栏杆。有大门、门厅、过道、院子。院子里种满天竺葵、杜鹃花、秋海棠、芜荑。还有前厅、带玻璃窗的饭厅、客厅和钢琴室、墁着方砖的走廊、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儿的阴暗潮湿的卧室、带抽水马桶的水泥浴室、带天窗的储藏室。后院里有水池，种着石楠和番木瓜。

屋里的家具和房子的年纪相仿。路易十五时代的家具比堂·布拉斯·德·列索^①还要饱经风霜。有自动钢琴、手摇留声机、痰盂、斗橱、带穿衣镜的大衣柜、玻璃柜、长沙发椅、靠壁桌、写字台；远祖、曾祖、祖父的画像；金黄色的卧榻；各位圣徒、圣母、殉道者的圣像；蒸汽熨斗、磨盘、阿雷基帕产的金属锅、巴迪利亚产的水缸、装着金丝雀和金莺的鸟笼子以及各种尺寸的豁边儿小便盆。

贝纳贝没有家里的钥匙。妻子把他当成小孩子，不愿意把

^① 布拉斯·德·列索（1680—1741），西班牙著名水手。

钥匙交给他，或者干脆认为他根本没有权利掌握钥匙。贝纳贝轻轻地叩了一下门。屋里没人答腔。他力气不大，只好再使劲敲了敲门。过了几分钟，猛听得狮吼般的声音。这是他那位冤家在自言自语。她一边穿过门厅，出来开门，一边说：

“二流子！老不要脸的！都什么时候啦才回来……干这个他倒在行……就拿这个教育孩子？”

贝纳贝·贝纳尔连忙用手画了个十字，两臂交叉放在胸前。那副样子就像基督教的殉道者走进竞技场的模样。他那位“冤家”抽下门闩，拧开门锁，打开大门。

“怪不得呢！醉得像摊烂泥！都快站不住啦……下三烂！瞧你这副脏样儿！”说着，她叭叭给了倒霉的贝纳贝两记响亮的耳光。“你害臊不害臊？”她关上门，接着说，“像你这种老梆壳，下午六点钟就该挺尸了，可你一喝就是一整天，拿着退休金到处乱扔！……我这儿想煮杯可可，连个钢镚儿也没有……”

“太太，我就花了四十七比索零八十分……”贝纳贝怯生生地嘟囔着，“剩下的全交给你……”他从裤兜深处掏出那卷钞票。

“四十七个比索零八十分，够我买条短裤啦……你瞧瞧我剩下的那几条短裤，全成筛子底儿啦……”“冤家”一面数钱，一面说。等数完钱，她又说：“还差九比索零六十分！”

“哟，是啊是啊，我忘了……”贝纳贝吓得半死不活，连忙答道，“那几个钱坐出租汽车花了……”

“什么！你还坐出租汽车？”“冤家”又抬高嗓门儿说，“我跟孩子出门都是挤公共汽车……每回喝醉了，你都充大爷……干吗你不走着回来？路上也把酒气散散嘛。”

“说实话……我怕有人抢钱……”贝纳贝用低弱的声音说。

“怕！怕！你老是怕！”“冤家”暴跳如雷地说，“过去你怕你

爸爸，怕你妈，怕哥儿们弟兄，怕老师，怕同学，怕上司，怕同事。眼下你怕我，怕孩子，怕朋友。连你自个儿的影子都怕……我算倒了霉了！嫁给你这么个胆小鬼、窝囊废！你压根儿用不着怕人抢钱。有朝一日你遇上打劫的，他们准会可怜你，还得施舍你点东西……”

“别发火，太太，”贝纳贝央求说，“用不着大嚷大叫的。街坊四邻会怎么说啊？”

“街坊说什么，管我屁事……”“冤家”依然高声喊道，“他们都知道，道理在我这边儿。天下人谁不知道你是个窝囊废！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我一巴掌抽烂你的嘴。去，撒尿、祈祷、上床睡觉！”“冤家”断然下令说。

贝纳贝低着头朝盥洗室走去，完成“冤家”下达的第一道命令。他走过孩子的卧室，房门半掩半开，听见两个孩子在说话。贝纳贝停住脚步，只听孩子们说：

“可怜的爸爸……我打从心眼儿里可怜他……”

“我看是活该。他太窝囊了……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让老婆又打又骂，根本值不得同情，只会叫人瞧不起……唉，给这么个人当儿子，我真觉得不光彩……”

说来也很奇怪，贝纳贝·贝纳尔的“冤家”——也就是他的老伴儿——居然名叫波妮法希娅。世上和这个温柔的名字判然不同的东西倒是不少，可只有她名列第一。这个女人面目丑陋，大嗓门，举止粗鲁。简直是一个长了女性生殖器的中士。她身高一米七十，身宽六十厘米。两只乳房好似两座小山头，已经不属于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对象，而属于山岳形态学的范畴。要不是因为巨大的臀部抵消了乳房的沉重分量，她肯定要不停地朝前栽。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用揶揄的口吻说：“我一直搞不

清楚,到底是波妮法希娅的乳房大呢,还是贝纳贝的脑袋大。”波妮法希娅浑身毛茸茸的,肌肉丰满,两只手和巴斯克樵夫的那双手不相上下。她的表情,一举手,一投足,全都粗野得让人恶心。总而言之,在她身上找不到一星半点女性的特征。贝纳贝的叔叔在得知他和波妮法希娅订婚以后,曾经断言:“谁爱上这么个半男不女的人,谁准是个搞同性恋的。”

如果说波妮法希娅在肉体上是个丑八怪,那么在精神上、道德上她就是个恶魔。她贪婪,她忌妒,她仇恨人类。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贞节的女人和忠诚的男人。她没有一丝高尚的情操,没有一毫恢弘的气度。她那张嘴是不住喷吐怨恨岩浆的火山口。贝纳贝的怯懦时常惹得她火冒三丈。她动不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把胸中的怒火全都撒在倒霉的丈夫身上。

对这一门荒唐的亲事,贝纳贝说惟一的解释就是叔本华的兴趣论。根据这一理论,不成对的东西可以成对地出现,理由是男人要从女人身上寻找他所没有的属性和机能,反过来,女人也要从男人身上寻找她所没有的特性和品德。

“波妮法希娅体格健壮,力大无穷,这些我都没有,”贝纳贝常说,“我有世界观和对生活的伦理观念,这些她都毫无所知。因此,我们相辅相成……”对夫妻生活的悲剧,贝纳贝就是用这种天真的诡辩来安慰自己。

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叫黑诺维娃。在给大女儿做洗礼的时候,贝纳贝想起了布拉班特的女儿。大儿子叫胡安·雅科沃。这是贝纳贝阅读《社会契约论》^①受到启发,给儿子起的名字。二儿子叫莱昂。贝纳贝给二儿子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同

^① 《社会契约论》的作者是让·雅克·卢梭,法语 Jean Jacques 相当于西班牙语的 Juan Jacovo.

时纪念托洛茨基和托尔斯泰^①。不过那些嚼舌子说，这个名字十分贴切，因为他本来就是“母狮子”下的小崽儿。

黑诺维娃嫁给了一个老实的商人。正因为他老实，才接连几次破产。如今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肯尼迪城的一幢公寓里，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胡安·雅科沃和莱昂则还住在父母身边。胡安·雅科沃是个好孩子。他尊重贝纳贝，承认父亲的才华，发自内心地怜悯父亲。他不止一次在波妮法希娅面前挺身而出，保护贝纳贝。二儿子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专爱打架斗殴。他继承了母亲那份邪恶的秉性，和她一样对贝纳贝又是仇恨又是蔑视。有几次，他把贝纳贝骂得狗血喷头，还有一次几乎要动手揍他一顿。

胡安·雅科沃是银行出纳员。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攻读法律。每天经他手的钱不下几十万比索。可是到了晚上，他只有一张五比索的票子，买一杯咖啡、一个面包。他是职员工会的领导人，组织过几次争取提高工资（顺带说一句，他的月薪是一千二百比索）的罢工。劳工部长自称是“争取社会权利的旗手”，然而他几次宣布胡安·雅科沃组织的罢工是非法的颠覆活动。银行经理认为胡安·雅科沃是危险的共党煽动分子。他说：“连这个儿子的名字都说明他是个革命党。”论工资，论工作效率，胡安·雅科沃早该得到提升，可银行经理一连六次拒绝给他晋级。

胡安·雅科沃远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然而，跟他父亲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他喜欢读书，头脑聪明，感觉敏锐，品行端正。他母亲认为，就凭这些特点，他根本不可能干好律师的职业。波妮法希娅说过：“一个老老实实的律师早晚得饿死。”胡

^① 列夫·托洛茨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俄语为 Лёв，相当于西班牙语的 Leon，含义为“狮子”，即英语 Lion。

安·雅科沃尽管年纪不大,可在行动上却能够严格地约束自己。今年才二十五岁,已经成熟得像个五十岁的人。他节衣缩食,拼死拼活地工作,终于凑起一个藏书八百册的图书室,收藏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讲法学、社会学、历史和政治的。他不抽烟,不喝酒,酷爱古典音乐和戏剧。他很讨厌妈妈的俗气和弟弟的浅薄。

莱昂是个哥伦比亚—美国式的人物,恰好他学过英语的学校也叫哥美专科学校。在他身上,美国人的特征远远超过哥伦比亚人的特征。他尽心竭力的模仿“世界主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他为自己的生身父亲感到羞耻,也为自己的国籍感到羞耻。他还没有掌握好英语,可西班牙语已经忘掉了一大半。他说的话是两种语言的大杂烩。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看见了一起事故。从一幢正在建造的楼房上掉下一块砖头,正好砸在一个行人的太阳穴上,行人立刻昏倒了。一名警察过来处理这件事,莱昂这样讲述了事情经过:“您看, my dear Agente从这个 building 上掉下一块 brick, 砸在这个 man 的 one hundred 上,他没有 yes 过来。”不用说了,他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里任职。成天嘴里嚼着口香糖,不住气地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香烟,对摇滚乐简直是如醉如痴。

他宁肯在纽约一家餐馆里洗盘子,也不愿意当哥伦比亚总统。他认为,西奥多·罗斯福^①夺去巴拿马是办事不彻底。他说:“他根本用不着费什么 work,只要 say ‘I took Colombia’,今天咱们不都成了 United States 的 one 了吗。”为了表示亲美,他干脆把自己的教名改为 Lion。

尽情地寻欢作乐是莱昂的一大嗜好。对他来说,世界就是

^①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1901—1909 任美国总统, 任内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武装干涉。

舞场。他每周两次邀请一位金发女郎参加在“玫瑰红河马”举行的迪斯科舞会。这位女郎是个舞女，身材窈窕，穿着超短裙。两个人疯狂地扭动，直跳得精疲力尽为止。他正式结了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他长发披肩，喜爱印度大麻和L.S.D.^①。

莱昂·贝纳尔和他父亲、和他哥哥胡安·雅科沃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和他母亲的共同点就是粗俗的实用主义，庸俗，动不动就发脾气。

贝纳贝抽抽搭搭地走进卧室。听见孩子们的议论，他伤心透了。大儿子的同情使他深受感动，二儿子的秽言恶语使他万分痛苦。贝纳贝往床上一坐，两手抱住脑袋，不由得大放悲声。

“哭哭啼啼的干什么？”波妮法希娅已经躺下了。“喝醉了就嚎丧……老不正经！都一点啦，快躺下，关灯！”

“我可受不了啦……”贝纳贝用手帕捂着眼，呜呜咽咽地说，“我招谁惹谁啦？你打我、骂我，孩子瞧不起我，我犯了什么罪啦？我也有权利娱乐娱乐嘛……”

“你的权利就是尽到自己的义务，给孩子们做个榜样……！”
“冤家”大吼一声。

“你把权利和义务搅混了……”贝纳贝低声下气地回答。

“少跟我来这套什么形而上学啊哲学的！”“冤家”气哼哼地说，“又娱乐娱乐了，你以为你娱乐得还少啊？每回拿到那点可怜的退休金，就找你那两个狐朋狗友，那对不要脸的东西一块下酒馆、逛窑子，像阔佬儿似地拿钱不当钱……”

“我不想喝，可安布罗希奥非拉着我……”贝纳贝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① 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是一种麻醉药物。

“又是这一套！你是个窝囊废，对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少废话，别哭哭啼啼的……立刻躺下，要不我再给你两耳光子！”“冤家”下完命令，翻了个身，冲墙睡了。

贝纳贝·贝纳尔老实地躺下，对老婆的命令不能讨价还价。再说，她又那么身强力壮。这时，他想起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一句话：“当危险超过希望的时候，鲁莽并非勇敢，撤退也不算逃跑。”想到这里，在他唇边又出现了那特有的苦笑。他慢慢腾腾地脱掉衣服。衣服穿久了，上面千疮百孔。他看着破烂衣服，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小心翼翼地叠好衣服，挂在椅子背上，然后换上那件百衲衣式的睡衣。关上灯，战战兢兢地钻进被窝。他那位“冤家”像修道院院长似地安静地睡着了。贝纳贝合上眼，打算快点入睡。可是，睡魔偏偏不来赴约。他觉得头疼，口干舌燥。既然睡不着觉，只好回顾一下这一天的经历。在拉门塔希奥内斯墙根底下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又累又冷，直等到领取退休金的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后来，在内格拉·伊菲赫妮娅的酒馆里度过了安适的一天。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和卢佩托·梅德拉诺进行政治辩论，开些庸俗的玩笑。搭乘出租汽车，闹了一场虚惊。和他那位“冤家”见面，令人羞愧难当。再就是儿子的议论。总之，先是喜剧，后是正剧。贝纳贝在黑影中笑了笑，想起了拉法埃尔·努涅斯^①的一句正合他眼下处境的诗句：“按照和谐的规律，一切欢乐的原因也是痛苦的根源。”想到这里，他又觉得心安理得了。最后贝纳贝进入甜蜜的梦乡——一个躺在刽子手身边的殉道者可能达到的甜蜜的梦乡。

^① 拉法埃尔·努涅斯(1825—1894)，哥伦比亚政治家、作家，1880年至1894年曾任哥伦比亚总统。

二

和拉·坎德拉里亚区的修女们一样，太阳一大早就起来了。接着，像一个照常规办事的老人，开始了从东到西的例行散步。

毫无疑问，“曙光”和“晚霞”是世界文学中最陈旧的题材。瓦加斯·维拉先生笔下的绚丽夺目的场景能使读者眼花缭乱、深受感染。谁能忘记那些五彩缤纷的景色呢？面对着神奇的清晨、壮丽的黄昏，哪位诗人舍得撂笔呢？然而，在1975年，再写什么日出日落，可就成了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了。

好吧！只要说这么几句就够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穷人心急如焚，忧心忡忡；阔人大吉大利，财源茂盛。

上午九点钟，太阳高悬在万里无云的晴空。天气炎热，人们觉得波哥大城仿佛下降了一千米。当初，堂·冈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①决定在兀鹰栖息的地方建造京城。在像今天这样的赤日炎炎的上午，波哥大人一定认为他的决定是情有可原的。

贝纳贝·贝纳尔披着一件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旧晨衣从盥洗室走出来，不料迎面碰上了他那个“冤家”。

“洗完身子啦，现在该洗洗灵魂了！昨儿晚上你犯下那么多罪孽，你得好好说一说，忏悔忏悔！不要脸的酒鬼！”

贝纳贝假装没听见。他唇边挂着微笑，径直回到卧室换衣服。穿上仅有的那件黑礼服后，朝饭厅走去。

^① 冈萨洛·希门尼斯·德·克萨达(1495—1546?)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一名律师，1536年征服新格林纳达，两年后建造波哥大城。

早饭是一盘菜汤(四分之三是白水，四分之一是牛奶，汤里漂着一截香菜，像个随波逐流的遇难者)、每餐必喝的糖水和一个半比索一个的面包。家里人往桌上端早饭，贝纳贝翻阅起报纸。

报上的主要标题是“生活日用品全面涨价”、“发展部长宣布说：生活费用得到控制”、“国家机关查出三千万件盗用公款案”、“总检察长说：我们为吏治腐败设下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贵妇人手中发现价值一千万比索的可卡因”、“父亲为贫困所迫，杀死妻子和四个儿子后自戕”、“八名军人遭伏击身亡”、“国防部长声称：颠覆活动遭彻底镇压”、“工业巨头在麦德林被绑架”、“公安局长称：今年是安全年”、“提高议员津贴法案业已通过”。贝纳贝把报纸逐页翻阅了一遍，没找到劳工部长答应颁布的调整退休金法令。最后，他读了读社论，标题是：《哥伦比亚——美洲的天堂》。

吃罢简单的早餐，贝纳贝·贝纳尔准备出门。每天，他那位“冤家”发给他几个零用钱。出去之前，还得等着领钱。

“哟，又要上街呀？”波妮法希娅酸溜溜地问道，“今儿个上哪儿去喝啊？我看出来了，你跟那帮酒肉朋友又约会好了……走吧……干这种事你也不怕自己岁数大了，兜儿里也有钱了……给你十个比索，揣好了……别胡乱花……”

贝纳贝打算吻一吻波妮法希娅的面颊。她气呼呼地躲开了。

“滚开，撒旦！留着唾沫亲亲昨儿晚上跟你在一块的那个女流氓去吧！……”说完，她车转过身子。

老头儿来到街上，一时间犹豫起来。“往哪儿去啊？”他自言自语地说。到那不勒斯咖啡馆，在烟雾弥漫的气氛中跟三四位

退休职员扯些陈芝麻、烂谷子？贝纳贝觉得挺无聊的。他需要灿烂的阳光和清净的空气。他猛然想起，公园是穷人寻开心的天地。于是，打定主意乘公共汽车前往“国家公园”。

贝纳贝登上一辆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司机打破了物体不可入性的物理定律，在容纳五十位乘客的车箱里居然装载了一百三十人。乘客当中，至少有四十位不住气地抽烟。车窗关得严严实实，车里热得难以忍受。从乘客的脚上、腋下以及身体其他部分散发出来的气味真不亚于窒息性毒气。车上的收音机拧到最大音量，播放一首刺耳的墨西哥“兰切拉”调^①，七台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着七家不同电台的节目。汽车开到每个拐角，都要下去一位乘客，然后上来十位乘客。孩子哭，老太婆咳嗽，男人扯着嗓子骂街，什么脏字儿都用上了。赶上司机猛一煞车，总有五十位乘客一下子压到别人身上。这时候，只听得一片难听的咒骂声、痛苦的“哎哟”声和其他不堪入耳的话语。三排男男女女挤满汽车通道，到站的乘客根本无法下车。贝纳贝·贝纳尔用手和胳膊肘连推带搡，总算打开一条路，紧紧抓住一根金属立柱。他浑身上下热汗淋淋。车上人的臭气熏得他一个劲犯恶心，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吵得他脑袋似乎要炸裂开来。每隔两分钟，乘客们就争先恐后地朝车门挤来，狠狠地踩他的脚。“活动地狱”总算停下了。司机不愿意早停车，把汽车开过“国家公园”，又过了五条街。贝纳贝“心力交瘁地”下了汽车。

几辆最新式的小卧车从贝纳贝身旁急驰而过。每辆车上只坐着一个人。“想想吧，”贝纳贝心里说，“这些人肯定从来没有尝

^① 一种民间曲调。

过我刚才受的那份儿罪……”他倒背着手，唇边挂着永不消逝的微笑，慢慢地一直走到“国家公园”。他顺着一条大道朝前走，大道两旁是草地和花坛。然后在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摘掉帽子，解开背心的扣子，松开领结，伸直两腿。阳光从贝纳贝的头顶上直洒下来，和风吹拂着他满头白发。贝纳贝终于来到自己的乐园。

几个脸蛋红润、头发金黄的孩子在左边的草地上嬉笑打闹，旁边站着几位保姆。看见这群欢天喜地的儿童，贝纳贝不由得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往事从他脑海深处纷乱地涌现出来。他想起那幢简陋的故居、母亲慈祥的面容、父亲冷若冰霜的神情、哥哥姐姐的模样；儿时的游戏、学校、最初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凌辱；因胆小怕事而屡遭失败的青年时期；因无力搏击而白白度过的成年时期以及回顾潦倒一生而倍觉凄凉的晚景。他这一生可以说是虚度年华、一事无成，受尽妻子的责骂殴打。孩子怜悯他又鄙视他，朋友们揶揄他。

贝纳贝觉得似乎有人在他耳边说：“你本来可以成为伟人，可你偏偏成了个微不足道的侏儒！”“你本来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塑造成一尊完美无缺的神像，可你偏偏端出个布娃娃！”“过去、现在、将来你都是个穷鬼，你那份聪明、你那些文化知识都干什么去了呢？”“你干吗总用自己的头脑为他人做嫁衣，而不干些于己有利的事呢？”“唉，贝纳贝、贝纳贝啊！说来说去你是个窝囊废！”这个不光彩的绰号从年幼的时候起就跟着他。现在还在敲击着他的耳鼓：“窝囊废！”“窝囊废！”“窝囊废！”

贝纳贝坐在木凳上一动不动地回忆起过去，沉思默想地度过了几个时辰。保姆领着孩子们走了。孩子们的喊叫声、欢笑

声消逝了，四下里一片岑寂。太阳渐渐西垂。眼前的情景使贝纳贝联想起胡安·洛萨诺的一首十四行诗中第三段结尾部分：

沐浴着夕阳的余晖，
记忆仿佛垂下额头，
寂寞地点数着死去的亲人。

于是，贝纳贝也点数起自己“死去的亲人”。他是个怯弱的人，在和生活环境展开的力量悬殊的搏斗中，什么理想、什么雄心、什么希望都纷纷被击毙，倒卧在他人生的路途上。蓦地，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把自己的历史写下来。他满怀深情地思索起这件事，开始酝酿如何写好一部自传。贝纳贝兴冲冲地从木凳上站起来。他要通过这部自传发泄出满腔怨气，对所有剥削过他、凌辱过他的人进行报复。夜色笼罩了公园，寒风抽打着树木。贝纳贝朝家里走去。

当天晚上，贝纳贝开始写自传。一连几个月，他把回忆、经历写在四百页纸上。一旦结束了这项耐心的工作，他又害怕了。他担心书中提到的人会恼羞成怒，对他施加报复。一个出版商读到贝纳贝的手稿。他认为这部手稿是一个人生活的宝贵见证，很值得印出来。于是，他劝贝纳贝把这部自传拿去出版，贝纳贝当即一口回绝了。有一天，这部手稿偶然落到笔者手中。笔者读完手稿，得出的看法和出版商完全一致。于是，决定利用一下这部手稿。

下面就是本书主人公叙述的一个人——一个本来可以成为大人物但又没有成为大人物的人——的历史；一个看起来平庸无奇、微不足道的人的历史；一个被胆怯奴役了一生的波哥大

的阿米尔(瑞士人)^①的历史；一个受尽剥削的人的历史；一个绝顶聪明、道德高尚但被同代人称为“窝囊废”的人的历史。我们还是让贝纳贝·贝纳尔自己来谈谈吧！

我出生在波哥大。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会挑地方，而是上帝和父母的恩赐。我认为，以我的情况而论，生活在波哥大比生活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称心如意。堂·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把波哥大比作所有哥伦比亚人的可亲可爱的保姆。波哥大是一座雅致大方的大都会，不管什么人在这儿都能有吃有住。波哥大以苦为乐，善将悲剧化为喜剧。波哥大人生性诙谐，嘻笑间能使一切问题不了了之。为了显得待人亲切，她宁说假话也绝不失礼。她头脑强健、心胸宽广，总爱向人伸出援助之手。

上帝具有无穷的智慧，知道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故此安排我出生在波哥大。他知道我不会有安蒂奥基亚人的开拓精神，不会有桑坦德人的正直秉性，不会有博亚卡人的内在精明，也不会有沿海居民的欢快性格，因此命令我出生在波哥大，并且赋予我“黑鹰和金石榴城市”的儿女们所具备的一切优良品质和缺点。

我的父母未经我本人同意就把我带到人间，我不晓得应该责备他们还是宽恕他们。凡“肇事人未能预见其行为的结果或虽已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是为过失犯罪。因此父母在孕育我的时候，他们犯下的过错是典型的过失犯罪。我可以原谅他

^① 阿米尔(1821—1881)，瑞士人，《私人日记》的作者。他曾取得明显的成功，但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日记》从1847年起一直记到他逝世为止。

们。但是有一点我不能原谅他们，上帝也不会原谅他们，那就是他们的故意犯罪，即他们利用受害者无力自卫，出于恶意，故意犯下的罪行。我指的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这个名字加在我的姓上根本不成其为名字，而只是“同音重复”。

我的父母——我来到人世要由他们负责，我刚才指出的语言上的毛病也要由他们负责——是一对和谐的伉俪。我父亲身材矮小，瘦筋巴骨，黑头发，黑眼睛，上唇蓄着一小撮黑胡须，仿佛是鼻头的延伸。很明显，他的相貌和查理士·卓别麟颇为相似。走路的时候两腿朝外撇着，两脚跨着八字步，头戴一顶小圆帽，手拄一柄木杖，看上去更像卓别麟了。他走起路来，仿佛两脚踏在水皮上。朋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水上漂”（《水上漂》是当时流行的一支华尔兹舞曲的标题）。人人都这么叫他，我觉得实在够滑稽的。他从来不苟言笑，那股严肃劲儿和鼯鼠不相上下。偶尔开开口，说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几句话。

我母亲个头儿也不高。有点神经质，特别好动，上肢、下肢还有舌头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拿爸爸的话来说，她“连胳膊肘儿”都会说话。干起各种家务活儿来，总是那么快当。居住在周围十条街以内的太太们都是她的朋友和乡亲。不过，她最亲近的故交和知心人还是圣·犹大·达太^①、帕多瓦的圣·方济各以及炼狱里的善良的灵魂。她待人无比宽厚，特别疼爱爸爸、哥哥、姐姐和我。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没见过第二个像她那样会料理家务的女人，像她那样能干的家庭主妇。

爸爸和妈妈懂得互相体谅，从不吵架拌嘴。只有妈妈才有本事让爸爸露出笑容。只有爸爸才有本事让妈妈闭一会儿嘴。

① 耶稣的十二信徒之一。

他们和平相处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这件事实在不多见，完全能称得上是个“奇迹”。

在三个孩子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出生的时候，大哥塞拉芬已经十岁了，二姐托玛莎八岁。每逢想起哥哥、姐姐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我都不禁要问自己：“既然存在动物保护协会，为什么没有保护无自卫能力的婴儿的协会？这些协会应该阻止父母在给孩子洗礼的时候犯下的有伤美学的错误。”塞拉芬！托玛莎！贝纳贝！做父母的给他们的爱情果实挑选这样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牌号，究竟是哪家王法或天条赋予他们的权利？

我和哥哥、姐姐的年龄相差太多，这给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毫无疑问，对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消极影响。塞拉芬和托玛莎总是用蔑视的眼光看我，把我当成木偶、侏儒、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他们从来不叫我参加他们的游戏，每时每刻都让我觉出我比他们矮三分。动不动就打我，嘲弄我。因此，我的童年是孤独的、阴郁的。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我五岁那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当时的世界只限于故居——跟我眼下住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墙壁、屋顶、院子和后院。对什么是城市生活，我还很生疏。我一直住在玻利瓦尔广场南面的居民区。那儿的房屋都是平房，街门很大，有门厅、走廊、两重院子和一个后院。这些都是本世纪初建造的房屋的主要特点。我没什么事干，惟一关心的就是吃饭、睡觉、玩耍。我最爱吃的是小甜饼、小甜面圈和牛奶甜粥。这些吃食都是我们家的女佣人奥洛希娅从拐角的商店买来的。奥洛希娅是博亚卡省的农妇，梳着两条辫子，围着条大围裙，穿一双草鞋。我的玩具是一个球、一只铁

环、一辆木头车、几个玻璃球儿和几个铅做的小兵。

我一个人玩，就要想出各种主意。不用说了，这就磨炼了我的想象力。我一个人要分别扮演三四个不同的角色。譬如，有一阵子我想当个建筑师。于是，我用泥巴把石块、砖头、木头粘起来，在后院里盖房子。我既是房主，又是建筑师、泥瓦匠和负责安装供水管道的管子工。有时候我一个人玩“侦探捉贼”。我又要当罪犯，又要当警察，最后自己逮住自己。

在我眼里，人类就是我周围的人，我把他们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里有圣婴、守护天使和妈妈；坏人里有“科科”^①、魔鬼、爸爸、哥哥和姐姐。圣婴是个小慈善家，在圣诞节前夜他送给我玩具。守护天使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金黄头发、蓝眼睛、白翅膀，他保护我不受阳间和阴间的恶人的侵害。妈妈是个善良的妇人。她给我吃的，时常吻我，胡噜我脑袋。“科科”是神话里的人物。人们常拿“科科”吓唬我，逼我喝汤。我压根儿没见过“科科”，连画像也没看见过。照我想，他是个面目狰狞的黑老头儿，两眼露着凶光，心肠十分歹毒。魔鬼嘛，照我看是个妖怪（当时我还不不懂什么是“同义叠用”），头上长着一对大犄角，唇上蓄着克利马科·索托·博达式的胡须，还有条尾巴，龇着三颗牙齿。爸爸是个偏心眼儿、让人讨厌的老头子，动不动就骂我，用的词儿我根本听不懂。他还常打我屁股。最后，哥哥、姐姐都是恶魔，他们千方百计欺侮我，弄得我简直活不下去。

^① “科科”是用来吓唬小孩的妖怪。

坏人这边儿的人数比好人多一倍。这边儿是六个人，那边儿只有三个。每次交手都是坏人取胜，归齐还是我倒霉。譬如说，圣婴每年只露一面，而“科科”和魔鬼天天夜里都来吓唬我。我压根儿没看见守护天使用翅膀扇过哥哥、姐姐，让他们别再不住气地欺侮我。最后，妈妈亲吻我、爱抚我，却抵不上爸爸对我的训斥和体罚。从切身感受中，我领悟出一个道理：坏人老是占上风，老是压过好人。

星期天是“放风”日，我可以到外面看看。妈妈用一只小木桶给我洗澡，然后擦粉，掸点儿香水，给我换上丝绒上衣、漆皮鞋、白袜子，再给我戴上一顶帽子，交给我一根小手杖。妈妈、爸爸、哥哥、姐姐也都梳洗打扮一番。上午十点钟，我们全家一起到大教堂、圣·伊格纳希奥教堂或圣·克拉拉教堂去望弥撒。望着望着，我睡着了。爸爸狠狠地拧了我一下，把我拧醒了。我大叫一声，打断了神父的布道，惹得善男信女们直提抗议。这时候，哥哥塞拉芬推推搡搡地把我撵出教堂。走到门廊，在我屁股上连踢两脚，一则惩罚我对宗教无动于衷，二则惩罚我破坏神圣的典仪。

有一回，家里人带我去“独立森林”公园。那是个星期日，我们在圣·迪埃戈教堂望弥撒。我一准是闹失眠了，这一次居然没睡觉，所以安然无恙地走出教堂。随后，家里人带我去露天音乐会，最后去玩旋转木马。我骑上一匹木马，一前一后地摇来摇去，开心极了。一不小心，失去平衡，摔了个嘴啃泥。这一下摔得不轻，脸上青了好几块。

“窝囊废！怎么不抓好了？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了！”爸爸一边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一边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窝囊废”这个要命的字眼儿叫我。从那

儿以后，我不止千百次听到这个称呼。当时，我摔懵了，心里想准是魔鬼推了我一下，而守护天使又玩忽职守，没有飞过来拉我一把。爸爸太不公道的了，比判处耶稣死刑的人还欠公道。

和往常一样，坏人打败了好人，我又充当了牺牲品。妈妈教给我每天晚上做祈祷，祷词是：

守护天使，我亲密的伙伴，
白天黑夜，望你把我照看……

那天晚上，为了报复一下守护天使，我干脆不做祈祷了。

在我童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领圣餐。爸爸给我买了海军服、水手帽、漆黑锃亮的皮鞋、大蜡烛、带子、祈祷书、念珠和雪白的手套。我站在镜子前一照，嚯，我简直成了另外一个孩子啦！由于我刚才说过的那些痛苦经历，我的宗教信仰大为减弱了。不过，妈妈还是想方设法让我明白，这一天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基督的肉体一旦进入我的体内，我将进入一个难以描绘的幸运时代。妈妈切开圣饼，递给我一份儿。到此为止，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塞拉芬突然朝我扑过来，劈手夺走我那块圣饼，撒腿就跑。我急忙追上去，最后赶上了他，问他：

“你干吗抢我的圣饼？”

“我乐意！”塞拉芬回答说，“我是大哥，我有权先吃！你不高兴吗？”

“说实话，我不高兴……”我吓得要死。

“不高兴，拿去……！”说着，他从我手里夺过大蜡烛，照

我脑袋上就是一下子。他使的劲很大，蜡烛断成了两截儿。

我疼得要命。用手捂住脑袋，张开手一看尽是鲜血。血水滴落在崭新的海军服上。精神上的痛苦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我咧开嘴哭了起来。妈妈赶忙跑过来，给我擦干净伤口，绑上纱布。她温柔地吻了吻我，就去找爸爸告状。爸爸正在客厅里和几位朋友说闲话。塞拉芬一看我头破血流，连忙溜到大街上去了。

过了几分钟，爸爸进来了，气哼哼地对我说：

“太不像话了！为了块圣饼就这么闹！……还是第一次领圣餐日……当着客人的面，你也不害臊？昨儿个刚给你买的衣服，瞧瞧弄成什么样了……”他看了看我衣服上的血迹又加了这么一句。

爸爸如此蛮不讲理，把我弄愣了。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五十六年了。可这些话给我留下的可怕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领圣餐（差一点儿成了我的“临终圣餐”）后过了几个月，我考进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我很快学会了认字，轻松愉快地掌握了女教师教的算术、地理和历史的基本知识。我发现我是个机灵孩子。同时，我也发现我胆子特别小。老师一问功课，我的脸就涨得通红，浑身发抖。笔试我的分数全优。一到考口试，就糟糕透了。当众讲话，我吓得要命，把功课忘得一千二净。同学们很快就看出我是个胆小鬼。“胆小鬼”过去和现在都是“窝囊废”的同义词。这下子，我成了全班公认的“窝囊废”。我的苦难历程也从此开始了。班上三十位同学都成了“刽子手”。他们朝我扔泥球儿、橘子皮，藏我的书，用绳子绊我，往我的笔记本上洒墨水。我上黑板的时候，他们敲我后脑勺儿。

他们违犯校规，把过错一古脑儿推到我头上。

这些“小土匪”的头目是欧斯托希奥·马查多，一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从外貌上看，具有龙勃罗索^①笔下的罪犯的特征。他很爱炫耀自己的力气。做游戏的时候，横冲直撞，拳打脚踢，谁站在跟前就把谁打翻在地。全班数他最好打架斗殴。我呢，偏偏有幸被他选中为俎上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我是谁，想必你也知道……谁敢不听我的，我就砸烂他的脑壳！从今儿个起，你替我做作业，考试的时候给我递小抄儿……你要是不干，就是活腻了！……你摸摸！”他伸出右臂，我摸了摸，好家伙！肌肉硬得像我家厨房里的磨盘。

“好吧，我很乐意……为您效劳……”我心惊胆颤地回答说。

这话一出口，就等于我为自己的厄运签字画押，为自己的自由竖下墓碑。从打那时起，我沦为暴君的奴隶。他是男恶魔，我是给他配对儿的女鬼。只要他挤挤眼儿，努努嘴儿，或者做一个难以觉察的表情，我就得像机器人似地立刻照办不误。每天我要替他完成作业，还要完成我自己的作业。考试的时候，替他捉刀。为此，老师不只一次取消我考试资格。他得五分，我吃鸭蛋。爸爸责罚我，我算罪有应得。光用知识帮忙，他还嫌不够，还要我从经济上帮他忙。他每天守在校门口，见了我把手一伸，一声不吭，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只好把妈妈给我买上午加餐的五分钱交给他。到了下午，他还是一声不吭，照此办

^① 塞萨尔·龙勃罗索(1836—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

理。我只好整天忍饥挨饿。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鼓起勇气，打定主意找校长告状，讲清我的难堪处境，求他保护。我哆哩哆嗦，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把我的悲剧讲了一遍。

“这儿是男校，不是女校！”校长回答说，“我不能给每个学生当保镖啊……从你的话里我听出来了，你是个窝囊废，那个孩子知道你是废物……你别不动劲儿啊！跟他顶啊！要当个男子汉嘛！”说完，校长背过身去。

我真笨！把跟校长说的话告诉了我同座的同学。这小子真不够朋友，为了表功把事情告诉了马查多。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那位“屠夫”把我拉到校园的一个角落里。

“看样子你不光是窝囊废，还是个马屁精。你以为凭你打个小报告就会把我开除？臭蛤蟆，来吧，学一学怎么管住舌头！”他照我下巴上就是一拳，打得我离地几厘米，摔出三米远。

我被摔得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等醒过来的时候，只见周围站着几个孩子，在哈哈大笑。我的同座儿站在校园中间，高高托起马查多的胳膊。“拳击冠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左顾右盼。

对压迫的反抗全然无济于事。我只好听天由命。那时候，我已经十二岁了。七年前，我曾经想过，人类分成好人和坏人。现在我想，人们分成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这个随心所欲的分工中，我被列入了后一类人——这就是我的结论。

哥哥、姐姐对我缺乏手足之情，同学们对我十分反感。面对生活中这样不友好的气氛，我转而从读书中寻求解脱。我贪

婪地阅读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能够读懂的东西：《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鲁宾逊漂流记》、胡利奥·凡尔纳的作品和埃米利奥·萨尔加里的作品。

爸爸从来不读书，可他从爷爷那里继承下一大批书。尘封的书籍放在储藏室的两个壁橱和四只箱子里。我如饥似渴地在希腊、拉丁、西班牙和法国的清泉里痛饮甘露。我用柏拉图、欧斯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贺拉斯、维吉尔、普鲁塔克、塔西陀、斯维托尼乌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拉辛和高乃依代替了哥哥、姐姐和同学。我的文化水准竟然超过了老师。

一天，教文学课的老师要我们每人就读过的书写一篇作文。我读过《堂·吉珂德》，而且读得津津有味，得益匪浅。于是，我写了一篇《堂·吉珂德》读后感。用了二十五页纸分析这部小说。我把拉曼却的游侠骑士的缺乏理智的理想主义和他的随从的世俗的功利主义作了比较，我认为，正如《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①中所说的，我们每个人一半是吉珂德，一半是桑乔。作为出自我那个年龄的儿童之手的作品，这篇作文可以说是鞭辟入里，文笔在我看来也是无可挑剔的。我十分骄傲地把作文呈交给老师。

过了两天，老师派人把我叫到备课室。没错，一准是要夸奖我几句。我高高兴兴地走出教室。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胜仗。哪儿能老不顺当啊！

“你坐下！我要非常严肃地跟你谈一谈，”老师说，“你要说

^① 《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是法国小说家都德（1840—1897）的作品。

实话！这篇东西是从哪儿抄来的？”老师拿着我的作文问，“是谁写的？你父亲？要不，哪位作家是你们家的朋友？这不可能是你写的……！”

“这篇作文是我写的，老师……”我期期艾艾地说，“我发誓……”

“你不但想糊弄我，还要起假誓？”老师气呼呼地说，“我没闲工夫去调查，证明你是从哪本书上抄来的，或是有人口述、手写……算你走运吧。欺骗人，你要吃大亏的！你只配得零分！”说罢，老师把我的作品撕得粉碎，丢进字纸篓里。最后又加了一句：“你可以走了！”

这一棒子把我打懵了。胜利变成了可耻的失败。我完全胡涂了。过了几分钟，我才苏醒过来，自言自语地说：老师不相信这篇作品是我写的，他认为是抄来的，要么是哪位作家写的。这就是说文章写得十分精彩。我确确实实具有文学才能。这一发现使我感到宽慰。此外，据我想，调查者毁掉罪证，恰好说明他也怀疑我是有罪的。

过了一阵子，我的猜测被证实了。老师叫到我那儿去，对我说：

“说实在的，说你抄袭文学作品，或者别人代你作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兴许是你写的。什么事都会有嘛……想去掉疑心，我倒有个办法。我妹妹是学商的，快毕业了，得写一篇关于‘自由交换和保护主义’的论文。她没有时间写，我也没空儿。你知道……你干吗不写一写呢？你要是有本事写出关于《堂·吉珂德》的论文，也可以替我妹妹写这篇论文嘛……给你个机会，当着我的面儿给你恢复名誉。……你瞧，我待你有多好……”

我已经习惯于白替别人干事了。欧斯托希奥·马查多代表同学们逼着我替他们做作业，我照办了，每天至少为十五个同学完成作业。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只能睡上两小时。考试的时候，我还要为全班同学打“小抄儿”。所谓“小抄儿”就是几块小纸片，上面用蝇头小字抄上试题的答案。学生们把纸片藏在鞋子里、长袜里，一有机会就偷偷地抽出来，靠这些纸片回答试题。“自由交换”也好，“保护主义”也好，我都一无所知。于是，我从一套百科全书里找出有关的卷，读了三本讲“自由交换”和“保护主义”的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论文。后来，老师告诉我，论文得了奖，毕业那天大家长时间冲着他妹妹欢呼。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改变上次判给我的分数。我是文学课的优等生，却落得倒数第一。

十五岁那年，我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胆小怕事。干一件事，我显得胆小怕事；不干一件事，我也显得胆小怕事。每当哥哥、姐姐、同学拿我开心，骂我打我的时候，我恨不得做出激烈的反应，可是总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阻止我这么做。每当有人张嘴要我做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我便立刻想到拒绝这种无理要求，可是舌头偏偏不听使唤。除了怯懦之外，我还有个毛病：哪一项体育活动我都不行，既没有天分，又缺乏灵巧。至少我是这么看的。我不参加同学们的游戏，更加证实了他们的看法：我是个窝囊废。

我的文学才能大家都知道。这也没能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机灵鬼儿”这个词，在学生的行话里等于是“天才”。同学们认为，我是个“机灵鬼儿”，可我还是个窝囊废。他们常说：“贝纳贝在写作文上是机灵鬼儿。可惜太窝囊……！”

另外，我的文学才能还引起了许多人的忌妒。比如，他们

这么说：“贝纳贝那个窝囊废成了百事通了……谁受得了！”结果，我在学业上取得的进步不但没能改善我的处境，反而使我的境遇每况愈下。我不只是同学们嘲笑的对象，还是他们忌妒的目标。我除了要替他们完成作业外，还要为老师的亲友们写论文，起草毕业生离校演讲词。

在我们班上，有个名叫费明·萨尔加的学生。此人少年老成，显得很成熟。他的主要特点是性子耿直，敢做敢当，从不撒谎，也不拍老师的马屁。他不赞成同学们对我的看法，也不参与别人对我的嘲弄。他身上有一股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从认识费明的第一天起，我对他就很有好感，其中还夹杂着敬佩之心。是他用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最终摆脱了“恶棍”马查多——我们大家都这么称呼马查多这个头号刽子手——的桎梏。有一天，在校园里他看见“恶棍”要揍我，就赶忙往我们俩当间儿一站。

“你是个野人，很有把子力气……”他用平静而有力的语气说，“我是个体面人，没什么力气。你揪住我脖子，能把我脑袋拧下来。可我告诉你，不许你打贝纳贝。有力使力，无力使武器。你要是胆敢碰他一下，我马上回家把我爸爸的手枪拿来，连打你六枪。好吧，有胆子，你打他吧……！”

“野人”吓呆了。他把举起来要打我的拳头垂了下来，低下头，转身走了。十位围观的同学也都吃了一惊。世上有所谓“感激之情”，这我知道。可是，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对谁产生过感激之情。我一句话没说，向费明伸出右手，激动地握住他的手。我觉得眼睛里噙满泪水。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保护我。我终于找到了朋友。

我的确有很多缺点，但是没有忌妒心理。只是此时此

刻，我忌妒了。以后，直到现在我一直忌妒费明·萨尔加的铮铮铁骨。对于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他的行为真可谓侠肝义胆，仗义勇为。我不只一次想过，假使上帝恩赐我这样一种性格，我的生活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

从打发生我刚才提到的那件事以后，我们俩成了朋友。我们一起学习。有时候他到我家来；有时候我到他家去。星期日，我们相约去奥林庇亚宫、法恩萨剧院或波哥大剧院——这是当时仅有的几家剧院。有一次，我们去看斗牛。用木板围起的斗牛场坐落在拉·雷维卡湖对面。还有一次到东巴尔马戏场看演出。马戏团有五十只野兽、二十个小丑、三十名吊杆演员和耍杂耍儿的。野兽真叫我失望，我的同学比它们凶猛得多。一天，我们一起到欧罗巴咖啡馆玩台球。这是我第一次打弹子球。咖啡馆在第二皇家大道上。当时我们还不满十八岁，可是咖啡馆的一个服务员还是偷偷地放我们进去了。费明教我抽烟，还和我讲了人类繁殖的奥秘。

我听了，不由得大吃一惊。说来也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十五岁的孩子都相信婴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只白鹤把他们带到人间的。费明撕下帷幕，我张大惊恐的眼睛，面前出现一幕令人恶心的场面。原来性行为是男人对女人的可鄙的侵犯。“这怎么可能呢？”我问自己，“人类最崇高、最纯洁、最高尚的感情怎么会表现为这么一种血淋淋的痛苦的行为，表现为最粗野的禽兽行为呢？”从那时起，这个不愉快的先入之见在我的性生活中投下了阴影。

虽然我胆小怕事，虽然一想到肉体接触就感到恶心，可我还是喜欢女人。我是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读到《玛丽

娅》^①、《清风紫罗兰》^②，朗诵马努埃尔·阿库尼亚^③和何塞·阿松森·席尔瓦^④的诗篇，我总要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天下午，从我身边走过一位俏丽的妙龄女郎。漆黑的头发果壳似地披散在她后背上，面孔跟象牙一样白润润的，真是皂白分明。她那双眼睛好像天鹅绒，鼻子端正，小巧玲珑，一张小嘴标致极了。我直瞪瞪地望着她，看得她直发笑。我的心简直翻了个个儿。我打定主意跟着她。她凭女性的本能大约猜出了我在转什么念头，走几步就扭过头来看看我。看见她一再投来的目光，我鼓起勇气继续尾随下去。最后她到家了，过了几分钟出现在窗前。是时候了，我应该走向前去。可是，走到街角我停住脚步，不知如何是好。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两脚被钉在地上。就这样一直站了半个小时。我觉得脸上滚烫，浑身轻轻地颤抖着。她看见我畏葸不前，可能大失所望，于是关上窗子，回到屋里。

第二天，我在同一时刻又来到她家窗前。她从窗口探出身子，似乎正在等我。只见她满面含春地望着我，分明是要跟我攀谈几句。从那副神情上看，我不仅不是个可有可无的人，而且博得了她的好感。她根本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只要朝前跑十五米，我就能站在她跟前。然而，我又感到一阵恐惧，直觉得一双铁手牢牢地拉住我的两脚。我心中犹疑不决，不住地盘

① 《玛丽娅》是哥伦比亚作家霍尔赫·伊萨克斯(1837—1895)的小说。

② 哥伦比亚小说家瓦加斯·维拉的小说。

③ 马努埃尔·阿库尼亚(1849—1873)，墨西哥浪漫主义诗人，有诗集《献给罗萨里奥的小夜曲》。

④ 何塞·阿松森·席尔瓦(1865—1896)，哥伦比亚诗人，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他的《第三首夜曲》是一首备受推崇的爱情诗。

算：“过去？不过去？过去？”也不知道一动不动地站了多长时间……要是有人寻找一个扮演傻瓜的演员，那么世上最出色的演员也无法和我相比。最后，她蹙起双眉，耸了耸肩，似乎在说：“这可不能怪我，我能做的全做了。”接着，她离开了窗户。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我这事干得真像个笨蛋。怪不得大家都叫我“窝囊废”呢！我一定要在这位素昧平生的漂亮姑娘面前挽回名誉。不娴于词令，我会写信啊！再又一说，写信还可以展现一下我的文学才能。想到这儿，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您真美，不知您是幻影抑或是栩栩如生的塑像？是仙女临凡抑或是肉体成圣？是天上的镜花水月抑或是人间的艺术杰作？我担心幻影消逝、仙女升腾，我担心镜花水月顿成泡影，故此未敢走到您的跟前。请告诉我：是我错了。请告诉我：您也和普通人一样是上帝用泥土做成，是活生生的人。我将匍匐在您脚下，我对您的爱情至死不渝。

您的、永远是您的贝纳贝”

那时候，每天下午五点钟，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姑娘们总爱站在门口。到了那个钟点，我走到恋人门前（她的家就在“烈士陵园”的下一条街上）。果不其然她正站在窗前。我低着头，面孔涨得像胭脂一样通红通红的。没有问候她，连句话也没说，就把信交到她手中。然后退下来伫候佳音。

过了几分钟，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我即将赢得初恋的胜利。蓦地，大门打开了，走出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我未来的内弟。他两眼瞟着我，仿佛在

看一只恐龙。突然他放声大笑，然后又面带微笑地走过来对我说：

“这是姐姐叫我交给你的……”

我神色紧张地打开小孩儿交给我的纸片，读道：

“我不是什么幻影。我只是个处女，直到出嫁前仍是个处女。但我不会嫁给您。再倒霉，我也不能嫁给一个傻瓜，特别是一个名叫贝纳贝的傻瓜。我愿向您进一言：要是哪位姑娘挑动了您的心，您就该当面告诉她，不必写这些不三不四的傻话……在我爸爸回来之前，该消逝的是您。”

我的灵魂一下子飞到九霄云外。我习惯于接受各种打击，可是直到此时哪一次打击也没有这一次来得厉害。我在肉体上、精神上曾经受到百般折磨，如今又在感情上遭到第一次挫折。我给托波索的杜尔希内娅写了一封信，却从阿尔冬莎·洛伦索^①那儿收到回音。

后来，我不只一次地问过自己：这封回信究竟算什么？是经过巧妙的构思写出的一封精采的幽默信呢？还仅仅是女人看到一个胆小的男孩子干傻事的时候做出的天真无邪的、合情合理的反应呢？

那天下午，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和苦涩的灵魂发誓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谈什么恋爱了。我还发誓说：一定要效仿费明·萨尔加的榜样，克服胆怯，战胜懦弱。然而，在我一生中却屡屡违背这番誓言。

^① 见《堂·吉珂德》。

说到这儿，我想应该把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波哥大的城市环境描绘一番。我以为，这种环境在塑造——准确地说，在歪曲——我的个性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环境大大加重了我的怯懦天性。

波哥大是个安静的宗教村庄，一个停滞在中世纪的村镇。只有三十座教堂的钟声不时打破静谧的气氛。迷信思想和惧怕鬼神的心理统治着全镇居民。这里的人谨小慎微，神情庄重，一律身着黑衣黑裤。谈话的题目还是什么“钉掌的骡子”；什么堂·安赫尔·列伊；什么“喧嚣的时代”；什么鲁西博士的罪愆；什么“胶桤木”；什么萨格拉里奥·莫拉莱斯。

关于妖魔鬼怪的恐怖传说在居民中广为流传。据说，每一株无花果树——家家后院都种有无花果树——底下都埋着一座神堂。夜半更深，居民们在无花果树周围看见过奇怪的绿荧荧的亮光和没有脑袋的神父。

执政者是个愚昧无知、假仁假义的家伙。政权之上还有一个执掌神权的阶层。谁当共和国总统全由他们决定；国家朝哪个方向前进全由他们左右。协调社会关系的是一种虚情假义、随机应变的道德。善良的公民们星期一造孽，星期二忏悔；星期三又犯罪，星期四再表示悔悟；星期五亵渎上帝，星期六又谈什么内疚。到了星期日就休息了。太太小姐们在街上看见“放荡的女人”，立刻在胸前划个十字。阅读瓦加斯·维拉的诗作被视为大逆不道。

做父亲的咬牙切齿地用鞭子抽打自己的孩子。当老师的恶狠狠地责打学生，戒尺能在学生的手掌心上断成两截儿。一个“年岁大、地位高、有权有势”的人随便放个屁都是金科玉律。二十岁以下的孩子被当做小猫小狗，在大人面前只能低眉顺眼。大

人出门不让他们跟着；大人说话，不准他们插嘴；对任何问题，他们都无权发表意见。他们和一些僧侣、尼姑一样，必须做到一尘不染、缄口不言、服服帖帖。抽烟、谈恋爱、阅读未经教会许可的书籍均属罪大恶极，必须严惩不贷。儿子必须老实地接受老子的政治思想，而老子往往又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就连长辈的喜怒哀乐，他们也没有继承下多少。孩子选择什么职业，全由做父母的一手包办。从襁褓时起，女孩子就注定要当修女或者教师，男孩子就注定要当神父、律师或者军人。就中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是啊，我那一代人出生在恐怖主义制度之下，又在恐怖主义制度下长大成人。我们时常受到父兄、“科科”、魔鬼、老师和“花狗子”（当时我们管警察叫“花狗子”）的恐吓。地狱的烈火、撒旦的三叉戟、父亲的鞭子、老师的戒尺、“花狗子”的警棍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头上晃动。恐惧成了我们唯一的动力。

我生来就胆小怕事。自卑感像盲肠似地伴随了我一生。波哥大的环境是胆怯的培养液。有时候，我想，假如我是在自由自在、人类尊严得到尊重的环境中长大，或许我能够治愈这种情绪上的疾病，至少可以控制其发展，不让它滋长，我也不至于变成一个可怜虫，变成各色人等可以随意奚落的对象。

1929年，波哥大开始由村镇发展成为城市。三十座教堂的钟声被淹没在二十五辆电车的轧轧声、二十辆出租汽车和十五辆私人小轿车的喇叭声中。小汽车开始取代了马车。哥伦布剧院和市立剧院遭到电影院的邪恶的挑战。最后几台手摇留声机让位给最初几架电唱机。每年的圣周^①和学生节成了人们宣泄感

^① 圣周即复活节前一周。

情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些机会举行宗教活动和狂欢活动。

风流倜傥的波哥大人衣冠楚楚地坐在英吉利咖啡馆或温莎咖啡馆，一个个文质彬彬，谈吐风雅，交谈的内容都是些流言蜚语。他们站在阿兰卡普鲁马斯大街拐角处，对过往的女士们大肆恭维一番。在金瓶酒家畅饮阿纳托尔酒。在“艳丽宫”、“美人堂”大摆龙门阵。和敢于冲撞他们的“小玩闹”挥舞老拳。入夜，则去寻花问柳。上流社会的娇小姐们浓妆艳抹，头戴狐皮圆帽，从自家窗口探出身子或者望完十一点的弥撒站在维拉克鲁斯教堂门口，向过往的公子哥儿挤眉弄眼。手艺人身披斗篷，头戴巴拿马草帽，足登草鞋在九国酒家、绿洲酒家或红帽酒家痛饮奇恰酒^①，喝醉了就互相捅刀子。

老百姓吃饭好似一场马拉松赛跑，从早上六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九点钟结束。比赛可分为六个阶段：早饭、上午加餐、午饭、下午加餐、晚饭和夜宵。这还不够，还要从小多罗特亚冷饮店购买冰淇淋，从爱尔兰饮食店购买香烟，从宝莉娜·加西亚那儿买蛋卷，使食谱更加丰富。

这里的生活十分平静。没有震耳欲聋的噪音，也没有空气污染。没有大大小小的公共汽车或面包车。没有电梯，没有电视，也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没有格利耶斯演唱会或迪斯科舞会。没有拦路抢劫，没有绑票，也没有人贩卖毒品。没有“哥伦比亚巡礼”广播节目，也没有足球比赛转播。所谓“尾巴”只是“四蹄动物脊椎骨的延长部分”，而不是一群傻瓜在剧院门口排列的望不见尽头的长龙^②。至于印度大麻，人们才刚刚听说

① 奇恰酒是用玉米发酵制成的酒。

② 西班牙语 cola 有两个含义，即“尾巴”和“排长队”。

这个东西，因为没有它，破车就开不动。

当时，米格尔·阿瓦迪亚·门德斯博士仅在公余（所谓“公”事者即打野鸭、玩台球、讲授宪法）时间才处理国事。政府里实权人物是国防部长伊格纳希奥·伦西弗和绰号叫“奇奇默科”的公共工程部长阿图罗·埃尔南德斯。

保守党的权力大厦出现了裂罅，显出摇摇欲坠的样子。堂·霍尔赫·罗亚提出一个支撑大厦的方案，即在这座破败建筑的每一个窟窿里架起一支步枪。不过，看来也于事无补。自由党正在窥伺时机，企图把预算夺回来。是啊，自由党人已经多年未占肥水了，只有恩里科·奥拉亚·埃雷拉博士和法比奥·洛萨诺·托里霍斯博士还在驻华盛顿和利马的使团中继续为共和国献身。

在遵从父命这一点上，我是很保守的。

“你必须跟我一样是个哥特佬^①！”爸爸曾经对我说，“咱们国家最显要的人物全是保守党人，像堂·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堂·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奥斯皮纳将军^②和马埃斯特罗·瓦伦西亚。相反，自由党里最突出的人物是内格罗·马林、乌里亚斯·罗梅罗和图利奥·巴龙，他们全是潘乔·比利亚^③一类的土匪。再又一说，所有自由党人都是无神论者，他们注定要在十八层地狱里受火刑。天堂的大门对我们哥特佬却大敞四开……”从哲学上说，这就是他拥护保守党事业的理由。

① 在拉丁美洲某些地区对保守党人的蔑称。

② 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保守党人，1922年至1926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③ 潘乔·比利亚（1877—1923），墨西哥1910年革命中的杰出的农民领袖。

6月7日那一天，我起得很早。起来后就去上学。看校门的人告诉我，校长怕出乱子决定停课一天。过了几分钟，我的好朋友费明·萨尔加来了。我把停课的消息告诉他，并建议我们一起到市中心去兜个圈儿。

我们穿过玻利瓦尔广场，顺着第一皇家大道朝北走。从气氛上看，确有动荡不安的迹象。每个拐角处都聚集着一伙市民。他们高声叫喊，比比划划，挥动拳头。警察巡逻队急匆匆地在街上走来走去。

当时，正好爆发了一场抗议“罗斯卡”的运动。“罗斯卡”是由“奇奇默科”、伦西弗、昆迪纳马卡省省长卢佩托·梅洛将军和市政府的几位高级官员组成的社团。他们把波哥大据为己有，到处安插自己的亲朋好友，把政府预算当作战利品中饱私囊。波哥大市市长路易斯·奥古斯托·库埃沃不赞成“罗斯卡”的行径，结果被撤职。这件事使民众义愤填膺，忍无可忍。

突然，我们看见从桑坦德公园那边走过来一支游行队伍。我们俩好奇心胜，也加入到队伍里去。示威者高呼：“打倒‘罗斯卡’！”“打倒‘奇奇默科’！”“伦西弗下台！”示威者走到第二皇家大道，在一幢房子跟前停住脚步。这时候，阳台上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发表演说，一开头引用了米拉波^①在国民议会上的讲话：“我们在这里代表人民的意志，能把我们赶走的只有刺刀……”话音未落，几十名警察高举警棍，向我们直冲过来。

“来了一批警察……！”我连忙告诉费明。

“再不跑，就要当替死鬼了……”费明大喊一声，撒腿就

^① 米拉波(1749—1791)，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之一。

跑。

人群像变魔术似地一下子分成几堆。大家四散开来，只有我吓得动弹不得。我在想：“逃跑等于自认有罪。”我纹丝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打算找个门洞躲一躲。我故作镇静地慢慢踱步。蓦然觉得背上狠狠地挨了一下子，耳边听到一个声音：

“让你假装窝囊废！瞧你这副熊样儿……！”我扭过脸，看见一个蓄着两撇胡子、长得圆滚滚的“花狗子”。他手持警棍，刚才打我的就是他。我心里想：“坏了！这家伙把我认出来了。”

“花狗子”抓住我一只胳膊，把我带到格朗德广场对面十道街的警察总局。

“我抓来一个混蛋。他喊着要打倒政府，还向警察扔石头……”警察向局长报告说。

“啊哈，你想打倒政府，是不是，小伙子？”局长从眼镜上边望着我问道，“你攻击合法政府……干得漂亮！”

“局长先生，谁我也不想打倒……”我哆哩哆嗦地回答，“刚才那一棒子差点儿把我打倒，是……”

“少跟我来这套鬼画符！”局长打断我的话头儿，大声嚷道，“警察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你带到这儿来吧？……你是自由党还是好人？”

“我是好人……说得准确点儿，我是保守党……局长先生……”我回答说，“我就是好奇心胜，没别的……”

“哼，就是几个像你这样好奇的人拿下了巴士底监狱，割下了路易十六的脑袋……”很显然，局长为能炫耀一下自己的历史知识感到骄傲。“再说，我看你不是保守党。我们保守党人都循规蹈矩、奉公守法，不会专找三条腿的猫……我要拘留你七十二小时！秘书先生，请你起草一份判决书！”

“可是，局长先生……”我吓得嗫嗫嚅嚅地说。

“什么‘可是不可是’的！”局长说，“你再多说一句，我就加倍处罚你！”

像在父母、哥哥、姐姐、老师、“恶棍”马查多以及所有欺负我的人面前一样，我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说来说去，我命该如此。别人来到世上是为了享乐，而我生下来就是为了受罪。我被带到一间普通牢房。牢房里坐着几个人。一个披头散发的臭女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喝得酩酊大醉。一个老家伙，眼中露出淫荡的目光，伸出手来要抚摸我。还有一个扒手，他走上前来，问我犯了什么罪。

我的处境真叫人哭笑不得。像我这样一个胆小怕事、怯懦无比的人居然成了危险万分的阴谋家……！我唇边露出一丝疑惑不解、自我嘲弄的微笑——这是我特有的一种笑容吧。

这一天，所谓“民主”的神话、言论集会“自由”的闹剧、“正义”的喜剧在我面前第一次被剥下假面具和伪装。我总算明白了，在堂·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①的共和国里，宪法和法律跟威廉二世眼中的国际条约一样，不过是张废纸。

过了七十二小时，狱卒打开牢房大门，对我说：“跟我走！”随即对站岗的高声喊道：“出去一个！”

我作为反对宪制政府、破坏国家安全的严重罪犯，服完了刑。回家的时候，心里战战兢兢，等待我的还有第二次处罚。费明·萨尔加从远处看见我被捕入狱，早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我爸爸。爸爸火冒三丈，手里拿着鞭子迎了出来。

“倒霉鬼！小流氓！恶棍！我的儿子居然跟红色异教徒搅在一

^① 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1792—1840)，哥伦比亚政治家、军事家，于1831年至1837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处，推翻政府！把裤子、衬裤脱下来！”

我顺从地解开裤子。和往常一样，我往桌子上一趴，露出了屁股。鞭子雨点般地打下来。三下、五下、七下、九下、十一下……痛得我昏厥过去。最后，爸爸打累了，我提上裤子，盖住了供他发泄怒火的部位。

第二天，旷课三天之后我回到学校。同学告诉我，要我先去找督学。我马上去了。

“听说你参加了反政府暴动……”督学对我说，“还为这个被抓起来了。你的错可不轻啊。要是教育部知道学校里出了反政府的捣乱学生，就会下令封学校的门。本来应该把你开除。可我不想伤害你，更不想伤害你爸爸，他为你能受点教育已经付出不少代价了……不过，有过必罚。张开手！”他下完命令，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戒尺。

我平摊开右手，闭上眼睛。真不知道哪一下打得我最疼。过了几分钟，我走出督学处，手掌肿得攥不上拳头，眼泪顺着两颊直往下淌。

为了好奇，我受了三次处罚。我还接受了“民主”的洗礼。从切身感受中，我知道了国家的共和体制是如何运转的。警察杀害了一个名叫贡萨洛·布拉沃·佩雷斯的纳里尼奥省的学生。这就是说，有人比我受到更残酷、更不公正的对待，我也只能借此聊以自慰了。

三

爸爸去世对我的影响不太大。甚至可以说，我松了口气。他和我之间根本谈不上什么父子之情。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工头和工人的关系。他从来没有吻过我，抚爱过我，从来没有说过

一句谅解我的话。爸爸成天板着脸孔，寡言少语，老是皱着眉头。他只会下命令，大声呵斥人。为了让人服从，他唯一的法宝就是鞭子。掌刑人丧命了，自然不能非叫受刑人感到遗憾不可啦。坦白地说，爸爸一死，我觉得得到了解放。

哥哥塞拉芬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了婚，住在萨巴纳的一座庄园里，吃喝全靠她，总算有了归宿。姐姐托玛莎不像他那么走运，嫁给了一个老酒鬼。这家伙收入本来就不多，可把四分之三的工资喝了酒，四分之一抽了烟。要说尽到做丈夫的义务嘛，他倒是尽心竭力，乐此不疲。结婚七年，两个人一共生下七个孩子。

全家只剩下母亲和我两个人。全部家当就是我们栖身的那幢老房子，那还是爸爸从祖父手里继承下来的。为了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爸爸去世后几个月，妈妈不得不把故居抵押给一个投机商。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一岁了。高中未能毕业，可我还是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是国立图书馆的最忠实的读者，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把世界文学的基本著作全部吞进肚子里。我还时常就各式各样的问题写些评论。我自己觉得词汇不断丰富，风格日臻优美、成熟。当时，我很喜欢刑法。我认为世上最崇高、最美好的事业莫过于从社会不正义的魔掌中解救那些出于愚昧无知或为饥饿所迫铤而走险的人。我陪同我的好朋友费明·萨尔加到法学院去上课。我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课，连眼皮也不眨一眨。老师说什么，我记什么。这样过了几个月。有一天，老师定定地看着我，问道：

“看样子，我讲的课你都听懂了。请你说一说是超出预想罪，并举例说明……”

我一听，吓得要命。老师一定会发现我是来偷偷听课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站了起来，直觉得体似筛糠，脸烧得

滚烫。

“超出预想罪，”我回答说，“是指结果超出了行动人的预想。罪例：某甲打了某乙一拳，某乙摔倒了，头盖骨碎裂，造成死亡。肇事者不想杀死对方，只是想打伤他……”说完，我一屁股跌坐在位子上。

“你有点紧张，不过回答得很好，”老师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张了张嘴，想要回答，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坐在我旁边的费明·萨尔加代替我回答说：

“他叫贝纳贝·贝纳尔……老师，我得说明一下，他不是本院的学生，是来旁听的……”

“这就是说，你犯了欺诈罪！”老师厉声说，“当律师的荣誉是要花一定代价才能换来的。看起来，你又想当律师，又不想花一分钱……不错，这里是法学院，可对恶意也该有个限制……我命令你马上离开教室！”

我谁也没看，在学生们的喊喊喳喳声和哄笑声中离开了教室。我不但是个政治犯，还成了狡狴的骗子手，居然惊了法学老师的大驾。我想：“其实，上帝是爱我的，他要拯救我的灵魂，因此才在我争当律师的途中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上帝要我成为一个忠诚老实的人，我一定照他的神圣的意志办事。”想到这儿，我凄然一笑。

我得要自己养活自己，还得养活妈妈。为此，就要挣钱。挣钱不外乎两个办法：一是干活儿，二是到有钱人那儿去抢。抢钱可以用心计，也可以用暴力。要用心计，作案人必须具有出色的理财能力，善于运用知识经营好一家银行或保险公司。要用暴力，作案人就得是粗野的强盗，值不得别人同情，只能受到王法天条的惩处。

这两种犯罪的方法都和我的秉性格格不入。权衡来权衡去，我只能有一种选择：干活儿去。到哪儿去干？干什么？我啥也不会。我的知识仅限于文学。而文学于公、于私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我叔叔达马索·贝纳尔是个很有特点的人。他善于雄辩，在家人当中素有“哲学家”的美誉。我们碰上什么事，都爱找他讨主意。我决定登门拜访，谈谈我的问题。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对我说：

“在咱们国家里，像你这样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只好当国家职员。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此事只能如此。要想谋得一份公差，必不可少的是要有人任命。要想有人任命，非得加入执政党不可。要想入党，只须相应的党部点个头就行。要想让党部点头，就得和某位执委交上朋友。要想和某位执委交上朋友，请他吃顿饭就行了。要想请人吃饭……”

“就必须有钱，可我没有钱……”我情不自禁地说。

“查拉图什特拉^①就是这么说的，”叔叔回答说，“糟糕的是我也没钱……不过，我倒有个办法。我和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是好朋友。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家。眼下是众议院议员。只要他一推荐，无论哪位部长都会当成命令去办。要想让他帮忙，就得说你是自由党。要想让他相信这一点，就得证明你的确是自由党。要想证明你的确是自由党，就得向他证明你爸爸也是自由党。要想证明你爸爸是自由党，就得让他相信你爸爸是为自由党事业而献身的先烈。要想让他相信这一点，就得制造一段历史。要想制造历史……”

“就得找一位历史学家……”叔叔说起话来没完没了，我只

① 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创始人。

好下死命地打断他的话头，“我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叔叔，您是蒙德拉贡的朋友，您跟他说说我的事。告诉他，罗哈斯·加里多、印第安人乌里维和本哈民·埃雷拉将军绑到一块也不如我更相信自由党。再告诉他，我爸爸是让保守党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让保守党杀害的，是让保守党活埋的。最后，还告诉他，妈妈和我快要饿死啦，这可是百分之百的实情……”

雄辩的叔叔接受了我的建议，和蒙德拉贡博士谈了一次。过了两天，我来到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办公室，一次又一次，一连去了六个月。

1930年6月，自由党整整挨了四十五年饿之后，又登上了官僚盛宴的餐桌。奥拉亚·埃雷拉博士——他声音低沉，有着一副蒙古人的脸型、美国人的躯壳和灵魂——击败了保守党，当时，保守党分成两派，一派以吉列莫·瓦伦西亚为首，另一派以阿尔弗雷多·瓦斯盖斯·科沃为首。

原来的实权人物堂·霍尔赫·维莱斯、希门尼斯·洛佩斯博士和堂·彭波尼奥·古斯曼从部长名单中消失了。他们那些用高薪和旅差费喂得脑满肠肥的同党也被饿红了眼的自由党人撵下了台。

政府自称是“爱国者集中联合体”。然而想谋得一份公职，还得要加入自由党。也许“集中”的含义是指权力“集中”在独断专行的奥拉亚总统手中吧。

波哥大人也好，政治家也好，从来不说个“不”字。波哥大人担心说“不”字会失去朋友；政治家们担心说“不”字会丢掉选票。赫雷米阿斯·蒙德拉贡博士是波哥大的政治家，故此有双重理由不说“不”字。造化没有赋予蒙德拉贡博士伟大的天才，他本人也从未打算达到高度文化水平。可是，他很狡猾，很机

敏，具有官场行话里称之为“耍手腕”的本领。在一次有五百名代表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上，他居然像变戏法似地获得五百五十张选票。在全省的各个市，在市内的各个区，他有几百位同乡和义子。他常跟他们一起品尝各式各样本地的美味佳肴和国产及进口的名酒。亏得他记性好，无论何时何地，一下子就能认出他们，而且叫得上每个人的名字和姓。至于受到他保护的人，那更是不可胜数。公共机关门口的指示牌上到处都有他的卡片。

朋友们管他叫“魔法师”蒙德拉贡。他身材魁梧，脑袋特别大，据说里边装着丰富的思想。他模仿奥拉亚·埃雷拉博士的样子，总爱把脑袋朝右边歪着。蒙德拉贡博士神情庄严，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接触，总是摆出一副国务活动家的架势。他假装耳沉，谈话的时候，爱把耳朵凑到说话人嘴边五厘米的地方，让人觉得他在津津有味地听人讲话。他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是善于掌握声调起伏。每逢讲话，像演戏一样，声音忽高忽低。这样一来，区区小事到他嘴里也像是泄露什么机密大事。他还用表情、手势来制造气氛。挤眉弄眼，挥动双手，像贝塔·辛格曼一样在空中画出上千种花样。显然，他在全中国享有巨大的声望。在众议院里，他占据头席宝座，是他那个党的党团主席。每逢某部、某省政府或共和国总检察院出现空缺，人们总要提到蒙德拉贡的大名。

我在前厅里等了整整两个小时。女秘书把我带到这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的办公室。

看见我进来，他站起身，张开两臂朝我走过来。

“亲爱的朋友！”他抬高嗓门说。“我最亲爱的朋友！”他重复了一遍，这次压低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不过，您肯定不是我的同乡，也不是我的义子。他们，我一个也不会忘

记……”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

“鄙人没有这份荣幸……”我回答说，“我叔叔达马索·贝纳尔跟您提起过我……”

“噢，想起来了……请您相信，承蒙大驾光临，本人感到万分高兴……”他用忽上忽下的声调说，“请坐！达马索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的确，他说起过您。说您是一位伟大的自由党人，令尊也是伟大的自由党人，为此还遭到哥特佬儿的迫害……”

我强忍着，总算没笑出来。想想看，几小时前我还是“铁杆儿”保守党。我想起了爸爸那套宗派情绪。有一次搞选举，爸爸在乌内市当市长。他给昆迪纳马卡省省长发来一份电报，上面说：“自由党滥用多数，正在本市获胜。如何处理？”

蒙德拉贡博士接着说：

“令叔说，您和令堂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您要找份儿工作……本人很乐意帮忙。这没什么！我想，您大概没什么专长。不过这也无关紧要。您和我在一个党。您又是本党烈士的后代，这才是最重要的……幸而我的影响很大。请您留下名字和地址，”他拿出一个笔记本，“下星期一，同一个时间，请您再来一趟……我担保把工作给您安排妥当……”

我高高兴兴地走出来。这下子工作算是有着落了。妈妈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但是，我却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成了光荣的保守党的逃兵，我背弃了何塞·欧塞比奥·卡罗^①和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②的不朽的学说。我为了几块银币改换门庭。我把自己比作加略人犹大。思

^① 何塞·欧塞比奥·罗（1817—1853），哥伦比亚保守党的创始人，军人和诗人。

^② 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1805—1875），哥伦比亚政治家，1857年至1860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前想后，我自言自语地说：“就连努涅斯博士^①都可以从甲方转到乙方，为什么偏偏我不能这样做呢？1885年努涅斯博士的处境固然窘迫，但到底不像我眼下这样捉襟见肘。”末了，我想起了储蓄所在号召人们存钱的时候使用的那句话：“别人行，我为什么不行？”想到这里，心中也就释然了。

下星期一，四点整，我来到我的新政治首长和大恩人的办公室。

“博士很忙，”女秘书对我说，“您要是愿意的话，请坐下来稍等一会儿。”

前厅里坐着四个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四位也是前来谋事的。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望着我，分明猜出了我是来和他们争位子的。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在看报。另外一个人脑袋一点一点地在打瞌睡。其余两个人在闲聊天。

“您还抱什么希望吗？”

“我看希望越来越小了……博士答应给我安排工作，说话快一年了，可……连影子也没有！”

“哟，那我还算好的啦，我才等了七个月……可如今我连可典当的东西也没有啦……不怕您笑话，今儿个早饭、中饭我还没吃呐……家里还有五口人张着嘴等着……”

“我还不如您呐！您知道我住在哪儿吗？在圣·费南多！我是走着来的，连五分钱的电车票钱也没有……谁知道该怎么办啊！”

“要有耐性……要相信蒙德拉贡博士。大伙儿都叫他‘魔法师’，那可不是随便叫的……您知道他在公共工程部安置了多少

^① 拉法埃尔·努涅斯原是自由党人，1884年组织了国民党，其成员大多数来自保守党人，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保守党人。

人吗？三十七个！听说，还把一个又聋又哑的瞎子安置在邮电部！咱们的运气不好，不过也用不着泄气……”

我本来挺乐观的，这番话不啻给我泼了一桶冷水。可又一想，既然“魔法师”大大方方地把一个听不见、看不见又不会说话的人安排进公共机关，像我这样五官俱全又颇有文学修养的人，他更不难安排了。

我的四位竞争对手严格地按先来后到的次序一个个被请进了蒙德拉贡博士——这位杰出的“考迪罗”^①——的办公室。每个人在里面呆十分钟。出来的时候，面孔都比进去以前拉长了一大截子。最后出来的就是那个不得不从家里走到这儿的人。我认出他来了。他走过我身旁，对我说：

“我看博士在给大伙儿分糖吃……我真腻烦了，不想再来了……”

在波哥大的俗话里，“分糖吃”就是假许愿，胡弄人，让人老觉着有希望。听了竞争对手悲观的论断，我感到心情很压抑。我最后一个走进蒙德拉贡博士的办公室。

“亲爱的蒂莫特奥！”蒙德拉贡博士一边伸出右手一边大声嚷道，“看到您，真高兴……”

“请原谅，博士，我叫贝纳贝……”我忐忑不安地回答说。

“啊，应该请您原谅我的口误……不过您一定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像那个……正像那个那个谁说的来着……好吧，反正有人说过。当然啦，您的名字是贝纳贝！哎呀，要说心灵感应，可确实是有。此时此刻，我正在想着您呐。您听我说，到现在还没有……不过，会有的……您自管放心。明天

^① “考迪罗”原指割据一方的军事头目，后引申为军事独裁者。有时也用来称呼掌握军事力量的独裁政客和向追随者宣扬个人崇拜观念的政党领袖。

我刚好要和财政部长共进午餐。我一定利用机会把您的事办一办……星期五我等着您，还是这个时候，不见不散……”

听了“魔法师”最后这几句话，我的精神又为之一振。一位如此严肃认真、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不可能拿我取笑的。他的口气情真意切，毫不含糊。把我的名字记混了，这算得了什么！贵人多忘事嘛！说老实话，到此时为止我一直把他看成是贵人。在我前面进来的那个人显然缺乏信念。否则，就是他想说得我灰心丧气，退出这场竞争。

星期五，我再次来到“魔法师”的办公室。据他说，部长没去赴宴。“不过，明天，”他接着说，“巴西使团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能见着他。”他约我星期一来，时间照旧。星期一我去了。他跟我寒暄几句以后，又说他本人身体不大舒服，没去赴宴。他又说，星期五等我。就这样一连过了二十四个星期一和二十四个星期五。总是不断出现困难、不便以及人力难以克服的变故，使这两位人物无法会面。我凭着上帝恩赐给我的温顺，耐心地等啊等啊，等待着出现奇迹。

“只有像你这么窝囊的人才相信他们会替你安排工作。你告诉那个老头子，别再给你吃糖啦……你就说你有糖尿病，糖吃多了身子受不了……！”一天，费明·萨尔加对我说。他一直在关心我这样一天天的徒劳往返。

“蒙德拉贡博士是位诚实君子，”我回答说，“他一片好心，可惜无能为……”

“什么一片好心、一片歹心！”费明反驳说，“他是个卖糖的，所有搞政治的全是卖糖的……他们当中有哪个敢对人说个‘不’字……”

这段时间里，我家越过越穷了。妈妈无法按期交付赊欠利

息，债主已经开始议论要我们把房子卖掉。为了每天的开销，我们把钢琴以及客厅和厨房里的家具变卖一空。每日六餐减为两顿可怜的粗茶淡饭。妈妈仅有的几件首饰躺在旧货店里。我们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衫。贫困的魔影在故居的房间里徘徊。如今故居已是家徒四壁，再过不久就要落到他人手中了。

最后牺牲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手中还有一件无价之宝，那就是书籍。书籍是我唯一的兄弟和挚友。只有书籍不殴打我，不嘲弄我。只有书籍向我露出微笑，对我表示亲热。书籍是使我童年时代心情欢畅的唯一玩具；书籍是使我青年时代馥郁芬芳的唯一花香。书籍牵着我的手，把我引进一个美不胜收的世界。书籍在心理上激励我，在道德上约束我。书籍为我消忧解愁，为我医治生活留给我的创伤。然而，我不得不卖掉书籍，用精神粮食换取物质粮食。我只能先顾肚子，后顾脑子了。在我看来，这简直是肆意亵渎神灵，是犯下了类似杀害耶稣的罪行。可是，舍此我别无他法。

我挑出几本书，有莎士比亚全集、歌德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都是祖父遗留下来的古旧珍本。我把书夹在腋下，朝位于大教堂后身六道街上的书店走去。书店老板专门收购古旧书籍。走到书店门口，我神色惶遽地停住脚步，仿佛走到火山口一样。出卖书籍就等于出卖我身体的一部分，就等于出卖我的眼睛、嘴唇和双手。想到这儿，我夹紧那几本书，慌忙逃开了，也不知往哪里去是好。

万万没有想到，跑来跑去跑到蒙德拉贡办公室所在的大楼跟前。我没打算到这儿来，也不是跑顺脚跑来的，完全是不知不觉地来到这里。那天不是星期一，也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三。时间不是下午四点，而是上午十一点。然而我还是决定上

楼去看看。我自言自语地说：“无论如何，这是最后一次。”我要让自己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也还可以做到说一不二。

我是谋事的人当中最积极的一员。在“魔法师”的办公室里人人都认识我。开头几次，我来访的时候，女秘书十分尊敬地管我叫“贝纳贝·贝纳尔先生”。可眼下她居然叫我“贝纳贝纳”，还一个劲儿拿我开玩笑。“我认识几个人，”她说，“在他们像您这么年轻的时候，博士就答应为他们安排工作。如今他们已经进了老人收容所了，还在等待分配呢……”我和其他几位谋事的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十分冷淡。现在已经涣然冰释，互相之间异常亲热。我知道大家的名字，大家也知道我的名字。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对我们的处境也常谈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看法。

“喂，贝纳贝纳！”女秘书瞧见我进来，大声喊道，“上回您不是说绝不再来了吗？是凡穷人都不能说：‘我不吃这碗饭。’肚子不饶人啊……”她两眼盯着我腋下的书，又说，“看样子，您是给博士送礼来了……好主意！财能通神嘛……”

我真不晓得如何回答是好。只是点了点头，傻子似地笑了笑。其实，把书馈赠给大恩人倒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再又一说，把书送掉，我也省得把精神变为物质，用卖书的钱换饭吃，这多恶心人啊！明天，我和妈妈吃什么，还是没有着落。不过，可怕的精神冲突总算过去了。

“鄙人不揣冒昧给您带来几本书……”我问候过蒙德拉贡博士后，对他说，“但愿能讨您喜欢……”

“哎呀，这可是久旱逢甘雨……”神情庄重的大人物一边看书，一边用惯用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说，“哎哟，这是歌德的作品，英国最杰出的戏剧家。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德国最伟大的诗人……”

听了这两句话，我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魔法师”一看，连忙问道：“是不是弄拧了？我也没有多大的把握……总而言之，是两位出色的作家……这位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不在他们二位之下……”他翻阅着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又说：“我对他的了解十分详尽，和对您的了解一样……谢谢，太谢谢啦！可惜呀，我还没有得到关于您的喜信儿……这阵子我挺忙。再过五天我得发表一篇演说，到这时候了，一段也没写出来……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有时候，人的脑筋就是那么迟钝……”

我知道机会到了。立刻想起哈辛托·贝纳文特^①笔下的人物克利斯平的一句话：“交情不如送份儿礼，送礼才能往前挤。”我鼓足了勇气，对他说：

“您要是愿意，我可以代为起草……”

说完话，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

“您能写？”蒙德拉贡上下打量着我，问道，“您怎么不早说呢？我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我想咱们会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正式给您建个议：您来写一篇精彩的讲稿，我马上为您安排工作……众议院委托我在阿塔纳希奥·吉拉多特^②半身像揭幕典礼上代表众议院发表演说。题目就是这个。我给您三天时间，好好发挥一下……如果您如期完成，我绝不食言……”

我日以继夜地写了二十页纸，概括了这位英姿勃勃、浑身是胆的上校在二十年中创下的辉煌的业绩。自由是他第一位新婚妻子，也是他终生唯一的恋人。我再现了他的胜利的人生历

① 哈辛托·贝纳文特(1866—1954)，西班牙戏剧家。

② 阿塔纳希奥·吉拉多特(1791—1813)，是哥伦比亚的爱国者。1813年，玻利瓦尔驻守的重镇卡贝略港被西班牙殖民军围困。吉拉多特把祖国的旗帜插上巴布拉峰而英勇献身。

程：他高举新生的祖国的大纛在瓦霍·帕拉塞开始战斗，最后在巴布拉峰上在迎风招展的祖国旗帜下终结了一生。我用炽热的语言颂赞了他那无与伦比的勇气和难以置信的无私精神。写完讲稿，我读了一遍，满意地笑了。英雄的画像完美无瑕。对于他短促而丰富的一生和壮烈牺牲，凡是可以说的，我都用优美动听、准确无误的语言表达出来了。

我急匆匆地跑到蒙德拉贡博士的办公室。女秘书遵照蒙德拉贡博士的指示，当即带我去见他。那三位守候在前厅里的谋事的人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魔法师”认真仔细地把讲话稿读了一遍又一遍。看完了，他从写字台旁站起身来，对我说：

“您把我的意思说得透彻极了。这些话恰恰是我要说的……祝贺您，也祝贺我……词儿是您编的，曲子是我谱的……咱们两个人完成了一篇伟大的演讲词！我看，咱们可以合伙组建一家固定的公司。我出思想，您出词句。我当会思考的头脑，您当会写作的右手……您同意吗？”

当然，我连忙点了点头。蒙德拉贡博士走上前来，向我伸出右手，那股亲热劲儿真令人感动。他用堂·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①在安戈斯图拉^②大会上宣布共和国成立时使用的声调，高声说道：

“蒙德拉贡—贝纳尔公司宣告成立！蒙德拉贡—贝纳尔公司万岁！”

“万岁！”我应声答道，内心里感到很激动。

① 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塞亚(1770—1822)，哥伦比亚博物学家，爱国者，哥伦比亚共和国第一任副总统。

② 安戈斯图拉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城的旧名。

“您已经履行了诺言。我也要说到做到……”“魔法师”说，“Business are business^①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我记得是康德说的。他是德国人，可他也懂得点儿英国话……现任公安局长，是我安排的，他不会不帮忙……再又一说，新近我还在内政部里帮他妹妹找了个差事……我这就给他写信，您亲自送去……好啦，您可以填好表格，走马上任了……”

“魔法师”确实比不上一个打字员。他打字的时候，只用右手的食指。左手攥着一块橡皮，边打边擦。他不住地问我某个词是S还是Z，带不带重音符号。费了一个小时，总算把信打出来了。他签上名，把信递给我，让我读一遍。信上是这么说的：

“敬启者。谨向足下推荐贝纳贝·贝纳尔。持信人系我党党员，其父毕生对党忠心耿耿。贝纳贝经济拮据，然为人诚实可靠。足下尽可信赖此人，贝纳贝当不负重托。此人性格刚毅，机敏勇敢，颇有心计。依鄙人之见，如能进入足下英明领导下之机关，此人堪任侦探。我相信，无论什么任务，无论任务多么危险、精细，此人均可有效地完成。”

读到信中称赞我“性格刚毅、机敏勇敢”那几句，我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没笑出来。再往下，读到推荐我当侦探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怎么会没有哈哈大笑。这件事太出格了，太荒唐了，就像有人奉劝我当斗牛士、驯兽师一样。我受到这么多的惩罚，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压根儿就没弄明白。可如今居然要我这样

① 英语：“公事公办”。

的人去侦破全国同胞犯下的罪行……！我这个人笨手笨脚，连打死个苍蝇也不会，看见自己的影子都能吓一跳。居然要去对付黑社会，冒着枪林弹雨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在刀光剑影中拳打脚踢地和最凶恶的歹徒搏斗……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

我拿着信走上街头，心里开始盘算起来。眼前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在这出悲多喜少的悲喜剧里，我成了主角。蒙德拉贡博士和公安局长过往甚密，我身上这封信其实就是任命书。可我真害怕这份任命书付诸实现。干吗我要去担当这样一个和我的为人、和我的思想感情水火不相容的差使呢？要是让宗教领袖圣·路易斯·贡萨加去讲性变态课，他的心理矛盾肯定不会比我小。现在我只三条路可走：不交信；考核的时候装疯卖傻；任命下来后拒不接受。可是，不管走哪条路，为了解决困扰我的经济问题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办法就算泡汤了。

只有一个念头鼓起了我的勇气：宁肯在十字路口让杀人犯杀死，也绝不饿死。我朝公安局大楼门口走近五次，又走开五次。最后，狠了狠心，还是走了进去。公安局设在一所古老的砖房子里。过去，这儿是一所神学院，里面阴气森森。我估摸着，巴士底监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顺着一道暗幽幽的石头楼梯上了楼。楼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墙上开了几扇尖顶窗户。走廊尽头处就是局长办公室。两边的办公室里有人进进出出。这些人年龄不同，面貌各异，只有一点是共同的：一个个横眉立目，眼露凶光。从哪一张面孔上也看不到丝毫的亲切或善良的表情。此时此刻，我才开始懂得一个道理：那些和罪犯活动进行斗争的人，斗来斗去自己也变得像个罪犯。后来大量的事实证实了这个看法。我问看门人局长在不在，巴不得他今天没来，或是拒不见我。看门的手里拿着报纸，连眼睛也没

抬一抬，厉声问道：

“找他干吗？”

“我带来一封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给他的信件……”
我回答说。

“等一会儿！”他打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过了几分钟。我利用这段时间，默默地祷告上苍：“主啊！千万别让他们给我份儿差使！带我离开这贼窝儿吧！”蓦地，办公室门开了，看门的说：

“蒙德拉贡博士派来的人可以进去啦……！”

一进门，我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黑大个儿。此人身强力壮，膀大腰粗。他伸出手来，使劲握了握我的手，握得我手指头咔咔直响。我把信交给他。看过信后，他定定地看着我。

“从信上的介绍来看，您是一介武夫……可看上去不大像啊……”局长嘲笑地说。

“说实在的……蒙德拉贡博士说的……有点过头，”我哆哩哆嗦地回答说，“至于武不武的……我几乎连武器也没见过……可……我的文化水平不错……”

“在我们这儿，文化顶个屁用！”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什么哲学家，什么诗人，我们都用不上，我们要的是壮汉子！甭管在哪方面，他们都能跟土匪较量一番……该开枪的时候不手软……您想必知道，我们不能派慈善会的修女去抓危险的杀人犯……您在黑社会里有朋友吗？”

“我没有这份荣幸……”我回答说。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是句蠢话。“我是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可以试着结交几位……”

“干吗我要向您打听这个呢？”局长说，“有没有朋友是能不

能成功的关键。我不相信什么科学侦破。据我所知，靠指纹、靠化验室提供的证据破案，还从来没有过……好侦探在黑社会里都应该有朋友，有老乡……这些人一闹内讧，就会你攀扯我，我攀扯你。侦探只须听听他们谈话，破案就算大功告成啦……您见过刑法吗？”

“我从书上读到过宗教裁判所那会儿使用的刑法……”我回答说，“我估摸着现在还会有狠心人用这些办法……”

“您马上就要成为这种狠心人了……！”局长说完哈哈大笑一阵，“您要明白，为了拿到口供，对罪犯动刑是必不可少的……法律不许这么办。可您知道，法律应该服从，但不必执行……”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喷出一大口浓烟后，又接着说：“跟您交谈了几句，我得出了印象：蒙德拉贡博士在信中把您说成是只老虎，可您不大像……依我看，您不是当侦探的材料，不过我还是要委任您……我知道您和我同在一个党里，令尊又是我们事业的坚强斗士，这就行啦……再又一说，冲着蒙德拉贡博士的荐举，我一定照办不误……政界嘛，不外是你帮我，我帮你。他拉扯我的朋友，他的朋友我也帮一把……我立即下一道委任状……”

我听傻眼了，连声“谢谢”也说不出。局长的话说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压根儿当不了侦探，可我偏偏要成为一名侦探了。此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出基督在髑髅地问过的那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她哭了。她说，她是高兴得掉眼泪，可我知道她是难过得掉眼泪。她十分了解我，她清楚地知道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凭直觉，她猜得出等待我的会有多少痛苦和磨难。

那天下午三点，举行吉拉多特半身像揭幕仪式。蒙德拉贡博士要在仪式上致词，或者说宣读我写的那份材料。不用说，我很想听一听。另外，我已经是蒙特拉贡博士的廷臣和被保护人，更有义务参加这项活动了。我来到矗立着吉拉多特半身像的小广场上，那里，聚集着二百来人。一个穿了一身黑的高个子在人群当中跑来跑去，看模样，是个当司仪的老手。他嘴里交待说：

“你们几位站在讲台跟前……！你们站在中间！你们站在那边，靠右边！等头儿一到，大伙儿就喊：‘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万岁！’‘人民的保卫者万岁！’‘劳动者的代表万岁！’他讲完一段，大伙儿一起热烈鼓掌，高喊：‘演讲人万岁！’讲演一完，你们仨把他扛在肩上，围着广场绕一圈儿，剩下的人跟在后边！听明白没有？头儿一到，我就摇晃白手绢，给大伙儿报个信儿……”

讲台左边摆着三十把椅子。几位举止稳重、道貌岸然的老年人端坐在椅子上。不用说，他们准是历史学院的院士。另外，还有几位军官。当然啦，他们从来没参加过一次军事行动，可胸前却佩戴着奖章和十字勋章，数量之多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们获得的全部勋章。突然，司仪把手帕举在空中，连连摇动。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来到了。布好阵势的人群发出洪亮的欢呼声：“蒙德拉贡博士万岁！”“人民的保卫者万岁！”“劳动者的代表万岁！”蒙德拉贡博士这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大人物真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他把头朝右边歪着，唇边挂着慈祥的微笑，沿着他的拥护者组成的人墙朝讲台走去。蒙德拉贡博士向教育部长点头致意，随后在部长身边坐下来。乐队奏起国歌，教育部长揭下覆盖在半身像上的国旗。“魔法师”在暴

风雨般的欢呼声中登上讲台。

他伸出两手，朝人群挥动了两下，要大家安静。随即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故意慢条斯理地戴上眼镜。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讲稿，打开来，开始演奏威武雄壮的交响曲。我写的演说词到他嘴里登时化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快板”一起，听众的热情陡然爆发。到“第二乐章”，听众情绪倍增。“诙谐曲”响了，人群变得如癫似狂。到了“尾声”，群情激越。演说者的声音时而如轰轰炮响，时而如嚶嚶鸟啼。与此同时，他挥动双手，勾画出史诗的各个场景。他把英雄参加过的“七·二〇事件”^①、瓦霍·帕拉塞和文塔盖马达战役、拉·格利塔和卡拉切战役、蒂纳吉略、卡贝约港和巴布拉战役一一比画了一遍。还用强烈的戏剧性的表情增加手势的说服力。

每讲完一段，就引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演说结束时，群众的情绪达到癫狂状态。司仪大师指派的三个人围住“魔法师”。其中一人跪在地上，另外两人把“魔法师”抬起来，让他骑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庆祝胜利的游行开始了，只听一片口号声：“演讲者万岁！”“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万岁！”“人民之友万岁！”

我心里很高兴。我的演说词首战告捷。不过，和往常一样，又是为他人做嫁衣。说句公道话，对这些掌声和欢呼声当之无愧的应该是我。我心里高兴还因为“蒙德拉贡—贝纳尔公司”已经有了红利，而我恰恰是该公司的卖力气的合伙人。

走到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蒙德拉贡博士才从廷臣搭成的“人马”上下来。我觉着他要走过来向我致意了。然而在一群崇拜

^① 指1810年7月20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暴动。

者的簇拥下，从我身边一闪而过，仿佛和我素昧平生。我感到茫然若失。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对我说：“这篇演说真了不起！”我顺口答道：“谢谢！”对方莫名其妙地瞪了我一眼。

看到“恩人”对我采取这种态度，我不禁陷入痛苦的思索。这么快就把我忘了？不可能！他忘恩负义，连声招呼也不肯打？不至于！后来，我想恐怕还是贵人多忘事。上一次，他就把我的教名记成了“蒂莫特奥”。最后，我自言自语地说：“八成是他觉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我相认有些冒失，或者担心我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举动。”

第二天我去体检。大夫给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告诉我：

“真遗憾，您的身体合格。从今往后，要想活着，没灾没病，全得看您善不善于自己保护自己了……幸亏您还年轻，身子骨结实，挨上一两匕首还能顶得住……什么时候您一受伤，马上来找我！我劝您身边常带着棉花啊、纱布啊、橡皮膏啊什么的……”

听了大夫这番话，我血管里的血都凝住了。我东摇西晃地走出门诊所。额头上布满冷汗，直犯恶心。我只好找个门洞坐下来，呆了好几分钟。没法子，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想活着，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摆在我眼前的情况就是这么古怪。

给我分派工作的时候，局长又讲了几句要命的话。我宣誓以后，他说：“祝您万事如意！这儿有好多侦探都成了富翁！……犯罪是一种传染病。和罪犯接触，就能学会犯罪，而且不留痕迹……关键是要干得漂亮……特别是不要让顶头上司和我知道……明白吗？就算您走背运，让人家收拾了，也用不着担心！我担保用头等葬礼发送您，叫全局的人为您送葬，履历表上记下

您的光荣业绩…… 好吧，您去找保管员，他会把‘家伙’发给您……！”

所谓“家伙”是一把 38 毫米口径的“科尔特”式手枪、五十粒子弹、一副带钥匙的手铐和一张身份证。我在收条上签了字，保管员把“家伙”交到我手里。

手枪这玩意儿，我从来没摸过。只在西部片和波哥大警察的腰带上见到过。听说好多人因为手枪走火误伤过人命。我小心翼翼地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手枪，仿佛捏住一条毒蛇似地把枪装进裤子口袋里。

“有枪套子吗？”保管员问我。

“枪……什么？”我反问了一句。

“枪套子！”保管员抬高嗓门儿说，“就是装枪用的皮套子……”

“没有，先生，”我回答说，“我想我用不着，我打算把枪放在家里……”

“你是跟我逗闷子吧？”保管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照你这么说，是要把枪撂在家里？要是坏蛋袭击你，怎么办？跑回家现拿枪去？我给你‘家伙’，是让你随身带着。明白不明白？”

“明白啦，先生，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懂得……”

“现在就要懂得！还告诉你，谁也甭想要笑我。吃不了，让你兜着走！”说罢，他扭过身子去。

我耷拉着脑袋退了出来，心里想：“我不让外面的土匪收拾了，也得让家里的土匪给宰了。”我看了看身份证。公民贝纳贝·贝纳尔变成了 273 号侦探。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使用自己的名字、盖自己的图章了。赶上要递份报告，我只需用食

指在报告尾巴上按个手印。唉！我这个人啊，竟然落到这步田地，变成了数码和指纹。

“273号侦探报到！”我一边推开侦缉科科长办公室的大门一边说。这句话是一位同事教给我的。

“进来！”从办公室里传出一个声音。

说话的人是个矮胖子，头发平直，蓄着一抹浓浓的小胡子，长了一双狡黠的眼睛。在我看来，他颇像潘乔·比利亚。

“我刚上班儿，现在来听您安排……我叫……”

“里(你)叫什么关系不大！”科长干巴巴地回了我一句，“刚才里(你)说里(你)是273号，就行了！过去干过吗？”

“没有，先生，”我回答说，“我是第一次……”

“拉(那)就在这儿干吧……可得卖卖力气！别拉(拿)这儿当避暑胜地……里(你)会干什么？”

“我上过五年中学，”我回答说，“学了不少知识，什么文学啊、历史啊、哲学啊……”

“行啦！少跟我念叨这些玩意儿！”科长打断我的话头说，“里(你)觉着，文学、历史、哲学什么的楞(能)帮里(你)查清案子、逮住罪犯？书呆子我们这儿用不着，我们要的是长犄角的公羊。要拉(那)些会玩带响儿的，豁得出命去的……明儿个里(你)七点钟来，参加这儿的甄别活动。”

甄别活动是在大楼一层的一个又宽敞又阴暗的大厅里进行的。头一天抓来的罪犯或嫌疑犯排成队从一个台子上走过去。侦探们脸上蒙着黑面罩，坐在木台子前面。这样，侦探能认出罪犯，可罪犯认不出侦探。

甄别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怎么个甄别法，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在科长指定的时间，我走进大厅。一看前面坐着三四十排

蒙面人，我着实吃了一惊。这好像在召开阴魂大会或是“三K党”非常会议。我战战兢兢地挨着一个“鬼魂”坐了下来，只听他说：

“喂！窝囊废！你是来甄别别人的，还是让人甄别的？桌子上有面罩，戴上一个……！”

“遵命，遵命……”说完我戴上面罩，又回到我的座位上。

主持这次活动的官员下令甄别开始。被捕的人被关押在地下室的牢房里。他们被人带到大厅。一个挨一个地从一架小木梯走上台子，在侦探眼前站立几分钟，然后从另一架小木梯走下去。

“第一个上来！”官员命令说，“你叫什么？”

“帕斯夸尔·乌塞切……”被问的人回答说。

“118号侦探要求发言！”一个蒙面人站起来说，“这家伙我很熟。他有好几个名字，什么埃梅内希尔多·陶蒂瓦、什么特累斯弗罗·加斯卡、什么库佩蒂诺·皮拉万，外号叫‘豪猪’。他是窝主，窝藏赃物，坐地分赃……上次红衣商店抢劫案有他一份儿。第三高级法院有记录他盗窃的案卷，第四巡回法院有他小偷小摸的案卷，市第二刑事法庭还有他诈骗的案卷……他被抓起过几次……”

“下一个！”官员又下令说，“你叫什么名字？”

“鲁德辛多·塞龙……”

“325号侦探要求发言！这家伙是下三烂、哥特佬儿。保守党得势那会儿，他在大选里胡作非为，搞了不少名堂……还有，凡是自由党人胆敢靠近票箱，他就往人家眼睛里扬石灰，用大棒子打人……前几天，他在一家咖啡馆里说，要让国家得救，除非宰了奥拉亚·埃雷拉博士，他还要亲自动手暗杀……”

书记员把侦探讲的话速记下来。七十二个倒霉鬼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七十二名侦探给他们唱“催命曲”。在我们的行话里，就是揭被甄别者的老底儿。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才渐渐悟出了他们的话十有八九是瞎编的。搞甄别的人弄虚作假或夸大其词，为的是搞政治构陷或公报私仇，或是假装对罪犯了如指掌，向上司邀功请赏。牺牲者无法为自己辩护，就连是谁告发他们的也弄不清。

主持甄别的头目摇了摇铃铛，宣布甄别结束。侦探们鱼贯退出大厅。走到门口，我们摘下面罩，交给站在门口收面罩的人。在院子里，一个伙伴儿朝我走过来。此人个头很大，黑头发、黑胡髭，长了两只大眼睛，眼珠碧绿碧绿的，显得很活泼，很讨人喜欢。

“您是新来的吧？”他问我，“我没见过您嘛……”

“昨天我才上班儿……”我回答说，“我是 273 号，有话您尽管吩咐！”

“我是 288 号，请多关照！”他回答说，“我在这儿干了三年啦……当真学了不少乖……依我看，哪儿的犯罪学校也比不上这儿……甭管是谁，在这儿呆上八天准得变坏……有些人进来的时候老老实实，现在成了地地道道的恶棍……钱挣得不多，东西学到不少！”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又说：“另外，薪水根本不够花的，得能‘憋得住’……”

“这我很能理解……”我回答说，“一个人不能老想多挣钱，得能憋得住……”

“别这么窝里窝囊的，亲爱的朋友！”他哈哈大笑起来，“我说‘憋得住’是指‘主顾’出钱收买你的时候，你能豁得出去……所谓‘主顾’就是该逮捕归案的人。”

“哎哟，这可是犯法的事啊……”我马上想起了偷学来的关于《刑法》的知识。《刑法》上说：“贿赂是双方犯罪。”我想给对方上一课，就接着说：“行贿的、受贿的，出钱的、接钱的都犯法……”

“你少跟我说这些废话！”288号答道，“我劝你，千万别跟这儿的人再说这些。不然，大伙儿都得管你叫‘窝囊废’，老虎会把你吃了……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

这番对话弄得我更糊涂了，心里更害怕了。要么我让歹徒一枪打死或一刀刺死，要么我随风转舵，自己也变成罪犯。两条路就是这么尖锐地摆在眼前。可是……我作为一个老实人，良心往哪儿放呢？我在法学方面的天赋有什么用呢？我对生活的伦理观念又怎么摆呢？

我被分配到缉捕队工作。法官们、检察官们每天每天向我们发出命令，捉拿被指控为犯下这种或那种罪行的人。

“我给里(你)个机会，让里(你)露一手儿，”科长递给我一张逮捕证，对我说，“这小子诡计多端，很兰(难)对付……里(你)千万别听他的花言巧语，……他要是拒捕或是逃跑，里(你)就给他一枪！是死是活，把他给我带来……嗯，死的更好……”

不用说，死的准是我了。我像准备献身的殉道者一样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科长把催命鬼的地址交到我手里，告诉我说那家伙是个惯犯，专门从事诈骗活动。他十分奸滑，作案三十多次，一直没被判刑。他善于逢场作戏，手头上有大量化装用具，能装扮成各式各样的角色，真假难辨。有一回，他扮成牧师，哄骗一个人。随后又装扮成军人、医生、商人，最后装成泥瓦匠。受骗的人一直以为自己在和五个不同的人打交道。他名叫

里戈贝托·科戈略斯，又叫“民法专家”。他对民法造诣颇深，能把他做的坏事统统说成是履行纯粹的公民义务。因此才得到“民法专家”的绰号。他为人聪明、文质彬彬、风度翩翩，那股和蔼可亲的劲头儿足以征服任何人。

我怀着赴死神约会的心情朝“民法专家”的住宅走去。我在想，照他的情况和特点来看，在被捕的时候，他不大会公然拒捕，或者企图逃跑。然而，我还是怕得要命。我此去是要剥夺别人的自由，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这一回，我身上带着枪，就装在裤子的右口袋儿里。左边的兜儿里装着六粒子弹。说来您也许不相信，可我还是要坦白地说，我一直不敢往枪里装子弹，害怕走火打着自己。我思忖着，到时候总还来得及上子弹。眼下至少不用担心子弹会打在自己身上。愈走近目的地，我走得愈慢。每到一個拐角，就停下脚步，长时间地发愣。通常用半小时能走完的路程，我花去了三个半小时。直走得浑身热汗淋淋，两手一个劲儿打哆嗦。

“这儿是里戈贝托·科戈略斯先生的家吗？”我冲着一个人容貌俊秀、满面含春的年轻人问道。他从二层楼的一扇窗子里探出身子。

“是啊，先生。我就是……您等等，我下去开门……”

过了一分钟，追捕对象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最初的印象得到了印证。他身材高大，衣着考究，风度潇洒，和蔼可亲。

“欢迎，欢迎！”他伸出手来对我说，“我能帮您什么忙？啊，请进，请进……”

他把我让进客厅，请我坐下。他坐在我身旁，递给我一支香烟。把他的烟和我的烟点着以后，问我：

“承蒙光临寒舍，鄙人不胜荣幸。请问您有何贵干啊？我完

全听从您的吩咐……”

“我这次来是为了一件十分……十分……不愉快的事……”说到这儿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甭管多么不愉快，能在寒舍迎接大驾，我感到由衷的高兴……”科戈略斯不动声色地说，“莫非是为了钱？……”

“比钱还要坏……”说完，我又哑口无言了。

“别这么说！什么也比不上钱好……生活当中最倒霉的就是没钱……”科戈略斯笑嘻嘻地说。

“首先我得告诉您，我是侦探……”我说。

“您是侦探？”科戈略斯说完，纵声大笑了一阵，“我已经多少年没听说过这么逗人的笑话啦……！您要是侦探，我就成了日本天皇啦！”

“别看我长得不像……您要相信我！”我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看。

“要是不怕冒犯您，我得说这张身份证是假造的……像您这样体面的人会是侦探，我真是无法相信……我估摸着您是刚刚当上侦探……因为我……事情很明显，没有一个侦探我不认识，可我这是第一次有幸见到您……”他把身份证还给了我。

“我刚上任两天……”我答道。

“这我就明白了……我想您是来找我问什么事吧？……治安方面的人都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全都知道……”科戈略斯说。

“很遗憾，我这次来还有别的事……”我哆哩哆嗦地回答，就是不敢说出来访的目的。

“莫不是来抓我的……”

“真让您说着了……”我连忙接上去说。“民法专家”帮我摆

脱了尴尬处境，我心里真高兴。

“这个玩笑可开过头了！”科戈略斯强挤出个笑容。

“不是开玩笑，我向您担保……您瞧……”我把逮捕证拿出来给他看。

“啊！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啦……完全是民事纠纷……没完没了……我向您担保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我看您挺紧张，直发抖……真奇怪，您比我还害怕……来点白兰地，准会好得多……我就要和自由告别了，我想您这样的正人君子一定不会反对……您还记得努涅斯·德·阿尔塞的诗句吗？

自由啊自由，
你不是我梦中的女郎，
身穿洁白的束腰长裙，
既窈窕又端庄……

请允许我离开一分钟……我这就回来……承蒙您慨然剥夺我的自由，我不胜感激之至，让咱们干上一杯……”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出客厅。

趁他不在的工夫儿，我赶紧想了想。的确，喝一杯白兰地，我能舒服一些。他多么和蔼可亲啊！他将举杯向自由道别，我怎么能拒绝和他碰杯呢？毫无疑问，命运为我安排的职业是人间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职业。

“民法专家”端着一瓶白兰地和两只高脚杯回到客厅。

“干杯！”他给我和他自己斟满两杯酒以后说，“尽管咱们初次相逢就碰上了这样的情况，请您相信，能够认识您，我还是感到很幸福……甭管怎么说，我到底还是个幸运儿……因为‘凡是受到司法人员追捕的都是幸运儿’……您和那些野蛮人不一

样。他们拿剥夺别人最珍贵的财富来取乐。他们拿着手枪，气势汹汹。对人蛮不讲理，肆无忌惮……而对您来说，为了完成眼下的任务，您忍痛作出了牺牲，这我很清楚。我由衷地同情您……像您这样的人，不能当什么巡警……我对您的了解还很肤浅，但我敢说您选错了职业……来，咱们干一杯，为您很快找到自己的道路，抛弃现在这个可怕的行当，发挥您的高才，干杯！”说着，他又斟满了两杯酒。“还为了您再过几分钟即将违心地剥夺走我的无价之宝，干杯！”

直到此时此刻，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引起我的好感。谁也不如他了解我，说出我的心里话。我觉得仿佛在和一位老友促膝谈心。他的话我听起来真是又聪明，又悦耳。我似乎被层层轻纱裹住，既不能也不想摆脱出来。我们喝了一杯又一杯，一连喝下好多杯白兰地。几杯酒入肚，我渐渐地摆脱了谨小慎微，下意识逐渐浮上表面。我总算找到了知音，可以把我的悲惨遭遇向他一吐衷肠了。我告诉他，我生来胆小怕事，难以克服，为此遭到了种种欺凌。我告诉他，哥哥、姐姐怎么样打我、嘲弄我，同学们怎样辱骂我、责打我。我告诉他，我酷爱文学、法律。我还告诉他，出于生活所迫，我万般无奈当上了巡警，这种职业和我的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

“是啊，我看我没有弄错……”“民法专家”说，“从打一见到您，我就想到您是个才华横溢而又胆小怕事的人。听您刚才说的，我是想对了。只要能克服荒唐的自卑感，您一定可以成为出色的作家、杰出的法学家……为争取生存而斗争是正当的互相防卫……拿我来说，我的所作所为无外乎是进行自卫……人对人是狼。弱者只能注定成为强者的口中食……道德和法律是有钱人发明出来的，为的是合情合法地攫取政治、经济权力，

限制穷人……凡是反抗这种残酷的不正义行为的人，凡是使用资产阶级法律认为不合法的手段谋生的人，都被看成是罪犯……还是拿您来说吧……我想跟您交个朋友，奉劝您几句话……您一定会同意的。您胆子小，可为人高尚，您身上蕴藏着一股力量，您还没有认识到，甚至还没想到……只要您胆子稍微大一些，就能把生活变得如花似锦……振作起来吧，朋友！”

他这番娓娓动听的言词说得我昏昏然。本来是我捉捕他，可他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却愈来愈把我抓住了。一阵轻轻的昏眩串遍我周身。我们把话题转到了文学。里戈贝托·科戈略斯读过所有法国古代和当代的作品。他当着我的面朗读了莫里哀、拉伯雷、维克托·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福楼拜的作品的片断，还朗诵了魏尔仑^①和瓦莱里^②的诗歌。真是的，跟他谈话委实令人着迷。我们把第一瓶酒喝光了，讨人喜欢的主人又端来第二瓶。这样的欢聚我不但不想让它结束，相反希望它能无休止地延长下去。我甚至把此来的主要目的完全置诸脑后了。“民法专家”继续鼓动如簧之舌夸赞我的聪明。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直觉得头晕眼花。他还一再邀我为我喜欢的作家干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过了三个小时，我醒来了。科戈略斯没在我身旁。我面前站着一个女佣人，她笑吟吟地望着我。

“科戈略斯先生有事要出去一会儿……”她说，“他给您留下一张便条……”

便条上说：

① 保尔·魏尔仑(1844—1896)，法国颓废派作家。

② 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著名诗人。

“最亲爱的朋友：

和您一起度过的时刻真有趣啊。在我的熟人当中，像您这样聪明、愉快的确不多。我很乐意被您抓走。但是此前我答应过一件事，现在必须离开波哥大市。下次再跟您走吧。本想叫醒您，和您告别。可您睡得那么香甜……而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睡觉的。请允许我奉劝您一句：您还是改行干别的事吧！像您这样的好人是不能追捕和您相似的人的。更不能追捕像我这样和您不同的人。我很高兴能再次和您见面。您要知道，这儿就是您的家。别忘了来这儿的。路。请接受我热烈的拥抱。

您的朋友

里戈贝托·科戈略斯”

四

我的愚蠢打破了世界纪录。在我这种处境下能犯的错误，我全犯了，一个也没落下。科长给“民法专家”勾勒了一副惟妙惟肖的画像，一再告诫我不要上当受骗，我还是没能逃过他的蛊惑。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和他一起开怀畅饮，直喝得酩酊大醉。我还愚蠢地把心腹事向他和盘托出。我好比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学生掉进了骗子手巧妙布下的圈套。

然而，我不仅仅干了一连串难以想见的蠢事、错事，还触犯了刑律。我的责任是将罪犯逮捕归案、押解入狱，可我偏偏让他逃之夭夭。究其原因，还是怪我生性懦弱。我这一辈子啊，干什么也好，不干什么也好，倒霉全倒在胆小怕事上了。

我没法把真实情况向科长交代。不能告诉他小鸟儿从我手里飞掉了，更不能告诉他这次失手的详情。我决定去找 288 号侦探，求他出个主意。他和我算不上什么知交，可直到那会儿我只和他一个人谈论过我们这一行的问题。上一次，他坦诚地谈出了他的想法，我对他产生了某种信任感。再又一说，我已经犯了罪，正好把我的忧虑跟犯罪的高手讲一讲。除了他还能对谁说呢？于是，我把和“民法专家”打交道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

“这算什么问题？”他问我，“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他们你让那小子给涮了，他们就会撤你的职，让你坐班房……其实，照你这么窝囊，活该如此！你至少也该从他身上捞几个嘛……可你压根儿就没想过……眼下怎么办？很简单：说瞎话！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执行命令，我们就这么干……去告诉他，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没找到他……”

“可……我发过誓，一定讲真话，这誓言……？”我问他。

“嚯，你可真是心地纯洁啊！但愿你一辈子如此……！”他笑着对我说，“事到如今，你还相信那些鬼话？我估摸着，连魔鬼、地狱你也信其有吧……你都这么大了，也不嫌害臊？事情是明摆着的：你实话实说，就要被撤职查办，蹲监狱；你小小地撒个谎，就能保住自由、保住饭碗……两条路，由你挑！”

当然，我还是挑选了撒谎这条路。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我才拿定主意。本来我的罪过是协助、掩护罪犯潜逃，这下子又变成行骗和作假誓了。为了保住公职人员的可怜的小小的饭碗，我只好牺牲所有的原则，践踏道德、法律、“十诫”^①和刑

^① 即《十条诫命》，是犹太教的戒条。基督教也用十诫作为诫条。

法。我不再是什么 273 号侦探，而进入了充斥世界的无数罪犯的行列。

我给科长打了个报告，内容如下：

尊敬的科长：谨向您报告：本人奉命多方努力以求将被告里戈贝托·科戈略斯（绰号“民法专家”）逮捕归案，但未能捕获其人。昨日下午四时，我赶到他家，据女仆云科戈略斯已离开波哥大市，去向不明。嗣后，凡科戈略斯经常光顾之处尽皆寻遍，不见踪影。我发誓：上述情况属实，完全属实，完完全全属实。”

“里(你)在这里说的是瞎话，完全是瞎话，完完全全是瞎话！”科长看完报告，对我说，“骗子手！要不要我把事情捅开？昨儿个下午四点正，我给科戈略斯打了个电话……我信不过里(你)，现在里(你)更不可信了……女佣人接的电话，说主人不楞(能)来，因为来了位客人……听拉(那)言谈话语，是个穿便衣的警察，还说里(你)们大喝了一顿……又来胡弄我了，说些着三不着两的话……咱们都是兰(男)子汉，说话不用兜圈子……‘民法专家’要里(你)来说假话，给了里(你)多少钱？里(你)用不着说他给里(你)灌了多少米汤……用不着说几杯酒就把里(你)收买了……至少他给了里(你)五百比索……里(你)老实地吐出二百五十比索来，要不然，里(你)就甭想活！里(你)不给我，我就撤里(你)的职，里(你)放跑了科戈略斯，我要把里(你)关起来……！”

“我身边没带着钱……”我回答说，“明天我给您送来……”

我又加了一句，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不楞(能)拖过明几个……!”科长说，“要是不送来，里(你)就盯着点儿的……里(你)知道有里(你)的罪受……”

没料到事情急转直下，我完全给弄懵了。刚才我亲耳听到的不可能是真的，可偏偏又是真的。我压根儿没拿到一分钱，可又得分给科长一半儿。我答应第二天把钱送来，这等于是我默认“民法专家”收买了我这个帮凶。哎呀，我钻进了一条死胡同。

我的月薪只有五十比索。科长索要的钱相当于我五个月的薪水。到哪儿去弄这一大笔钱啊？想了想，我决定再去求教于288号。我把和科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求他伸把手，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事啊，全怪你太窝囊!”288号说，“当初你要是照我的主意办，这笔钱不都落在你的腰包里了吗？你要多少，科戈略斯就会给你多少……你倒是落了个老实的好名声，可到头来一场空……甭管怎么样，得先想办法把钱凑上。‘犟牛’中士，哟，这是我们给科长起的名字，碰上分钱的事儿，他是决不饶人的……我认识一个安蒂奥基亚人，是个老头儿，他叫萨鲁斯蒂亚诺·阿罗雅维。他愿意借钱，得用武器作抵押……他救过我好几次急……你干脆把手枪当了！他开的那家旧货店就在九道街上，过了圣·克拉拉就是，靠右手……这倒是个办法……!”

说实在的，的确也没有其他办法了。要借钱，我什么值钱的抵押品也没有。不过，一大堆疑问立刻出现在我脑海中：一个作侦探的能把公家发的武器送作抵押吗？这不等于是海军上将把装甲艇抵押出去了吗？动用国家财产不是犯了盗用公款罪

吗？为了掩盖我已经犯下的罪行，逃避惩处，难道要我非得再犯新罪不可吗？甭管怎么说，我开始沿着犯罪的山坡滚落下去。谷底里等着我的一定是偷盗罪、强奸罪、暗杀罪！善与恶在我内心深处展开了殊死搏斗。正在这个时候，我在咖啡馆里无意中听到了几句话，这才痛下决心。离开我坐的那张桌子不远，有两名侦探在闲谈。其中一个人说：

“我倒是挺喜欢‘犟牛’中士的，这个人 心狠手辣……在博亚卡他宰过三十来人，在加西亚·罗维拉，至少把二十个人关进监狱……政府不想垮台，就用得着这号人……他要是跟谁相好，那可是个大善人。要是跟谁作对，就比犹大还可恶……哪个侦探想逞强，有外快不分给他一半儿，准得让他扔进河里去……！”

用不着再听下去了。过了半个小时，我那件武器——共和国把它交给我，为的是要我维护民主制度、法律秩序，保卫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荣誉——躺在堂·萨鲁斯蒂亚诺·阿罗雅维开的旧货店的货架子上了。我呢，兜儿里装着赎买自由和前程的钞票，安静地躺在床上，心里颇为惬意。至少暂时不必为那件危险万分的手枪揪着个心了。

“273号侦探报到！”我一边推开科长办公室的房门，一边说。

“带没带钱来？”“犟牛”中士问。

“带来了，中士……”我回答说。

“拉(那)就进来……！”中士说，“把钱放在这儿，放在写字台上……里(你)说话算数，我很高兴……‘民法专家’就给了里(你)五百，是真的吗？”科长数完了钱问我。

“我向您发誓，中士，没多给……”我回答说。

“快收起里(你)拉(那)套誓词吧！里(你)是不是又想发假誓？甬管怎么说吧，这第一笔买卖还算不赖……我本来以为里(你)是个窝囊废……算我看错了，可我很高兴……”

中士一口咬定我接受了科戈略斯的贿赂，并以此为根据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毫无根据，我还是想拥抱他一下。是他第一个力排众议；只有他不赞成所有熟识我的人给我下的断语。人世间总算有人——哪怕是一个人——认为我不是窝囊废了！

然而，这股得意劲儿一下子就过去了。回顾一下几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我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的道德水准下降了好几英尺。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无可无不可了。不知不觉中我对犯罪也习惯了。在短暂的时间里，我连犯数罪。先是协助罪犯潜逃，接着做假证，最后又挪用公款。似乎这还不够，科长认为我是行贿受贿案的同谋犯，我反而觉得心满意足。

对一个老实人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变得不老实。这种痛苦的感觉使我惶惑不安。我觉得我渐渐地陷入一个令人作呕的泥潭之中，我身上最优秀的东西被闷死了。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费明·萨尔加，决定去找他。

在我眼里，费明·萨尔加是男子汉大丈夫。他英勇、坚毅、孔武有力。这些品质我丝毫也不具备。自从那天他像个英雄似的(我一直这样说)把我从“恶棍”马查多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我一直对他怀着热烈的敬佩和无限感激的心情。

我像死囚作忏悔似的，把自己的罪行一一告诉给费明。他面带微笑听我说话。我一讲完，他就说：

“听了你说的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惊奇。你的作法与众不同，也许是少见的。像你这样的人，必定要遇上这些事，还有

比这更糟糕的事……我也不劝你什么了，‘杉木头做不了正梁’，你是无可救药了。过去你是窝囊废，现在是，将来你还是窝囊废，这就叫病人膏肓……眼下得赶快把枪赎出来，牙科大夫不能没有镊子，侦探不能没有手枪……再又一说，你们头儿要是知道你把手枪当了，非得闹得天翻地覆不可……我借你钱，把枪赎出来……不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出事儿，就甭来找我啦……好吧，咱们马上到旧货店去……”

我生平第二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费明帮助我保住面子，免受屈辱和囹圄之灾，我恨不得双膝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双脚。不过，我还是控制住自己，只是说：

“你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报……！在熟人当中只有你是好人……”

“好人是你……！更准确点说，你是个好先生……！”费明说，“如今这世道是野兽出没的大森林。为了活下去，就得你吃我，我吃你。这个道理，多会儿你才能明白啊？生存斗争给人们指出了两条路：要么当操刀手，要么当俎上肉。老实说，我可不像你那样要当什么殉道者……我宁肯当刽子手！所以我才选了律师这个行当……我的饭桌上不能缺面包，哪怕饿死些孤儿寡母……”

“可是……职业道德呢？伦理呢？法律呢？”我爹着胆子问。

“提出这些问题足以说明你太天真啦！”费明反驳说，“这些问题似乎是上天派到地上来救苦救难的天使提出来的……发明法律为的是把不道德说成道德，使非法行为合法化……律师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有财有势的人的特权，帮助罪犯逃脱法网……那些身穿礼服的强盗们颁布法律为的是保护他们的赃物，你以为这种法律值得遵守吗？你这么谨言慎行、小心翼翼，真叫我

笑掉大牙！以你这样的天才却办了一连串难以想见的蠢事，而你还以为自己是罪人……！”

“我是老实人，今后我还想当个老实人……”我说，“你说了好多反话，可我还是认为你是好人……”

“好人是窝囊废的同义词！”费明大发议论地说，“所以，请你别再用‘好人’这个词来侮辱我……你固执地要当老实人，那是你的事。你觉得过意不去，那是你的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无私的行为。不错，我要帮你个小忙。可我问你，明几个我会要你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大公无私地为别人效劳……”

朋友的这番话使我大失所望。我觉得，他这样不讲道德，真是不知羞耻二字。他的实用主义的确令人作呕。他在我的心目中本来是个新堂·吉诃德的形象。“恶棍”马查多揍我的时候，是他保护了我。这和堂·吉诃德保护倒霉的安德烈斯免遭主人——农夫——的鞭打是多么相似。此时，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倒塌了、碎成一块一块的。取代他的位置的是桑乔的粗鄙形象。但是，不是作为纯朴的功利主义者的随从的形象，而是无法无天的流氓形象。

从旧货店出来，正赶上天降大雨。倾盆大雨无情地抽打着行人。每逢上班下班或上学下学的时候，圣·彼得总是毫厘不爽地赠予波哥大的职员和学生一场瓢泼大雨。我们两个人在一户人家的门洞里站了半个小时，眼瞅着从埃及区和贝伦区奔流而下的黄泥汤。街道顿时变成可以行船的大河。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闹个不停。真冷啊！

“这场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费明说，“我说，咱们到哪家铺子里躲一躲，好歹喝两杯！天儿这么冷，喝点酒大有好处……”

在波哥大——我估摸着，在拉巴斯和埃佛勒斯峰^①也是这样——天气寒冷是喝两盅的最好的借口。我既没有放荡不羁的性格，也没有天天喝酒的习惯。不过，对一个像我这样胆小怕事的人来说，稍微喝点酒还是颇有效力的。在微醺的状态中，我觉得我成了另外一个人：生性愉快、乐观，能够主宰自己。我可以和常人——那些没有染上我这种可怕的病症的人——一样思考、说话、办事情。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拼搏，态度勇敢，能够大胆地拿主意。假如我喝得酩酊大醉，又会突然变得消沉，十分胆小，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我担心自己会说傻话、办蠢事，回忆起自己的悲惨遭遇，禁不住还要痛哭流涕。

我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费明的邀请，乐得轻松几个钟头，逃避开现实，忘掉我是侦探，忘掉我变成了罪犯。忘掉我还是个窝囊废！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在波哥大有许多充满浪漫气氛的杂货店。后来这种店铺才被超级市场和冷饮店取代了。我们光顾的那家铺子就是一家典型的杂货店。里面卖的东西确是五花八门：木炭、烤蚕豆、粽子、猪骨头、油渣、肉肠、土豆、青菜、粮食、椰蓉玉米甜食、黄油鸡蛋糕、糖果、巧克力、塔糖、丸子串、鲸脑油、绳索、笔记本、铅笔、祈祷书、肥皂、香料、甘蔗酒、白酒和啤酒。店铺门口照例挂着个酒幌子，好像一面旗子。屋角里必不可少地摆着一盆芦荟。墙上挂着奥拉亚·埃雷拉、林德贝格^②、卡洛斯·加德尔、罗多尔福·瓦伦丁^③、马利内·黛德

① 即珠穆朗玛峰。

② 林德贝格，美国飞行员，生于1902年。1927年，独自一人乘飞机从美洲出发，第一次横越大西洋，飞抵法国。

③ 罗多尔福·瓦伦丁(1895—1926)，意大利电影演员。

丽^①和庇若十一的照片。柜台大约原是绿色的，如今已经变得十分古旧。灯泡线上缠着一根捕蝇草，上面沾满苍蝇。店铺有两个单间，里面摆着两张桌子、四把带扶手的椅子。屋角里有一个小便池，用布帘子遮住。一只鸚鵡栖息在木架子上。一只猫在称盘里打瞌睡。卖东西的女人又矮又胖，唠里唠叨，显得特别殷勤。住在周围的人都管她叫“大婶儿”。

我们在一个单间里坐下来。费明要了两杯白酒。一开头，我们谈话的题目是我们共同度过的童年生活。回想起上学那会儿的事情。我说起费明如何在“恶棍”马查多面前挺身而出，救我一命。我把他的行为比作龙东上校参加博亚卡战役。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我胆小怕事上了。费明每隔一会儿工夫就抬高嗓门儿说：

“大婶，再来两杯！”

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每人喝下八杯酒。我喝得半醉半醒，还在竭尽全力维护我的立场，为我的人生态度、世界观进行辩护。费明哈哈大笑，揶揄我说：

“咱们俩反正说不到一块去……没有共同语言嘛……我生下来就是要惹事生非，不受别人的窝囊气，你是为了受气才活着……！自个儿得了病又不想治好，这种病人最糟糕……你就是这号人！咱们还是换个话题吧……谈谈女人怎么样？”

“好极啦……嗯……我是说……可以吧……”我回答说。

“你喜欢不喜欢女人？”费明问道。

“当然喜欢啦……”我说，“问题是……”

“问题是你害怕！对不对？”费明打断我的话头儿说，“我敢打赌，你既没有情人也没有未婚妻！我给你介绍几个，都是我的相好的……个个漂亮极了！要价儿还不高……睡一宿才二十个比

^① 马利内·黛德丽，德国电影演员。

索……咱们准能乐一阵子！喝了几杯酒，我的兴头儿也上来了……大婶，再来两杯！”

我已经喝醉了。激动劲儿过去了，只觉得情绪消沉。而且，一想到将要和妓女调情，心里就很害怕。可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陪费明走一趟。如果我不陪他，反而证实了他对我的看法。我们左一杯，右一杯，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杯。最后“大婶”把两杯酒往桌上一撂，对我们说：

“这两杯是‘压轴儿’的，我要关门儿了……”

那时候，波哥大市的烟花柳巷被圈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后来，一位天才的市长决定取消限制，妓院才遍及整个城区。凡是妓院，一定要在门前点上一盏绿灯，以示不同于寻常人家。

我们乘坐一辆出租汽车，来到费明的相好的堂子。何塞利托给我们开开门。此人年纪不大，声音又尖又细，娇里娇气，一身女人气，脸上擦着粉，嘴唇上涂着口红。他既是乌龟，间或也接待有断袖之癖的客人。

“哎哟，亲爱的……！看见你们真高兴！”他说，“这位少爷，我压根儿没见过您来这儿……”他冲着我加了这么一句。“姑娘们，来客儿啦！”他一边拍手一边说。

迎着我们走出来两个女人。其中一个细高挑儿，皮肤黑里透红。她抱住费明，在他嘴上亲了一下。

“我给你介绍介绍罗莎·芙洛尔……”费明指着另外那个女人对我说。看样子，她有二十岁上下，长得小巧玲珑，体态匀称。中等姿色，头发染成金黄色，前额上留着齐眉穗儿，脸上擦着胭脂抹着粉。“在床上，她可是个出色的角儿！”

罗莎·芙洛尔感激得莞尔一笑。我发现她缺了两颗门牙。客厅里有两对男女正在跳舞。一个上年纪的秃头男人用手胡乱

地摩娑一位年轻的姑娘。屋里乌烟瘴气，又是香烟味儿，又是浓烈的酒气，还掺杂着女人们使用的廉价香水味儿。费明和他那位相好的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罗莎·芙洛尔和我坐在另一张沙发上。还没等坐稳，罗莎·芙洛尔就问我：

“请我喝点什么啊，宝贝儿？”

“你要什么，我的……我的……”费了半天劲我也没说完这句话。我觉得，管一个毫无感情可言的女人，一个缺少门牙、浓装艳抹的女人叫什么“亲爱的”，实在太过分了。

她要了一杯白兰地。我推说喝醉了，什么也没要。何塞利托给我端来一杯粉红色的饮料。喝起来，淡而无味，自然不会白兰地。可照样按白兰地的价儿收钱。过了五分钟，那个女人又要了一杯白兰地。过了一会儿，又要了第三杯。半小时之内，她一连灌下去六杯。我实在不知道跟她谈点儿什么。我试着说了说天气不好、下雨、天儿凉，可我发觉她对此毫无兴趣。我一边说话，她一边仰着脑袋看天花板，还哼着一首流行歌曲。突然她站起身来，把手伸出来，对我说：

“跳舞吗，宝贝儿？”

“好极啦，我的……我的……夫人！”我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个词儿来。

罗莎·芙洛尔紧紧地搂住我，使劲把我往她身上靠。我觉出她的胸脯、肚子、大腿压挤在我身上。她趴在我耳朵边上呼呼地喘粗气，吻我耳朵，抚摸我脖子。然而我心里丝毫不激动。尽管喝了那么多酒，我的胆怯心情依然如故。此外，这个缺少门牙的女人一举一动都显得假里假气，就连接吻、抚摸也显得十分做作，实在不讨人喜欢。

“咱们躺会儿去吧，宝贝儿？”她在我耳边说。

“我还不困……”我打算开个玩笑，躲开这个话题。

“别装蒜啦……”罗莎·芙洛尔顶了我一句，“你以为床铺就是为睡觉用的？”

“还可以躺在床上看看书……”我说。

“少跟我装疯卖傻！”罗莎·芙洛尔厉声喝道，“我没工夫跟你磨时间……！去不去睡？”

“咱们再商量商量……来，坐下，坐下！”

我们回到沙发上。罗莎·芙洛尔用半嘲弄半挑衅的目光盯住我。我摆出一副老夫子的架势，对她说：

“我认为，性行为是一种高级的心理过程的终结，是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可你却想从结尾开始。激动是一系列思想准备、回忆、感情联系的产物……一个有理智的人不可能机械式地行动，不能像配种场里的种马……人和动物的区别即在于此……”

罗莎·芙洛尔用惊奇的目光瞅着我。我的印象是，即使爱因斯坦给她讲解相对论，她也会比听我的解释明白得多一些，好一些。就在这个时候，费明·萨尔加端着一只酒杯走过来，对我说：

“看样子你在讲哲学呐……瞧你选的好地方，好听众……！该干什么就快干什么！你这样的男子汉可不能轻易放过这么讨人喜欢的卷发女郎……”

费明这番话不啻是对我有无男子气概提出了挑战。我可不能像个阉人似地呆在那儿。于是，我拉住罗莎·芙洛尔的手，说：

“走吧！”可是我心里却说，“命该如此！”

我们走进一间卧室。卧室里有几幅露骨地表现淫乱的裸体画、一面带雕花框子的穿衣镜，还有一盏光线暗淡的红灯。罗莎·芙洛尔假装亲热地吻了我一下。我觉得吻我的似乎是堂·

何塞·埃查加拉伊^①某出戏里面的性格女演员。想到这儿，我不禁笑了笑。她手脚敏捷地脱掉衣服，仿佛准备下水去搭救一个行将淹死的溺水者。她光着身子，毫无羞耻地躺在床上，问我：

“你还不脱，等什么呀？”

我开始慢慢腾腾地脱衣服。这当儿，她拿起一本杂志，翻阅起来。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用眼瞄着她。她的身体的确很美。小小的乳房朝上翘着，臀部肥大，两腿修长，正好成了对比。她的两条腿雪白、匀称。可是，我对她没有什么欲念。我知道我会失败，而且担心染上性病，所以越发显得拘谨。可我又怕闹出笑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脑子给身体下了命令，身体却顽固地拒不执行。

“怎么啦？”罗莎·芙洛尔怒气冲冲地问道，“还让我等几个钟头？你躺不躺下？”

我穿着裤衩，站在她的床前。两臂交叉在胸前，热汗直往下淌，身体微微颤抖着。

“究竟怎么啦？”她气咻咻地又问我：“你不能干？还是不喜欢女人？”

“我喜欢……不知道今天晚上我是怎么啦……”我回答说，“反正我不行了……请你原谅……”

“二胰子！没用的色鬼！”罗莎·芙洛尔像只受伤的豹子似地大声吼叫着。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顺手抓起一只鞋子，举着鞋子朝我扑过来。我吓坏了，连忙朝客厅跑去。我穿着裤衩跑进客厅，后面跟着个赤身裸体、怒不可遏的女人。这副场景立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费明插身进来，三下两下从暴跳如雷的罗莎·芙洛尔

^① 何塞·埃查加拉伊(1833—1916)，西班牙戏剧家。

手里夺下鞋子。

“出了什么事？”他笑着问我。

“事情是……没出什么事！”我半死不活地回答说。

“跟这种二腩子、可怜虫会出什么事……”罗莎·芙洛尔说，“何塞利托！何塞利托！快来呀，这位客人是你的！”

何塞利托急匆匆地走过来。他两眼望着我，冲我卖弄风情，脸上露出贱里贱气的微笑。堂子里的姑娘们、嫖客们，还有费明不住气地哈哈大笑。我们进来的时候看见的那个秃脑袋老头儿笑得太厉害了，躺在地毯上直打滚。

“只有像你这样的窝囊废，才会出这种丑！”费明对我说，“带你到这儿来，真给我丢脸……按说我应该想到你根本不行……”

“要么交钱，要么我把你的脸拉了！”罗莎·芙洛尔已经穿好衣服，拿着一把剃头刀，大声嚷道。

“凭什么给钱……我什么也没干……”我躲在费明背后，浑身打颤。费明挡住要扑上来的妓女。

“你没干，那是你干不了……！谁让你二腩子呢？”妓女暴跳如雷地吼道，“我的时间值千金！要么给钱，不给我就拉你的……！”

“别拉他的脸！把他那个没用的玩意儿拉下来！”秃脑袋老头儿说罢，嘻嘻一阵大笑。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也跟着大笑起来。

“别拉脸，也别拉……别的地方！谁也不许碰我的朋友！”费明斩钉截铁地说，“钱，我来付！你穿好衣服，咱们走！”他冲着我加了这么一句。

费明又救了我一命。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把左脚的鞋套在了右脚上，忘了穿坎肩，也忘了系裤扣。罗莎·芙洛尔白白拿到一笔钱，可还是一口咬定我身患暗疾。在大家的哄笑声和

罗莎·芙洛尔的詈骂声中，费明陪着我走出妓院。何塞利托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但愿您能从中记取教训，亲爱的！”何塞利托尖声细气地对我说，“女人啊，厉害，厉害，太厉害啦！可不像男人……什么时候您想找乐子，我来伺候您！”

费明和我一声不吭地走过好几条街。看得出来，他很生气。耻辱的重担压得我透不过气来。蓦地，费明站住脚步，对我说：

“这出戏真丢人！我不往前走啦……晚上好！”

“请原谅！”我嗫嗫嚅嚅地说，“晚上好！”

费明走远了，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两条腿仿佛钉在地上。清晨的寒风扑打在我脸上，可我身上还是汗涔涔的。世上难得有人像我这样陷入悒郁的苦苦思索之中。我不光是胆小鬼、穷光蛋、窝囊废，还成了阳痿患者！更糟糕的是我还是鸡奸犯！刚才那个凶险的场面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视网膜上。罗莎·芙洛尔的粗言恶语，妓女和嫖客们的嘲笑，秃脑袋老头儿那几句话，半男不女的何塞利托的粗鄙的言谈，这一切都扎进我的耳朵里。我不是人，而是废料、破布条、人类的垃圾；我不能再活下去，我不应该再活下去，我不配再活下去！想到这儿，我伸手摸了摸装在右裤兜儿里的手枪，从左裤兜儿里掏出几粒子弹。我定定地望着子弹，仿佛病人用充满希望的目光盯着一剂祛病的良药。只要把一粒子弹打进我的骨头和肉体，我的问题也就一了百了了。只要把一粒铅丸嵌进我的脑袋或心脏，我就能永远摆脱掉这无穷无尽的苦恼。

但是，自杀的念头一下子就闪过去了。我想起了一系列问题，把自杀的念头从脑海里驱逐得干干净净。妈妈怎么办？和一个妓女没有性交成，就值得自杀吗？一个臭女人、老色鬼、二

胰子，加上妓院一群下三烂说了几句话，就能让我名声扫地，让我失去生存的欲望吗？我的胆怯真是不治之症吗？只要愿意拼上一拼，难道就不能克服吗？既然我有勇气自寻短见，为什么我不能勇敢地活下去呢？想到这儿，我松开了手枪，把子弹又装进口袋里。我打定主意，一定要洗心革面，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要面对人生，奋起抗争。和以往一样，这次下的决心又是个短命鬼。想一想妓院里那场悲喜剧，我不禁笑了笑。胡思乱想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离开了那个地方。这时候，天已经放亮了。曙色矇眊，渐渐勾勒出蒙塞拉特山和瓜达卢佩山^①的侧影。

上面这些回忆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直言不讳的、简单明了的自传片段，比起完全发自心底的忏悔没有什么两样。照我的看法，如果不提一提我多年来亲眼目睹的主要事件，这些回忆就显得不完整，缺点儿什么。从打开始写这篇故事起，我就立意边讲个人生活经历，边讲近六十二年来波哥大和全国的历史，现在我还是这么个打算。我生性懦弱，再加上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两次加入保守党，两次加入自由党。如今，这两党都让我大失所望，我又成了一个羞答答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我又不敢公开说出马克思的名字。我热切地盼望革命，但我又怕可能来一次激烈的变动。我在政治上变幻无常，因此用不着说，我的证词就会不偏不倚。我没有对谁许下过什么诺言。我在这儿谈论亲眼目睹的人和事，只是一个普通人想到什么说什么而已。

在奥拉亚·埃雷拉执政的四年^②当中，发生过两个重大事件：一次是无一人伤亡的国际战争；一次是伤亡达数千人的国

① 波哥大市东侧的两座山。

② 即 1930 年至 1934 年。

内战争。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冲突中^①，最激烈的战役其实只是一次单方面的战斗。在勇敢无畏的瓦斯盖斯·科沃将军的指挥下，我军士兵朝塔腊帕卡山开枪射击，而敌军几天前早已弃山远遁。相反，在桑坦德省、北桑坦德省和博亚卡省的战场上，保守党和自由党展开了一场浴血苦战。保守党企图保住在票箱中失去的权力，而自由党则打算借助官方军队的支持把大权全部夺过来。

所谓对秘鲁的战争只有一点作用，就是从政治上加强了奥拉亚政权；再加上公民们出钱支持国防，又在经济上巩固了奥拉亚政权。此外，在那场战争中，一些部长和参议员还从捷克的“斯科达”兵器制造公司那里得到了丰厚的佣金。事后，对此进行过一次“严格的调查”，立案材料厚达两米。只是几年后这些材料在法庭的档案架上自行消失了。

奥拉亚·埃雷拉属于卡洛斯·E·雷斯特雷波^②的共和派，曾在雷斯特雷波内阁中担任过外交部长。他不顾伊瓦盖会议的明令禁止，多年来一直充当保守党领导集团的忠顺奴仆。此人口若悬河，但思想贫乏；道貌岸然，又善于做戏，他强令最知己的朋友称他为“阁下”。在议会辩论中，他动辄大发雷霆。为了些许小事就要和对手决一死战，不过他从来也没和任何人决斗过。他极力阻止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竞选总统。这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一直走不到一块去。奥拉亚·埃雷拉施展出博亚卡人特有的狡猾手段，建议保守党人提出联合候选人。可是，劳雷亚诺·戈麦斯——他是洛佩斯的挚友和同乡，又是奥拉亚的死对头——挫败了奥拉亚的阴谋。保守党宣布不参加

① 发生在1932年。

② 卡洛斯·E·雷斯特雷波，1910年至1914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竞选，自由党投了洛佩斯的票。据保守党人说，票数远远超过有选举权的公民的人数。

阿方索·洛佩斯是典型的领导阶级的后代。他父亲是个家私巨万的银行家、咖啡出口商，母亲也出身于一个银行世家。阿方索·洛佩斯穿着考究，风度翩翩。他天资聪慧，稍学自通。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常跑伦敦的高级裁缝铺和豪华的酒吧间。他是俱乐部的常客，波哥大沙龙的贵宾。成天无精打采，专好捉弄人寻开心。

阿方索·洛佩斯心里明白，一定要给底层的人们一点东西，而且得赶快分下去，免得他们自己动手把上层人士的东西抢得精光。上层人士多是他同窗好友、游乐场的同道。于是，洛佩斯搞了一场半截子革命。这种革命是重大社会变革最有效力的打胎药。然而，洛佩斯那套表面上的革命思想却唤起了全国人民。工人、农民终于明白了，除了选举权外，他们还有其他权利。于是，他们涌上街头，不是要求马埃斯特罗·瓦伦西亚朗诵诗句，而是要求正义，要住房，要面包，要读书的机会。

哥伦比亚的殖民制度不是1810年结束的，而是1934年结束的。对这一点，历史学家的看法刚好相反。人们在观念上起了变化，这是洛佩斯半截子革命的最积极的成果。过去把持政权的巨头，充当政客的神父，曾经活跃在“千日战争”中的将军以及狡猾的博亚卡的头子们失去了权力和影响。许多新人纷纷进入政府，像阿尔贝托·耶拉斯^①、达里奥·埃昌迪亚、霍尔赫·索托·德尔·科拉尔，等等，等等。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1937年的事儿。当时我已经二十四岁

^① 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哥伦比亚保守党人，于1945年至1946和1958年至1962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了。哥伦比亚和波哥大在继续成长。穷人们正在盼着他们缺少什么，“自由共和国”能够补给他们什么。阔人们还在担心他们富裕什么，“正在进行的革命”会剥夺他们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穷人的希望化为泡影，阔人的担心也烟消云散。波哥大市朝北面扩展，一直到智利大街。当时，最时髦的是特乌萨吉略区。在那里，孩子们长到十六岁还都穿短裤。所有的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都戴毡帽。车辆和行人开始拥挤起来。不过，人与人之间还是以礼相待，波哥大人的智慧不减当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明》、《下坡路》和《阿拉瓦尔旋律》以及加德尔的其他影片已经被墨西哥影片中的明珠，像《那里，在我的宽敞的茅屋里》、《啊，哈利斯科，你不要自食其言》等所取代。沿海一带的大学生到处参加别人的家庭聚会，而且不请自到。他们还是旧货店的老主顾。舆论界继续关注着西班牙内战的起伏变化。赤色分子和土生土长的长枪党人在皇家大道的咖啡馆里大打出手。奥拉亚·埃雷拉的同党中许多人本来打算让他连选连任。可是，不料奥拉亚·埃雷拉猝然去世，这就为爱德华多·桑托斯充当候选人廓清了道路。爱德华多·桑托斯是波哥大人，多年侨居巴黎，他是全国闻名的最强大的报业大老板。波哥大准备庆祝它创刊四百周年。新婚夫妇已经开始跳起“贴面舞”。

上次失败的教训真叫人丢脸，一连几天我都没缓过劲来。我本想补救一下，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的勇气愈来愈小，又变得胆小怕事。在那个极其痛苦的夜晚，我曾经下过一个又一个决心，但是我只做到了一件事，那就是继续活下去。为了能活下去，就得赚钱。我只好重操旧业，还当我的侦探。

我第二次出马比第一次更热闹。幸好这是最后一次。“犟牛”中士递给我一张拘捕令，对我说：

“事实证明，里(你)像老流(牛)一样能挺得住……这回我要看看里(你)的横劲儿……里(你)去抓的拉(那)个人可是个呱呱叫的危险分子……他不会给里(你)钱，只会请里(你)吃黑枣！……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拉吉亚斯·阿里萨，人人都知道他叫‘放血匠’……在阿尔莫萨德罗郊外，他一口气干掉十一个人。他的档案里，凶杀卷宗有二十多个……这家伙是个神枪手……！指拉(哪)儿打拉(哪)儿……里(你)要多加小心，别让他抢先！”

科长这番话等于是宣判我的死刑。究竟是死在一个心如铁石的歹徒手中，还是辞去倒霉的差使，和妈妈一起饿死，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到我的面前。我犹疑了几个小时。最后，我想饿死并非快事，我也没有勇气去试一试。“放血匠”倒可以使我免去不快。我决定给妈妈写一封诀别信。

“妈妈：我马上要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此一去，九死一生。如果他们将我杀死，您千万不要哭。假如儿子是瞎子、瘫子、聋哑人，或者像我这样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好妈妈，这种儿子死了，您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我的墓志铭——假如我还配有墓志铭的话——应该是：‘这里躺着一个窝囊废’。死人不领薪水，就连现在这点小忙我也帮不上了。这是唯一让我痛心的事。反正您失去的东西也是微不足道……至于拯救我的灵魂一事，您自管放心，窝囊废是不会下地狱的！我的葬礼，您也不必操心。善心的科长慨然允诺将我安葬在保安部的公墓里，全体人员将参加我的葬礼，履历表上也将写上一笔我的光荣业绩。永别了，亲爱的妈妈！也许咱们可以很快见面，我相信饥

饿会很快迫使您和我重逢于地下。

您的儿子贝纳贝”

“我死了，您应该感激我，正如现在我对桑坦德的江洋大盗马拉吉亚斯·阿里萨(绰号‘放血匠’)心怀感激一样——又及。”

写好信，我走进坎德拉里亚教堂。走到神坛跟前，双膝跪倒，像斗牛士乞求马卡雷娜圣母一样，我热忱地请求上帝保佑我。他们求的是不被牛角刺伤，我求的是不让阿里萨手枪击中。但愿能出现奇迹：他失去准头，或者手枪卡壳。

最后，我找到 288 号侦探，对他说：

“我想求您两件事。一件是请您把这封信交给我妈妈……地址写在信封上……还有一件事，我去抓‘放血匠’，要是我被打死，请您把这只枪和子弹一块交给库房……”

“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288 号惊讶地打量着我说，“你赤手空拳去捉拿‘放血匠’那样的危险人物？”

“带枪不带枪反正一个样……”我回答说，“我压根儿没开过枪，连怎么装子弹我也不会……这不，我的枪一直是空着的……‘放血匠’是惯匪，又能百发百中……甭管怎么说，反正我算死定了……我听这儿的同事说，最可悲的莫过于带着枪让人打死……”

“算了吧，你少来这套胡说八道！”288 号反驳说，“谁是‘犟牛’中士看你是窝囊废，才派你去送死……十有八九得让人家给收拾了。到时候，你托付的两件事我一定照办……”

晚上七点钟，我走到“放血匠”的巢穴。那是一间土房子，还没盖好，土坯墙，顶上盖着洋铁皮，坐落在瓜维奥区的一条暗幽幽的陋巷里。我一生当中，每逢这种关键时刻，总是浑身

打战，汗流浹背。我走到门口，战兢兢地敲了敲门。

“谁啊？”一个哑嗓子从里面问。

“晚上好！劳您大驾请告诉我，这儿是堂·马拉吉亚斯·阿里萨的家吗？”我用最最地道的波哥大客气话问。

“是这儿，你找谁呀？”哑嗓子又问。

“找一位朋友……”我极力控制住恐惧的心情回答说。

“朋友也得有名有姓啊……你叫什么？”

“贝纳贝……贝纳贝·贝纳尔……我不认识阿里萨先生，可……我想跟他交个朋友……我不是来打架的……各位可以放心开开门……”我愈说心里愈害怕。

屋里响起几个男人的声音。“这家伙准是个‘空子’，叫这个名儿的人我不认识啊……”“开门还是不开？”“开开，他妈的！比这厉害的我也见过！”“我的枪呢？想抓活的，没门儿！”“准备好了吗，哥儿们？”

屋门突然打开了。门口出现一个高个子男人。他身材瘦削，皮肤黝黑，长了一副吉卜赛人的模样。一双绿眼睛，两撇长长的掩口胡须，身穿一领套头斗篷，头戴一顶卷沿马帽。

“我想和堂·马拉吉亚斯·阿里萨谈一谈，不知道我能否有这个荣幸？”我尽力掩饰着身体的颤抖。

“没什么荣幸不荣幸的。免去‘堂’字，干脆叫我马拉吉亚斯·阿里萨。甜言蜜语，我听不进去……你找我有什么屁事？”

“我这次来……很遗憾，……我恳求您跟我走……”

没容我说完，他刷地掏出手枪，逼住我说：

“老实点！动一动，要你的命！举起手来！”

我胆战心惊地举起双手，同时直觉得一股热烘烘的液体弄湿了我的衬裤，又顺着右腿直往下淌。直到那会儿，一直没听

见枪响，我不可能受伤啊。我知道不是鲜血，心神才算定了下来。没错儿，准是两肾不由自主地在分泌液体。

“搜搜他！”“放血匠”对站在门口的两个凶眉恶眼的人命令说。这两个人，一个拿着刀子，一个提着木棒。

其中一个人在我身上搜查了一遍，然后向阿里萨禀报说：

“没搜到家伙儿！”

“不会吧！‘空子’会不带家伙儿？”“放血匠”问道，“你是不是侦探？”他又冲着我加问了一句。

“十分遗憾，我是侦探……如果您允许我放下一只手，我把身份证掏出来给您看看……嗯……还有逮捕证……”我情不自禁地抖衣而颤。

“身份证、逮捕证，我要那玩意儿有屁用！”阿里萨怒冲冲地反驳说，“他们要抓马拉吉亚斯·阿里萨，要抓‘放血匠’，要抓像我这样跟二十名警察、三十名士兵交过手的大盗，可是派你这么个可怜的熊玩意儿来，口袋里连根针也没带。这么侮辱人，我受不了！”

“请您原谅，阿里萨先生！您容我解释两句……请您把枪收起来，让我把手放下……我没带枪，我是君子，我认为……这么说吧，现在我还是认为您也是君子……君子动口不动手，用不着枪……我绝不敢侮辱您……我衷心地向您道歉，请您……”

“少说废话！你不是我的对手！”“放血匠”一边收起手枪，一边说，“你可以把手放下来！马上给我滚蛋！告诉派你来的人，下次派个真正的男子汉来，别再派你这样的废物鸡！快滚，不然的话，我对准你肚子连开六枪！”

“我太感激您了，阿里萨先生！您不知道，我是多么感激您……见到您我真高兴……”说完，我像被小鬼催命似地撒腿就

跑。

第二天我写了份报告，把新近这次失败（也是最后一次失败）的经过报告给科长。今天，过了若干年后再来读一读这份报告，我终于明白了“风格即人”这句话包含着永不枯竭的真理。这份报告形象地勾勒出我的心理状态。

“鄙人诚惶诚恐地向您报告，昨日晚间出了一起严重的误差。我奉您之命逮捕嗜血成性的匪徒马拉吉亚斯·阿里萨——因其嗜血成性，此人又名‘放血匠’。受命后，鄙人收拾停当，前去执行命令，来到此人家中（位于本市瓜维奥区）。我误认为，此人粗野残暴，好斗成性，与其用恐吓、威胁手段逼其就范，不如以理服人，劝其归降。故此，有意不带公家发给的武器。我本想劝他相信蹲监狱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法。被捕后，即可摆脱逃亡者之苦恼和惊恐。不幸，我遇上一个蛮不讲理的野人。一弄清我的来意，他立刻拔出手枪，逼得我无计可施。他还出口不逊，出于对您的尊敬，我不愿重复那些污言秽语。我手无寸铁，只好不战而退，未能完成您交付于我的使命。此次，对人、对物均未施加暴力，我为此感到欣慰；事情虽未办成，但没流一滴鲜血，我为此感到庆幸。阿里萨恨不得弄得血流成河，我未让他如愿以偿。鄙人谨向您建议：为了抓住这个惯匪，请您派出性情与其相似、善用恶语伤人、宁用手枪不用说理之人前往。

此致

科长先生

273号侦探”

“里(你)是个笨蛋！一份报告居然有这么多蠢话，我从来没见过！”科长晃动着我的报告，气急败坏地说，“里(你)好好回忆一下蒙德拉贡博士那封荐举信的话……信就在这儿……要不要我念念他是怎样介绍里(你)的？里(你)好好听着，‘此人性格刚毅，机敏勇敢，颇有心计。依鄙人之见，此人堪任侦探……’瞎说八道，纯粹是瞎说八道！里(你)再听听这段，‘……我相信，无论什么任务，无论任务多么危险、精细，此人均可有效地完成。’这些政治家满嘴瞎话，究竟是因为什么？里(你)的位子不在这儿，在修道院里！里(你)去当个职事僧吧！要么，里(你)去印度，加入甘地党，搞里(你)的消极抵抗去吧……。赶快买辆小车，也好有地方下蛋……”

“什么蛋？”我吃惊地问。

“里(你)下的蛋！废物鸡！”科长说完，纵声大笑起来。

五

在官场的切口里，“轧柏油路”和“丢官罢职”是同义词。我突然被撤职，只好整天“轧柏油路”了。不过，在保安部门这个肮脏去处混些日子，也不全是坏事。我在帷幕后面亲眼看到一个寡廉鲜耻的世界。这里活动着一些半是鹰犬半是豺狼的怪人。他们嗜血成性，视财如命。他们是手捧“强盗执照”的罪犯。他们肩负着追捕杀人犯和盗贼的重任，同时又用心向罪犯求教，最后竟然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是身披权力外衣的歹徒，掌权无非是为了滥用权力。他们指天发誓要维护法律，可又是践踏法律的恬不知耻的罪犯。他们是领取俸禄的诈骗犯。他们是流氓，对他们来说，国家交给他们的武器不过是用来恫吓旁人的工具。他们是恶棍，把侦察犯罪活动和缉拿凶手的崇高活

动变成发财致富的最便当的行业。

我把身份证、手枪、手铐交给仓库保管，离开了那幢暗幽幽的大楼，直觉得仿佛从噩梦中苏醒过来。273号侦探死了，公民贝纳贝·贝纳尔复活了。失业好似狰狞的恶鬼挺立在我眼前，然而我还是感到幸福。我的怯懦之树终于结出果实。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我又可以成为手无寸铁的老实人了。身历险境，却安然无恙，而且还大长了见识，这不是奇迹吗？有的罪犯公然对抗法律；有的罪犯执法犯法，又能逍遥法外。我深信自己既不会成为前者，也不会成为后者。

我信马由缰地在街头踟蹰了好几个时辰。像刑满释放的囚犯一样心情很愉快，只是一想到前途渺茫，高兴劲儿就减少了几分。妈妈和我怎么生活下去呢？一定要再找到一份儿工作。只是到哪儿去找？怎么找啊？

每家门口都有一只垃圾桶。各种质料的垃圾桶沿着道边排成一长串，里面装满垃圾，等候清洁车收走。一只野狗和我并排朝前走。它用鼻子嗅着垃圾桶，把嘴埋进垃圾里寻找些残羹剩饭。我怀着手足之情望了那只狗一眼。我们俩是一对难兄难弟。它也好，我也好，既没有谋生手段，也没有固定职业。我和它一样，只能在官僚的垃圾堆里找点儿东西餬口。忽然我想起了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想起了我还是“蒙德拉贡——贝纳贝公司”的合伙人。我打定主意去找这位显赫的大人物，求他帮帮忙。

这样一来，我又开始了一次苦难的历程。为生计所迫，我一连三个礼拜一次又一次地去到“职业介绍所”，即“魔法师”的办公室。新来的女秘书对我和其他谋事的人老是重复那几句瞎话：“博士刚到众议院去了”，“博士在开会，没空儿接待各位”，

“博士打电话来说，今天党部开会，不来了”，“博士正准备一份法案，不好打扰他……”

终于，我们把博士等来了。那天，我正在等候室（其实应该叫“白等室”）里。博士一到，全体谋事的人像被弹簧弹起来似地立刻站起身来。博士面带大选前夕政治家惯有的笑容，和大家打招呼。突然，他两眼盯住我，张开双臂朝我走来。

“见到您，真是难得！您的名字是……您叫……”

“贝纳贝·贝纳尔……”我回答说，“我想您会想起我……”

“当然喽！您的名字我没记住，可您的面孔我记住了……！优秀的自由党人的面孔，我从来不会忘记……！”像往常一样，他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请跟我来，我想跟您谈谈……”说着，他把我带进办公室。

“请坐！”蒙德拉贡博士指着一张椅子说，“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您仗着我的推荐当上了侦探……是这样吧？好啦，眼下我正用得着您！大选快到了，伟大的自由党的前途如何，共和国的未来如何，都在此一举啦。凡是自由党的干部都有义务为挽救共和民主制度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他的语调、动作、表情好像演说家当着广大听众在发表演讲。“不客气地说，”他接着说，“我不知疲倦地为本党和国家效劳！靠了我，几百名党员在公共机关里找到差使。靠了我，几千名学生拿到了公立学校的奖学金。因此，我有合法的权利争取再次当选……凡是我的朋友都要热情地行动起来……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本党的崇高利益，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我能指望您帮忙吗？”

“没说的，您完全可以指望我……”我回答说，“只是您指望的不是 273 号侦探，他们刚刚把我辞退……”

“蠢货！大选前夕居然辞退自由党的干部，不知道他们犯什么病了？好些政党掌不住权，道理就在这里！”

“就我来说……我打心眼儿里认为，他们有道理……”我爹着胆子回了一句。

“没啥正经道理！”蒙德拉贡博士大喊大叫地说，“当政的人主要的职责不是照看公民的生命、财产、荣誉，而是给本党党员安排官职，甭管称不称职，要让他们保住官位！他们撤您的职，您不用担心……我是不会抛弃朋友的……大选快到了，您对我会很有用处……有我这样的将军，有您这样的士兵，咱们是稳操胜券啦！您愿意为我效力吗？这是您报效自由党，顺带也报效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我恰恰是为此而来……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我回答说。“魔法师”故意没叫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从保安部门退出来，另谋职业，对此我挺高兴。

“好极了！我正等着您这句话呐！”蒙德拉贡博士接着说，“在众议院里，我们设置的职位和议员一般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任命一名秘书，当然秘书没有特定的工作……谁任命谁给秘书分派工作。一般来说，是充当政治助手，或是竞选代理人……”

“据我所知，公职人员不准参与政治……”我说。

“您的天真确实令人感动！”蒙德拉贡博士笑着说，“看得出来，您是个读书人……回到地上来吧！咱们是在哥伦比亚，不是在瑞士……在咱们国家里，每个公职人员都应该是，都必须是捍卫他的政治思想的斗士。每个公职人员的压倒一切的义务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合法的也罢，非法的也罢，使本党永远执政……您快给我当秘书啦……国家要付给您一份薪水，不过

您专门为我一个人服务……您要起草一些讲话、一两份竞选纲领，给我在省里的朋友们写几封信和电报；我会及时给您下达指示，您带着这些指示到本省的几个市跑一跑；作为我的代表参加会议；组织群众集会；在区里散发竞选宣传品，等等，等等……您是个聪明人。上次您起草的关于阿塔纳希奥·吉拉多特的讲演词，我出思想，您出词句，一炮就打响了……咱们合办的公司前程远大……由于我的提携，您从今以后将从事人类最崇高的活动，那就是政治……您应该感到满意，感到骄傲……对一个像您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您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高高举起何塞·伊拉里奥·洛佩斯和何塞·马利亚·奥万多手中的红旗，高高举起塞希奥·卡马戈在加拉帕塔挥舞过的红旗，高高举起拉法埃尔·乌里维在佩拉隆索挥舞过的红旗，把这面红旗胜利地送到共和国的圣洁的神坛，对一个优秀的自由党人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吗？”他高举着左臂，把头歪向右边，声音高低起伏，用词十分讲究，这一切合在一起使“魔法师”的夸夸其谈成为奥拉亚·埃雷拉博士的高谈阔论的精妙的仿制品。“一个人，”他接着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意志贡献给为争取自由、社会正义和民主共和制度的胜利而斗争的事业，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崇高的呢？噢，贝纳贝，贝纳贝，在我的帮助下，您一定会鹏程万里……！”

过了几天，我的任命下来了。这样，我又得以在帷幕后面亲眼观赏一下演出议会丑剧的舞台。我坦率地承认，和小小的保安部门相比，议会也令我大失所望，使我的厌恶程度也不相上下。众议院由一百三十人组成，他们以盎格鲁萨克逊人特有的准确领取津贴。可是，参加会议的只有四五十人，在辩论中发言的不过是十到十五人。只有在日程表上列出讨论提高议员

津贴的草案或者选举共和国审计长的时候，才全体到会。在这类选举中，人人都能捞到一笔好处。中选的审计长要为每张选票提供二十个职位，为选举人的亲朋至友安排工作。然而，所有的众议员都互称对方是“正人君子”。

众议院议员在人种、年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上各不相同。这里有白人、黑人，还有混血种人。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也有七十岁的老头子。有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和识字不多的酋长。有波哥大赛马俱乐部的纨绔子弟、帕亚内的贵胄、卡塔赫纳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也有金迪奥的短工。有活泼愉快、能说会道的海边人；有能算计、好夸张的安蒂奥基亚人；有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纳里尼奥人；有趾高气扬、性情古板的桑坦德人；有好说大话、崇尚浮夸的卡尔登人；有心灵手巧、精明强干的博亚卡人；有万念俱灰、态度冷漠的托利马人；有胆小、质朴的乌伊拉人，还有神情庄重、喜欢吹牛的考卡山谷人。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想法：争取重新当选。为此，不惜耍弄各种手段，什么空许诺言啊，什么收买选票啊，以及拿权势作交易，给追随者小恩小惠，大搞不可告人的肮脏勾当，夸口要帮助边远地区，可又从不兑现。

我观察了不几天，觉得议会这个团体像煞个动物园。这里有昂着头哞哞乱叫的神圣的母牛；有身体笨重、动作迟缓的白象；有撑起光彩夺目的雄辩的羽毛自鸣得意的孔雀；有匍伏在权势者脚下的爬虫；有在观众的掌声刺激下愤怒进击的公牛；有吞食预算鸡笼里最鲜嫩的家禽的狐狸；有吞噬敌人肉体的贪婪的鲨鱼；有遇到危险就把脑袋藏在桌子底下的鸵鸟；有以别人的名声的尸体为食的鬣狗；有对政治牧人的命令百依百顺的

羔羊；有在精神贫乏的泥淖里滚来滚去的肥猪；还有躺在国民困难问题上呼呼睡大觉的囤睡鼠。此外，再加上老鼠、兀鹫、变色龙，就凑齐了这条新诺亚方舟上的全部乘客。只是雄鹰和狮子一去不复返了。罗哈斯·加里多、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内格罗·罗夫莱斯和何塞·维森特·孔恰的演说只在他们当中留下了模糊的记忆。

出于好奇心，我参加了几次会议。那副情景立刻使我大失所望。拜占庭式的讨论；荒唐的提问；幼稚的推理；不光彩的指责；庸俗的玩笑；粗鄙的蛊惑；对国内问题一无所知、对解决问题一筹莫展的演说；为了博得喜欢刺激的观众一笑，或让他们取乐而表现出的像墨西哥斗牛士一样的装模作样的夸张态度；喜剧和阴谋；鄙俗的兴趣和低级的热情；粗言恶语。

有一天，两位议员卷入一场尖酸刻薄的舌战。经过一场以各种方式、各种语气的对骂以后，一位议员对另一位议员说：

“您阁下从泥潭里拉不出一头母驴！”

“您跳进去，尊敬的议员，”另一个人回答说，“我能把您拉出来，您瞧着吧……！”

坐满旁听席上的公众开心地大笑，疯狂地鼓掌。与此同时，几百万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缺医少药、没钱上学的哥伦比亚人正在老老实实在地盼望着议会的众议员能够满足他们的急迫要求。过了半个小时，两位激烈舌战的主角来到酒吧间，谈笑风生地庆祝他们这出独幕喜剧的演出成功。

他们当中只有四五个人与众不同。这些人一手包办，牵着议会团体的鼻子走，充分证明了平庸者治于人的规律。这些例外的人物让大家推选他们当议长、副议长。他们就天上人间的各种问题发表权威性的讲话。对那些胆敢持不同见解的人大张

挾伐或干脆革出教門。他們命令同事們投票贊成有利於他們的選區的法案，投票反對不合乎他們利益的法案。總而言之，馬幫馴順地尾隨在趕馬人的後面。

和現實的衝突給我帶來莫大的痛苦。直到那時候，我一直認為議會是共和體系中最重要、最可敬的機構。我把議會大廈看作是法律的殿堂、正義的神龕、智慧和口才的寶庫。然而，展現在我眼前的卻是肆無忌憚的商人居住的洞穴和寡廉鮮耻的投機倒把分子和囤積居奇分子活動的市場。八年前，在監獄的鐵窗後面，我看到了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不過是神話。後來在保安部門，我又觀賞了司法的丑劇。如今，我又在觀看一出代議制民主的滑稽戲。

正如蒙德拉貢博士所說，我的工作沒有什麼作用。在官場里，人們管這種工作叫“領帶”。我只是在花名冊上簽個名，嚴格地照數領薪水。其他一百二十九人和我一樣也是所謂“祖國之父”的私人秘書，他們的處境也和我一模一樣。每天我們都要到各自的頭兒那里去，當面聆聽指示。

“明天，您將開始一個新的時代……”蒙德拉貢博士照例用演講的口吻對我說，“明天，您將首次進入妙不可言、動人心弦的政治世界……您為自己慶幸吧，對我感激涕零吧！下個月，將召開黨的代表會議，決定眾議員候選人。朋友們一定要我連選連任，我這個人從來不推卸責任，不逃避民主制度加於我的義務。鄙人將再次將賤名提交選民審議……當然嘍，咱們必須大力活動起來，因為競選議員的人很多，而名額有限……我是提出計劃的大腦，您是執行計劃的手臂……首先，您得到本省的幾個市跑一趟，和朋友們——黨部的成員、市長和其他頭面人物——見見面，做做輿論準備……”

按照头儿的指示，我草拟了一份通电，寄给我打算走访的各市市长。

“我享受议员邮资豁免权，”蒙德拉贡博士特别嘱咐我说，“您不必节省词句。要说什么，尽管敞开地写……要说明您是博士，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这些在政治圈里活动的人事实上都是博士……称号很有威力……不要忘记加上一句：您的出差费由市里报销……”

下面就是我起草的送交“魔法师”签署的电文：

“市长：党代会开幕在即，贵处主要责任在于保证鄙人的挚友与会，并提名鄙人担任下届众议员，特此提醒。鄙人曾为本省多方效力，其价值难以估量，说明鄙人是人民意志之最忠实的代言人。鄙人和省长过往甚密，足以担保您留任现职，或擢升一级。特委派贝纳贝·贝纳尔博士前往贵市，以确保会议成功、竞选胜利，特此通知。贝纳尔博士在贵市停留期间的一切费用可在市预算‘临时性开支’项目中列支。请您及您的主要助手鼎力协助，以期本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即使其他活动暂时中止亦在所不惜。此致敬礼。众议员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

“您把我的意思琢磨透啦！”蒙德拉贡博士读完电文以后对我说，“咱们的公司一定会大发财源！等着瞧吧……”

273号侦探变成了贝纳贝·贝纳尔博士，“魔法师”蒙德拉贡的政治助手和竞选代理人。

我走访了几个市。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记不清走访了多少个市以及哪几个市了。不过，我还记得所有的市在建筑式样

上和社会状况上都是彼此雷同。同样的空无一人的广场，广场上矗立着教堂和市政府，象征着神权和政权，使居民对天国荣誉和人间正义充满希望，对地狱和官府的横行霸道心怀恐惧。同样的沾满灰尘的旧式房屋，老处女躲在窗子后面徒然地等候“蓝衣王子”的莅临。同样的虔诚的妇女，她们总是祝福上帝、诅咒他人。同样的市长，个个性情暴躁。同样的神父，人人贪而无厌，混迹政界。同样的懒汉，他们东游西荡，就像在市里仅有的两张弹子台的破旧绒布上每天撞击几百次的象牙球。同样的年老体弱的老头子，他们把胳膊肘支在商店的柜台上，嘴里嘟嘟囔囔，冲着齜齜的西班牙纸牌不住气地咳嗽。同样的官僚和承包商，他们像不知餍足的小牛犊一样拼命吸吮市政府金库的干瘪乳头。同样的部落酋长和首领，在他们身上愚昧和野心展开一场永无休止的无声搏斗。同样的流言蜚语，议论的无非是女教师身怀六甲或是税务员换了件新衣服。人们的热情像街区一样狭小，人们的兴致像街坊四邻的心灵一样卑微。每个教区都有七大罪恶：地主的傲慢、小报务员的忌妒、刑警队长的易怒，理发师的淫荡、投机倒把分子的贪婪、法官的怠惰、教堂司事的贪食。人人都让政治交易的发动机推得团团转，眼睛都死死盯在预算这块“希望之乡”上。

我走下公共汽车，一个身披呢子斗篷、五短身材、肤色黝黑的汉子走上前来。他彬彬有礼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说：

“您四(是) 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吗？”

“我是贝纳贝·贝纳尔……”我没敢重复蒙德拉贡博士赐给我的雅号。

“我四(是) 四(市)赠(政)府秘苏(书)……愿为您效劳！”他向我伸出右手。“四(市)狙(长)先僧(生)命我出来迎接您……请

允许我替您拎灰(着)箱子……咱们先去奥腾希娅夫人旅馆……四(是)灰(这)儿最好的……也是唯一一座旅馆……”他笑了笑，骄傲地露出了满口金牙。这口金牙数量之多、体积之大足以唤起西班牙征服者的贪婪之心。“头儿怎么样啦？赠(郑)总(重)地梭(说)，我们灰(这)儿所有的人都四(是)蒙德拉贡博四(士)的嘴(追)随灰(者)……四(市)狙(长)先僧(生)和鄙人能有今天的位子，多亏了他的提拔……他让人任命我爱人在卫僧(生)赞(站)当了一名护四(士)，虽然到现在她还没学会打针……我有个姑娘有点儿呆洒(傻)，他安排她当了教员……也好嘛，学僧(生)、老私(师)教学相狙(长)嘛……不才五年吗，她几乎可以流畅地朗读啦……”他微微一笑，又露出满口耀眼的金牙。“总而言之兹(之)，头儿对我太好了。俗话梭(说)得好，‘有奶便四(是)娘’……我四(是)有不嫂(少)缺点，可我懂得资(知)恩报恩……为了蒙德拉贡博四(士)，掉脑袋我也不含糊！不过，博四(士)，请您告诉我，波哥大那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最新消息？弄来弄去，随(谁)能当总统？桑托斯博四(士)，还是埃昌迪亚博四(士)？我看四(是)桑托斯博四(士)。《私(时)代报》大老板要四(是)不能当选，还有随(谁)能当选？再又一梭(说)，他有的四(是)钱，钱能通神嘛……在咱们国家里，穷光蛋当不上总统……当上了，也得让人推下来！堂·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就四(是)现曾(成)的例子……他整个四(是)个窝囊废！想当初，他要四(是)不去卖官鬻爵，而是明偷暗抢，什么四(事)也没有，他还不得了百万富翁啦……四(是)不四(是)这么回四(事)，博四(士)？您别看呆在灰(这)么个小地方，我知道的四(事)可多啦，可细啦……我能白干十七年的秘苏(书)吗？……”

秘书自言自语，一直把我领到奥腾希娅夫人旅馆大门口儿也没住嘴。一路上，根本不容我开口。似乎向我提的问题他自己全能回答了。

“我很荣幸向您介臊(绍)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他对旅店老板娘——一位面带慈祥的笑容、和和气气、又矮又胖的女人——说,“他四(是)波哥大地位显赫的赠(政)资(治)家。他来仄(这)儿帮着咱们开攢(展)这次竞选活动……头儿派他来执行一项特苏(殊)的任务……我要梭(说)的就四(是)仄(这)些……请您把他安顿在僧(省)长先僧(生)来的四(时)候组(住)的那间屋子里……就四(是)那间有瓷便盆、羊毛脚垫、新床单的屋子……您替我好好糟(招)待仄(这)住先僧(生)……早饭两个鸡蛋、橘子汁、洋葱肉汤、可可、黄油面包,必不可嫂(少)……宗(中)饭、晚饭一定要丰僧(盛)。博四(士)出门在外,免不了饥一顿饱一顿的……到四(时)候我来检查!脏(帐)吗,全记在四(市)赠(政)府名下……预算就四(是)为仄(这)个用的嘛……就四(是)为招待党里的人嘛,紫(只)要他们肯屈驾光临……”

中饭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合乎秘书的要求。吃完中饭,我走到市政厅。市政厅坐落在中心广场上,是幢两层楼的老房子。楼里面充作办公室的房间光线暗幽幽的。检察院、金库、邮电局、市法院都设在这儿。

市长身材高大,精力旺盛。面色很白,仿佛擦了一层粉。掩口胡须漆黑漆黑,好像染过似的。他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和我寒暄了几句;

“能在鄙处接待蒙德拉贡博士的使者真是不胜荣幸啊!太高兴啦!欢迎!欢迎!您是头儿的朋友,当然也就是鄙人的朋

友……我能有今天，多亏了蒙德拉贡博士……他是我的重生父母。不仅让我在本省当了七个市的市长，还为我四个儿子弄到了奖学金……我知道您这次来是为了争取咱们头儿能当上候选人，我特地向您报告，人马俱已齐备……我们这儿人人都是蒙德拉贡主义者。谁不是，谁就去蹲班房……”

“会不会有人指控您滥用权力啊？有没有危险？”我问他。

“看得出来您在政治上是初试锋芒……”市长回答说，“您别忘了，有权能使鬼推磨，市长在任就能指挥一切……我不懂什么市政法。什么宪法、法律，关我个屁事。不过，要论多拿选票，我可是行家……等回到波哥大，您可以告诉头儿，在本市他算赢定了……头儿知道，我办事历来是噶哩喀喳……！我已经下令把全市公民的选民证一律收上来。就放在那只箱子里……”他指了指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只破箱子说，“到选举那天，凡是蒙德拉贡博士的朋友，就把选民证还给他，再带上选票，然后让他们去投票。对每个人都要严加监督，免得有人在路上偷梁换柱。凡是头儿的仇人，第二天再还给他们选民证……另外，警察局和警卫队负责吓唬哥特佬儿，不叫他们靠近票箱……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什么也不明白，可还是点了点头。我觉得他刚才这番话简直是荒唐透顶。我没法相信，一个官员恬不知耻、没羞没臊竟会到这种地步。凭着我正直人的良心、尊重他人权利的公民觉悟，我对这个无耻之徒的阴谋诡计反感透了。难道说这就是政治？难道说这就是蒙德拉贡博士所说的人类最崇高的活动？当初我走进保安局那个臭革阿斯牛圈^①的时候，曾经感到一阵

^① 厄利斯王臭革阿斯的牛圈里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没有打扫过，粪秽堆积很多，转义指极其肮脏的地方。

精神恶心，如今又有了这种感觉。

下午六点钟，我应市长的邀请参加了市党部特别会议。会议在市党部委员长堂·普罗科皮奥·马塔雅纳家里举行。他是当地的一个老恶霸，腆着大肚子，胡子七长八短，眼里透着股邪气，笑起来阴森森的。一道半月形的伤痕横过他多半张脸。这是他在多次政治决斗中留下的永远无法平复的印记。仇家都说他“马刀瞎杀^①，杀了白杀”。在三次紧要关头，他干掉过三名对手。只因为他和市法官思想一致，一次也没被关起来过。堂·普罗科皮奥在政治上立下功劳，作为报偿，蒙德拉贡博士下令所有条件优惠的合同一律同他签订，集市上、节日上赌博的事儿全归他管。

会场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墙上悬挂着一面红旗和乌里维·乌里维、埃雷拉、奥拉亚、洛佩斯、桑托斯和赫雷米阿斯·蒙德拉贡博士的照片。到会的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参加这类会议的中央、省、市的公职人员：市长、检察官、教育局长和他们的副手。此外，还有地方党部的四位领导成员、五位代表市政厅多数派集团的市政官员。

堂·普罗科皮奥站起身来，摇了摇手铃，清了清嗓子，然后说：

“尊敬的党员们：此私(时)此刻，我感到非常高兴……不过，大家不要以为我要朗诵私(诗)……紫(只)四(是)和组(诸)位在一起，我的私(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赠

^① “马塔雅纳”，西语为 Matallana，此处为 Mata·llana，故且译为“马刀瞎杀”。

(正)像洛佩斯博四(士)梭(说)的，看到‘这么多脏(张)愉快的面孔、友好的面孔、自由的面孔’真叫我无比激动，心跳不紫(止)……！各位组(注)意到没有，我梭(说)的话，句句四(是)私(诗)……

“今天这个僧(盛)大的集会有几个目的。第一四(是)我们要开会……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赠(正)在开会嘛……第二，我想向各位介臊(绍)一下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他四(是)波哥大的非藏(常)了不起的大人物，蒙德拉贡博四(士)在地丧(上)的……应该梭(说)在咱们仄(这)块土地丧(上)的代表……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万岁！我们的叟(首)领蒙德拉贡万岁！伟大的自由党万岁！打倒哥特佬儿！”听众跟着讲演人热烈地高呼口号。

“咱们赠(正)在谈思想、计划、纲领，我要告诉大家，头儿一定要连选连任……咱们大伙儿都要资(支)次(持)他！咱们在坐的，有随(谁)不欠着蒙德拉贡博四(士)一份人情啊？要不四(是)亏得他，四(市)狙(长)先僧(生)当不了四(市)狙(长)，岁(税)务官当不了岁(税)务官，老私(师)当不了老私(师)……是随(谁)给咱们孩子弄到奖学金的？是随(谁)给咱们的亲戚找到工作的？我攒下这点儿钱，亏了随(谁)？四(是)随(谁)为医院搞到赞组(助)的？四(是)随(谁)弄来钱盖学校的？”

“下个月要在波哥大糟(召)开党代表会议。因此，咱们必须在今儿晚丧(上)选出出席大会的代表……代表们的资(职)责只有一条，就四(是)提名赫雷米阿斯·蒙德拉贡博四(士)当纵(众)议员。拳打脚踢也罢，动刀动枪也罢，无论如何要保组(住)蒙德拉贡博四(士)的候选资格。不错，咱们是讲民阻(主)，爱选随(谁)就选随(谁)，可咱们得尊纵(重)头儿的意资

(志)……他想让下面仄(这)几位当代表：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皮匠多米希亚诺·马拉维尔，大家伙儿都认私(识)他；裁缝法布利希亚诺·穆内瓦尔，当然他得学学文化，上次会议的四(时)候，他还不会在纪要丧(上)签字，仄(这)四(是)人民的此(耻)辱；木匠马蒂亚斯·奥塞霍，他是伟大的自由党人，从来不向哥特佬儿打糟(招)呼；还有萨拉铁尔·贝穆德斯，也是咱们信得过的党员……三私(十)年啦，他没去望过弥撒，怎(真)四(是)好样的自由党人……！选举前，先请贝纳尔博四(士)讲几句话，他给咱们带来了头儿的意见……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万岁！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四(士)万岁！伟大的自由党万岁！打倒哥特佬儿！”

我站起身来，不由得浑身上下一个劲地哆嗦，三魂跑掉了两魂。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干脆拒绝活动，口里只觉得一阵焦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手颤抖得太厉害了，我只好用两只手抓起一杯水，送到唇边。胆怯，这个多少年来一直控制我的凶狠的恶霸又一次把我变成了可笑的木偶。一连几分钟，没人说话，局面真是令人难堪。有几个人笑嘻嘻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有几个人在切切私语。最后，我总算控制住了自己，开始断断续续地说：

“尊敬的……党员们……朋友们：首先，我想……向大家致敬，向大家转达……头儿……我们的头儿……尊敬的……最尊敬的蒙德拉贡博士的问候……他想……要鄙人……告诉大家……他准备……再次牺牲自己……放弃平静的生活……不顾自己的健康……抛弃个人利益……无条件地……为祖国服务……为伟大的自由党服务。”

不出所料，最后这几个字激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这样

一来，我的勇气大增，连忙抓空喝了口水，因为我一直觉得口干舌燥。我还在不住地颤抖，杯里的水溢出了一大半。我稍微冷静了一下，心里有了点底，才又接着说下去：

“诸位马上就要选举参加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了，这是竞选的第一阶段。四月份，也就是下个月，竞选将以我党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而结束……我们将在没有暴力、不要手段的纯洁的选举中击败老对手……！”

“不对！”站在听众最前排、腋下拄着一根拐杖、匪里匪气的一个瘸子大声嚷道，“暴力万岁！耍手段万岁！”

“万岁！”全体在场的人齐声高呼。

“闭上你的臭嘴，该死的瘸子……！”市党部委员长边摇手铃边喊道，“别仄(这)么没大没小的！没看见发表讲演的四(是)随(谁)吗？他四(是)波哥大来的博四(士)，你呢，一个大字不私(识)！”

说罢，他凑过来，趴在我耳朵上说：

“其四(实)，瘸子梭(说)的有道理……咱们仄(这)儿要是不使暴力，不要手段，哥特佬儿就会打败咱们，咱们全得玩儿完……我劝您，博四(士)，还是换脏(张)唱片吧……”

他们打断了我的话，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打定主意按照堂·普罗科皮奥的权威性忠告，重新开始我的演话。

“我嘛，最爱讲民主，愿意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要是各位认为使暴力、耍手段必不可少，那就两样儿一块上！”这时候，我想起了吉列莫·瓦伦西亚在乌里维·乌里维葬礼上说的话，又接着说：“噢，民主，祝你长命百岁，可是……绝不让一个哥特佬儿活下去……！”

“仄(这)句话我爱听！洛佩斯博四(士)梭(说)过，就四

(是)仄(这)么回四(事)儿……!”瘸子大声嚷嚷着说,“讲演者万岁!”

“万岁!”听众异口同声地呼应着。

听到一片喝彩声,我又鼓起劲来继续说下去:

“鄙人无权滥用诸位的耐心。我今天讲话主要是想当众宣布: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我们的最高首领,我们的至高无上的首领,我们的恩人——决定接受他为众议院的候选人。至于他能否再以其智慧之光使议会半圆形大厅大放异彩,以其雄辩的口才震撼国会的圆柱,那就全都取决于我们啦!”

“好!梭(说)得好!”瘸子又高声大喊,“一开头,他还装得象个窝囊废呐……!”

“我的话快要完了。今天晚上选出的代表只有一项义务、一个责任,那就是保证蒙德拉贡博士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提名为候选人。在我党这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和大纛下,我们将展开四月选举战役并赢得胜利!”结束讲话的时候,我照例喊了几声“万岁”和“打倒”。正像堂·普罗科皮奥·马塔雅纳每次结束讲话,都要高呼:蒙德拉贡博士万岁!伟大的自由党万岁!打倒哥特佬儿!

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市长、检察官、财政局长、法官、税务官、警察总监、卫生局长、教育局长及其副官、市党部委员长和委员以及四位出席会议的市政厅官员走上前来,向我表示祝贺。检察官紧紧抱住我,对我说:

“讲得恰到好处。一开始讲话,我还担心您讲不下去呢……看得出来,博士,您胆子小,……很紧张……不过,后来您稳住了……我看您很有天资,而且挺谦虚。我的嗅觉特别灵……

有一回，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博士打算竞选议员，他和几位政治家到这儿来……我预言他一定榜上有名……现在他当上了共和国审计总长……有个孩子还流鼻涕呢，我就敢打赌，说他一定能当上总统，赌什么都行……”他像个预言家似的说。

接下来，堂·普罗科皮奥·马塔雅纳再次发言。他说：

“现在选举代表！既然大伙儿都赞曾（成）在座的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多米希亚诺·马拉维尔、法布利希亚诺·穆内瓦尔、马蒂亚斯·奥塞霍和萨拉铁尔·贝穆德斯，那就鼓吹通过吧……！”

“应该说鼓掌通过……”我小声地纠正他说。

“行啊，造（照）博四（士）梭（说）的，鼓狙（掌）通过……”他说，“那么一字（致）鼓狙（掌）通过了！下面挨个儿宣四（誓）……请过来！”他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画了个十字，问我们大家：

“到了党的代表会议丧（上），你们一定要保住头儿当选为纵（众）议员候选人，必要的四（时）候，连咬带抓也得干，绝不让哪个候选人把你们笼络过去，你们愿意发四（誓）吗？”

“是的，我们发誓！”五位代表同声答道。

一位市党部委员要求发言，建议大家静默一分钟，缅怀乌里维·乌里维将军。另一位委员建议为了缅怀埃雷拉将军再静默一分钟。一位市政厅官员发言说，不能忘了奥拉亚博士，也要静默一分钟，以示缅怀。

“好吧，那就为他们三位一共静默五分综（钟），落得皆大欢喜……”堂·普罗科皮奥建议说。

“静默六分综（钟）吧，每人摊上两分综（钟）……”财政局长炫耀了一下他的数学知识。这个颇有见地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

“那不把蒙德拉贡博四(士)撂在外边啦?”瘸子问。

“你别露怯啦!不知道头儿还活着吗?要么你不梭(说)话,一梭(说)话就满嘴胡噉……!”一位尊敬的市政厅官员说。

“全都组(住)嘴!”堂·普罗科皮奥命令说,“两位将军和奥拉亚博四(士)在天资(之)灵一资(直)盯仄(着)我们呐,他们会怎么想?”说着,他指了指三位大人物的画像。“肃静!我开死(始)计算私(时)间……”他从背心口袋儿里掏出一只“特根达马”表。

静默六分钟后,委员长晃了晃手铃,说:

“今天的日程到此结素(束)……随(谁)还要梭(说)点什么?”

“我要求发言,想贡献点东西……”屠杀老百姓的刽子手普利米蒂沃·贝哈拉诺说,“参加投票的印第安人都饿得要死要活的,所以顶好给他们弄点儿毗(吃)的……本人很乐意贡献出一头小牛犊儿,选举那天给他们毗(吃)……”

“我看党员贝哈拉诺这一糟(招)儿真叫高……”堂·普罗科皮奥说,“不过,还四(是)先投票,后毗(吃)……选举那天;咱们把小牛儿牵到广藏(场)上,在牛身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凡是今天投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一票仄(者),明天可毗(吃)牛肉。’我代表头儿和全体党员向堂·普利米蒂沃资(致)以谢意,希望他能把诺言付诸私(实)现……我又想做私(诗)了……好啦,眼下没什么要谈的啦,散会!我已经吩咐在吐埃塔·奥夫拉希娅那儿准备了一顿野餐,大概已经准备好啦……咱们走吧,去晚了饭就凉了……”

几张粗糙的长条桌上铺着芭蕉叶,上面摆着饭食,有用猪脊骨汤熬的小麦粥、杂碎、母鸡、煎土豆、木薯、米饭、鳄梨

沙拉子、小辣椒。中央、省、市的官员们、市党部的委员们、市政厅的官员们、代表们以及参加会议的其他公民们蜂拥而上，向菜肴发起猛烈进攻，那副架势真不亚于海盗攻上客船。争夺战进展迅速，十分激烈，我紧抢慢抢只捞到一只鸡翅膀和一个土豆。

“博四(士)，您喜欢这顿野餐吗？”吐埃塔·奥夫拉希娅问我。

“看样子，味道大概挺鲜美……”我的口气里分明带着波哥大牌的讥讽。

“填饱肚子精神爽嘛！”堂·普罗科皮奥说。他在几分钟里吞掉了一只母鸡、十个土豆、一磅米饭，木薯块吃得数不清。“行啦，肚子填饱了，该喝两杯啦！为头儿的健康、为伟大的自由党，干杯！为咱们的尊贵客人贝纳贝·贝纳尔博四(士)，干杯！”说着，他举起一瓶啤酒。

“干杯！”在座的人拿起酒瓶，齐声高呼。

乐师罗梅罗三兄弟弹起吉他、曼陀林和高音六弦琴，唱起奥蒂斯·蒂拉多和佩德罗·瓦加斯的歌曲。应市长的邀请，三位歌手还唱了几首政治歌谣。我记得有一首歌谣开头儿几句是：

自由党，真叫好，
一盘鲜肉吃个饱；
哥特佬，哥特佬，
每人一枚大黑枣……

吃饭的时候，聚餐的人狼吞虎咽。现在又是一顿狂饮。过了一个小时，吐埃塔·奥夫拉希娅的酒店变成了疯人院。五十

个疯子大嚷大叫，大哭大笑，拍手顿足，手舞足蹈，互相拥抱。一开头，还客气了一阵儿。渐渐地酒精剥去了这帮野人戴在脸上的文明人的假面具。开头显得最斯文的人现在变得最为粗野。人们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激烈地争吵不休。说话的人披头散发，面孔扭曲得不成样子，两手攥成拳头，一个劲发抖，扯起嗓子互相讥笑、谩骂。当然，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相同的题目：政治和政治家。皮匠和裁缝展开一场舌枪唇剑的争论。皮匠断言埃昌迪亚博士是个精力非凡的人物，裁缝说他是条“懒虫”，最后两人挥起老拳。一位市政厅官员说桑托斯博士是个十足的“达尔杜弗”^①，税务官立刻打了他一个嘴巴。教育局长竟敢说阿方索·阿拉乌霍博士和“‘斯科达’的买卖有牵连”，酒店老板踢了他一脚。到了半夜，醉汉们开始拿出寒光闪闪的匕首和手枪。市长把手枪退出枪套，朝天空连放三枪，然后说：

“晚会结束！这帮混蛋！亏你们都是自由党，不然的话，把你们全都铐起来……！贝纳贝·贝纳尔博士屈驾光临，当着他的面儿，你们也不嫌害臊？怪不得咱们这个市在波哥大的名声那么糟呢……！现在统统住口，滚回家里去。谁不走，就他妈的冲着我来！”

在座的人趑趄趑趄地开始撤离。走到大街上，一个人按捺不住，违抗市长的命令高声喊道：

“伟大的自由党万岁！打倒哥特佬儿！”

“组(住)嘴，凑(臭)狗死(屎)，你要把我们大伙儿都弄进监狱里去啊……！”走在他旁边的一个人对他说，“黄汤灌得太多

^① 莫里哀(1622—1673)的戏剧《达尔杜弗》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

了，你还以为咱们真有民组(主)呐……”

第二天，我在市长派出的三名清洁工的陪同下，到广场四角和主要街道上粘贴告示。告示是遵照蒙德拉贡博士的嘱托设计起草的。上面有一张头儿的大画像，下面写了几句话，颇得头儿的赞赏：

“自由党人：自由行动吧，请您自由地投这位伟大的自由党人一票！1900 年选举 乌里维·乌里维；1922 年选举本哈明·埃雷拉；1930 年选举恩里科·奥拉亚·埃雷拉；1937 年选举蒙德拉贡博士！

“您要摆脱困扰，
得到房子、面包和学校；
那就不要犹疑，
快投蒙德拉贡一票！”

当天下午，我完成任务，和市里的政治动物界的各种标本告辞以后，启程返回波哥大。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东躲西闪地艰难前进。回想起两天来的经历，我觉得泄气极了。所见所闻真叫我恶心。我为自己感到羞耻。像我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头脑聪明，又有文化，怎么会拿信念做赌注，背弃原则，竟然变成一个政客的代言人呢？怎么会成为一个愚昧无知、胆大妄为的“口技演员”手里的傀儡呢？在我看来，蒙德拉贡博士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人物。一个有高尚情操、坚定的道德观念的人，怎么会陷入政治勾当的臭泥坑里呢？一想起我的讲话，我特别感到机隍不安，情绪沮丧。我把自己降到了听众的文化水平。由于一时软弱(这是我的老毛病啦)，我竟然建议使用暴力，玩弄手段。这一切无非是要保住月薪七十比索的

可怜的职位……然而，没法子啊。要说斗争，要说扭断“魔法师”套在我身上的可耻的牛鞭，我没有那份儿力量。要么继续为他效劳（这是卑鄙的行为），要么挨饿，在这两者之间，我宁肯干点儿卑鄙的事。我注定要为别人充当人梯，想逃脱也逃脱不了。说来说去，我还是个笨蛋、可怜虫、窝囊废！

我正在苦苦地思索，同行的两位农民的对话把我惊醒过来。

“老哥，看见村儿里墙上贴的攒（传）单了吗？”

“看见啦，老弟……又要投票啦。蒙德拉贡博四（士）……咱们还是照样喝西北风，可该仄（着）……”

一个月后，党的代表会议召开了。蒙德拉贡博士在圣·维克托利诺租下一幢房子，供他从本省十个市搜罗来的四十名代表下榻。我们像蹲禁闭似的在那幢房子里呆了两天，和外界完全隔绝。不许我们打电话，也不许我们接电话。不许写信，也不许收信。总之，不许我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每隔六个小时，头儿来看我们一趟，下下指示，发发口号。

“诸位都很清楚……一定要忠于我，坚定不移地跟着我！只有我手中的旗帜才是合法的旗帜……各位别忘了，你们的前途、你们家庭的前途全部取决于我能否再次当选……参孙死了，所有非利士人^①全得完蛋。眼下我就是参孙，你们就是非利士人……现在有不少流氓，专门在代表中游说，收买选票……各位千万不要上当……！我个人算不了什么。这不是为我，是为了自由党的前途，为了保住共和民主制度……”

我在蒙德拉贡派的“司令部”里呆了两天，趁此机会我兴致

① 参孙是《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因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后被一非利士女子剃去头发，为非利士人投入监狱。一天，非利士人将参孙绑在大殿的两根柱子间。此时，参孙头发已再生，奋力摇动二柱，大殿倒塌，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勃勃地观察了一下各位代表。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多半不识字。从哲学上来说，他们当中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入自由党。他们成了自由党，只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自由党，只是因为保守党过去曾经伤害过他们的前辈。所有人都欠着蒙德拉贡一份人情，或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得到蒙德拉贡的关照。他们好比是遥控机器人，好比是要木偶的大师用无形的线牵动的傀儡。在他们眼里，头儿是万能的神人。对他必须百依百顺，顶礼膜拜。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善良人、老实人。可是，只要领导一声令下，什么犯罪的事他们都干得出来。从这里，我一丝不差地测量出了政治家的腐蚀力量。

举行党代表会议那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在蒙德拉贡博士率领下离开了那幢房子。蒙德拉贡博士从公共工程部抽出十名亲信职员，派他们紧紧盯住我们。路上遇见熟人，也不许我们打招呼。我们一直朝国会大厦椭圆形大厅走去。大多数代表是第一次到波哥大来，他们直呆呆地望着国会大厦的圆柱和大教堂的尖塔。

会议主席要秘书宣读代表名单，核实法定人数。然后，宣布代表会议开幕，宣读了一份原则声明。声明内容艰深，篇幅冗长，逻辑混乱，照我看是出自洛佩斯·德·梅萨教授的手笔。这篇文件足足念了三个小时。文件从纪元前两千年的阿美涅姆里特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时代说起，介绍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谈到古希腊反对暴君庇西特拉图和希庇亚斯的斗争；谈到在撒丹纳巴勒斯和尼布甲尼撒二世王朝时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进退；还谈到中世纪和近代争取自由斗争的成败。文件论述的内容上起早期希腊文化，下至曼彻斯特、里约内格罗会议、1910年宪法和奥拉亚·埃雷拉当选总统。从希罗多德到米尔顿·普恩特

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提供了材料。代表当中是文盲的，压根儿没听懂；我们这些识文断字的，懂得也不多。可是，声明居然得到一致通过。

代表会议上分为贵族团和平民团。

组成贵族团的有波哥大所谓名门望族的老爷、少爷们，他们都能说会道，矫揉造作，挂着些滑稽可笑的头衔，银行里有大笔存款，一见面，互相说：“哟！老伙计，怎么样？”此外，还有想连选连任的老议员、打算跻身政界的真假知识分子、善于纵横捭阖篡改选举结果的城市政客。

组成平民团的是来自本省各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像牲口似的让候选人牵着鼻子走。

一看这架势，用不着费什么脑筋，我就清楚地知道贵族团已经稳操胜券。力量对比悬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估计得不错。

与会者首先向过世的大人物表示悼念，向在世的大人物表示致敬。紧接着，主席发言。他说：

“这次代表会议是一次真正的民主会议。在会上，最普通的工人和最贫困的农民都享有发言权、选举权和表决权。因为正如本哈民·埃雷拉将军所说，人民是‘自由党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血中之血’。尽管如此，我还要提醒大家，各位自由地、自觉自愿地选举出来的众议院议员候选人应该是，必须是当之无愧的出类拔萃的公民，他们应以其效忠党国的高尚行为证明他们热爱共和民主制度。我手里有一份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名流、前部长、前省长、前外交家、前法官。他们多年来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不惜将个人利益和舒适的生活置诸脑后，在国内国外为共和国做出自我牺牲。他们理应有

权争取在国会里代表人民，而我们也可趁此机会哪怕是部分地偿还欠下他们的巨额恩情债……”他念了十二个人的名字，个个姓氏响亮，都和波哥大的寡头集团有瓜葛。二十年来，他们耗费了大量墨水，签署工资报表和旅差费单据。

“老是这些个人！”一个省里的代表嚷道，“再说，名单里没有一个省里的代表……你们还像往常一样要把我们抛在一边儿吗？”

“住嘴，讨厌的乡巴佬儿！把这个醉鬼拉出去！”几位贵族团的成员高声叫道。

“我不能容许任何人不尊重这个神圣的会场！我不能容许一个酒鬼用蠢话干扰这次庄严会议的辩论！”主席坚定有力地说。“司令先生，”他冲着—位警官发话，“请您下令把这个共产党破坏分子撵出会场！”

按照上峰的命令，两名警察推推搡搡地把那个唱反调的代表拉出会场。平民团首战失利。这时候，蒙德拉贡博士举起手，晃了晃手帕。他的追随者一看这个约定的暗号，立刻齐声高呼：“蒙德拉贡！蒙德拉贡！蒙德拉贡！”主席摇了摇手铃，要大家肃静。然后，又继续发表演说：

“这种压力，我也绝不接受。我知道，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把许多代表带到会场上来。他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党员，称号之多也足以争取连选连任。只是我请他不要忘记即使在天上也要分个等级。在我们党内，有一大批举国公认的知名人物，一大批高贵的公民。多少年来，在任何一张代表人民的候选人名单上，他们一直有权名列前茅。我们要是侵犯了他们这种权利，就不成其为自由党人啦。另外，这些劳苦功高的党员们的头脑与众不同，我们绝不能让议会失去他们的强烈的思

想光辉。刚才的可悲情况大家都看见了。为了防止破坏纪律的苗头，我决定委任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挑选候选人……”他念了三个人的名字，都是贵族团里最显赫的人物。

平民团的队伍里响起一片不满和抗议的声浪。蒙德拉贡博士走到我身边，趴在耳朵上对我说：

“您得马上讲几句话，保住我的权利……我们不能眼看着寡头们打败我们……您代表省里讲几句……要求发言！”

我吓得要死，哆哩哆嗦地站起身来，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我要……要求发……发言！”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许打断我的话！”主席怒气冲冲地喊道，“现在我就是领导，你胆敢目无权威吗？”他冲着我加上了这么一句。“还有没有纪律啦？我要问问各位代表先生：你们是愿意携起手来走向胜利？还是打算闹得四分五裂，同归于尽？”

“走向胜利！走向胜利！”全体代表齐声高呼。

“那你们就要接受，就要服从我今天晚上做出的决定，我不外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利益！刚才任命的委员会可以拿出十分钟来核实一下候选人名单……咱们眼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把咱们在众议院的代表权交给代表民族的光荣和荣誉，得到举国承认和尊敬的显贵；要么把代表权白白交给无知无识的投机分子！要么遵守纪律，无往不胜；要么大搞无政府状态，一败涂地！先生们，要是咱们失败了，咱们的子子孙孙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咱们的房屋将付之一炬，咱们的妻子将要受到凌辱！”

分裂的幽灵和失败的魔影把平民团的成员全给吓住了。贵族团的成员们个个春风满面，得意洋洋。过了十分钟，主席任

命的贵族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宣读了十二个名字，和几分钟前主席提名的那几位杰出人物一个不差。贵族们疯狂地鼓掌，平民们鸦雀无声。主席再次发言。他说：

“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卓越的候选人广泛地满足了人民的意愿。他们被选中说明本届代表会议顺利地办了件好事。但是，我们不能对省里的呼声充耳不闻。我们应该大方一些，‘大方’和‘自由’这两个词含义相同。我们给了波哥大市十二个众议员名额，理所当然地应该给昆迪纳马卡省的一百个市两个名额……再又一说，我们不能让省里的自由党人放弃投票，或自相残杀。不能冒这个风险。因此我建议在刚才通过的候选人名单中再加上埃斯塔尼斯劳·蒙图法尔和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的名字……散会！”

十二名“显贵”没有得到一名代表的支持。有五十四个人支持埃斯塔尼斯劳·蒙图法尔，可他在候选人名单上名列第十三；有四十人支持蒙德拉贡博士，但他却名列第十四。有几位候选人分别得到三十人、二十人、十五个人的支持，名单上根本不见其名。贵族团再次获胜，平民团和往常一样又遭到彻底失败。第二天，报纸用大字标题报导说，一项“光荣的民主事业”大功告成。

选举的准备工作差点儿把我给累死。每天从天一放亮起直到深更半夜，我要完成五花八门的任务。为蒙德拉贡博士起草讲话、文告、信件和电文；打不计其数的电话，还要接不计其数的电话；跑遍候选人相应的选区；会见候选人的朋友；向各区群众领导人传达指示；散发宣传品、贴传单；包装选票……

选举前夕，我奉头儿的命令前往上次去过的那个市，也就是选我为代表参加党代表会议的那个市。在那儿，我观看了民

主喜剧的最后一幕。当时正执行《禁酒法》，可我还是看到市长、检察官、财政局长、法官、税务官、卫生局长和委员们以及市政厅的成员们个个喝得烂醉如泥。为了庆祝胜利，大家开怀畅饮，一直喝到下一个星期一。尽管全国禁止游行示威，那天晚上还是举行了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会。堂·普罗科皮奥·马塔雅纳和皮匠多米希亚诺·马拉维尔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市长提出的争取选举胜利的计划百分之百地实现了。头儿的朋友们从早上八点开始拿到选民证，二十四小时以后，才把选民证发还给头儿的敌人。头儿的朋友们来到投票处的时候，受到严密的监视，以防有人偷天换日。到了下午两点钟，投票仍不很踊跃。市长派人找来选民登记册。注册的公民总共是 2734 人。保守党人没有参加投票，又赶上闹黄热病，至少有一半有选举权的人卧床不起。尽管如此，蒙德拉贡博士名下的选票不多不少刚好 2734 张。警察局、保安队一丝不苟地完成了交给他们的恫吓选民的任务。这次还好，只死了三个人，全是反蒙德拉贡分子。法医逐个做了尸体解剖，诊断说他们全都死于心肌梗死。警察总监以法医提供的科学报告为依据，宣布没有任何理由进行刑事调查。农民们围着普利米蒂沃·贝哈拉诺贡献出来的小牛整整转了一天，口水流得能灌满的喀喀湖^①。可小牛身上的肉还不够平息一下中央、省、市各位官员咕咕乱叫的饥肠呐。

下午五点钟，统计完选票，市府乐队奏起“卡契帕依”（他们只会弹奏这支曲子），走遍主要街道。清洁工人点燃了我从波哥大带来的大爆竹。以市长为首的竞选获胜者去到吐埃塔·

① 位于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一个大淡水湖。

奥夫拉希娅的酒店，好好地吃了一顿“祝捷野餐”。

与此同时，几百名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选民开始长途跋涉，返回在主人的土地上搭起的茅屋。他们为使用了民主制度定期赋予他们的唯一的权利而感到心满意足。

“您告诉头儿一声，说我为他步步高升干了这么多事情……”我去告辞的时候，市长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官员，为数不多啊！像我这样的朋友，绝无仅有啊！您把右盗^①对耶稣说过的话再跟他重复一遍：当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干脆把话挑明了吧，这次我出了力气，也该弄个收入更多的市长当当了……比方说，希腊多特市对我就挺合适……您把这个意思随便向他透露透露……您要是打算在政界干，我可以助一臂之力！对我的活动能力、工作效率，您已经有所了解……”

我继续为“魔法师”蒙德拉贡出力效劳。过了两年，他当选为共和国参议员；又过了四年，他再次当选。在三次竞选当中，我一直是他的参谋长。他连中三元，我一直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只是薪水由国库开支。在漫长的岁月中，“蒙德拉贡——贝纳尔公司”的活动具有如下的特点：资方只限于提出野心勃勃、大胆的想法，而得到丰厚的利润；劳方把全身心投入累死累活的工作，从天色微明干起，常常要干到黄昏钟响，但是收入菲薄，只拿微不足道的工资。利润分配全凭一句话，蒙德拉贡得到的是玫瑰花，我得到的只是几根刺。我不只一次想要奋起反抗，挣脱侮辱人的枷锁，另谋生路。但是，我的软骨病总是起而保护自己，我只好相信离开那位万能的人物的庇护，我根本找不到活路。

^① 右盗，即圣·迪马斯，被钉死在耶稣的右侧，因悔罪而得以升天。

那些年里我究竟起草过多少讲演词、法案、工作报告、动议、建议、公告、文章、对记者的谈话、信件和电报，连我也记不清了。我这个人生来是个谦谦君子，可为了说明真实情况，我只好说正是由于我拼死拼活地绞尽脑汁，蒙德拉贡博士才成为议会中最显要、最有威望的人物。在他头上加了一顶又一顶桂冠，在他胸前戴上了一枚又一枚勋章。而我这名默默无闻的士兵头上没有一小串花环，军服上衣上没有一枚铁牌儿。

我是参议院的职员，又天天和两党超群出众的人物接触。这等于说我站在不可多得的观众席上观察了九年中发生的政治事件。

1938年，爱德华多·桑托斯博士登上行政权力的第一把交椅。这以前，他一直是报刊——这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力——的主人、老板。他是近百年来主张妥协、让步的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为人温和平静，说起话来总是从容不迫、有板有眼。不过当他发现自己的王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作出意想不到的反应。他奇迹般地把一张报纸变成制造总统、部长、大使和文学天才的工厂，变成民族意识的权威。他曾经和达里奥·埃昌迪亚争夺过总统宝座。埃昌迪亚长得又矮又胖，是个冷漠的哲学家。他压根儿不明白权力是干什么用的，可却执政了四十年。上一年，爱德华多·桑托斯博士在议会选举中战胜了对手，成为自由党推出的唯一一位候选人。由于保守党宣布放弃参加竞选，他没有遇上任何对手，当选为总统。

桑托斯鼓吹“共处”。但是，加切塔发生了流血事件，政府武力干涉阿兰戈·维莱斯博士（绰号是“斯巴达克”或“风暴中的雄鹰”）参加竞选，让阿方索·洛佩斯再次当选为总统，为此还阻止省议会开会，以免阿兰戈·维莱斯当选。这些都使“共处”

蒙上阴影。

桑托斯不得不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国家带来的问题以及劳雷亚诺·戈麦斯领导的保守党的顽固的、无情的反对。劳雷亚诺·戈麦斯像堂·吉诃德面对酒袋那样，把愤怒的长剑刺向他遇到的每一个自由党的部长和参议员。在他背后还有一支强大的战斗队，其中包括身材魁梧的普利米蒂沃·克雷斯波和羸弱瘦削的米格尔·希门尼斯·洛佩斯、狡黠的路易斯·伊格纳希奥·安德拉德和机灵的胡安·乌里维·夸亚。

1942年，洛佩斯重新执政。他是个不同的人。他仿佛是个猎人，四年前打死一只老虎，如今却被虎皮吓住了。为了让领导阶级谅解在他第一个任期中犯下的罪孽，洛佩斯在第二个任期内干了不少悔罪和弥补的事情。汉德尔公司的生意、托利马脱粒公司的买卖和“马马托科”杀人案都被劳雷亚诺·戈麦斯及其议会的一帮人无情地加以利用，结果把船弄得千疮百孔，河水一直漫进船长的舱里。这时候，一个古怪的上校在帕斯托演出了一出国民历史上最滑稽的喜剧。他逮捕了总统，过了几小时，又请总统任命他当国防部长。他释放了总统，自己却锒铛入狱。霍尔赫·埃利塞尔·盖坦^①打出了“从精神上重建共和国”的旗号。加夫列尔·图尔巴伊打出“振兴自由党”的旗号。从此自由党分裂成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派别。1945年，洛佩斯下台，他的得意门生阿尔贝托·耶拉斯取而代之。1946年5月，自由党分裂日益加深，保守党的候选人马利亚诺·奥斯基纳·佩雷斯晃动着漂亮的长发，摆出安蒂奥基亚长者的慈

^① 霍尔赫·埃利塞尔·盖坦(1903—1948)，曾是哥伦比亚自由党左翼领袖。1947年10月被提名为自由党竞选1950—1954年总统候选人。1948年2月与政府公开决裂。4月9日被杀害。

祥面容，取得了节节胜利。

大约先后有十年的时间吧，我坐在剧场的第一排，观看了政治马戏团献演的数不清的剧目。我有机会看到最凶猛的野兽、最灵巧的杂技演员、最熟练的魔术师和最风趣的小丑。还有训练有素的驴子和鹦鹉。这些演出一开头挺让我开心，可最后叫我恶心透了。最后，我实在受不住从兽笼里散发出的粪便的恶臭了。

六

上面回述了那段时间（当时我表面上为国会服务，实际上听命于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件，不觉之中岔到政治领域中去了，反而没有提及当时相继发生的在我一生中关系重大的两件事。

一件是我母亲去世，另一件是我和波妮法希娅·雷卡曼结婚。前一件事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后一件事是我一辈子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我爱妈妈。我爱她，因为她善良、和顺、温柔、可亲。只有她理解我，喜欢我，同情我。只有她从来没有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折磨过我。只有她从来没有压榨过我，嘲弄过我。在我失败的时候，只有她安慰我，鼓励我继续走下去。在她身上我倾注了全部感情。在心理上我时常落海遇难，她是我能够靠近的安全岛；在我感情的荒漠中，她是凉风习习的绿洲。

我那位无私忘我的老母亲，在七十岁那年得了脑溢血。随后，又是半身不遂，一连几个月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我手头拮据，没法送她上医院。我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的“替身”，我起草过可以装订成集的演说词、经过深思熟虑的法案、条理

清晰的报告，为“头儿”打开了功成名遂的道路，然而我却没有起码的几个钱为妈妈支付住院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疾病是奢侈品，只有富人才生得起病。妈妈需要一位护士经常照料她。我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位护士，可我压根儿没想到我找到的却是个灾星。

她名叫波妮法希娅·雷卡曼，后来成了我天天见面的债主、凶狠无比的冤家。虽然女人的年龄历来是个猜不透的谜，可我能估摸出她大约有三十五岁。当时，我二十八岁。她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相貌丑陋。往脸上看，一双小眼睛不住转动，发出一股咄咄逼人的光芒。一张大嘴，露出一口坚硬的大牙。脸上没有一丝一毫高雅的神情。只有高高隆起的胸脯，才毫不含糊地表明她是女性。从声音、举止、表情上看，她是个性情粗鲁、性格倔强的女人。

不过，在我母亲跟前，她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护士成了最孝顺、最亲热的闺女。我母亲说不出话，她能揣摸出她在想什么、要什么。她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母亲。一连几个钟头跪在病榻旁边，观察母亲呼吸的起伏变化。她以极大的耐心给母亲喂饭，喂大夫开的药。讲些逗乐的故事，逗得母亲露出笑容。用甜滋滋的声音唱着古老的歌谣，把母亲带回青春时期。到夜间，她念起玫瑰经，让母亲感到说不出的安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温存的人，在有生之年恐怕也不会再见到了。我定定地望着波妮法希娅，直觉得在她周围环绕着一圈神圣的光环。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感激心情和对她的好感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接近爱恋的情愫。虽然那个女人容貌丑陋、性情粗鲁，但对我却颇具吸引力。弱者在不知不觉中总在寻求强者的保护。这位无与伦比的护士或许有本事医治好我的胆怯癌症，把

她身上的力量注入我的躯体。再又一说。她外表的粗鲁和内心的柔顺恰成鲜明的对照。我曾经心血来潮，把她看作外壳粗硬，果肉软和、甜蜜的水果。我们俩渐渐成了好朋友。她开始直呼我的名字，我也直呼她的名字。开头几天，大家客客气气，后来索性以“你”相称。她看我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好感。我一说笑话，她就放声大笑。我不住口地称赞她心地善良。

有一天，母亲睡得很沉，波妮法希娅跪在床前，看着她睡觉。我对她说：

“你为我妈干了这么多事儿，我怎么才能报答你呀？”

“我不是单单在尽义务，不能这么说，那是撒谎……我觉得你母亲和你都挺好……我仔细想过了，你这个人不简单……可惜你胆子太小，缺乏意志……我在想，老太太没有多少日子了，她去世以后，你比眼下更需要我……得有人给你鼓劲，得有人推着你走……”

“的确是这么回事。坦白地说，这件事我也琢磨多少回啦……”我回答说，“我胆子小，不敢跟你说……可说实在的，我需要你……”

通过这番含蓄地表白爱慕之情的谈话，我们的浪漫史开始了。第二天，我送给她一束玫瑰花。过了两天，又送给她一瓶香水。送完香水，我怯生生地吻了吻她的手。又过了一个星期，在暗幽幽的门厅里，我仗着胆子吻了吻她的面颊。

我母亲的头脑一直很清楚。她注意到我们的爱情日益加深。有一天，她指了指波妮法希娅，又指了指我，为我们祝福。我们俩都明白，她同意我们的婚事，而且把它看作是一桩大好事。母亲默默地赞成我们结婚，这是她的遗愿。对我来说，她

的遗愿具有不可抗拒的约束力。

一两个礼拜以后，妈妈躺在我未婚妻和我的手臂中咽了最后一口气。我一生中受过的罪一个接着一个，惟独这次最厉害、最让我撕心裂肺。波妮法希娅对我表现出无限的柔情，替我分担了悲痛欲绝的重担。她的沉重心情一点也不亚于我。

那时候，波妮法希娅成了我感情世界的中心。她是我在茫茫黑夜中的引路人，是慰藉我的亲人，是给我勇气的顾问。我们天天见面，一起吃午饭、喝茶。我们还时不时地去看电影。每逢星期日，她总要陪我到公墓去祭扫妈妈的坟茔，在坟的周围摆上鲜花。

我在恋爱，但从不放纵感情。正如席尔瓦在一首诗中说的：

那不是激动，

那是模糊的柔情……

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常常没有什么强烈的激动。我对波妮法希娅的爱情中混杂着感激和寻求保护的心理。我是个寻觅伴侣的孤独者，是个渴望慰藉的可怜虫，是个急需鼓励的胆小鬼。波妮法希娅首先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护理我的精神护士。另外，我还觉得我有义务履行妈妈的唯一一项遗嘱。

过了三个月，我结婚了。中产阶级的基本特点是模仿别人。他们宁肯牺牲一切，也要按照上层社会的方式操办婚丧嫁娶。上层社会人家办婚事，不怕大把大把地花钱。到了中等人家，就只好东施效颦了。我的婚礼就是如此。波妮法希娅和我穿上租赁来的礼服，用赊购的国产香槟向宾客敬酒。没有乐队，就从拉斯·内维斯小广场找来三名吹鼓手。我的教父和婚礼的中心人物自然就是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

上次在妓院里一挨近女人我就败下阵来。对此我记忆犹新。不过，这次也是没事瞎操心。我胜任愉快地履行了夫妻间最不令人着恼的义务。热情不高，劲头儿不大，不过倒也颇有成效。九个月后，我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

波妮法希娅从老处女变成新嫁娘。目的达到以后，她猛地扯下了热恋时期一直戴着和善的假面具。扯掉假面具，我才看到她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丑陋得令人作呕。她本想治愈我的胆怯症，可眼看着回春无术，直气得暴跳如雷（她的火气到现在也没过去）。天使般的护士成了刽子手。于是乎，我开始了长达三十四年的无休无止的苦难历程。我本来盼着上帝大发慈悲把我变成鳏夫，以补偿我做出的牺牲，后来也绝望了。

婚后不几天，我就看到了我犯下的错误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和波妮法希娅——一个脾气暴躁、不顾脸面的半男不女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成亲好比是堂·吉珂德娶了桑乔·潘沙。在我们之间横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

“从嫁给你那天起，我算倒了霉啦！”第一次拌嘴的时候，她说，“我嫁给你是出于可怜你，现在我真后悔……我寻思着能把您变成另外一个人……嗯，这么说吧：变成个人！你身上连点人味儿也……现在我算明白了，对您这种人，毫无办法……青山易改，秉性……在咱们家总得有人驾驭啊，只好我当马夫啦！我脚上多了双靴子，可你没有……！”

她和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博士^①、波菲利奥·迪亚

^① 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1756—1840)，巴拉圭独裁统治者。巴拉圭独立后，他负责起草宪法，并成为执政者之一。1814年5月，通过国会他攫取了整个统治权。1816年，又被任命为终身的统治者。

斯^①或者奥里维拉·萨拉查^②一样要终身执政啦。

我的好朋友费明·萨尔加得知波妮法希娅宣布独裁统治以后，笑嘻嘻地对我说：

“夫妇之间也好，拳击手之间也好，谁先动手，谁就能连击第二下！对你，我是了如指掌。我早知道骡马迟早要骑到你这匹公马身上……我劝过你多少次，让你不要结婚……你硬要胡来，这下子该吃苦头了吧……！像你这种人，压根儿不该结婚……”

“像我这种人，压根儿不该活着……我压根儿不该出生……”我哭丧着脸回答他说。

我千辛万苦建功立业总算得到报偿。蒙德拉贡博士被任命为驻某中美洲共和国大使。在出国赴任前几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

“共和国要我做出新的牺牲，让我离开祖国！不过，也给予了我巨大的荣誉，我要在友好国家的政府面前代表共和国！我的为人，您很了解。不用说您也知道，对牺牲，我绝不逃避；对荣誉，也绝不退让……我要求您最后为我服一次务，替我起草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演说词……出国前要准备的事儿太多啦，想写，连一分钟也腾不出来……这九年里，您一直是我疼爱的孩子。我琢磨着，我走之后您一准会觉得自己成了孤儿……那倒不会！我可不是个不懂骨肉之情的父亲……我活着

① 波菲利奥·迪亚斯(1825—1915)，墨西哥独裁者。从1876年起直到1911年止的三十多年中——其间只有1880年至1884年由他所布置的一个傀儡冈萨雷斯任总统——他是墨西哥全权的独裁统治者。

② 奥里维拉·萨拉查(1889—1970)，葡萄牙独裁者。从1932年起任葡萄牙总理，统治葡萄牙长达三十六年之久。

一天，您就能得到我的保护……甭管怎么说，您到底还为我干了点事嘛……不错，国家已经给了您优厚的报酬，可我还是很感激您，我自认有责任继续帮助您……我跟拉萨罗·马利亚·魏兰迪亚博士谈起过您。他是我的好朋友、法院的法官、咱们的同党，又是杰出的法学家。顺带说一句，多亏了我他才当上法官。我通过两位最高法院的法官，让他当选了。那两位法官都是我手里的牌……魏兰迪亚博士正好需要一位合格的秘书……像您这样聪明老实、精通刑法、又是笔杆子、打字能手的人……薪水嘛，不算太高，可工作很有意思……再说，这个职位人人羡慕，能够执法，这可是一项无比崇高、令人肃然起敬的职责。机会难得，能够碰上的人不多……当然喽，秘书知道的事情得和法官一样多，有时候还得超过法官……这有什么呀？您在我身边儿学到了这么多知识，为什么不能把您的新上司的法学知识学到手呢？”

拉萨罗·马利亚·魏兰迪亚博士是个穆拉托人^①，宽鼻子、厚嘴唇、头发打卷，两眼灵活，透着狡狴。满头没有一根白发，很难猜出他的年龄。可能有五十岁，也可能有六十岁。两手戴的戒指又多又大，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香味儿。一看就能知道他的远祖是非洲人。

“您被推荐来，真是太好了……”我去到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蒙德拉贡博士的推荐，对我来说就是命令……虽说法院官员不兴干预政治，可您是自由党人，这一点是个很好的保证……‘哥特佬儿没有好儿，喝点酒样样儿有’……当然啦，前面这句话并不说明我是宗派主义者……求上帝饶恕我！您在

^① 即黑白混血种人。

办公室里的工作很轻省。不外乎是审核一下巡回法院的法官和高级法官做出的非最后性的判决和裁决，以便认定、撤销或者改变这些判决和裁决。对上述人员在直接受理或以适当手续提出上诉时所做的逮捕、暂停审理、停止审理和起诉决定以及判刑、免刑、取消或终止刑事诉讼的判决，您要提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上千件凶杀、人身伤害、堕胎、偷盗、扒窃、诈骗、监守自盗、敲诈、殴打、骗奸、猥亵幼女、强奸、抢劫、重婚、乱伦、渎职、盗用公款、勒索、滥用职权、诬蔑诽谤等等罪行，您要分析证据，正确估量犯罪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对预审判决中判处的主刑和附加刑，您要提出加刑或减刑……”

“就是这些？”我趁着魏兰迪亚博士停下来喘口气的工夫，战战兢兢地问道。

“我还没说完呐……”法官回答说，“您还得学一学最高法院的案例和全国所有法庭提出的学说；还要把龙勃罗梭、卡拉腊、菲利^①、加罗弗洛^②、佩西纳、塞巴斯蒂安·索莱尔、伊鲁雷塔·戈耶纳和希门尼斯·德·阿苏亚等人的理论付诸实践。总而言之，您要成为人类学和犯罪社会学方面的技术人员，成为法医学专家……薪水嘛，相对来说是低了点儿，可我绝对相信您……但愿您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我在四所法学院里任教，您起草的文件我连签个字的空儿也没有……我这个法官的威望得来不易，现在全靠您啦……最后，我想提醒您一声，一年来部里没向我们提供过文具，职员们得要自己掏腰包购买所需的纸张、铅笔、带子和橡皮……”

① 菲利（1856—1929），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的学生。曾为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之一，后来转向刑事社会学派。

② 加罗弗洛，意大利犯罪学家。

新办公室的环境简直是污秽不堪。先说家具吧。有一张旧的写字台，大概堂·何塞·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波^①曾在这张写字台上起草过最早的几份判决书。有几把皮椅子，背上印着的共和国国徽隐约可辨，“哥伦比亚共和国”几个字几乎无法辨认了。还有一把年久失修的长沙发椅。几排粗糙的木阁板，上面堆满用龙舌兰绳捆扎起来的尘封的案卷。屋顶上布满蛛网，地毯上净是墨水的污迹，被啃得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窟窿。可见，蜘蛛和老鼠经常光顾办公室。暗幽幽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支 25 烛的灯泡。苍蝇拿灯泡当了公共厕所。几本堆放在角落里的法典和《司法公报》是仅有的参考资料。

我是个大傻瓜，所以我勤奋地做事。世上有无数的傻瓜，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干活儿能使人变得尊严，我就是他们行列中的一员。我工作起来，热情洋溢，劲头儿十足，好比是贪婪的汉子为了发财拼命干似的。新的工作也确实确实让人着迷。接到一宗案子，我要从几百张纸页里找到被淹没的真实情况。在模模糊糊的迹象和互相对立的证据组成的林莽中，我要分清善恶，弄清谁个有理、谁个无理；谁是无辜者、谁是罪犯。我要像潜水员一样穿过相互矛盾的论据组成的茂密的水草，深入到人们的心底。我要调查清楚看来似乎无法解释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动机。我要划清在某个犯罪活动中加重情节和减轻情节的种种情况，并根据罪行轻重，依法处以不同的刑罚。所有这些对我都很有吸引力，使我感到热情澎湃。我觉得自己仿佛是置身于竞技场上的运动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过去对法学的爱好和用笔表达思想的天生才能又找到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① 何塞·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波（1760—1832），哥伦比亚法学家。

我一连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全神贯注地阅读案卷，真可谓废寝忘食。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从看台上观看人类贫困的悲喜剧大游行。在我眼前掠过人能够干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卑劣行径和愚蠢行为。害人者和被害者肩并肩地走在一个行列里。

儿女急于继承遗产而谋害亲生父母。兄弟间为了些许小事互相残杀。在酒神的驱使下，亲密无间的朋友反目成仇。为领到保险金，商人纵火烧毁自家的仓库。有人假冒百万富翁的亲属，伪造遗嘱。坏蛋奸污两岁的女孩儿。四十岁的妇女遭到二十岁小伙子的蒙骗。呆傻人犯下难以描述的重婚蠢事。小偷盗窃牲口，拍花的拐骗女孩儿。强盗明火执杖，司库靠盗用公款大发横财。吃醋的丈夫大打出手，甘戴绿帽子的男人替老婆拉皮条。老师带着学生在索多马区幽暗的胡同里瞎逛。牧师宣扬抛弃阳间钱财，可又从胆大包天的骗子手里购买制造伪币的机器。

每一份案卷都是一出恐怖的戏剧，或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或是一出滑稽戏，或是一部热闹的小说，或是一出妙不可言的独幕喜剧。看着看着，我忽而觉得害怕，忽而觉得愤怒，忽而觉得同情，忽而觉得厌恶。时常看到一些令人捧腹的事情，我不由得放声大笑。

对我来说，学会这门新职业并不困难。干了八天以后，我就在司法工作上开步走了，我起草了几份判决书，颇得魏兰迪亚博士的赏识。他不加任何修改就签上了名。

“您可是块好材料……”他说，“既有法律观念，文笔又优美……跟着我，您能学到不少东西，进步一定很快……给我当助手吧，我一定帮您的忙！”

有件事虽然他没说，可我心里很明白，这就是一家新公司又开张了，替代了九年来一直打着“蒙德拉贡—贝纳尔”的招牌营业的那家公司。和以往我参加过的所有公司一样，在新公司里我作为合伙人还是身兼二职：资方和劳方。利润归大股东所有，我付出体力和脑力劳动，得到的报酬只是一份可怜的薪水。

教学和私事占去了魏兰迪亚博士的全部时间。他每隔两、三天到办公室来一趟，呆上一个小时，在我起草的文件上签个字。一开头，他还逐字逐句地读上一遍。到后来索性看也不看，签个字了事。只有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他才准时来到办公室，因为我们这儿每半个月发一次薪。

“我的支票交给您啦？”他顾不得寒暄几句，一上来就问我，“我一个大子儿也没有啦……有什么新闻吗？有谁来过电话吗？我估摸着得有不少判决书要签字……跟您这样一位尽心尽力的秘书一块工作，真叫人高兴……！冲您这么卖力气，该喝一杯咖啡……等签完字，我一定请您……”

我的新上司建立了一个统管一切的司法王国。宫廷里的人物有三位高级法官、九位巡回法官和二十七位地方市级法官。臣仆包括一百九十五个为朝臣服务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书记员和看大门的。他本人任命法官，又为法官钦定副手。因此，这二百三十四位职员都是死心塌地为这位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效劳的臣仆。

臣仆们不能仅限于对魏兰迪亚博士表示服从和崇敬。他们还得定期设宴款待他，给他送礼，满足他各种需要，迎合他各种癖好。他家里所有的家具和装饰品全是臣仆们馈赠的。他在省里的下属把阿诺拉伊马的黄油鸡蛋玉米饼、希帕孔的母鸡、维耶塔的糖塔、帕却的橘子、乌巴特的奶酪、索阿查的香肠、

拉·梅萨的菠萝和加切塔的扁桃仁糖送进京来，像绵绵细雨似地不停地洒到魏兰迪亚博士家的食品储藏室里。据传，三十年间他的夫人居然不必到市场去买东西。

每逢发薪的日子，他都要吩咐我：

“把朋友们叫来，告诉他们，我准备好了，单等着接受他们的招待啦……！请他们下午六点钟在摩西酒店等我！”

波哥大这家老酒店是律师和司法部门的官员们聚会的地方。六点钟整，所有家住本市的受到法官保护的人都来到摩西酒店。过了半小时，杰出的法学家走进来，慈父般地向大家打过招呼。然后，坐在桌子的一端，问在座的人：

“今几个，各位请我点儿什么呀？”

“看您喜欢什么啦，博士……”一个人说，“来瓶威士忌？”

“要么来瓶白兰地……”第二个人说。

“也许博士想喝汽水？”第三个人问。

“还是先喝瓶汽水吧……”魏兰迪亚博士回答说，“今几个办公室里事儿太多，我渴极了……喝完再说……”

主人们笑咪咪地望着尊贵的客人。他一发表看法，大家连忙点头称是。他一说出警句，大家连忙大加夸赞。他一说笑话，大家连忙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人突然问道：

“博士想吃点儿东西了吧？辣子鸡丁味道鲜美！”

“我斗胆劝您尝尝用刺山柑花蕾调味的火鸡……”一个高级法庭的秘书说。

“干吗不来个烩肠呢？是这儿的拿手好菜。”一位巡回法官问道。

“哎呀，我饿极了，那就来一份辣子鸡丁、一只火鸡……”

法官回答说。

到了半夜，法官酒足饭饱，提高嗓门儿说：“我想跳跳舞，还想……还想……”

“博士想去‘萝赛达尔’？”一位办公室主任问。

“我提议咱们去‘芳塔希奥’……”一位书记员说，“前几天我去过，那儿有一位从佩雷腊来的美人儿！博士准能中意……”

付完饭钱(以大家的微薄收入来说，这顿饭委实够贵的)，主人们在廉明清正的法官率领下，转移到法官选定的夜总会。到了夜总会，一位市级法官挑出最妖冶的姑娘，嘱咐她说：

“瞧见坐在那边儿的那位先生啦，就是那位半黑不白、鼻子有点扁平的，他可是位大人物……是法官！今儿晚上你陪他睡，可别跟他要钱……他的帐朝我要……来，先给你几块……”市级法官递给她几张钞票，“不过，你得好好伺候他！博士的胃口大得很呢……”

“博士，姑娘来啦！请便吧……”市级法官立刻对魏兰迪亚说。

这种场面每十五天重复一次，风雨无阻。每一次都是这么开头，中间和结尾也是一模一样。我是法官贴身的副手，只好老得请他吃饭。我要匀出大部分薪水，定期摆饭局。新上司没羞没臊，厚颜无耻，真把我气坏了。看见他的仆从们那副奴才像，我恶心透了。可是，我担心自找倒霉，担心失去上司的青睐，担心被解雇，只好忍气吞声。Primum vivere^①这句话平息了我的愤怒和厌恶。

① 拉丁语：首先要活着。

魏兰迪亚博士及其全家在希腊多特的法官家里度过十二月的假期。在卡克萨的法官家里度圣周。在托卡伊马的法官家里欢度周末。这些地方的法官被任命后，一直有义务为法官及其家属提供住处，并在客人停留期间供应他们食品 and 美酒。

法官的生日相当于“卡马乔的婚礼”^①，每次都要欢庆三天。生日的筹备工作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了。魏兰迪亚博士从那些跟他的办公室有业务联系的律师当中挑选出十名律师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采购酒类。再任命一个负责提供食物和饮料的委员会，成员是在法院参与诉讼的律师。最后，还组成第三个委员会，负责出钱请乐队。

宾客们是魏兰迪亚博士在法院工作的同事、最高法院的法官、国务委员、普通法官和检察官、刑事律师以及所有他的臣仆。每个人都得准备一份礼品。送什么礼，法官在发出邀请的时候都一一指定。他的要求和每个送礼人的经济能力直接挂钩，因此是公平合理的。对有钱的人，要他们送西装、大衣和高级香水；对没钱的人，要他们送内衣、手帕和袜子。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生日前夕，他对我说：

“明儿晚上八点钟，我在家里等您……祝寿准八点开始……我知道您手头儿不大宽裕，就送我一副背带吧……！我那副太旧了……”

那一次，装进魏兰迪亚博士柜橱里的东西计有十四套西装、四件大衣、六顶帽子、五十三件衬衣、二十七条领带、三十二条短裤、二十九双长袜、九双鞋、十一件睡衣、七打手绢和三把雨伞。上述物件都写在我奉命开列的礼品清单上，清单的拷

① 见《堂·吉珂德》，引申为狂饮暴食的宴会。

贝我一直保留至今。

魏兰迪亚博士用二十位法官捐献的美酒佳肴和十位法官雇来的乐队演奏的曲子十分体面地招待宾客。和往年一样，祝寿活动从星期五晚八点一直延续到星期一下午四点。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这些受到魏兰迪亚保护的人不能单独送礼，而要大家凑份子。在一年圣诞节前夜，我们送给他一辆小汽车。转过年来，送给他四百张彩票。第三年，我们花了一万五千比索，给他买了股票。

法官是个有福之人。上帝对他特别照顾，免除了他参加劳动的厄运。和他在一起的是慈母般的女神，和我在一起的是凶神恶煞，这两种情况相结合，其结果是他白赚大钱，而我的前额却……不住淌汗。打官司的律师经过盘算终于慷慨解囊；受到法官保护的人被迫自愿捐献。于是他吃的、穿的赛过亲王。在他麾下有二百名俯首贴耳的志愿兵组成的军队。他们奉承他，体察他内心深处的愿望，满足他最隐秘的癖好。

此外，随着我的刑法知识的不断长进，他在法律界的威望、博学多识的声誉也在与日俱增。经过三个月的实践和学习，我成了一名十全十美的审判官。我学会了分析证据、估量证词、分辨证言的真伪；评价各种迹象，分清哪些是实在的、哪些经不起推敲；抓住主要的东西，摒弃次要的东西；把握住法律问题的精髓，在平淡无奇的证据组成的杂七杂八的灌木丛中打开前进的路子；执行法律条文，把伟大的法学家的法学理论付诸实践。我的判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几乎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我重新评价一些陈旧的观点，就正当防卫、性自由、贞操、违抗行政当局的罪行提出了崭新的、革命的论点，并且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承认。我写的判词刊载在《法学杂

志》的显著位置上。司法官员和律师们纷纷向我的新上司表示祝贺。其实，这些优秀的判词的真正作者是谁，律师们心里一清二楚。他们遇上复杂的难题，就来求教于我、求救于我。我竭尽心力的工作使魏兰迪亚博士成为法院法官中最杰出、最受人尊敬的法官，从而有十足的把握在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上占一席之地。

然而，法官本人并不承认在他的成功中有我什么功劳，也从未对我表示过丝毫感激之情。他瞧不起我。我时常觉得他用忌妒的眼光瞄着我。有一次，法官的一位亲戚来看望他。两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说话。办公室的门半开着，正对着我的办公室。我听到了下面的谈话。

“你的秘书是谁？听说是个绝顶聪明的家伙……”

“唉，一个叫贝纳贝·贝纳尔的人……不算太笨……能干点事……当然啦，是在我领导之下……不过，那个可怜虫实在太窝囊啦……！”

“一个叫贝纳贝·贝纳尔的人”，当时我就是这么个人物，如今还是这样。世上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胆小怕事束缚住手脚，只好把自己的头脑和良心租给别人，换得几个可怜的小钱，用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为他人做嫁衣。我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我们是供大胆的人爬上成功的巅峰的阶梯，是供唯利是图之辈成名得势的跳板。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个叫贝纳贝·贝纳尔的人”！一个可怜虫！一个窝囊废！

一天下午，我从办公室出来，迎面走来一个大高个儿。他服饰鲜明，穿戴得整整齐齐。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安蒂奥基亚口音。

“我叫阿德奥达托·埃切维里，愿为您效劳……”他向我伸

出右手说，“我得跟您谈谈……想请您吃顿饭，您肯赏光吗？”

“我倒没什么……”我回答说。

“那，咱们去格拉纳达饭店吧，我就在那儿落脚……嗯，要不，咱们先到酒吧间喝两杯……波哥大的天儿真够凉的……唉呀，圣母马利亚！您瞧怎么样？”

我觉得这位新朋友挺不错的。听到他的邀请，我很高兴。我连格拉纳达饭店的大门儿也没进去过，正像现在我压根儿没去过特根达马饭店、希尔顿饭店、赛马俱乐部和度假村一样。对于属于我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些地方都是禁区。它们是专门供“财富创造者”、“干家子”、“上层社会的体面人物”以及蒙德拉贡们和魏兰迪亚们享用的。

我们把两肘支在酒吧间的柜台上，眼前放着两杯威士忌，开始了交谈。

“咱们说话，不必绕弯子。我们那儿的人，讲究的是这一套。拉萨罗·马利亚·魏兰迪亚博士的办公室里有份告发我的状子……我以马尼萨莱斯圣母的名义起誓，我是无罪的……！是这么回事，我有个仇人，他想报仇，就胡乱写了一份控告我的状子，说我犯了什么什么罪，其实没那么回事……我心里明白，我的小命儿攥在您的手心里。据我所知，您在魏兰迪亚博士办公室里是大拿……我是个有钱人……我的咖啡园价值一千万比索。您知道我有什么打算吗？整整那个告状的！您写一份判决，彻底取消本案，把拷贝转到阿尔梅尼亚，拖他娘的！您明白吗，嗯？我想过啦，找律师也得花钱，与其把钱白便宜了律师，还不如给您呐……我出个主意，咱们可以做笔交易，我给您二十万比索，您写一张彻底取消案子的判决……您看怎么

样，嗯？您要是愿意，我马上可以开支票……”说着，他把支票簿和自来水笔放在柜台上。

这个主意太有吸引力了。当时，我的薪水是一百二十比索。我的全部家当就是家里那几件旧家具。当年，这二十万比索可是笔大数目。有了这笔钱，能在波哥大买下十所像样的房子。可是，在我内心深处，正直不阿的人、热爱法律的人、胆小鬼、窝囊废统统挺身而出，义愤填膺地要我拒绝这个缺德、骗人的主意。

“您找我，算是找错人啦……”我对埃切维里说，“我人穷志不穷……我需要钱，可不想用非法手段捞钱……您的主意是要我犯法。行贿受贿，双方犯罪：出钱的、得钱的；给钱的、拿钱的都犯法……本来我可以揭发您……可我不想火上浇油……早知道您要出这么个点子，我就不会接受您的邀请了……晚安！”

我怒冲冲地离开了酒吧间。只是一想到我对行贿者进行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教育，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过了几天，魏兰迪亚法官手里拿着一件公事走到我的写字台前，对我说：

“这件案子拖得太久啦……据可靠消息，这几天检察院要派人来检查工作，我想别让他们看见咱们办事拖拉……再说，我跟被告谈过一次话。他是卡尔达斯省的一位挺有钱的咖啡园主，很讨人喜欢，还是位出色的自由党人……我的印象是他是受人污蔑……我以为，这个案子应该彻底取消……”说完，他把卷宗交给了我。

我仔仔细细地研究了案情。认认真真地阅读了全部审理记录，反复看了三遍。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直接证

据或间接证据、证词或情况证据足以证明阿德奥达托·埃切维里犯有指控他的罪行。他是无辜的，这一点十分明显；对他的指控毫无根据，这一点也十分明显。我为那位答应给我一大笔钱的人写了份“彻底取消此案”的判决，而且分文不取。一个月后，魏兰迪亚博士在城北置下一幢房子。价钱不多不少，正好和埃切维里开出的价码儿一个样儿。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好友费明·萨尔加。他说：

“你得去查一查，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别人出了主意，爱动脑筋的人总得想一想，再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你本来可以赚下二十万比索，又不犯什么法。被告有理，你起草的判决书完全合法……可你却让你那位新上司占了便宜。他有的是钱，根本不需要这二十万比索……唉，贝纳贝啊贝纳贝！像你这样的窝囊废迟早得饿死在穷人收容所里！”

我的周围笼罩着一股缺乏道德的气氛。行贿、渎职现象在最高法院、各级法庭和检察院里随处可见。美酒是发动司法机器的燃料。所有官员靠着律师、原告和被告出钱每天大喝特喝。莫名其妙的发财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位每月收入四百比索的大法官，或是一位收入二百五十比索的普通法官，一夜之间能买下价值十五万比索的房子。一个月薪一百六十比索的秘书突然开上一部最新式的小轿车。报刊上报道：“人所共知的罪犯被判无罪”，或是“当场抓获的小偷被无条件释放”，或是“对十九次关进监狱的流氓彻底取消审理”。大法官、普通法官及其副手借口亲自视察，吃得胃里发胀，喝得烂醉如泥，还从阔人手里接受现金或食物馈赠。

一个出名的刑法学家把大部分丰厚的收入用于搞所谓“公共关系”。一个星期当中，他从每天晚上七点起，在家中接待

各个法庭的人员。天亮了，宾客们长鲸饮巨川似地喝下了大量白酒，个个醉得东倒西歪，吞食下堆积如山的食物，直吃得肠胃壅塞。这时候，宾客开始撤离，该着分发礼品了。刑法学家往普通法官的腰包里塞进一千比索，给秘书五百比索，给办公室主任二百五十比索。还对大伙儿说：“这几个钱儿是我给您家的公子买糖吃的。”每当刑法学家充当辩护律师，司法官员们就作出彻底取消审理或宣布无罪的判决；每当刑法学家代表原告的时候，司法官员就作出判刑决定。这就叫知恩报恩。

我有一位同事，名叫库佩蒂诺·卡斯塔尼奥。他是何塞·马蒂亚斯·马丁内斯法官的秘书。法官的办公室紧挨着魏兰迪亚法官的办公室。我和卡斯塔尼奥是邻居，他的办公室里没电话，我的办公室里有。因此他常来我这儿借电话用。一来二去，我们的关系就很密切了。他是个小矮个儿，多嘴多舌，有点神经质。他喝酒喝得鼻子发红，很像卞萝卜皮的颜色，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卞萝卜”。如果说法律可以出卖，那“小卞萝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案子落在他手里，总得捞点油水。他家的房租、孩子的学费、妻子购物的钱以及他本人和妻子儿女买衣服的钱，全都出自被告、原告和律师的腰包。

每天上午十一点，他准到我的办公室来，对我说：

“借电话用用……！我得解决午饭问题，还有……房租问题……收房租的都快把我逼疯啦！”

“博士，”要通电话后，他跟一位律师说，“我是‘小卞萝卜’……啊，法院的……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高兴！我已经着手研究您那件小事啦……不过，很复杂呀……有不少疑问……我想当面和您谈谈……与其喝咖啡，还不如一块吃顿午饭呐……我家离这儿太远，连去带来不赶趟儿……好极啦，太谢谢您

啦……！我准点到！听见您的声音，太高兴啦！”

“问题解决啦，”“小卡萝卜”挂上电话，对我说，“在这儿混事，要是不想法子捞点外快，非得见鬼去不行……！真不知道您是怎么对付的，薪水居然够得上开销……”

下午五点，这出戏又重演一遍。

“又给您添麻烦啦，真过意不去。不过，我得找找阿古埃约博士，要他管我顿饭吃，帮我解决孩子的学费问题……”

“喂，是阿古埃约博士吗？……我是‘小卡萝卜’……唉呀，听见您的声音，真高兴……我已经开始起草判决书啦……正写到判决的根据……不过，有几处地方不大清楚……我想找您澄清澄清……您请我吃顿饭吧，咱们聊聊……事儿嘛，总能办妥的……博士，您别忘了，我孩子的学费还没着落呐……好极了！好，就在那儿见，八点钟，不见不散……祝您幸福……！”

“今儿晚上，我能像希利伽巴拉^①那样足吃一顿了，明几个孩子也能带着学费上学校去啦……”他对我说，“您看出来没有？‘虾米睡大觉，啥也捞不到’……”他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不过，在我周围所有法律贩子当中，最无耻的八成要算一位常和我见面、原籍是大西洋省的法官啦。此人五短身材，胖乎乎的，皮肤黝黑，总是露着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开玩笑来逮着什么说什么，笑起来好像打雷。在司法官员当中没有人不认识他。只要他眼前摆着一瓶白甘蔗酒、一盘鸡肉、一盘加鲸肉和葱的椰子饭，任凭什么法律问题，他都不在乎。他曾经用了个比喻给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下过一个定义：“四(世界)四(是)个大鸡笼，上面鸡拉死(屎)下面鸡毗(吃)死(屎)！”

^① 希利伽巴拉在218年至222年为罗马国王，以贪吃著名。

这句话也概括了他的人生哲学。他脸上有块伤疤。据他的老乡说，有一次这个花花公子冲着一头母驴发情，母驴为了保卫自己的贞操狠狠地咬了他一口。所以大家都叫他“啃母驴”。

有一天，我正在司法大楼对面的弗洛咖啡店里。“啃母驴”突然走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个带手铐的人，由两名卫兵押解着。最后面是一对衣衫褴褛的老人，看样子是犯人的父母。只见他们坐到我隔壁的桌子上。“啃母驴”敲着桌子说：

“拿瓶‘三星牌’白兰地，六滋(只) 杯子！好，伙计们，先算算死(时) 间……两点开庭，开庭前咱们先得毗(吃) 点嘛……”

“博士，咱们到国际饭店吃中饭，您瞧怎么样？”老头儿问。

“算了吧，老爷子！咱们还四(是) 去维维德罗饭店吧！那儿卖的小圆面包可四(是)……两点到五点，检擦(察)官和辩护律私(师) 发言……五点，我宣布休庭，咱们出来毗(吃) 饭，到摩西酒店毗(吃) 点儿、喝点儿……八点钟再开庭，到凌晨一两点，就出来庆祝僧(胜) 诉吧！”

“要是法庭判刑呢？”老头儿问。

“唉，你把我当成二胰子啦！滋(只) 要法庭判刑，我就宣布判得不符合四(事)四(实)， 犯人无罪！”“啃母驴”回答说。

听了无耻之徒这番话，我仿佛吃了一副催吐剂，恶心得再也听不下去了。我费了好大劲总算没把饭吐出来。我觉得，那一天我的厌恶情绪达到了顶点。这就是法院吗？抑或是骡马大市？拍卖行？妓院？在这种市场上，公民的自由和荣誉有时要出大价钱方能买到，有时一瓶酒、几盘小菜也能买下来。在这种拍卖行里，大骗子可以拿判决书拍板成交。在这种妓院里，身穿法衣的娼妓把判决当商品来兜售。

在我看来，如果说治安机关是个阴暗的洞穴，政界是个腥臭的泥潭，那么司法界就是塞满肮脏的老鼠的臭毛坑。我和猪一样命中注定要生活在烂泥里。我又一次向命运之神低首屈服。我掩住鼻孔，继续在司法界当一个无名小卒。

我起草的判决书内容深湛，词句耀眼生辉，这就为魏兰迪亚博士打开了通往最高法院的通途，正如我写的雄辩有力的演说词曾为蒙德拉贡博士敲开共和国参议院的大门一样。当然，魏兰迪亚博士也把我带进了最高法院。他不喜欢我，但是需要我。在最高法院里，我的工作更加细微，更加复杂。然而，刑法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办事勤快，大法官继续在法律界享有盛誉。

又过了两年。有一天晚上，魏兰迪亚博士的臣仆们按照惯例向他进“半月贡”。大吃大喝一顿之后，魏兰迪亚博士去世了。当时，他在一家堂子里，正在一位姑娘身上趴着，突然得了脑溢血。报纸理所当然地隐瞒了事实真象，在一份讣告里就此事提供了下述说法：

“法学界巨擘拉萨罗·马利亚·魏兰迪亚博士，因工作紧张，用脑过度，突患脑溢血，猝死于自家小教堂中。夫人、子女均守候其身旁。魏兰迪亚博士是全国司法界的一盏明灯，孜孜不倦的法律工作者，以其传世之作丰富了法学的刚正不阿的大法官，把宝贵的聪明和道德献给了共和国的慷慨无私的巨子。除了同胞们默默地景仰外，他未做任何索取。可以说，魏兰迪亚博士临终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手里高举着刑法典！杰出的法学家在地下安息吧！博学多识、正

直无私的人永垂不朽！您把一生贡献于为司法服务的事业，您的死也散发着法律观念的香气。您的一生和您的逝世均是值得我们和未来一代人效仿的楷模！”

“魏兰迪亚博士死去的时候，不是有位姑娘有幸被他压在身子底下吗？您知道，咱们的女同事管她叫什么吗？”“小萝卜”用揶揄的口吻问道，“哼，管她叫‘刑法典’！”

我在官场上的继父去世后，我又成了孤儿。接替他职位的大法官任命了一位政治家的亲戚顶替了我的位子。那位政治家对大法官的当选起了决定性作用。于是，我从道德的泥潭走出来，再一次去“轧柏油马路”了。

从1946年到1951年的五年——也就是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凭借法律的权威执法”的五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最重要、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

劳雷亚诺·戈麦斯精心挑选出一位总统候选人，以便使保守党上台执政。此人曾经担任过“咖啡园主联合会”经理，是位工程师、金融家、城市规划专家，长得慈眉善目，说话带有安蒂奥基亚省的慵懒口音。他的家族每过一段时间就提供一名总统，表示对国家处境的怜悯。过去，他本人没有搞过宗派主义活动，既不会引起同党人的热烈拥护，也没有引起反对派的激烈反抗。

奥斯皮纳·佩雷斯博士的竞选是在自己家中进行的。他的总统宝座是在家庭作坊里打制而成的。他既不必像盖坦那样四处活动，声嘶力竭地喊叫，也不必像图尔巴伊那样成为盖坦分子投掷石头的目标。他只是慢声细气地发表了三次演说，为家庭果园辩护一番，提倡在农活里应该使用长柄锹。耶拉斯·卡马

戈总统袖手旁观，眼瞅着同党们一败涂地。为此，至今自由党人还不能谅解他，而保守党人对他却感激不尽。

和奥拉亚·埃雷拉在1930年时一样，奥斯皮纳也打算用“民族团结”这副镇定剂进行统治。可惜，这剂药全然无效。保守党人要独吞全部国家预算，自由党人对能拿到一半预算尚不甘心。于是，双方开始了你争我夺。在省里，保守党人开始向自由党人讨还旧债。报复事件，屡见不鲜。当局和政府的拥护者站在一起。暴力这个久未露面的魔鬼出场了，搞得到处鲜血淋淋。在博亚卡省、桑坦德省、北桑坦德省、卡尔达斯省、考卡山谷省、安蒂奥基亚省和托利马省，双方几百名男人、女人和孩子惨遭杀害。官军的子弹把几千名工人、农民打得浑身是洞。所有天理王法全被抛在一边。就连“同态复仇法”和国民宪法的第121条也几乎被废止。在保守党地区，参加自由党就是犯法；在自由党地区，加入保守党就是罪恶。在农村，“野汉子”^①制造恐怖气氛；在城市，特务横行肆虐。成群成群的居民背井离乡，开始流入波哥大、卡利、马尼萨莱斯、麦德林、阿尔梅尼亚、佩雷腊、布卡腊曼加和伊巴格。

4月9日^②到了。一个看样子像是神经病的无名小辈朝霍尔赫·埃列塞尔·盖坦连开三枪。当时，盖坦接过了加夫列尔·图尔巴伊丢下的旗帜，击败了自由党的寡头集团，遂成为自由党独一无二的领袖。这位自由党的领袖遇难后发生的事变实在是难以描述了。用“海啸”、“飓风”、“雪崩”这些字眼儿只能大体上说明暗杀盖坦后几个小时内波哥大发生的混乱。老百姓怒气冲天，群情鼎沸，再加上喝得醉醺醺，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

① 自由党人对保守党人的蔑称。

② 指1948年4月9日。

到处抢劫、破坏、放火、袭击修道院、亵渎教堂。但是，他们没有夺取政权，而只是抢夺商店，拿到战利品也就算报仇雪恨了。所以出了千桩事万桩事，等于什么事也没出。自由党的头目率领一群手持步枪、砍刀的匪徒冲进“卡雷拉宫”，要求奥斯皮纳辞职。最后他们和奥斯皮纳进行了谈判，答应在内阁里担任一官半职。米拉波、丹敦^①、罗伯斯庇尔变成了路易十六宫廷里的大臣和高级官员。在盖坦的尸体和波哥大的废墟上，两大寡头集团又结成了新的联盟。

但是，蜜月稍纵即逝。自由党迎着官方压力的狂风巨浪，赢得了1949年议会选举的胜利。暴力行动骤然加剧。何塞·安东尼奥·蒙塔尔沃表示政府要用血和火保卫自己。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宣布他的党员和保守党人断绝一切社会和家庭关系。揭竿而起的人群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众议院变成了打靶场。保守党通过阿马德奥·罗德里格斯和卡洛斯·德尔·卡斯蒂略·伊沙萨的手枪说话。自由党通过拉萨罗·雷斯特雷波和古斯塔沃·希门尼斯的左轮手枪发言。古斯塔沃·希门尼斯在枪战中毙命。波哥大的贵族霍尔赫·索托·德尔·科拉尔也受了轻伤。这种伤撂在一个无产者身上也就是八天起不了床。然而过了几年，科拉尔却因此一命归阴。

为了劳雷亚诺·戈麦斯竞选总统，官方机器又开动起来。达里奥·埃昌迪亚出于保守的本能，放弃了总统后选人的资格。他的一个兄弟被治安警察打中一枪，眼睁睁地倒毙在他脚下。戈麦斯当选为总统，奥斯皮纳对这位四年前把他推上总统宝座的人大肆感谢一番。

劳雷亚诺·戈麦斯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不用火药，而是

^① 丹敦（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

用口诛笔伐的形式把对手击得粉身碎骨。就我记忆所及，受到他的恐怖主义手段伤害的有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阿里斯托布洛·阿奇拉、蒙塞缪尔·埃雷拉·雷斯特雷波、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恩里科·奥拉亚·埃雷拉、拉蒙·戈麦斯、·弗朗西斯科·J·恰乌克斯、阿方索·洛佩斯、阿尔贝托·耶拉斯、爱德华多·桑托斯、蒙塞缪尔·佩多莫和何塞·戈麦斯·宾松。他选择了工程师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行业，可他生性就是一个破坏者。他具有托盖马达^①的狂热和萨沃纳罗拉^②的偏激。他生性不宜于组织政府，只宜于组织反对派。

在劳雷亚诺·戈麦斯当政的最初几个月，曾经流传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惟妙惟肖地为他勾勒出一幅画像。

有一次，戈麦斯博士主持内阁会议。内政部长谈到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外交部长报告说，由于秘鲁政府庇护阿亚·德·拉·托雷，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财政部长介绍了财政危机的极其严重的状况。国防部长说，最近几天在和土匪的战斗中，武装部队伤亡八十人。农业部长宣读了统计数字，说明由于口蹄疫流行，全国的母牛将死得一干二净。内阁成员讲完了，戈麦斯总统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声吼道：“真叫人深恶痛绝！骇人听闻！前所未有！我要是反对派，一定要推翻这届政府！”

四十年狂热的议会活动和新闻工作严重地损伤了保守党党魁的健康。1951年底，他只好退出总统的位子。按理说，继任者应该是希尔贝托·阿尔萨特·阿文达尼奥。此人是议会多数

① 托马斯·德·托盖马达（1420—1498），西班牙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宗教法庭法官。出于宗教狂热，曾用火刑烧死8,000人。

② 黑罗尼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多明我会传教士。

派无可争议的领袖，从外貌到气质颇像墨索里尼。然而，他却错误地放弃了总统候选资格，让位给罗伯托·乌达内塔·阿贝拉埃斯。后来，阿文达里奥在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的时候，说出了下面这句灼灼生辉的话：“做历史学家易，做预言家难。”

罗伯托·乌达内塔·阿贝拉埃斯是宦海中的一只老狼。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劳雷亚诺·戈麦斯从《世纪报》这只装甲舰或共和国参议院这只巡洋舰上发射出的鱼雷，都奈何他不得，他总是善于把航船驶向预算的安全港。在奥拉亚和洛佩斯任总统期间，他是部长；在桑托斯任期内，他是大使。当时，对保守党人来说，担任这些职务就是异端。然而，他却得到自由党人的信任，遭到保守党人的忌妒。不过，很快他就让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明白过来了。他用毫不含糊的事实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哥特佬。他耳朵不好，听不见被杀者的喊冤声，却听得见害人者的欢呼声。在他那一届政府时期，宗派主义的浑水上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前面这些记述都是些断断续续的追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我曾经加入过两个传统大党，如今已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从这段追述中，大家可以得出个结论：在1951年，要想得到一份公职，必须加入保守党。而且要是一名热情洋溢的战斗的保守党人，而不能是一名懈懈怠怠的温吞水式的党员。

在加入蒙德拉贡博士队伍的九年中，我曾经是一名自由党的斗士。我担当起一个政治助手所应担当的一切大大小小的工作。在魏兰迪亚法官的司法营中服役的五年里，我也是一名普通的自由党人。

如今，要想活下去，我必须抛弃洛佩斯们（何塞、伊拉里

奥、阿方索第一和阿方索第二)、桑托斯们(爱德华多及其兄弟和堂兄弟)、洛萨诺们(法毕奥及其儿孙们)、耶拉斯们(洛伦索·马利亚、阿尔贝托和卡洛斯)以及图尔巴伊们(加夫列尔、胡利奥·塞萨尔和胡安·何塞)主张的观点;我必须发誓永远忠于卡罗们(老卡罗和小卡罗)、奥斯皮纳们(马利亚诺第一、马利亚诺第二和佩德罗·内尔)、奥尔金们(卡洛斯、霍尔赫及其后代)的学说。我必须在心灵中降下胡良·特鲁希略将军胜利地插在昌科斯山上的红旗,而高举起普罗斯佩罗·宾松将军在帕洛内格罗胜利撑起的蓝旗。

“你要想找到个位子,就得翻个个儿……!”波妮法希娅对我说,“变成个冒坏水儿的哥特佬儿……”

“你很清楚,我当不了坏蛋……”我说。

“是啊,好也罢,窝囊也罢,你就是那么回事……”我那位“冤家”说,“你当不了坏蛋,就当不了哥特佬儿……!当不了哥特佬儿,咱们全得饿死……!眼下自由党没别的吃的,光能吃黑枣……”

尽管前程暗淡,我对退出司法界还是感到快意和轻松。我终于能够抬起头来,呼吸几口干净的空气。五年当中,我抛弃了人的尊严,变成一个贪官污吏的百依百顺的奴隶。他在智力上和经济上恶狠狠地剥削我。不但榨干我的头脑,还挤干了我的腰包儿。从此我再也不必去参加每半个月一次的盛宴,也不必去参加生日庆典,不必为那个没皮没脸的家伙的衣柜和食品储藏室提供服饰和食物,不必听“小卡萝卜”那些恬不知耻的建议或“啃母驴”的没羞没臊的主意。总之,不必亲眼目睹渎职、行贿受贿和让人恶心的肮脏交易。我没有经过大学学习,但以超乎常人的努力掌握了法学中一门主要科目的学问。我构思和

拟定了许许多多判决书，耗得我精疲力竭。

可是，这番经历还是很有趣的。说来说去，要想分析人类灵魂的伟大和卑污，那末没有一间实验室能比得上司法办公室。此外，我还有机会从内部了解什么是司法殿堂。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市场，那里一切道德价值都是可以买来买去的。

我的官场生涯是一条失望接着失望的链子。先是保安部门的气氛让我醒悟过来，后来是政界、党的代表会议、国会的喜剧，看得我倒了胃口。最后，法律界的丑剧又令我痛楚地大失所望。这是一出戏的三幕。行政、立法、司法是由两党的政治家吹嘘出来的赫赫有名的民主共和机构，其实不过是狂欢节上的丑剧而已。如今我已届六十二岁高龄。此时，我可以宣布，年轻时期的偶像在我心田的祭坛上已不复存在；我用天真的幻想筑起的沙土巨人早已被现实的西蒙风吹得烟消云散。

七

我被辞退后的第三天，清晨五点钟，我那位“冤家”连喊带叫，把我吵醒了。

“起来！快起来！早点儿起床，上帝帮忙……你是等着人家把部长、大使的位子送上门来吧？马上给我起来！洗洗澡！穿上衣服！到街上瞅瞅，看能捞着点儿什么……！昨儿晚上，我把你那件半新不旧的西装洗好了，也烫平了。人配衣裳马配鞍嘛……像你昨天那副打扮，人家顶多派你个扫大街的差使……走吧，甬吃早饭啦，省下这几个钱，得花到你找着工作呐……”

我像个站在长官面前的新兵一样，老老实实地按“冤家”的命令行事。这个厉害的女人在家里推行的那套军营纪律，我早

已习以为常了。对我这个具体人来说，“家”这个词只有第一个含义，即：“生火的地方”^①。当然，点火和不住煽火的是波妮法希娅，她把家烧成了地狱。

那是寒冷的六月的一天。天气变化无常。蒙塞拉特山和瓜达卢佩山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绵绵细雨——波哥大人称之为“圣·胡安的毛毛雨”——不停地滴落在城市里。我信马由缰地走过几条街道，在一个拐角处停止脚步，沉思起来。我在脑海里把可能帮忙的人滤了一遍。最后想起了我的叔父达马索·贝纳尔。他是我们家族的哲学家。他的话历来被视为逻辑小丛书。我打定主意到他那儿去。我刚一摆出问题，他就说：

“咱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形势。阿瓦迪亚·门德斯博士说过，是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找不到办法，问题也会自行解决……对人来说，最严重的莫过于一死……而死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人一死，自然而然地不再受罪，不再欠债，不用交税，看不见妻子，不再受儿女们的窝囊气，不再看朋友们的冷面孔……你、你那位恶婆娘，还有你的孩子们都得吃饭。要吃饭，就得有钱。穷人要想有钱，就得挣钱。要想挣钱，就得工作。要想工作，就得找个职业。要想找个职业，眼下就得是个保守党。要想让人家相信你是保守党，就得想法子证明你的确是保守党。要想证明你的确是保守党，就得有人推荐……”

“要想有人推荐……”我担心他还要没完没了地推论下去，连忙打断他的话头儿说，“就得有一位有势力的朋友。是不是啊？我这次来正是为了这个……我知道您在保守党里有几位知交……”

^① 西班牙语 hogar 的第一个含义是“炉灶”。

“我的好侄子，你别误会……”叔叔回答说，“我不是拿你的事不当回事。自由党当权那会儿，我跟自由党里的一些人有点儿交情。我记得，我曾经让你找过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博士。据我所知，这些年来，他一直是你的保护人。眼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保守党。倒不是我这个人爱随风转舵。我没变，是政府变了。只有疯子才会死抱住一个主意不变呐……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说什么也得找位政界要人证明你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哥特佬儿。我的朋友莱奥维希尔多·梅内塞斯博士是保守党在波哥大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现在，他是市政会议的成员。作为市政会议成员，他参加过选举市审计长。凡是投票选举审计长的人推荐来的朋友，审计长都得给安排个位子。你明白吗，我的好侄子？要是我们能争取到梅内塞斯博士把你推荐给审计长，那你就可以在审计长办公室里谋到一份差使……今天我就去找他谈谈……”

据说，在远古的时候，一些蒙古人成群搭伙渡过白令海峡，穿过北美洲和中美洲，进入南美洲。他们在帕伊帕索尝到了奇恰酒，然后在博亚卡省定居下来。莱奥维希尔多·梅内塞斯博士恰恰可以证实这个理论。他长得又矮又胖，两眼朝上斜吊着，鼻子扁平，颧骨突出，头发平直，又粗又硬。脸上总挂着中国官员那种神秘莫测的微笑。常穿肥大的裤子或灯笼裤，足登高腰皮靴，打着一一条天蓝色领带，手里常拿着把雨伞。外衣的左领子上挂着奇金吉腊圣母像，右领子上挂着劳雷亚诺·戈麦斯博士的像章。他是索特罗·帕纽埃拉、普罗斯佩罗·马尔克斯、苏亚雷斯·卡斯蒂略将军和博亚卡的保守党第一代领导集团的其他头目的政治思想熏陶出来的人物。1932年，自由党采取暴力行动。他眼看着人们杀害了他的父亲、大哥，奸污了他

婶婶，抢走七头母牛、四头小牛和三匹马，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从此，他离开了老家——那里本来是“野汉子”控制下的哥特佬儿极端分子所在的地区，定居在波哥大。他看到，跟当律师相比，搞政治更能赚钱。于是，以充沛的热情投身于政治，最后成为人人皆知的身经百战的领袖之一。保守党人几次把他选进昆迪纳马卡省议会，又几次把他选进波哥大市政会议。他在波哥大市的大企业的董事会里任职，赚得了巨额利润，财产大大增加了。十分明显，他是个凶猛的哥特佬。和他相比，菲利普二世和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都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他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同时他又仇恨自由党人。因为他认为所有自由党人都是该受火刑的异端分子。烧死他们恰恰是报效上帝。

和蒙德拉贡博士的办公室一样，梅内塞斯博士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个职业交易所。几年前我曾经在自由党领袖蒙德拉贡博士的办公室里看到过饥饿的面容，充满渴求、焦灼的目光的眼睛，油污的衣服和带窟窿的鞋子，曾经听到过混杂着希望和失望的言谈。如今在保守党领袖梅内塞斯博士的办公室里又看到、听到了。女秘书也一样善于撒谎。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求职者的政治色彩不同了。

我死乞白赖地纠缠了几天，总算进入了竞技场，换句话说，进入了梅内塞斯博士的私人办公室。他笑了笑，跟我打了个招呼。当初，蒂斯盖苏萨向希门尼斯·德·克萨达致敬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大约就是这副模样。要么，在广岛事件发生后，裕仁接见麦克阿瑟的时候想必也是这样笑法。

“前几天，令叔跟我谈起过您……他说，您在赫雷米阿斯·蒙德拉贡和死去的拉萨罗·马利亚·魏兰迪亚手下工作

过……我琢磨着，至少在那时候您是个‘大棒子’^①……这两个红色方济各会份子绝不会让好人、善良的基督徒，一句话，保守党人有什么官做，不过，这也没什么！现在，您已经悔不当初啦，这是最重要的……和神圣的天主教(说着他划了个十字)一样，保守党愿意接纳回头的浪子、迷途的羔羊……再又一说，比起天生的哥特佬儿来，我个人更喜欢反正的人……理由嘛，很简单：凡是反正的人必须立功才能博得人家的信任，必须用事实证明他真心实意改换门庭……眼下，最狂热的哥特佬儿恰恰就是从前的自由党人……首先，您得在这份表上签个字……(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盖着红印)表上写着您保证背弃那些虚伪的思想，拥护保守党的神圣事业(说着，他又划了个十字)直到最后一口气……看一看，签个字吧！”

表上的内容如下：

“填表人系哥伦比亚公民，成人，在本市居住，所持公民证为……号，……年……月……签发。本人经过周密思考，自觉自愿填写此表，并郑重声明：自即日起，本人放弃、背叛给祖国和世界造成如此巨大损失的自由主义的腐朽邪恶思想。自不齿于人类的法国革命时期起，人们即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名犯下了多少罪恶，而本人或许由于严重的精神失常一直盲目地维护此种思想。本人保证自此时起加入作为秩序、宗教、传统和家庭的捍卫者、永恒真理的宝库、民主的支柱、自由的旗手、社会正义的杠杆的保守党，如有必要将以生命保卫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何塞·欧塞

① 保守党人对自由党人的蔑称。

比奥·卡罗和马里亚诺·奥斯皮纳·罗德里格斯留给我们
的不朽的学说。为此，本人于1951年6月22日签
署此表。”

“这个表还得盖章、注册，您得先交五十比索……”梅内塞
斯博士对我说。

读了这张卑劣的表，我直觉得又惊讶、又愤懑、又恶心、又
惭愧，真是五味俱全。我行将成为一个改换门庭的人、一个鄙俗
的逃兵、一个可卑的投机者。我想起了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
子权的以扫；我想起了为了三十块银币出卖耶稣的犹大；我想起
了皮埃尔·赖伐尔^①；想起了历史上所有的大叛徒。一时间，我
犹豫了。这太过分了。可是我们这些怯弱者最后总是让步。我
们对生活心怀恐惧，深知自己软弱，无力起来抗争，所以总是不得
不妥协。我又一次屈膝投降了。过去我是“犟牛”中士手中的
傀儡、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手中的玩偶，拉萨罗·马利亚·魏兰
迪亚手中的木头人，现在又要成为一个穴居人手中的布娃娃了。

“我来听听您的起誓，例行公事嘛……”说罢，他从墙上摘
下耶稣像，握在手里，问我：

“为上帝、为祖国从现在起您将成为保守党事业的一名守纪
律的、勇敢的战士，事事处处都热爱劳雷亚诺·戈麦斯，像爱自己
一样爱护保守党人，不惜一切牺牲，不遗余力地保卫我们的学
说，保卫现政府。您愿意宣誓吗？”

“是的，我宣誓！”我回答说。

“您做到这些，上帝、祖国、劳雷亚诺·戈麦斯博士和保守
党一定会嘉奖您……不然的话，他们将一起或分别处罚您！现

^① 皮埃尔·赖伐尔(1883—1945)，法国民族叛徒、出卖法国给纳粹德国的主要策划者。1945年10月以叛国罪被处决。

在，”他继续说，“您已经具备了本党党章规定的公民加入党的光荣队伍的条件，您有权要求分配给您一个公职……据我所知，您想在市审计局工作……审计长当选是我帮的忙，在市政会议上是我提的名……他曾经答应为我的二十位朋友安排工作，到目前为止只安排了十四名……因此，还欠我六名……我给他写封信，交您送去……”

梅内塞斯博士叫人印了几百封推荐信，信中在谋职者姓名的地方留出空白。他从写字台里抽出一封介绍信，在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签上字，把信交给我。信上写道：

“尊敬的同志和朋友：持信人贝纳贝·贝纳尔先生的先祖、曾祖、祖父、父亲均为本党伟大的奴仆。在自由党时期，此人曾因坚持其信念而遭到种种迫害。他是一位有功的公民，家中人口众多，为人老实能干。鉴于上述情况，并考虑到他对保守党事业及现行政府忠心耿耿，堪在足下英明领导下的单位担任一份公职。我愿以个人名义担保此人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对您惠于照顾，预致谢忱。

您的同党和挚友

莱奥维希尔多·梅内塞斯”

“这封荐举信不亚于一份任命书……”我的新恩人说，“审计长心里明白，只要他不给我推荐的人派个差使，我就不让他连选连任，反正任期快要满了……噢，我还忘了提醒您一声，您从他们那儿拿到的薪水，每月得交给我三分之一……这笔钱不是给我的……我不缺钱花！是给保守党基金用的……您也知道，

竞选的开销很大……那边儿一派下差使，您立刻就来签署付款通知单……最后，我还有个忠告。您要是想保住位子，就得千方百计表明您是个地地道道的哥特佬儿！您得成为宗派分子！该打架就打！该杀人就杀！要记住，福音书（说着他又划了个十字）上说，柔弱之人，上帝弃之……您要相信，在咱们国家里，只要‘大棒子’们活着，就不得安宁……等到只剩下哥特佬儿的时候，咱们这儿才能成为天堂……！”

我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才算追到审计长。他和所有高级官员一样，难得到办公室去一趟。偶尔去办公室，也是关上门，边喝威士忌边和市政会议的委员们、保守党市党部的成员们谈论政治。三个礼拜以后，我被委任为审计局总秘书处下属的第四丧葬处档案资料第三科第一办公室的第二助手。职称之长和薪水之少恰成反比。我每月月薪是二百四十比索，实得一百六十比索，因为还得交给梅内塞斯博士八十比索。

审计局表面上是个财务技术单位，可实际上是个政治堡垒。为了能在市政会议上当选，审计长就要按票分配职务。市政会议委员每投一票，即有权要求为其二十位亲朋好友安排工作。

根据《内务条例》第 287 条的规定，我的职责是：

- “1. 当首席官员临时外出时，代行其职权；
2. 完成首席官员交付的工作；
3. 完成本条例规定的其他任务。”

但是，首席官员从不外出；也没有分派给我什么工作；《条例》上也没有规定其他任务。因此，我根本无事可干。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当职员那会儿，实际上我是为蒙德拉贡博士效劳。如今还是这样，作为市审计局职员，我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市政会议成员梅内塞斯的命令。

我上任后第二天，就接到一道命令，要我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在晚上七点召开，地点是里卡乌特区的一幢房子。参加会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人上下。其中有审计局和其他市政府机关的职员、内政部和公共工程部的职员、侦探和身着便服的警察。主持会议的梅内塞斯博士发言。他说：

“今天在座的都是哥特佬，这很好嘛，咱们可以敞开来谈谈。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大家宣布本人拟定了一个使波哥大市保守化的计划。我给计划起了个名字，叫‘烙铁行动’。在共和国首都，南美的雅典，诞生过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何塞·马努埃尔·马罗金、何塞·维森特·孔恰^①和劳雷亚诺·戈麦斯。可是自由党人仍占多数，这太不像话啦……！过去，普利尼奥·门多萨·内拉曾经使博亚卡省自由化过，可我们又把博亚卡保守化了。今天，我们也要把玻利瓦尔广场变成哥伦比亚的伟大的蓝色广场……！”

“保守党万岁！劳雷亚诺·戈麦斯博士万岁！克里斯托·雷伊万岁！打倒‘大棒子’！打倒耶拉斯·雷斯特雷波！莱奥维希尔多·梅内塞斯博士万岁！”听众齐声高呼。

“想要剥夺自由党人的多数地位，靠好言相劝是办不到的，那只好动硬的！当然也不一定非把他们斩尽杀绝……吓唬吓唬他们就行啦……恐惧能产生奇迹……我把各位分成几个组，每组六个人……每组至少要有两个人携带手枪，剩下的四个人带刀子或棍棒……我这儿带来了三十把剪刀、三十包棉花……你们看见谁带红领带，就用剪刀剪掉；看见哪些妇女嘴唇上擦口红，就用棉花抹掉……这个办法很有效，在别的地方用过，效果好极了……各个小组分散到市内各区……你们经过咖啡馆、商店，

^① 何塞·维森特·孔恰，保守党人，1914年至1918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就闯进去，把当地的居民吓唬住……要是有人反抗，就给他来一‘烙铁’……拳打脚踢，用枪柄打脑壳，朝天上放空枪……除非情况十分紧急，别开枪打人……

“在实现波哥大保守化的崇高目标中，我们可以指望我主上帝(他划了个十字)的保佑，还有武装部队的有力支持。假如阿道夫·希特勒能把德国的犹太人一扫而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大棒子’、‘套包子’、‘蠢驴子’从波哥大一扫而光呢？尊贵的同党们，我向你们致意，你们是保守党光荣的突击队……！此时此刻，我提出的口号也就是何塞·马利亚·科尔多巴将军在阿亚库乔提出的口号：‘解散，别轻易开枪！迎上去！胜利前进！’”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与会者再次高呼：“保守党万岁！梅内塞斯博士万岁！劳雷亚诺·戈麦斯博士万岁！打倒‘大棒子’！烙铁行动万岁！”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会场。对暴力我患有过敏症。我的禀性、我对生活的道德观念、我的文明人的良心都和梅内塞斯提出的野蛮做法格格不入。这种事，我干不了……！上大街找碴儿打架，对同胞拳打脚踢，舞刀弄枪，强要他们以某种方式思考，我干不了。我没有任何理由照他们的命令去欺负别人。另外，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执行这种愚蠢的命令。过去、现在、将来我都是个胆小鬼。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担当不了刽子手的角色。可是，没法子呀。为了不致于丢掉刚刚得到的饭碗，我只好服从。丢掉工作我就会缺衣少食，一文不名，特别是我那位“冤家”会大发雷霆，绝不会容我那么软弱。和从前一样，我又低头了；今后我也只有低头。我命中注定要给最厉害的人、最大胆的人、最歹毒的人充当工具。

我参加的那个小组共有两名侦察、一名便衣警察、一名清洁工、一名公共工程部的职员，还有一名审计局的职员，也就是我了。从同伴们的面孔、表情、言谈举止来看，他们个个都是勇敢果断的人，惯于寻衅打架。这次我害怕的心理和上次“犟牛”中士派我去抓“放血匠”的时候一模一样。

梅内塞斯博士为我们指定的活动地点北起十一道街，南到一道街，东起二号路，西至七号路。我们开始由南往北走。走着走着，来到一家咖啡馆。有四个当地居民正坐在咖啡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喝啤酒。还有三个人坐在中间的一张桌子上喝咖啡。

“伟大的自由党万岁！”一名侦探喊道，他是我们小组的头目。

“万岁！”几个老实巴交的当地居民喊道。

“这么说，你们是‘大棒子’，对不对？婊子养的！”侦探攥着手枪，又喊起来，“好吧，现在你们喊一声‘保守党万岁’，不然的话，我把你们都收拾了……！”

这时候，我们小组的另外四名组员已经气势汹汹地闯进咖啡馆。只有我站在门口，哆里哆嗦的，拿不定主意。当地居民吓得面如土色，举起双手，从椅子上站起来。

“‘保守党万岁’，快喊！不喊，饶不了你们……！”侦探继续拿枪逼着他们，命令他们说。另外那个侦探和警察也把枪口对准他们。清洁工手里拿把刀子，公共工程部的职员手持一根大棒子。

“保守党万岁！”那几个喝啤酒的人高声喊道。

“要想活着，你们就得赶快反正！臭流氓！”组长又喊道。“你呢，”他转过身来对我说，“站在那儿像个窝囊废似的，干什

么呢？给你的那把剪子是干什么用的，把这小子的领带剪了！”他指指一个戴灰红条领带的人。

我浑身上下一个劲发抖，朝我攻击的对象走过去。我从口袋里掏出梅内塞斯给我的剪刀，一面执行组长的命令，一面压低声音用纯而又纯的波哥大话说：

“这样对待您，我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唉，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啊……请您谅解……”

与此同时，警察手里拿着一团棉花，朝咖啡馆的一名女招待扑了过去。一边给她擦嘴唇一边说：

“讨厌的‘大棒子’！从今往后只许你涂蓝色……！”

“把这截儿领带收好……！”组长命令我说，“明儿个八点钟，把战利品交给梅内塞斯博士……好证明我们不是白吃饭的……”

第二个军事目标是一家商店。里面有几麻袋土豆，上面坐着三个人，每人拿着一瓶德国造啤酒，正在开怀畅饮。组长又是故意地喊了声“自由党万岁！”，那三个人都没言话。

“噢，你们都不喊？”组长一边问一边掏出手枪，“说你呐，他冲着其中一个人说，“你常戴红领带，是不是‘大棒子’，臭狗蛋！”说着，他用手枪柄狠狠地敲了一下对方的脑袋。

“您知道我为什么不喊‘万岁’吗？”那个倒霉鬼浑身是血，躺在地上说，“我是保守党……我就是本区区党部委员长……这是身份证……”说着，他掏出一本蓝色的身份证，上面有劳雷亚诺·戈麦斯的肖像。

“你看！你没喊万岁，可又戴着红领带，闹误会啦……谁让你……伙计们，这儿闹得一塌糊涂，咱们再找一家店铺吧！”组长对全体组员说。

奥斯皮纳·佩雷斯宣布要争取再次竞选总统。希尔贝托·阿尔萨特·阿文达尼奥在《哥伦比亚日报》上大肆攻击乌达内塔政府。这下子保守党分裂了。奥斯皮纳分子和阿尔萨特分子被宣布为现政权的敌对分子。他们和自由党一起遭到“烙铁行动”的严厉镇压。政府下令控制住奥斯皮纳的电话，截查他的信件，不许他离开波哥大。《圣经》上有个褒奖谦恭者和惩罚高傲者的箴言，如今被篡改为“谦恭者高官得做，‘造反者’^①将被熨平”。有一次，梅内塞斯博士手下的突击队奉命去捣毁阿尔萨特分子在卡皮托尔剧场的集会。我还记得，当时阿尔萨特高声喊道：“从国家预算的猪圈里派来的这群臭猪在外面拼命嚎叫，可我们还是要继续讨论！”尽管他骂的“臭猪”里有我一份儿，我还是挺欣赏这句话。

全国暴力行动日益激烈。埃利塞奥·维拉斯盖斯、瓜达卢佩·萨尔塞多、巴蒂斯塔兄弟、冯塞卡兄弟、“黑血”、“泰山”和“报仇者”领导下的游击队使政府军陷入困境。爱德华多·桑托斯提出“信仰和自重”的口号。阿方索·洛佩斯和《时代报》的老板一直有龃龉，他用揶揄的口吻说：“为了把这个口号付诸实现，我的两位亲戚一直还是女光棍……”

1952年9月6日到了。在这前几天，有几名警察在托利马遭人暗杀，尸体被大解八块。政府下令把尸体运回波哥大，在一所警察分局的房间里公开展览。把警察的残肢断体公开展览，无非是想激起其他警察、政府职员和支持者的公愤，鼓动他们报仇雪恨。梅内塞斯博士对他的走卒下了一道命令，要我们在尸体前列队游行，参加葬礼。有几个人在墓地发表演说，公开

^① “阿尔萨特”西语为 Alzate，亦为动词 alzarse（“造反”、“起义”）的第二人称命令式，此处是双关语。

鼓吹犯罪。警察局的一位军官说：“只要在暴力背后充当军师的阿方索·洛佩斯和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还活着，只要煽动暴力行动的《时代报》和《旁观者报》还存在，哥伦比亚就不得安宁。”安葬典礼结束后，送葬队伍举行了气势汹汹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打倒《时代报》！”“打倒《旁观者报》！”“处死洛佩斯！”“处死耶拉斯·雷斯特雷波！”队伍朝市中心走去。他们提出火烧两家报馆、火烧两个自由党领袖宅第的口号。几个游行带着装满汽油的家什儿。我和同组的组员走在一起，用围巾裹住脸，免得那些从边道上、从窗户里观看游行的人认出我来。我真觉得羞愧难当。走到《时代报》报馆门口儿，我停住脚步。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趁组长不防备，连忙溜之大吉。在《时代报》闹完了，纵火犯们又去了《旁观者报》。然后，去洛佩斯家，最后又去了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家。耶拉斯奋勇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不断发表一些看法，这里我想再讲一点内心深处的意见。在我如牛负重般地度过的六十年当中，我认识了不少政治家，可我觉得只有这个小个子才像个完全的、真正的、完整的人。他的灵魂要比他的身材高大十倍。

我时常想，他这个人虎虎有生气、活动能力强、勇敢善战。这些品德哪怕我有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也会和现在大不相同。我跟他没有私交，也从来没得宠于他。我有两次是他的同党，有两次是他的政敌。我没有给予他什么，也没期待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像我这样胆小怕事的人亲眼目睹他那种强烈的行动意志，的确很难掩饰住对他的钦佩。耶拉斯·雷斯特雷波身上的一切，都是我这种胆小鬼过去和现在难以企及的。上面这番话就算是一个弱者对强者的颂赞吧。

这次我临阵脱逃，上面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我。过了两天，

梅内塞斯博士命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你是个窝囊废！从见到你那天起我就瞧出来了……我推荐你，算是办了件错事……据你们组长报告，你把同志们抛下不管，自己偷偷地溜了……你的任务是参加放火烧毁那两家肮脏的小报馆，烧毁那两处蛇洞……你害怕啦？每隔半个月签个字，拿支票，你倒不害怕……像你这样的胆小鬼不配当政府的职员……我们需要的是遇事果断的人……再说，你也违背了忠于学说、忠于政府的誓言……你不配再当一名党员和政府职员……我跟审计长通过话啦，叫他辞退你……你可以走啦！”

我早料到了，我的命运只能是如此。所以离开梅内塞斯办公室的时候，心里挺高兴的。上次脱离保安部门，脱离议会，脱离司法机关的时候，我也是这么高兴。我当了一年“宗教法庭的法官”。我宁肯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忍饥挨饿，缺衣少食，宁肯让我那位大债主和“冤家”暴跳如雷，也不愿再干下去了。

当然，我也不免要咬紧牙关。上面通知我说，再过一年才能发给我失业救济金。我只好减价一半把这份权利卖给一个高利贷者。有了这笔钱，再加上达马索叔叔和我的好友费明·萨尔加借给我的钱，还有我给一家杂志写的几篇关于时事的文章得到一点稿费，才使我和妻子儿女不至于饿死。

又过了九个月，我完全陷入了绝境。可是，正像马上要倒下去的拳击师一样，6月13日事件让我绝处逢生了。那一天，劳雷亚诺·戈麦斯突然把内定当总统的乌达内塔·阿贝拉埃斯撤下来，自己上台执政；撤掉了卢希奥·巴蓬·努涅斯的国防部长职务，任命霍尔赫·列瓦取而代之；要人们对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工作做出评价，而他自己到亲戚家里吃木薯面包去了。发生什么事儿啦？在哥伦比亚，这可是天大

的事儿啊。安蒂奥基亚寡头集团的头面人物菲利佩·埃查瓦里亚遭到 G2 警察的严刑拷打。警察肆无忌惮地把他的尊臀放在一块冰上，硬要他招认指控他的罪行。假如受冰刑的是一个名叫贝纳贝·贝纳尔的人，那倒没什么啦。可领导阶级的成员是休戚与共的。几千名农民遭到杀害，他们可以无动于衷；他们当中某个人哪怕让人用小手指头捅一下，他们也会大发雷霆。戈麦斯认为埃查瓦里亚受刑，罪在罗哈斯·皮尼利亚。他要求调查这件事，并给以处罚。乌达内塔拒不执行正式总统提出的要求。总统和往常一样火冒三丈，采取了上述行动。

罗哈斯在军队里军衔最高。在博亚卡，他是穿军装的保守党领袖。其人以搞宗派闻名于世，深得同党的好感，也遭到自由党人的仇视。自由党人在参议院反对提升他。奥斯皮纳当政的时候，他是交通部长。作为第三旅旅长，他在 4 月 9 日挽救了卡利。他的下属和朋友用一架直升飞机把他从梅尔加接来。一开始，他支持乌达内塔继续持政。后来，经过几番犹疑才在奥斯皮纳和阿尔萨特的压力面前让了步，决定自己上台执政。他执政后第一个行动就是任命一个普鲁士式的蓝色内阁，第二个行动是流放劳雷亚诺·戈麦斯。

一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欢乐情绪爆发了，震动了全国，正像 1945 年 8 月震动广岛、长崎的爆炸一样。假使波菲利奥·巴巴一雅科沃还活着，一定会再写一首《疯狂的欢乐曲》。自由党人、奥斯皮纳分子、阿尔萨特分子和原来的劳雷亚诺分子高兴得如醉如痴，在大街上互相拥抱、亲吻。洛佩斯、桑托斯和阿尔贝托·耶拉斯异口同声地宣布罗哈斯是第二个解放者，6 月 13 日使 7 月 20 日、8 月 7 日黯然失色。法学家达里奥·埃昌迪亚决定取消《刑法》中的叛乱罪。他宣布这不是政变，而

是意见分歧。胡安·洛萨诺·伊·洛萨诺以骄傲的心情回忆起他和罗哈斯一起在军校上学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举行过只有男人参加的舞会，他十分荣幸地和“将军”跳过舞。“加利万”请求罗哈斯为了哥伦比亚别再乘直升飞机旅行。洛佩斯·德·梅萨教授称罗哈斯是“我们亲爱的总统，”说他比自由党的其他领导人更加现实、更加冷静。关于他的同党为什么如此情绪高涨，他解释说：“我们这些人欣喜若狂，不光是因为有些事终于到来了，更是因为有些事终于过去了……。”

除了七八个例外（这些人全是“敢死队”队员），保守党人都抛弃了他们过去的头子，双膝跪倒在新主人的脚下。劳雷亚诺·戈麦斯登上飞机准备出国流亡的时候，陪同他走到舷梯旁的只有一位朋友，那就是堂·维森特·卡萨斯·卡斯达涅达。在这出前所未有的最荒诞的法律喜剧中，立法机构宣布共和国总统位子空缺。理由是每当大法官离开司法大厦的时候，他的位子就是空的。举国上下齐声拥护执行这一项有名无实的处罚。

罗哈斯·皮尼亚一上台，军人阶级纷纷执掌政权了。挂各种军衔的各军种的军官被安插在不同的行政岗位上。军刀、马靴、马刺的铿锵声震响在中央、省、市的办公室里。

政变后过了几天，费明·萨尔加——我一生中最信得过的诤友——来探望我。他说：

“我爸爸说过，哪边儿太阳热，穷人就往哪边儿靠。现在，将军肩头上光闪闪的太阳最热啦……1930年以前，你是保守党；1946年以前你是自由党；后来，奥斯皮纳、劳雷亚诺和乌达内塔当政的时候，你又当上了保守党……眼下，你要想谋个事由，除非成为军权派……我有个好朋友，就是塞贝莱翁·维利亚特上校。他刚刚被任命为军需局局长。这个可怜的宝贝

比石头还笨，急需一位能干的秘书……昨天我去祝贺他，他要我给他介绍个人……我冒昧地提出了你的大名，他说想认识认识你……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吧，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关于这位即将成为我的新上司的人的履历，费明向我提供了一些材料。他在十一所学校里念过书，一直是最差的学生。七所学校把他开除了。五行八作，七十二行，他一概不行。他的父母无计可施，又不愿意把他送进教养院，于是想方设法让他进了军校。这以前，耶稣教士、基督教友、慈幼会教士以及维利亚特进过的学校的校长、老师在他身上白白花费了不少力气。军事教官们也极力想让这个未来的军官学有所得，结果还是白费力气。当他接过少尉的军刀的时候，他的知识也就略高于一个一级下士。不过，他学会的骂人话、下流话和恶言秽语却赶得上几百个车把式和卖菜妇捆在一起的水平。他时常把军帽往脑后头一掀，两腿叉开，双手叉腰，像打雷似地高声大叫：“今儿个不让你们这些小子尿一裤不算完！”“卧倒，王八蛋！”“向左……看！立正！枪举……起！二膀子！”一听见他大喊大叫，周围的人、牲口、连死物都不由得浑身打颤。

在战术学和战略学上，他当然不是隆美尔^①，可他却是一名难得的好射手。这有几重含义：无论在打靶场上，还是在妍头的卧室里，他都能百发百中。

除了军事本领之外，他的胃口大得出奇，酒量让人难以置信，跳舞、打台球样样精通。人人都承认，他骑术精良，善服劣马。据说他不用笼头、马镫，骑在黄骠马上稳如泰山。他酷爱墨西哥音乐。特别是爱财如命，为了这个，他的战友们把他

^① 隆美尔(1891—1944)，德国元帅，著有《步兵进攻》一书。

的姓小小地改动了一下，管他叫“钞票上校^①”。

他的官运亨通，靠的不是战场上的勇猛行为，或对政务的杰出贡献，而是靠夫人的迷人姿色。他每次提出晋升、出国的要求，均由夫人转递到上司那里。他那位讨人喜欢的年轻美丽的妻子是他钓取荣誉、勋章和提高薪金的鱼钩。

对“钞票上校”来说，世上最重要的莫过于“正规渠道”。想要见他一个小时，必须接连不断地找下士、中士、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以至将军谈话。他以为这是人类智慧达于顶峰的表现；比起发明火药和印刷术、发现美洲、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的艺术珍品和二十世纪的科学奇迹来，意义还要更加深远。对这套天才的程序的正确性，他笃信不疑。他把妻子变成“正规渠道”，以便得到各种好处，喝到肥水。

他用公款访问过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在法国，他参加了一期为“戴绿帽的丈夫”开办的速成班。在墨西哥他获得了“咀嚼大师”的称号。有个对他心怀不满的人说，由于他的成功，奖给了他几对金角^②和一把银锯。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军中生活，每六个月能拿到一枚勋章，所以他共有四十枚勋章、奖牌和徽章。每逢盛大的军事检阅或节日盛典，他的前胸真不亚于首饰陈列柜。

出于爱国激情，他买下了几门普法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大炮和几千支第一次欧战时期使用过的步枪。为此，卖主付给他一笔丰厚的回扣。用这笔钱，他在北方买下了一座宅第，在萨萨伊玛买下一座供游乐用的庄园，还买了一辆最新式的小轿车。

他先后只参加过两次军事行动。一次在卡利。他率领五百

① “维利亚特”西班牙语为 Villate；“钞票”是 billete。

② 西班牙语中“头上长角”，相当于汉语中的“戴绿帽子”。

名士兵用弯刀和枪托勇敢地驱散了一支手持书籍、笔记本和铅笔的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另一次发生在他驻防布卡腊曼加的时候。一个工厂的老板拖欠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五十名工人占领了工厂。他领着三百名士兵把工人强行赶出工厂。危险的共产党煽动分子吓得逃之夭夭。上校的英雄行为和他对共和民主制度的两次无可估量的贡献，大大加强了他作为荣誉军人的威望。为了履行他忠于法制的誓言，在自由党执政的时候他追捕保守党人；在保守党当家的時候，他迫害自由党人。他模仿本哈民·埃雷拉将军的口吻说，预算高于政党。

从外表上说，他身材高大，强健有力，表情、举止十分粗犷。面色黧黑，眼睛、头发、胡须都是黑漆漆的。说起话来，声音沙哑，笑声尖利刺耳。他狂热地信奉大男子主义。星期天和节假日，总是穿上漂亮的军装，站在穿衣镜前陶醉于自我欣赏。他孔武有力，言语粗俗，举止粗鲁，贪吃好色，饮酒无度，因此得了个“强人”的美名。他对这一美名爱护备至。他成天到晚一门心思想发财，整天担着个心，生怕发财前不得不退役。

几天来，我一直顺着勇武的上校规定的“正式渠道”往前挪，以便走到他跟前。我和十四个人谈过话，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说明我求见上校的目的。我一再坚持，总算达到了目的。一天下午，我被带到这位高不可攀的军官面前。当时，能否和他谈上话，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办公室的四壁上装饰着耶稣像、玻利瓦尔的画像、罗哈斯·皮尼利亚的画像和一条横幅，上写着：“和平、正义和自由”。

“这么说，你是贝纳贝·贝纳尔？”他坐在椅子上，一边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我一边问。

“是的，上校……愿为您效劳……”我回答说。

“我的好友费明·萨尔加向我推荐过你，说你是个非常老实的人。在我这儿，老实的职员只会碍手碍脚，不过我还是派你当秘书……”“钞票”上校说，“老实算个屁！除了坑人害人，能当个屁用！谁老实，谁就抬不起头来……老实的混蛋满街都是，全都要饭吃……好吧，我给你个机会，看你能不能不当窝囊废、穷光蛋……就看你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啦……哥特佬和自由党你偷我抢干了一百五十年；现在该轮到军人和愿意和我们携手合作的好公民大干一场啦……我压根儿没求过上帝给我钱，我只求上帝把我放在出钱的地方……咱们这个局手里掌握着几百万比索……咱们要买的东西很多，要买‘奔驰’汽车，供高级官员带着情妇四处兜风，还要买成卷的卫生纸……卖东西的能赚大钱，咱们为啥不能收点回扣啊？世界各地全都这么干。在墨西哥，哪个总统在任的时候不发笔横财，就会让人看做是笨蛋！不过，咱们这儿是堂·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的国家，管事的都是些鸡巴讼棍，干什么事全算犯罪……前些年，阿里斯托布洛·阿奇拉博士造假帐买了几副马鞍子，统共才值三百比索，就把人家给撸了……！什么宪法、法律、道德，我操他奶奶！放着大虾不吃，我干吗吃屎啊！不错，我爱钱，我不怕承认这个……大伙儿管我叫‘钞票上校’，也不是白叫的……我要是没能耐从这儿搂上它个几十万比索，那干脆让他们把我骗了！要干现在就干，要么就甬干！行啦，我的想法你全知道啦。跟着我，你能发财……发不了，算你他妈的是个窝囊废！干这种事，得要动脑筋！千万别收支票，也别打收条！好啦，你到人事处长办公室去，让他告诉告诉你该干些什么……！”

“我听您的吩咐，上校……！”说完，我走了出来。

新上司这番话，把我听傻了。我从来没受过如此露骨的败

坏道德的教育，也从来没听过谁一口气说出这么多不堪入耳的话。和“钞票上校”相比，“犟牛”中士、蒙德拉贡博士、拉萨罗·马利亚·魏兰迪亚博士和莱奥维希尔多·梅内塞斯博士都是地地道道的加图^①、风度翩翩的君子啦。我对道德沦丧和语言粗恶历来就很讨厌。可我刚才听到的那些话真是恬不知耻、俗不可耐，超过了我以往听到的一切坏话。新东家的灵魂是肮脏的洞穴，整天想的是如何贪污受贿；他那张嘴是臭气熏天的毛坑。我想(这是第一千次了)，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按照道德规范和法律条文行事，相信劳动能使人获得尊严，变得高尚，可我们恰恰都是大傻瓜，注定一辈子要受这帮恶棍的压榨。前几次找到事由的时候，究竟是干还是不干，我犹疑过；从善还是从恶，我彷徨过；顾及需要还是顾及脸面，我动摇过。如今，我又一次受到这种情绪的折磨。只要不是应得的，哪怕是一分钱我也难以接受。可是，我却要成为一部受贿机器的重要部件。我胆小怕事，害怕挨饿，害怕我那位“冤家”暴跳如雷，只好像往常一样又被推上悬崖。

“听说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波妮法希娅知道我又找到差事后，对我说，“人家说，在这个局工作过的全成了阔老儿……当然啦，像你这样的窝囊废，我也不抱什么幻想……我早看出来啦，你早晚得让人赶出来，一个子儿也拿不着……从前你干了那么多事儿，不就是这样吗……想捞钱，得会动脑筋，有胆子，活泛点儿。你呀，就会写点子窝里窝囊的玩意儿……到死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自个儿家的房子、什么是汽车、冰箱、洗衣机，到海边旅行是什么滋味儿……你死了，我就得

^① 指小加图（前95—前46），古罗马政治家，斯多葛派哲学信徒。

拿着破瓢上街要饭去……”

我们那儿和一切组织良好的行政单位一样，当头儿的啥也不干。他的时间还不够参加酒会、早餐会、午宴、晚宴，到处游逛以及参加卖主代表组织的其他招待活动的。才刚八月份，他的约会已经订到十一月了。上校一天到晚喝呀喝的，直喝得昏头昏脑，要么是半醉半醒，要么是烂醉如泥。一说话，满口酒臭，弄得一屋子全是酒味儿。采购处处长嘲笑他说，等上校死后，只能用氖管灯照明。不然的话，尸体会燃烧起来。他的写字台的抽屉里尽是“阿尔卡牌”矿泉水和“美荷拉尔”片。

他把他份内的工作全都分派给处长们和科长们。他本人只负责搞“公共关系”。所谓“公共关系”就是用卖主的钱成天到晚吃吃喝喝，接受卖主馈赠的礼物和现金，以免留下受贿的痕迹。在这次宴会和下次宴会之间的短暂时刻，他来到办公室，签发信件和我开出来的购物和付款的命令。上校最好的主顾，或者说对他最慷慨大方的卖主使用的口令是：“和平、正义、自由”。这六字真经一念，上校办公室的大门就自动打开了。上校叮嘱我，谁念这六个字，就立刻把他带进办公室。

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身穿运动服，仪表堂堂，像个年轻的会办事的人。他说：

“和平、正义、自由！我能和上校谈谈吗？”

“很遗憾，上校这会儿不在……”我回答说，“他在财政部……”我明知道他在特根达马饭店的“火星”酒吧间里，可还是加上这么一句。

“真遗憾！”对方说，“反正您是秘书，我跟您说说吧……我和上校是老交情啦……大前天，我们还一块吃午饭呐……那顿饭嘛，直吃到天亮五点钟……上校的耐力真让人羡慕，他的肝

脏来什么容什么……他这个人，了不起！我们做成过好几笔生意。今儿个我跟他谈一笔油水大的买卖……据我所知，政府要购进五十辆小卡车……我那儿有货！当然不是新的，可保养得挺好，跟新的一样……最旧的不过才用过十年……您可以瞧瞧……！就像刚出厂的一样……你们可以当新出的车买下来，能赚好大一笔佣金……我能答应的钱数是三十万比索……上校二十万，您拿十万……您看怎么样？”

“我看你纯粹是瞎胡闹，”我气哼哼地回答说。“你的胆子不小啊，刚认识我，就用这种主意寒碜我……我不是罪犯！是罪犯，我就不在这儿干啦。我可以手持钢刀，站在十字路口，看见过往行人，把他的东西全抢过来……我是个老实人。上任的时候，我发过誓，要忠实地执行共和国法律……法律禁止公职人员接受私人赠款……你出这种主意，本身就是犯罪……我没去告发你，你还不快谢谢我！”

行贿者听了我的话，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珠几乎努出眶外。他吃惊地望着我，仿佛猎人遇上了恐龙。他一言不发，怔了几分钟，最后对我说：

“您别发火啊，先生……我没想开罪您。这十五年我一直往这儿卖东西，今儿个可是第一次碰上有人不收佣金……没想到您是例外……我看，您这是干傻事，随您的便吧……不管怎么说，请您原谅！这件事我直接找上校去谈……再见！”

第二天，“钞票上校”一反常态，一大清早就来到办公室。和平时一样，他把军帽往后一掀，双手叉腰，两腿劈开，往我眼前一站。就像对着一排士兵似地大呼大叫地喊道：

“你这个王八蛋！二腩子！我的朋友科雷亚打电话给我，把你昨儿晚上说的那些混帐话全告诉我啦……你听着，我在这

儿想干他娘的什么就干什么！你不爱钱，我爱！你是窝囊废，我不是！你来搅我的买卖，少跟我来这套！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好看！你不光不要你那十万比索，连我那笔佣金也想推掉？更可恨的是你还吓唬像科雷亚那样的好卖主，说要他蹲大狱……你知道你配什么吗？就欠在你臭屁股上踢两脚，像只狗似地把你撵出去！唉，可惜啊……可话又说回来了，我还得用你，真倒霉……办公室里这么多事我也干不过来……”说完，他气乎乎地走进办公室。

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骂得我目瞪口呆。自从“恶棍”马查多以后，还没有人这么侮辱过我，嘲弄过我。过去我是蒙德拉贡、魏兰迪亚和梅内塞斯的傀儡，如今却成了可怜的奴隶、最低贱的贱民。什么男子气，什么尊严，在我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我被贬黜到最低层。

过了一会儿，“钞票上校”又走进我的办公室。看样子，火气消了一些。

“你是个窝囊废，早晚得窝囊死……这种毛病，治不好啦……你自个儿不想赚钱，那就让别人赚吧！闭上你的猪嘴！从今往后，你就当个瞎子、聋子、哑巴……！甭管出什么事，你只当没听见、没看见，也别说出去……！听明白了吗？干你的活儿去！政府要我提出咱们这个局改组方案和内部条例……我没空儿弄这些玩意儿……你来弄吧！能不能照令行事，你得起个誓，好让我信得过你……好，立正！为了基督、为了玻利瓦尔、为了二位一体的民众——武装部队，你发誓：无论本部门发生任何事情，你全当没看见、没听见，也不向外人讲，我派你干什么，你就专心致志地、老老实实地干什么，你愿意发誓吗？”

“是的，我发誓！”这下子饭碗保住了，我高高兴兴地回答说。

一连几个月，我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全力以赴起草出上交交派下来的两个方案。写完以后，我颇有一种大功告成后的快感，这是所有傻瓜的最高享受吧！是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后的紧张的快感。

“钞票上校”在我们局主持工作的时候，改组方案和内部条例一直没有实行过。但是，专家们认为这两份东西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上乘之作。这两份草案还在某些部和直属局实行过。大家纷纷向上校表示祝贺。人事处长专门为此举行宴会，而且下令全体职员一律参加。不朽巨著的冒牌作者月薪增加了两万比索，而我只拿到了五十分之一。

我的上司发财的速度越来越快。一年当中他得到两幢公寓楼，在雅诺斯买下一座牧场，在塞萨尔购进一座种棉花的庄园。圣诞节前后，他租下一座仓库，用来储藏老卖主送来的礼品，什么成箱成箱的威士忌呀，白兰地呀，葡萄酒呀，什么落地式两用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呀，什么吸尘器、上光器呀，什么家具、装饰品呀。到一月份，再转手卖出去。我呢，得到的礼品无非是几本挂历和袖珍笔记本。

就在这时候，《时代报》被查封了，学生遭到屠杀，斗牛场出了事，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威信大降。两大寡头集团一看大势已去，连忙把他们兴致勃勃树立在壁龛里整天顶礼膜拜的偶像推倒在地。于是，在波哥大出了一句俏皮话：“先是古斯塔沃；后是人人爱我；现在人人讨厌我……”

阿尔贝托·耶拉斯想起了他的宿敌劳雷亚诺·戈麦斯还被流放在西班牙。在他的压力下，法官还一度把戈麦斯关进监狱。不过，现在领导阶级的最高利益受到威胁，个人恩怨也就不在

话下啦。虽然他支持放逐令，可还是飞往贝尼多姆^①，和保守党党魁商定推翻罗哈斯，建立“全国阵线”。在我国的民主制度下经常是这样，几百万人在二十年内的命运，两个人就能决定了。

两位一体的“支票簿——念珠”击败了两位一体的“民众——武装部队”。那些曾经授权罗哈斯滥开空头支票的银行家，那些曾经用香烟呛得罗哈斯喘不过气的神父一块起来反对他。银行家们关闭了令人肃然起敬的银行大门；神父们登上布道坛要求“第二个解放者”（现在成了美洲头号暴君）伏法授首。“财富的创造者”和“干家子”拥上街头，把他们的豪华式轿车的喇叭揷得唔唔山响。

和所有皇帝一样，罗哈斯只好让位给五位元帅。这些人恰好是舆论指责为罗哈斯所犯罪行的共谋犯或帮凶。但是，两大寡头集团瓜分完内阁的席位以后，即下令民众举国欢庆。老百姓总是俯首帖耳的，也就来了个举国欢庆。

八

和堂·霍尔赫·曼里克^②的想法相反，对刚上台的政府来说，过去的事情全都糟糕透顶。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都成了头号道德之士，他们宣称：在为人所不齿的前政府期间所犯下的一切违法行为均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凡是平白无故发财的均要依法追查。

一个月前，“钞票上校”用密信把财产转移到一位亲戚名下，又通过他妻子这条“正式渠道”，以代管形式把财产寄到美

① 西班牙避暑胜地。

② 霍尔赫·曼里克(1440—1479)，西班牙诗人。以《悼念亡父堂·罗德里戈》(1476)一诗著名。全诗43节，前17节缅怀西班牙的先烈，赞颂他父亲的丰功伟绩。

国。军需局的处长和科长们一看大势不好，连忙学着头儿的模样，和他们在职期间取得的动产和不动产假意脱钩，并且撤离岗位。至于我，照逻辑推理，除了解职以外，倒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还照旧奉职。

显然，调查的第一批目标就包括我们那个局，因为大家一致公认我们局是贪污受贿的老窝儿。

我平生最倒霉的一天到了。那天上午十点刚过，有两个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瞅见他们，我立刻就联想起我在保安部门的那些老伙伴。事实上，他们脸上那副侦探相儿是再清楚不过了。果然，我的预感没有错。

“你叫贝纳贝·贝纳尔？”两个人当中的那个高个子问我。他戴着一顶帽子，帽檐遮住大半个脸，右肩上挎着一支卡宾枪。

“我是叫……”我回答说。

“我们奉命来抓你……”他拿出身份证和逮捕证给我看了看。“你得跟我们走一趟……给他戴上手铐！”他命令另一个侦探说。

“我很高兴跟两位走一趟……”我哆哆嗦嗦地回答说，“不过，我想不必把手绑上……”

“哦，你两手自由自在的，打算接着偷东西？”小个子侦探边给我上手铐边问。

“至少让我跟家里说一声……”我要求他们说。

“不行，先生！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话！你被隔离了！”大个子回答我说，“跟我们走！”

在两个侦探押解下，我戴着手铐离开办公室，耳边只听到清洁工菲德丽格娜对一个职员说：

“这就是生活……！线从细处断！这位可怜先生连根别

针也不会偷，可叫人抓走了……！那些能偷能抢的，反倒没事啦……！拿着钱，到处找乐子……多不公道啊！”

听到这番话，我的唇边又露出了苦笑——在我悲喜剧般的一生中时刻伴随着我的苦笑。我和两位侦探得要穿过几间办公室，才能走到临街的大门。那些老同事们故意不看我，或者背过脸去，仿佛我是个麻疯病人。一路走来，我没有看到一张友好的面孔，甚至没有一个怜悯的眼光。谁也不愿意跟我打招呼，免得被牵连进去。我已经不再是局里的秘书长了，而是个可卑的罪犯、违法的罪人，会把危险的犯罪杆菌传给旁人。

我被带到审判官面前。他说，我可以找一名律师，在即将开始的侦讯供述过程中帮助我。

“我估摸着，您捞了那么多钱……满可以找一位出色的律师……”他又补上一句。

我本想对他说，别这么早下结论，判罪前还得听我说说。不过，我还是忍住了，只是告诉他说：

“法官先生，您大概不相信，眼下我总共只有十五比索……还是求您帮我找一位普通律师吧……”

赶巧这工夫走进来一位律师，法官就指定他当我的辩护律师。这是个中年人，头发已经花白。在厚厚的眼镜后面映动着一双目光锐利的眼睛。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这个案子里有几个被告？”

“我也说不清……一个吧！就是我呗！”我回答说。

“那好，从现在起咱们是两个人啦……！得利，咱俩一块分……！说句心里话，你说你穷，我才不信呐……在前任政府当过官的没一个穷的……当然咯，现在亮财太冒失啦……这会儿，我先白帮忙……过后再说……”

我连续被审问了好几个钟头。我理直气壮地说明自己没有罪。在军需局工作期间，我唯一的收入就是薪水。不动产一点儿没有，动产嘛，就是我家客厅、厨房和卧室里的那几件家具，全是进局前买的。我干的事无非是接到维利亚特上校的命令，他签完字我再签个字。法官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冲着秘书挤了挤眼。

审问快结束的时候，我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谁也没有问我，是我自己说出来的。我说，有一次来了个姓科雷亚的客商，他提出要出售五十辆旧卡车。如果局里肯当新车买下来，他答应给我十万比索。我当场拒绝了，可是也没去告发他。法官听了，顿时笑容满面，搓着两手问我：

“这么说，对方出了个败坏道德的骗人的主意；你听了，又有意不向法院告发，是不是？根据《刑法》规定，这种行为构成隐瞒罪，要受到处罚。即使你没犯别的罪，那还得调查调查，单凭你坦白的这件事，我就满可以下逮捕令了……这次调查很成功！法庭胜利啦！”

“你这个畜生！”律师趴在耳朵上对我说，“你需要的不是律师，是兽医……！现在我算相信啦，你一个大子儿也没偷……像你这样的窝囊废，干不出这种事……”

法官下令逮捕了我。所有报纸在红字标题下刊登了报导，还配上我的照片。有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短评，标题是《罪与罚》。第一段是这样说的：

“和逍遥法外行为的斗争已经展开。司法部队初战告捷。以公职大发不义之财的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正受到法律的沉重压力。贝纳贝·贝纳尔一案具有典型意义，它表明：在5月10日上台执政的政权下，

任何罪行都难逃惩处。”

我被关进了模范监狱。一想起开头几天那场噩梦似的生活，到今天我还胆战心惊。对一个像我这种性情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折磨可以与之相比了。我认为，我受的那份罪比起奥斯卡·王尔德^①在瑞丁监狱里受的折磨更要厉害。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固然是十分残酷的刑罚；可是把一个人关进道德的麻疯病院——里面尽是人一兽、老鼠、虱子、臭虫，一切东西让人看着刺目、听着刺耳、闻着刺鼻、碰着难受——则是一个坏蛋能想出的最好诈的刑罚。

在司法机关任职的时候，我通过几千件案子对犯罪状况有所了解。不过，我只和两名罪犯，即“民法学家”和“放血匠”直接打过交道。这里有几百个人，身体、年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被同样的厄运汇集到一起。这种情况给我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这里，既有面目狰狞、顽固不化的杀人犯，也有以建立公平社会为理想的头顶光环的忠诚的革命者；既有猥琐的扒手，又有工业骑士；既有职业骗子手，又有用鲜血洗刷耻辱的受骗的丈夫；还有什么老色鬼、吸毒者、同性恋者。总之，各种罪孽、罪行、恶习，这里应有尽有。有的人悲痛得早生华发；有的人披头散发，脑袋像个乱鸡窝；有的人被折磨得面容憔悴；有的人眼露凶光；有的人目光狡诈；有的人眼神里满是疑惑；有的人嘴边挂着一丝苦笑，对什么都看不惯，一张口就责骂人、侮辱人；有的人干起活儿来两手笨拙，可偷东西、要钱就灵巧无比，什么弄虚作假，什么杀人灭口，全能手到擒来；有的人

^① 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诗人。

在老实人的光明大道上迈不开步，在逃犯的羊肠小道上却奔走如飞。破衣褴衫。肮脏。恶臭。身体和道德的贫困。

白天，囚犯们可以呆在监狱的大院子里。闲得没事，真让人恼火。这时候，我才领悟了几年前我读过的一句话里包含的全部真理：“一天闲散等于彻夜失眠。”懒散是监狱生活中最凶狠的一种处罚。有些人独自一个或三五成群地踱来踱去。有些人呆坐在地上，背倚着大墙。有些人沉思默想，一语不发。更多的人喋喋不休地大摆龙门阵。只有少数人翻阅过期的报纸和瓦加斯·维拉的小说。个别被指控犯有政治罪的人在阅读《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赌徒们蹲在地上，在盘子里玩掷色子。

蓦地，响起一片喊叫声、咒骂声、恐怖的尖叫声和痛苦的哎哟声。两名看守连忙跑到出事地点。一群囚犯立即四下散开。谁也没有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地上躺着一个人，肚子上插着一把匕首，身边一汪血泊。要么是一个青年人平趴在地上，昏迷不醒，自腰部以下全部赤裸。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分钟后，在囚犯中就流传开了：被杀的人不还赌账；青年人被十四个家伙轮奸了。对于监狱管事的人来说，这两件事和其他事情一样永远是琢磨不透的奥秘，因为谁违反“沉默的法律”，谁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起初几天，我以为自己疯了。吃不下，睡不着。监狱的气氛憋得我透不过气来。一生中我第二次认真地考虑要不要自寻短见。不过，像我这样生性懦弱的人，自杀的念头总是一闪而过。难友们很快就看出了我的病症。你传我，我传你，我的“胆小鬼”名声立即传开了。有一次，一个囚犯走到我跟前，问我：

“贝纳贝修士，能给我一支烟吗？”

“修士”这个绰号一下子传开来。过了几个时辰，全体囚徒、

典狱长、副典狱长和看守们都这么叫我。

要是为这点事儿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住声地抗议，那可是愚蠢的行为，只会给我的人身安全招来严重危险。甭管怎么说，“贝纳贝修士”还是比“一个叫贝纳贝·贝纳尔的人”好听得多。赐给我这么个雅号，我认了；而且我还下定决心认真当一当修士。于是，我变成一名不穿法衣的修士了。

我终于发现自己身上还真有传教士的气质。我想，从本质上说我是个好人、老实人，感情细腻，智力算是中等吧，还有几分知识。像我这样的人完全有能力让那些身陷囹圄的人过得轻松一些。从知识上、道德上，我都可以为他们做点儿事，教给他们起码的文化知识，开导开导他们，帮他们认识自己，唤醒他们的道德感，给他们的苦涩生活里添加点糖料。

我向典狱长摆了摆这些想法，他热情地接受了我的意见。由打那时起，我成了教阅读、写字、语法、历史和宗教课的教员，还成了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典狱长”。囚犯们跟我谈他们的隐私、问题，求我出主意帮他们解决。我还组织了一个戏剧组，编写了几出喜剧和独幕剧。我给其中一出戏起了这么个名字：《该来此者未全来，已来此者不全该》。演出的时候，司法部长大驾光临。戏演得很成功，司法部长对我热烈地祝贺一番。

组织教学和娱乐活动占去我全部时间，这是对付懒散的灵丹妙药。除了给囚犯讲各种学问的基本概念，组织他们参加文娱活动外，我还像个在俗的圣徒一样探视病号，劝慰遇上伤心事的人，给大家鼓励。我凭着一股为别人服务、帮人忙、做好事的热忱，做一些自己一直觉得做不来的事情。我强忍住恶心，为犯人拿虱子、捉跳蚤、治疮、理发、剪手指甲脚趾甲。无论对谁，我都能讲几句谅解的话、鼓励的话。礼拜天望弥撒，我

充当侍童的角色，重新捡起早已忘却的遥远的童年时代的习惯做法，满怀真诚的怜悯向犯人们散发圣餐。

“我非常感激您，贝纳贝修士……！”一天，典狱长对我说，“您的合作真是千金难买……眼瞅着偷偷摸摸、流血斗殴、同性恋活动明显减少……犯人们喜欢您、尊敬您……为了嘉奖您，我决定把您从现在的牢房里搬出来，搬到典狱长办公室隔壁的房间去住……唉，至少您可以单独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个好觉……还有，什么时候您需要上街买书或其他物件，预先办些和文化活动有关的事情，您自管走……您出去不用人跟着，我完全信得过您……”

干了三个月的传教士，我不仅博得典狱长的青睐，而且赢得难友们的尊重和好感。在人们情绪暴躁、容易冲动的环境中，一个犯人居然不招人恨，这也算得上是一桩奇迹吧。

在监狱里，我经历了饶有趣味的事情，看到了出乎意料的怪现象。有些人看上去什么知识也接受不了，可是突然间轻而易举地学会了我教给他们的东西。有些人犯罪后变得心如铁石，乍一看和“善良”二字完全绝缘，可是忽然间袒露出孩子般的纯朴的心灵。有些人没有什么明显的禀赋，可是一下子认识到自己的才能。有些人是披上魔鬼伪装的天使，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脱下犄角，扔掉三叉戟，露出双翅。有些人论潜力可以成为学问家、艺术家，只是被恶劣的环境耽搁了。有些可怜的蠢人在生活中随波逐流，遭到社会不正义的恶浪无情的打击。我发现很多天才，看到不少美德的闪现，由此不时想起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①的诗句：

^① 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散文家。主要著作有《诗韵集》和《传说集》。

“多少次啊，天才
沉睡在灵魂深处；
像拉撒路一样在等待，
等待一个声音说：“起来！”

•

倾听我声音的人并不多。然而在我百无聊赖、含辛茹苦的一生中，这却是我最大的满足。有一回，我的学生跟我说了几句话。到如今每每回想起来，我还止不住很激动。

“贝纳贝修士，您是圣徒。我愿意效仿您……帮帮我吧！”

“但愿我是……”我回答说，“我不过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已。或者说：是个好人……正因为是好人，我才来到这儿！圣徒们有意志、有性格、有力气，而我却没有……是啊，过去我是个殉道者，今后还是……不过，请您不要学我……千万别像我这样一生犹犹疑疑、软弱可欺……”

起初那场恐怖的噩梦渐渐变成了恬静的美梦。一开头我真像进入了地狱。不过，在这座地狱里居住的人并非如我当初想象的那样都是恶鬼。龙勃罗索讲到的不懂得爱、不懂得怜悯、不知悔改的天生罪犯只是一小撮。绝大多数人是非正义的牺牲品，譬如我，还有目不识丁的农民和山穷水尽的工人。他们铤而走险，无非是因为无知和饥饿。

慢慢地我镇定了一些，用希腊人的话来说，感到了内心的平静。监狱里固然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但比起我从前生活的环境还是更为可人。这里，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不掺假的。既没有假仁假义，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撒谎骗人。这里的人都是查有实据、已经招供的罪犯；而不是装扮成老实人的恶棍。比起保安部门的闹剧、政界的喜剧、司法部门的骗

局和军需局的圈套来，这里的戏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美学上来说，都要高明得多。在这里，我是受人尊敬的人。我不是“犟牛”中士的侦探，不是蒙德拉贡博士的头脑，不是魏兰迪亚博士的法律良心，不是梅内塞斯博士的刺客，不是“钞票上校”的小卒，不是我那位冤家的奴隶，不是我儿女们的笑料，也不是朋友们取笑的小丑。这里不用欺骗老百姓，不用拿正义作交易，不用收买良心，不用以鲜血给公民洗脑。胆大妄为者压不倒道德之士。这里看不到以民主的名义玩弄花招和欺凌弱者，看不到以法律的名义胡作非为。一句话，幸而民主共和制度在这里不起作用。说来奇怪，我在坐牢期间却感到从来未有过的自由自在。

此外，对我来说，坐牢等于摆脱了家务，理直气壮地、正正当当地度假。一连几个月，我没看见我那位“冤家”的凶狠的酸面孔，没听到她的辱骂和挖苦。波妮法希娅坚决不肯来探监，她说她抹不下脸来。“他让人抓起来，总是因为他干了什么事吧，”她说，“让我去看他，甬做梦啦。我臊得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我这样体面的女人，就算丈夫关在监狱里，我也不能跨进监狱的大门……”我那两个孩子黑诺维娃和莱昂赞成妈妈的做法。只有胡安·雅科沃（肯定地说，他在三个孩子中是最有出息的）定期来看我，给我送书、送烟卷。常来看我的还有我的好友费明·萨尔加。

我被关了一年。因为我历史清白，作案中有可以减轻刑罚情节，再加上坐牢期间行为端正，所以法官决定算我刑满释放。

我代人受过，为“钞票上校”和他的亲信犯下的罪行吃了苦头。这也可以说，他们没能逍遥法外吧。这样一来，法院心满意足，社会也消仇解恨了。

“贝纳贝修士，您这一走，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遗憾……”我

和典狱长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非常需要您啊！您在这儿干得确实不错……”

“嗯，我本人尤其觉得遗憾……！”我回答说，“说起来像是开玩笑，我在这儿度过了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现在等着我的倒是一座真正的监狱，就是我那个家。和我那个家相比，这儿简直是迷人的宫殿……要是我走了又回来，您千万别吃惊……监狱不就是专门为罪犯和窝囊废开的吗！”

在我被关押期间，至高无上的人民实现了阿尔贝托·耶拉斯和劳雷亚诺·戈麦斯至高无上的意志。“一半加一个”这种荒唐的民主做法被两党轮流执政的极为明智的做法代替了，而且延续了十六年。这次革命性变革的发明人之一阿尔贝托·耶拉斯被另一个发明人劳雷亚诺·戈麦斯推上台，借以打鼓开张。

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是阿方索第一一手拉扯起来的人才，曾在阿方索政府内担任过秘书和部长。他是“正在进行的革命”的旗手。在他政治幼年期，曾经患过左倾麻疹，如今病已痊愈，变成哥伦比亚资产阶级的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工团主义的头号敌人和美帝国主义最顺从的奴仆。除了这些突出的特点，他还具有播音员的奇特禀赋。这就第二次为他敲开总统府的大门。

我出了监狱，比进来的时候更加沮丧。这时候，我的人生经验比在“钞票上校”的军需局里丰富得多了。四十四年来，我第一次办了一件有益的、卓有成效的事情。在监狱里，没有任何人利用我的智慧、知识和好心肠。没有任何人欺侮我、奚落我。我不再是机会主义者和囤积居奇分子的工具。我在人世间的苦难历程中，监狱是第一个没人叫我“窝囊废”的地方。过去有多少次，我不知不觉地充当过帮凶，为某些人缺德的恶劣行

径打过掩护。在监狱里我没干这些事，离开那儿的时候，我丝毫不感到内疚。在看上去令人憎恶的大墙的阴影下面，我找到了自由世界一直拒绝赐予我的和平和安宁。在狱门后面，留下了我的朋友、同志、兄弟。他们一定会怀着感激的心情亲切地怀念我。

而在狱外，我将和妻子、孩子重逢，他们轻视我，嘲弄我，以我为羞耻。我将回到不公正的社会，它曾残酷地将我逐出，逼迫我代人受过。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我回到家里，我那位“冤家”问我，“还去偷吧……知道你蹲过监狱，还有人敢用你吗？把在监狱里学到的那些玩意儿全都施展出来，组织个土匪帮……！”

黑诺维娃和莱昂压根儿不跟我打招呼。看了看我，就像从来没见过我一样。只有胡安·雅科沃紧紧地抱住我，对我说：

“妈妈和弟弟、姐姐就是这样……原谅他们吧！幸好我跟他们不一样……在我眼里，您可不是个罪犯，而是一个心眼儿好过了头的人，所以才出了这些事……您千万别绝望！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昨天我见到二爷爷达马索啦，他说想跟您谈谈……也许他有点儿办法……您去看看他去！”

听了胡安·雅科沃这番话，我感动得掉下泪来。在监狱里我没哭过，可在他怀里我哭得热泪纵横。第二天，我去看望叔父——我们家的三段论学者。他跟我说起话来，还是那套前提啊结论的。

“侄子，你的处境很让我担心啊……当然啦，你一定想继续活下去。要想活下去，你就得挣钱；要想挣钱，你就得工作；要想工作，你就得找到职业；要想找到职业，你就得拿出警方的证明。可你拿出的证明上面记着你被控告过，被逮捕

过。所以，首先你得搞到一份证明，上面没有这些东西。你明白吗？”

“可是，这是假造公证书啊……”我嘟嘟囔囔地说。

“到哪年哪月你才不是个窝囊废呀！哼，当然要造假啦……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嘛！难道你想眼巴巴地饿死？你甭管，我去办。你也知道，我到处都有关系……我有个朋友，在指纹鉴定科担任要职……他能帮你抹掉前科……哦，当然啦，也不能白干……你得给他五百比索。我还认识一个放高利贷的，他借钱是一分利。你立个字据，他会借给你钱……这么着，第一个问题就解决啦。第二个问题是找到职业的问题。现政府是全国阵线政府，可总统还是自由党。就是说，想找到职业，最好是当自由党，别当保守党。首先你得再反一次正。自由党省党部的一名委员专爱开推荐信……被推荐者如果得到工作，得要给他一笔酬金，数额相当于能够领到的月薪的百分之二十……那位党部委员叫普鲁塔科·博拉尼奥斯。在省府秘书厅里，他一荐就准……这么着，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亲爱的侄儿啊，你放心，像我这样对逻辑运用自如，和各方面关系密切，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

一个人既没有祖产，又没有固定职业，只能受佣于官僚手下。本人一直就是这样。我是一个把头脑和良心拿来拍卖的人。娼妓租赁肉体；穷人租赁灵魂。从政治上来说，我就是个马路天使。青年时代我是自由党；在蒙德拉贡指挥下，我成了党同伐异的自由党分子；在梅内塞斯手下，我成了粗野的哥特佬儿；后来，又和军政府沆瀣一气；如今，为了活下去，我必须再回到自由党的圈子里去。要想找到一个卑微的职务，我不得不贿赂一位公职人员，向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借一笔钱，还

要拿出我未来的薪水的百分之二十交给一个政治投机商。这些事真让人恶心。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犹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达马索叔叔的安排。

三天之后，我借到一笔钱，给了贪官一笔丰厚的贿金，这才拿到一张写明我没有前科的警察局的证明。唉，一个老实人花掉五百比索，只是为了证明他的确是老实人。

普鲁塔科·博拉尼奥斯是昆迪纳马卡省的一个政客。小个子，又矮又胖，肤色黝黑。鬼头鬼脑的，透着机灵。他善弄权术，会做交易，混上了个众议员，还是自由党省党部的委员。他可以开条子证明某个谋事由的人是自由党，可以作为自由党人向外推荐。找事做的人得把薪水的五分之一给他。经他推荐的人有几百名，所以他每月的固定收入相当可观。弄清我的来意后，他说：

“您得先在这张纸上签个字……”他递给我一份材料，上面写着：

“出纳员先生：本人在本单位工作期间，请扣除薪金20%，转交给普鲁塔科·博拉尼奥斯博士。”

我在文件上签完字，把文件交给博拉尼奥斯。他说：

“拿着，这是交给省府秘书的推荐信。他跟我老交情啦……您放心，他准会给您安排，……最后一件事，您把名字填在这张纸的空白地方……”说着，他递给我一封信，上面写着：

“省府秘书先生：持信人……先生，系我党有功之臣，曾对党的事业做出无可估量之贡献，并为此受

到严酷迫害。为人正直，精明强干，本人愿为其担保。来人希在您正确领导下的部门谋求一份职业，特此推荐，并望尽速研处，预表谢忱。谨致亲切问候。

您的同志和朋友

普鲁塔科·博拉尼奥斯”

我又一次脱离了卡罗们和奥斯皮纳们的崇奉宗教和秩序的保守党。我在梅内塞斯博士的 SS 组织工作时，曾经手持剪刀捍卫过保守党崇高的学说。现在，又一次加入洛佩斯们和耶拉斯们的鼓吹自由和民主的自由党；在令人难以忘怀的蒙德拉贡博士率领下，我曾在市、省以至全国的会议上为自由党的崇高主张奋斗过。

我把我又回到自由党营垒的事告诉了费明·萨尔加。他说：“从政治上说，你结婚、离婚的次数超过了电影明星……将来给阿特拉斯牌呢绒作广告，最好是说‘比贝纳尔·贝纳贝还经得住折腾’……！”

我一连好多天在省政府的走廊和前厅里追踪我未来的新上司——堂·胡安·卡洛斯·德·科多维兹·伊·斯帕盖茨奥内。此人是波哥大贵族。头发金黄，两眼碧蓝，长着一个波旁家族特有的鼻子。从父系来说，他是圣大菲一家有钱的名门望族的后裔；从母系来说，是罗马最古老的贵族的后裔。据他本人讲，其母的先祖是斯帕盖茨奥内伯爵。不过有些爱嚼舌根的人偏偏说，其实他的外曾祖父只是罗马一座客栈的老板。客栈以制做面条出名，很对顾客的口味，他的响亮的贵族称号即由此而来。^①

^① 斯帕盖茨奥内，原文是 Spaghetione，来源于意大利文的 spaghetti，即“面条”。

堂·胡安·卡洛斯家私巨万，在萨巴纳中心地区有一座庄园，城里也有多处价值连城的产业。每死一位单身婶母，他的财产就增加一分。打高尔夫球、马球、去迈阿密、蓝色海岸旅游、在赛马总会喝酒、在高级饭馆吃饭，这些都搞腻了，于是就从政治里寻消遣，倒也可以解解闷。古玩、邮票、钱币，他全不收集，专门收集官职。向党提供活动基金，他是大户之一。每次大选，他都开一张三十万比索的支票。因此，也就成为公共机关和最高行政职务的当然候选人。他为人浅薄，喜好装腔作势。总是像波哥大的公子哥儿那样以打趣人、过分殷勤来掩盖内心的空虚。

“啊哈，小伙子，怎么样？见到你，真高兴啊！请坐，请坐……！家里怎么样？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让我想想，你的名字是……咱们在哪儿见过？”

“我叫贝纳贝·贝纳尔……”我回答说，“以前，我还没有机会见到您……我给您带来一封普鲁塔科·博拉尼奥斯的信……”说着，我把荐举信交给堂·胡安·卡洛斯。

“这个博拉尼奥斯真会缠人！真有点狼性，嗯？我带他去赛马总会，可给我丢尽了脸了……”斯帕盖茨奥内伯爵的后裔一边准备看信一边说。看完信，他又加上一句：“推荐信真有力！从信上看，你这个家伙很有点意思……你来我身边干事，我觉得太滑稽啦！我得告诉你，这儿的事很多，我的社交活动也很多，根本没空儿干事，需要个人帮帮我，嗯？哟，你喝杯咖啡，抽支烟……来个‘山茶花’，还是‘库尔’？那个笑话想必你也听说过……还是说正经的吧，我干这份差事，无非是想为党和政府效点儿力。能牺牲多少，我就牺牲多少。可是，午餐会啊、酒会啊、便饭啊、宴会啊、到各市访问啊，弄得我连一分钟空

闲时间也没有……老兄，你得帮我背一背十字架呀，嗯？”

和往常一样，整个行政十字架的重担还是压在了我的身上。堂·胡安·卡洛斯·德·科多维兹·伊·斯帕盖茨奥内和我的前几位上司一样对我寄予绝对信任，把全部职责一古脑全都压在我身上，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我要监督上百个市政府和几十个警察署的运转；研究求职者的历史情况；起草任命书；下达指示；组织、领导培训班；处理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解答疑难问题；检查官员的工作情况；调查官员的不正当行为或犯罪活动，并给以应得的惩罚；起草规章；处理来信，当然，还要代上司起草天天要发表的演说稿。我的工作从早上八点钟开始，往往要到夜里十一二点才能结束，累得我直不起腰来。我的月薪是四百比索，而堂·胡安·卡洛斯的月薪却是六万比索。

在我那间办公室里成天听到的是流言蜚语，看到的是阴谋诡计。三十位国会议员、保守党和自由党省党部委员、昆迪纳马卡省所属一百个市的市党部的委员、参议员、众议员、神父、酋长、土霸王是办公室的常客。有些人前来为朋友谋职；有些人来要求撤掉仇人。两部分人提出的理由纯粹都是政治性的。应该任命张三，因为他是“伟大的自由党人”；应该撤掉李四，因为他是“缺德的哥特佬”。什么工作能力，什么老实正派，什么工作效率，全都不在话下。

我那间办公室又是个绝好的了望台，可以看到政治、行政管理上的种种无赖行径。在工作中，我有机会领略到各种令人捧腹的事情。现在，忍不住给您讲上几件：

一年冬天，严寒在昆迪纳马卡省逞凶肆虐。一条穿过某市的河流泛滥，淹没了广阔的地区。有些人被淹死，物质损失不

计其数。我给该市市长发出一封电报：

“多少人无家可归，望告，以备救济。敬礼。省府秘书。”

回电是这样说的：

“昨日电悉。无家可归者仅 327 人。余皆淹死。市长。”

另外一次，一个保守党市民找到一位自由党市长，控告说他庄园里的十头骡子让人偷走了五头。

“您怀疑是谁干的？”市长问。

“嗯，我怀疑是自由党的人……”告状的人以为市长也是保守党。

“自由党的人全是正派人、老实人，你胆敢怀疑自由党？”市长怒不可遏地说，“你诬陷好人，饶不了你！”

“嗯，市长先生，我是怀疑自由党的人，因为如果是哥特佬儿干的，我的牲口就全得丢了……！”告状的人狡猾地说。

还有一次，某市市长得知有个人被吊死了，尸体挂在树上。他开始进行调查，在一份起尸证上开头是这样写的：“在此情况下，市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始摘尸，而不是起尸……”

这些引人发笑的事情，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事情（我都记不住了）倒也能不时消除日复一日的繁冗公务给我带来的烦恼。另外，我还时常作为省长的随行人员——堂·胡安·卡洛斯理所当然地也是随行人员——到省里各处游逛，也能消除一些烦恼。

省长的主要工作过去是、现在还是按字母顺序巡视省内各

市，从阿尔班起到希帕基拉^①为止，借口是“了解一下他们的需要和问题”。我参加过几次精采的出巡，因为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替上司起草在宴会上的答谢词。一连三天，大吃大喝。市政当局和市民一心盼着需要得到满足，问题能够解决，不惜一切花费，用最丰盛的菜肴款待省里的大员。

每到一市，必有下列节目：公立学校学生沿街列队欢迎；群众敲锣打鼓，鸣放礼炮，举行游行；在市府内喝香槟酒；游江、野餐；在保守党党魁或自由党党魁府上吃饭；在市政会大厅里举行舞会；市银行出资举办露天音乐会。接下去的两天，纵酒作乐，大吃八喝。市民们呈交申请单（通常老百姓缺的是自来水管、电灯、下水道、医院和学校）。省长和秘书庄严地保证马上处理大家提出的请求。但是，后来这些人得了饮酒遗忘症，把诺言忘得一干二净。市里仍然无水、仍然黑古隆冬，病人照旧没有床位，孩子还是没有教室。

我记得在一次出巡当中吃野餐的时候，堂·胡安·卡洛斯·德·科多维兹·伊·斯帕盖茨奥内摘下精制的羊羔皮手套，拿起两个味道鲜美的土豆，一面把土豆往嘴里放，一面对我说：

“我这儿先体验体验本市有什么需要，嗯？就这个事写上一笔，一定很有趣儿，你看呢？”

中央一级和市一级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上的丑剧，我都见识过。惟独不了解省一级的情况。说不出这三级当中哪一级更让我恶心。蒙德拉贡、魏兰迪亚、梅内塞斯和“钞票上校”捆在一起，也敌不上堂·胡安·卡洛斯那么无耻。有一次，他照我写好的稿子发表讲演，博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刚一讲完，马上

^① 阿尔班原文是 Albán，希帕基拉原文是 Zipaquira

毫不脸红地对我说：

“你看我讲得怎么样？才华横溢，对不对？我一向认为，要想成为出色的演说家，不要别的，一要好长相，二要好嗓子，就像我这样……老伙计，世代相传嘛，一脉相承嘛……！”

我从前那几位上司至少还属于中等阶级。而堂·胡安·卡洛斯却把贵族的妄自尊大和政客的目空一切融为一体。换句话说，他是双料的骗子手。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轻浮、虚妄的人；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如此的反感。我一共给他干了三年。有一天，他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到了以后，他说：

“亲爱的老伙计，消息不妙啊……实在遗憾透了……我臊得连头也抬不起来啦，嗯？可我又不能不辞退你……你想想看，省长接到一封信，把你说得一塌糊涂……老伙计，你先瞧瞧信，可不是鸡毛蒜皮的事啊……！”

信的原文是这样：

在阿尔贝托·耶拉斯这样坚定的自由党人领导的全国阵线政府内，在公共管理部门竟然安插进一个象贝纳贝·贝纳尔这样的惯犯，此事决非寻常。此人系危险的投机分子，为了实现其毫无节制的野心，曾两次加入自由党，两次加入保守党。在劳雷亚诺·戈麦斯和乌达内塔·阿贝拉埃斯的可耻时期，他在波哥大市大逞淫威，迫害自由党人。每见红领带，必然割断；每有蹂躏他人的机会，必不放过。在匪首莱奥维希尔多·梅内塞斯的指挥下，他曾参预了火烧《时代报》、《观察家报》以及火烧洛佩斯和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宅第的行动。在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府时期，他丢

掉剪刀和松明火把，拿起手锯，在军需局大发横财。在查明其极为严重的罪行后，曾将其逮捕归案，并在模范监狱中关押达一年之久。在狱中，这一危险囚犯的歪才又得长进。以其特有的狡黠、圆滑，买到一张身份证，证明其为自由党人，并混入昆迪纳马卡省政府。在那里，他像“沃克牌”啤酒一样颇有点儿名气……

我们这些从事正当职业的老实公民绝不能允许我们缴纳的税款成为歹徒的薪俸。我们有明确的权利，要求把此等坏蛋从其职位上撤下来，并代之以好人。此致

敬礼

何塞·阿尼塞托·科雷亚

这封信是报复行为。自称是“从事正当职业的老实公民”者正是企图向我行贿的有名的科雷亚。我在受审时，对他提出指控，为此他被关押了几个月。不过信中列举的事情有不少确有其事，我无法抵赖。于是，我低下头，一语不发。

“沉默就是认可……”堂·胡安·卡洛斯对我说，“你不说话，就等于是招认了……我本来希望这会是诬陷……真糟糕！这下子我还真缺人手！还得找个贝纳贝，一个人忙不过来啊……祝你万事遂顺……！你要明白，我完全听你的……失业救济得过两三年才能发下来，我先给你点钱，帮帮你，嗯？”一连三年，我把全副身心都拿出来为这位百万富翁效劳。事到临头，他只给了我一张五十比索的纸币。

我一时冲动，本想拒不接受。迟疑了几秒钟，和往常一样，胆怯还是压过了自尊，我还是收下了这份侮辱性的施舍。

“上帝会报答您的，堂·胡安·卡洛斯！”我说，“千不好，万不好，只能请您原谅了……承蒙您对我寄予满腔信任，我无时无刻不在竭尽全力以不辜负您……要是我办过什么错事，那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再说一声，谢谢您！”

我真是个傻瓜，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那位“冤家”。她怒气冲冲地说：“你也不害臊？你从窝囊废变成罪犯，又从罪犯变成叫花子……！你不懂自爱，也不能连我带孩子一块踩咕啊！像你这种没皮没脸的人只配落得这么个下场！我嫁给你这个倒霉鬼，也不知当初怎么鬼迷心窍了！那会儿追求我的人有多少……大老板给了你这堆钱，咱们也能顶到老天爷往下扔馅饼啦……你还能找到差使？我看没指望啦……”

我看也是没指望啦。要多倒霉有多倒霉，几个月前达马索叔叔去世了。我每次失业，总是找他帮忙，出主意，我只能向他倾诉胸中的郁闷。我把失业救济权的一半卖给了那个借钱帮我买警察局证明的高利贷者。用这部分钱，总算应付了家里几个月最起码的开支。

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读起书来还是如饥似渴。我常常从微薄的薪水里匀出几个钱购买书籍，星期日准定去“路易斯·安赫尔·阿兰戈图书馆”。一天，我从报上看到正在举行小说竞赛。得奖作品可以获得五万比索。这倒是解决使我苦恼万分的经济问题的办法！我拟了个写作提纲。指定的交稿日期已经逼近，于是我就以奥诺瑞·巴尔扎克的速度开始写作。我以个人生活经历为题材，小说的题目定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压根儿不懂什么小说技巧，如今还是茫无所知。可我写的故事人情味很浓。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教养的人发自内心的朴实无华的遗嘱。既无文学家的奢望，也无哲学家的矜持。每逢

写作，我都对自己提出苛刻的要求。对这部作品我很满意。我把小说中的几章读给我的好友费明·萨尔加听，他大加赞许。我昼夜不停地一连写了三个月。如期交出小说，署名是“菲德尔·纳拉多”^①。我天真地相信这部作品准定获奖。

一个月过去了。在评委会宣布结果之前，竞赛优胜者就宣布他得奖了。评委会出面辟谣，说目前正在进行评议，奖金属谁尚未见分晓。但是八天以后，宣布评选结果，证实了那位优胜者说的话的确不假。

评委会的一位委员是费明的朋友。他对费明和盘托出评选获奖小说的经过。这次参加竞赛的共有二百四十部小说，评委会要在三十天内选出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换句话说，每位委员每天要读八部小说，这根本是办不到的。一位委员给大家出了个聪明的主意。他说，为了躲开这种棘手的事，干脆把奖金奖给他亲戚寄来的作品。他这位亲戚目前经济状况很紧迫。大家接受了这个最省力的办法。评委会甚至来不及看一看送来的全部小说的标题和作者的署名。费明的朋友还说，评委们看到我那本小说的时候，有人说：“用这个笔名的作者准是共产党！根本不值一评！”

这次失败让我有说不出的沮丧。丑剧不仅发生在政界、司法界和行政管理部门。丑剧还扩展到文学竞赛当中……！

原稿退还给我。我拿着原稿走遍波哥大市所有的出版单位，巴不得有哪家出版社答应出这本书。可是，所有出版单位都向我表示，我是个不为人知的作者，必须自己出钱印刷，还要承担亏本的风险，因为我的书很可能没有销路。两千本书须要三万比索，对我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有位出版商对我说，如果

^① 意译为“忠实的讲述者”。

书里有大段的色情和污秽的描写，也许他能承担风险，出资印书。但是，书中缺乏当代文学这两种基本调料，出书就太冒失了。

此时，全国老百姓向去世的马埃斯特罗·吉列莫·瓦伦西亚(他曾两次要当共和国总统)表示赔礼道歉，把他的长子推上了总统的宝座。

吉列莫·莱昂·瓦伦西亚善长打猎，总爱摆出一副像煞有介事的神情，说些大而无当的话语。多年来他在参议院里占据着其父留下的位子。在参议院里，他像戴塔南面对枢机主教黎世留^①阁下的卫队一样，曾经拔出想象的宝剑，在假想的搏斗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用虚张声势的语调宣称：“在你们封闭国会的那天，你们必须从我尸体上跨过！”或者说：“阿尔贝托·耶拉斯和我用两支自来水笔能对付一万挺机关枪！”另外，他在担任哥伦比亚驻西班牙大使的时候，曾经陪同佛朗哥大元帅打过猎——他最喜爱的运动。这样，他就具备了当总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行政管理他一窍不通，但他天生会下政治棋，具有士兵的伟岸的身躯，而且心胸极为宽广，这就弥补了他的缺欠。在执政纲领中，他提出“让人人吃饱肚子”。一百六十万哥伦比亚人热切希望尽快吃到他提供的神秘的饭食，就投了他的票。这样，光荣的全国阵线开始了第二期执政。

九

我真气坏了，一怒之下把小说原稿撕得粉碎。其实，要说损失，倒也不大。我把写的那份原稿里的回忆和经历几乎都写进了这本书里。说来说去，我还是没有本事独立谋生。老天注定我要把智力、头脑、良心典当出去，真是毫无办法。我还得在

^① 黎世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

官场中为我平生两大罪孽——贫困和怯懦——赎罪补过。我准备重新抄起双桨，继续干划船的苦役。

我的下一个提线人是谁呢？我要落入什么样的丑角手中，或者陷入哪个胆大妄为之徒的魔掌？我将受到什么人的剥削？像“犟牛”中士一样的粗野汉子？像蒙德拉贡一样的无知政客？像魏兰迪亚一样的寡廉鲜耻的法官？像梅内塞斯一样的残忍的政治野兽？像“钞票上校”一样的贪婪受贿的刀把子？像堂·胡安·卡洛斯·德·科多维兹·伊·斯帕盖茨奥内一样的轻浮自负的贵族？命运的安排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官僚生涯的最后几年，我居然在“统计”这块荒野上拉起了“技术”这张铁犁。

全国阵线办了件积德的事，撤掉了暴力分子、玩弄选举魔术的人和“耍手腕”的人的职位。想要报效国家不一定非得是“野汉子”或是“大棒子”不可。更重要的人物是“行政管理人员”、“年轻的经济学家”、“技术助手”、“有活动能力的秘书”或“计划专家”。

我的好友费明·萨尔加也是赫拉迪诺·埃斯图皮尼安博士的朋友。埃斯图皮尼安博士担任全国精密科学研究所所长，因此是统计学王国的沙皇。

听说统计学是科学中最不精确的科学。我在法院的老同事“小卡萝卜”常说统计比女人的乳罩更富于欺骗性。有一次，我读一本《年鉴》，翻着翻着我就睡得死死的了。我的统计学知识，我过去和统计学的接触仅此而已。

可是，费明在向埃斯图皮尼安博士介绍我的时候，竟然说我是一名技术人员。招考的题目是做算术的四项运算。我和算术的关系一直平平常常。论加法，我只是把失败和失望加在一起；论减法，我只是不断减掉改善处境的机会；论乘法，我是一再加倍地为他人效劳；论除法，我只是把薪水分成几份儿，

分给我那位“冤家”和债主。尽管如此，我还是得了 3.5 分，远远高出其他求职的技术人员。考核我的那位数学专家对我表示热烈祝贺，认为任命我完全符合要求。

我被任命为“全国精密科学研究所统计、户籍、住房及农牧业中心办公室科学技术局社会经济资料收集、分析、评价和处理好 A 科二室三号统计制图员”。职称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的每个段落还要长^①，可报酬比斯比斯达的吝啬鬼拍的电报字数还要少。

我命中注定要生活在丑剧中。这次进入研究所，我又能从后台观看一出至今未看过的丑剧：技术的丑剧。刚干了不几天，我就觉出研究所是一座规模巨大的谎言制造厂，时间终于证实了我的感觉。

赫拉迪诺·埃斯图皮尼安博士不大像个人，倒像根旗杆。他身量很高，满头白发，两眼流露出一股茫然的神色。他动作缓慢、迟钝，神态严肃、稳重，寡言少语。他是个永远不离舞台的演员。当他神情庄重地在走廊上踱步时，颇像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散步。在他周围环绕着一个博学和威严的光环。他的秘密武器就是沉默。谁看见他，都会感到钦佩、景仰和恐惧。但是，一听见他说话，这三种感觉就像着了魔法一样烟消云散了，而且会认为他的姓最后一个音节写错了，最后三个字母应代之以 d 和 o^②。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的象牙之塔里，只有两个贴身人可以进去。他既不知道属下有哪些部门，也不认识在这些部门工作

①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1982 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其小说《族长的没落》每章一段。

② 埃斯图皮尼安，原文是 Estupinan，后三个字母换为 do 则为 estúpido，即“笨蛋”。

的职员。他对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和他交谈得不多，印象是他对自己的职责和下级的职责全然不了解。

相反，他在利用职务之便而谋利这一点上倒是很勤快，而且迫不及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他开着公家的汽车携全家前往希腊多特、维耶塔或科莱希奥山。作为参加统计会议的代表，他用公款跑遍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大城市。各省的财务监察员必须定期给他送上本地区的土特产品：卡尔达斯省的监察员送来甘蔗酒；沿海各省的监察员送来黄油鸡蛋玉米饼和可可饭；考卡山谷省的监察员送来米粉鸡脯羹；桑坦德省的监察员送来大蚁；博亚卡省的监察员送来杜伊塔马的苹果和索阿塔的海枣；托利马省的监察员送来小猪和白酒；纳里尼奥省的监察员送来豚鼠；考卡省的监察员送来羊肉馅饼。

他能爬上今天的高位，靠的是头上有圈灵光，可他的下意识，也就是方济各会的“小兄弟”的水平，总是处处跟他闹别扭。每当职员送上报表或报告的时候，他表示同意就在纸页边上写下两个难以捉摸的字母：M. I. (即 *Muy interesante*①)，或是 Q. M. (*¡Qué maravilla!*②) 或是 E. E. (*¡Está estupendo!*③) 他在正式文件上签完字，总在名字下面写下几个神秘的字头：A. L. G. D. G. A. D. U. 这就只有方济各会会士才能破译了。

大丑角上演丑剧，高级官员也必然跟着学。高级官员演丑剧，把中级官员和低级官员也拉了进来。于是乎大家都来扮演科学魔术师和高级技术传教士的角色。我们那儿有这么一条公理，即世上万事万物均不如统计重要；还有这么一个信条，即人类

① “真有意思。”

② “妙极啦！”

③ “太好啦！”

的一切都系于精密科学研究所的天才和学者所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处理和公布的数字。

埃斯图皮尼安博士把他的职责下放给科学技术局局长，科技局局长又把职责委托给计算处处长；计算处处长把职责转交给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科科长；科长把职责交给副科长；最后，副科长把职责全交给了我。

他们知道我有普通常识，掌握了四种运算方法。有这两条，就满可以把我当成技术人员，当成上级信得过的人。更确切地说，我在研究所里不但是个人，还是整个一个乐队。我得同时敲打各色乐器，演奏出统计交响乐。我要接收几千份来自全国各地的报表；按地域和时间分类整理；按照特别的编码把资料写入卡片；把全部资料或部分资料集中起来；把数字列入几张大如床单的表格；起草报告；提供谘询。

为了完成这一大堆工作，本科有八位职员同我合作(?)，可这八个人加到一块还顶不上一个人。他们是：

堂娜·孔恰。罗德里格斯的遗孀。每天下午，她请假四个小时，到死去的丈夫坟前祭奠。不过，有几次别人看见她和一个上年纪的公子挎着胳膊从剧院出来。

堂娜·马蒂尔德·德·桑切斯。她总是怀孕。她丈夫白天懒懒散散，一到晚上就成了不知疲倦的干家子。堂娜·马蒂尔德成天织毛衣、做鞋子、看大夫，时间根本不够用。

格拉迪丝·希门尼斯小姐。每天八小时工作，她得抽出三个钟头给未婚夫打电话，再花五个钟头擦胭脂抹粉涂指甲。

维努斯蒂亚诺·阿朋特先生。这位七十五岁的老者身患前列腺炎、动脉硬化，夜里还失眠。白天只好趴在写字台上睡大觉，连下班回家还得有人叫醒他。

堂·巴尔塔萨·卡拉维德。他是安蒂奥基亚省人，是个醉汉，边抽烟边喝酒，喝酒喝得十分健忘，连自己叫什么、老婆孩子叫什么、家在哪儿住都想不起来。

年轻的佩鲁丘·多纳多。沿海人，是个出色的法律系学生，成天眼不离法典，第二天总要交出一份考卷。

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对政治问题简直着了迷，上班那点儿时间还不够他猜测、预言谁将被任命部长、省长以及估计大选结果的。

还有卢佩托·梅德拉诺。他特别喜好赛马，一门心思要押中5号马、6号马，好解决解决经济问题。一星期里他要拿出五天时间研究种马的系谱和星期日参赛马匹的重量和试跑情况。

最后这两位过去是我的好朋友，现在还是。我常和他们见面、聊天，每月都一块去领退休金。

在各个公共机关的办公室里都笼罩着假惺惺的气氛，我们科里也是一样。这种气氛掩盖着当官者之间的忌妒、争夺和不满。罗德里格斯的遗孀在我们之间强行使用表示亲热的“指小词”。我们在官场上的名字成了孔奇塔、玛蒂尔迪塔、格拉迪希塔、阿朋蒂科先生、巴尔塔萨希托、佩鲁奇托、冈萨利托、梅德拉尼托和贝纳贝希托。每逢有人过生日，其他人都要凑份子，每人出十比索买一份鸡蛋奶油甜饼、两瓶甘蔗酒和二十四瓶可口可乐。下班后，大家在办公室里把东西吃得精光。玛蒂尔迪塔每月抽一次彩，花五十比索，能得一百比索。每年我们都合伙买一张圣诞节特别彩票。到了发薪的日子，我和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卢佩托·梅德拉诺总要到圣·阿古斯丁的一家小店里喝啤酒，议论议论上司，嘲笑嘲笑同事。

上班的时间是早上八点。八点钟一到，孔奇塔就拿起致炼

狱亡灵的九日祭祈祷书，通过善良的亡灵告知丈夫昨晚曾去看望他；玛蒂尔迪塔拿起一团毛线和织毛衣的针；格拉迪希塔抓起电话筒和一个珐琅瓶；佩鲁奇托拿起《民法》；冈萨利托翻开日报，寻找政治新闻；梅德拉尼托抄起一本赛马杂志；阿朋蒂科先生拿起椅垫，准备打瞌睡。一小时后，巴尔塔萨希托走进办公室，两眼通红，手腕颤抖。他的问候话总是：

“唉，圣母马利亚！简直伤心透了！今几个我什么也干不了啦！”

而我仿佛是一台数字输送机，像是一挺机关枪，每天八小时不停歇地喷吐出数字。我要完成所长、副所长、处长、副处长、科长和副科长以及我身边八位技术人员的全部工作。

“明天总统先生要向全国发表讲话……”科长对我说，“秘书刚刚打来电话，要材料……得立刻把数字送上去。家庭主妇硬说物价上涨了，总统打算批驳这种污蔑……因此，一定要说明近一个月物价全面下跌……听明白了吗？我建议您找一找《1928年年鉴》，把当时的物价指数抄下来……这是咱们这儿常用的办法……再又一说，谁敢跟全国精密科学研究所顶牛啊？我们技术人员说的话就是福音书……！给你两钟头干完这件事！”

其实，物价上涨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是见证人，又是受害者。可我偏偏得要一手遮天，设法证明家庭主妇们指控的物价上涨不过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过了一个小时，处长走过来，对我说：

“科长分派下来的工作完成了吗？真够磨蹭的！问题是我这儿还有件小事儿呐，也很着急……众议院叫司法部长去一趟，他得带点材料，证明全国犯罪率已经下降，说明法官们正在竭尽全力和犯罪现象作斗争……因此，必须把近一年审理的

案件数减掉百分之五十，把已经宣布的起诉和判处增加百分之五十……咱们的数字真实无误，谁能怀疑啊？”

三天前，在公共汽车上，我本人让小偷偷走了公文包、自动铅笔和手绢，凭直觉我知道法院的工作慢得像头老牛。可我得用准确的数字证明全国到处是天使、大天使和炽天使，司法机器像喷气式飞机一样飞速运转。

这两件事我还没干完呐，副科长走到办公桌跟前，对我说：

“贝纳尔先生……目前政府正在办理一项教育贷款……其实呢，这笔款子准备派别的用场，大使、公使衔参赞和武官的旅差费和活动费都得提高……可是，美国银行老板要统计资料……必须把问题说得大点儿，把学龄人口加一倍，把学校和老师的总数减一半……要是拿出真实数字，借款可就吹了……这件麻烦事我交给您啦……像您这样的明白人，用不着多废话……”

每次让我制作图表或报告，总要加上这一番千篇一律或大同小异的解释。资料嘛，总能符合使用者的需要，或者为其提供方便。对我们提供的信息，处长宣布了一条最高标准，那就是：“少了，添上去！多了，减下来！”很显然，每月的《月报》和全年的《年鉴》都是一连串的虚报和谎言。

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全部科学技术的重担都压在我的双肩。拿从前的岗位来说，我只有一位上司；可现在我却有十位上司。他们毫不留情地压榨我的体力和智力。我要提前两小时到办公室，比其他技术人员晚下班三、四小时。

而埃斯图皮尼安博士和研究所的高级官员却悠哉游哉地大享其乐，四处游逛。他们有最新式的汽车，不但自己用，还供妻子、情妇、儿子和义子使用，司机的工钱、汽油钱、零件钱全由国家支付。我把这种车子称为“贵族的豪华车”。他们陪着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人员在最华丽的餐馆里大吃大喝，在国外能捞到丰厚的奖学金。

有一年，埃斯图皮尼安博士参加了在华盛顿、巴黎、东京、斯德哥尔摩、约翰内斯堡、墨尔本和巴拿马召开的七次统计代表大会。我记得，他从巴拿马开会回来，我在走廊上和他不期而遇。我就问他：

“博士，这次出差怎么样啊？”

“很好！好极了！”这位严肃的大人物回答说，“我跟你我说。十二点钟，飞机在巴拿马降落。一点钟，共和国总统邀请与会代表出席丰盛的午宴。我们连吃带喝，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三点钟，大会开幕。我吃、喝得太多了，天儿又热得要命，就睡着了，睡得挺死。晚上九点钟，坐在我旁边的尼加拉瓜代表用胳膊肘把我捅醒了，告诉我：‘走吧，博士！会开完了！’据他们后来跟我说，会议开得很有意思……真格的，很有意思！”哥伦比亚代表一觉睡了六个钟头，为此得到三千美元的报酬。

当然啦，丰厚的报酬和俸禄都是留给所长和他的参谋部的。士兵们的薪饷少得可怜。单位没有接送工作人员的班车，我们上下班只好搭乘公共汽车。工作是连续性的，所里又没有食堂，方圆五十夸德拉^①之内也没有餐馆，我们的午饭只有一块面包、一瓶汽水。

有一天，我发现技术部门也不是清水衙门。我接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打来的电话，他表示对某些统计资料很感兴趣，邀我一起吃顿饭。我们约定在一家餐馆里见面。

“在阿罗约塞科我有一座庄园……”主人对我说，“当地居民

^① 1 夸德拉=125 米

和我都要求把阿罗约塞科提升为市，申请书已经交到一位议员手里，他是我的朋友……不过，申请书还得附上一份证明，说明当地的人口和出产已经达到法律的规定……这就得把数字吹得大一点儿……您要是能帮忙，我在居民当中捡齐了两万比索，打算白送给您……”

行贿居然行到精密科学的殿堂来啦。每逢听到这种主意，我都火冒三丈。

“关于居民么，我只能提供最新人口调查的数字；关于出产么，我只能提供财政统计的数字……对数字，我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我要是随便增减，就犯了伪造罪……请问：谁告诉您我要出卖自己的？您要知道，我虽然穷，可我是老实人……我不想跟您再谈下去了……到此为止！”说罢，我气乎乎地从桌旁站起身来。

我把行贿者的这次谈话讲给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听。他说：“你是个特大号的窝囊废！为了这么点儿可怜的薪水，你可以天天撒谎，干吗不再撒一次谎，拿他两万比索呢？”

我没有回答他，但我觉得他的说法是无容置辩的。过了几天，处长把我叫去，命令我说：

“省长要我们送份材料，说明阿罗约塞科的人口和出产已经达到把该地升格为市的标准了……您照办吧！”

又过了一星期，处长把全科的技术员叫到一起。对我们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中彩了，拿到两万比索！我知道各位手头儿不富裕。这笔钱眼下我也用不着，打算拿出来给大家用……我可以借给各位一点儿，利钱不高，只要五厘……不过，得打个借条，找个有固定资产的人作保……”

“你瞧，两万比索落到谁手里啦？”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

说，“上次召开泛美会议的时候，劳雷亚诺·戈麦斯博士让人在玻利瓦尔广场上放了几只大球。你是比那些球还大的大浑球儿！”

不用说，过了一段时间，处长成了我头号债主。

要说统计数字分文不值，我一直不以为然。我不相信那些辛辛苦苦地收集、整理、编排、经过审核评估后列入巨大表格，然后送交制表科，最后公诸于众的数字会没有任何实际用途。把这些数字永远埋藏在《年鉴》的坟墓里，只有大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才来光顾这些数字的坟墓，这是不对的。应该把这些数字利用起来，就像利用X光照片或化验室的化验结果一样。要用这些数字向全国人民讲明国家患病的原因和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数字表明工农业生产不足，那就要增加生产。如果数字表明医院和病床数大大低于病人数，那就要建设更多的医院。如果数字表明由于招生名额有限，每年有几十万名儿童不能入学，那就要赶快兴建更多的学校。统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统计是以确切的数字了解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的手段。如果怎么合适就怎么使用数字，随意增减，伪造数字，只会使人们对现实的情况得到一个歪曲的认识，这是不老实的。用数字制造生活指数下降的假象或犯罪率下降的谎言，也是不老实的。

我一直认为，不安定是国民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民的生命老是受到杀人犯的威胁，人身自由老是受到绑架犯的威胁，财产老是受到一帮土匪、骗子、抢劫犯、敲诈犯的威胁，那就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休息，不能看书，不能写作，不能思考，不能爱人；一句话，不能生活。过去和现在我一直生活在大洋的这个角落（这里信奉耶稣圣心和崇尚美满家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虽然我没有理由留下来，我更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离去。

在哥伦比亚，犯罪分子比咖啡树还要多，而司法当局行动迟缓，缺乏效率，简直毫无办法。这些我心里有数，于是我仔仔细细地潜心研究司法统计数字，包括立案、判案、法官的判决、判刑、被判的人数和无罪释放的人数，关进监狱和释放出狱的罪犯数。

结论十分令人寒心。犯罪率每年递增80%。法官的办事效率非常差劲。有的法官在十二个月当中只判处一件案子、两件中间传讯。每判处一个人，要经过七十次预判。这就等于说另外七十名罪犯得以逍遥法外。总统、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最高法院、议会应该了解这种骇人听闻的状况，勇敢地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我花去了几个月的时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出一份长达一百八十页的报告，还附上二十张图表。整个报告分为六章，标题是：《罪犯的行为和法官的无所作为》，副题是：《司法界懒散状况的统计说明》。

我把报告呈交给十位顶头上司。其中九位连看也没看。第十位草草地翻了一下，对我说：

“这些玩意儿不能公开啊……衣服脏了家里洗嘛！我们必须忠于政府……这儿给咱们发钱，不是要咱们揭露问题，而是掩盖问题……！”

“小兄弟”埃斯图皮尼安看了看题目和副题，在边上写道：M. I. P. D. A.（五个字头是Muy interesante. Pero debe archivar-se.^①）

报告不能和公众见面，我实在不甘心。国家不能对自己最

① “很有意思，但要归档。”

严重的痼疾茫无所知。报告太长，我把基本内容压缩成十页纸。我拿着稿子走访了全市所有报纸的编辑部。在办事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答应发表。最后我在一家反对派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份报告。

我本来估计这次揭发问题准能引起巨大震动，在议会上引起一场辩论，司法部长会引咎辞职，检察长也许会下台。我一定会受到来自各方的祝贺。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正如有人揭发严重事件一样，舆论对我的揭发冷若冰霜。但我却因此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撵出公共管理机关。

科技局局长是埃斯图皮尼安博士的代言人，因为博士只会说四个字：“很有意思！”报上发表我那篇文章的第二天，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

“贝纳尔先生：您犯了一个大错误！您在对政府抱敌对态度的报纸上利用官方资料破坏政府威信，为反对派提供反对政府的武器……！这种行为是公开的颠覆活动，和政府官员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您不只损害了您所属的政府的威信，而且损害了大家遵守的民主共和制度……！您被辞退了！”

我自作自受，成了自己创造发明的牺牲品。二十八年来，我曾为十一届政府卖命效力，可是一直未学会官场成功的两大诀窍，一是守口如瓶，一是讳莫如深。也未能掌握职员的基本守则，即感觉到的不能说出来，想到的不能写出来。虽然有了近三十年的生活经验，我却不能相信，我只是个由几位上司轮流牵线的傀儡，只是个没有发言权、选举权、自主权、主动权的只能听命于主人的奴隶。

很幸运——我在通篇小说中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已经五十二岁了。因此，论年龄、论工龄，我都具备了法律规定

的公职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条件。

因此，听到被辞退的消息，我并不感到苦恼，反而像落幕时候的演员一样感到很愉快。我可以退到化妆室休息休息了，脱下戏装，摘掉使用了近三十个春秋的假面具。七幕官场喜剧演完了。我在戏中扮演了一名配角，而要求于我的却是做出超乎常人的努力，施展我并不具备的演员才能。从此，我不必再忍受主角的下流责骂，不必忌妒观众为主角的表演发出的掌声，也不必因为我演技不高而遭到观众的嘘声。傀儡终于摆脱了多少年来绑住他脑袋和四肢的提线。

我要求我工作过的中央、省、市机关发给我有关的证明材料。得到材料后，连同出生证一起交给了社会保险局。过了两年，我的退休金才批下来。在长长的两年里，我只好靠我的孩子莱昂和胡安·雅科沃养活我。莱昂在一家美国石油公司里工作，胡安·雅科沃在一家银行里任职。在这期间，我只能呆在家里，成天到晚饱受我那位“冤家”的责骂和殴打，我想这就用不着多说了。

从我最后离开公职那年到今年，也就是1975年，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我和所有靠退休金过日子的人一样过着自生自灭的生活。吃得不好，睡得更糟。退休金不多，年近六十二岁的人总有些特别的病痛，这些都让我难以入眠。我常到国立图书馆或路易斯·安赫尔·阿兰戈图书馆看看书，因为收入不容我买书，正像我那位“冤家”不能容我一样。我定期去社会保险局，为我这部损耗得厉害的身体机器找些润滑油。我常跟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和卢佩托·梅德拉诺谈论一些老生常谈的题目，什么政治啊、天冷啊、什么物价太高啊、行政腐败啊、什么青年堕落啊、家庭问题啊、我们的病痛啊。我还去参加同代

人的葬礼、或者上门吊唁。没钱看戏，只好观看政治演出。这是两大传统政党的演员为至高无上的人民免费演出的唯一一种戏剧。

帕莱塔拉的乡绅把戴高乐将军错当成佛朗哥大元帅，还砸坏了胆敢为他拍照的记者的相机。这以后，他违背逻辑的规律，结束了任期。

1966年，耶拉斯第二登上宝座。换句话说，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上台执政。耶拉斯是个小个子，秃头顶。他这个人十分聪明，对管理学有深湛的研究，但性情暴躁，为人傲慢。他曾担任过审计长和财政部长。在不少场合，他拼着性命不要，勇气百倍地和奥斯皮纳政府、劳雷亚诺政府和乌达内塔政府相对抗。耶拉斯是个聪明人，学有专长，精力充沛，很有性格，是我们的领导阶级中最杰出的人物。在垂暮之年，他仍是我们的领导阶级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一点我曾经说过，现在无妨再重复一遍。敌人说，傲慢是他最大的缺点，可是我坚持认为傲慢是他最好的品德。但愿上帝把这个神奇的发动机恩赐给我……！在人们的印象里，他是个性如烈火、逞强好斗的人物。关于这一点，在波哥大流传一个笑话：

一天，耶拉斯总统下决心向帕拉西奥牧师忏悔。

“我最大的罪孽是傲慢，我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说实话，傲慢是非常严重的罪孽，傲慢会生发出许多其他罪孽……”牧师说，“总统先生，您应该成为一个虚心、谦恭的人。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向我主表示歉意，我希望您在耶稣脚下放一束鲜花……”

第二天，在十字架下出现一束玫瑰花，还有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全国第一大法官献给三圣一体的二号人物。”

过了四年，根据阿尔贝托·耶拉斯和劳雷亚诺·戈麦斯下达给哥伦比亚人的命令，该轮到保守党人当总统了。崇奉宗教和秩序的政党分裂成三派，提出三个人，即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博雷罗、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和埃瓦里斯托·索迪斯。自由党决定支持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博雷罗。全国人民联盟提出罗哈斯·皮尼亚将军为总统后选人。

参议院曾经宣布过罗哈斯·皮尼亚将军“没有资格”参加竞选；有人认为屠杀学生、斗牛场事件和其他罪行，都是他干的。可是，老百姓把这些事忘得干干净净，纷纷投票选举“暴君”。选举那天晚上八点，全国人民都清楚地看到罗哈斯已稳操胜券。统计资料大大有利于他。但是，内政部长禁止选举继续进行下去。第二天，帕斯特拉纳获得微弱多数的选票。全国人民联盟成员拥上街头，高呼胜利属于他们。卡洛斯·耶拉斯给他们半小时的时间撒尿、祈祷、回家睡觉。于是，大街上空无一人。当天晚上，全国人民联盟就寿终正寝了。

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博雷罗在圣·安娜事件上受到伤害，这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总算得到补偿。这位年轻的行政长官长了一副运动员的面孔，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颇像牙膏广告宣传员。他是阿兰戈·维莱斯的女婿、寡头集团的 enfant gaté^①。在奥斯皮纳、劳雷亚诺、乌达内塔、罗哈斯和耶拉斯政府中担任过驻外使节和部长职务。他的纲领是：“社会阵线。目标：人。”其实，在他任期内，“人”只是难以承受的物价飞涨的牺牲品。帕斯特拉纳也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诸如把圣·卡洛斯宫改名为“玻利瓦尔之家”。帕斯特拉纳政府专干开幕剪彩

① 法语：宠儿。

的活儿。他剪过的彩带比“烙铁行动”时期梅内塞斯博士手下的突击队员剪掉的领带还要多。

全国阵线搞了四届政府，自由党和保守党分别回到自己的营垒，双方重新形成对抗。争夺总统宝座的是三位前总统的儿子。世界各国报纸都强调了这一事实；惟有国内报纸或和这位候选人有瓜葛，或和那位候选人有关系，对此缄口不言。自由党在1945年曾经让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辞职，得罪了他。如今为了向他表示歉意就选举了他的长子。保守党也是如此，为向马埃斯特罗·瓦伦西亚道歉，就推选了他的儿子。

阿方索第二得到三百万臣民的支持，在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专门为他谱写的“峡谷小调”乐曲声中拿起总统的权杖。阿方索第二是行政长官的儿子、大学教授、领导阶级的小说家。在耶拉斯·雷斯特雷波政府中，他曾将革命领袖的饰物换成外交部长的礼服。他为国家开出两剂药方：经济紧急状态和戒严。可惜，两剂“仙丹”全然无效，“病人”依旧慢慢地而又确实实地每况愈下。生活指数上升到平流层，社会不安全达于极点，就连我这样的人也觉得很快会被人绑架。“清明的政府”能否澄清我的同胞以及我本人日益模糊的处境，我对此不抱任何幻想。

这个痛苦的悲观想法是经验的自然产物。老话儿说：“人人都说集市，仿佛全都赶过集。”至于我，却仿佛是去望弥撒的狗。没有一位修女没用旱伞敲打过我，没有一个侍童没用脚踢过我。很久以前我就对什么政治、什么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我曾经给七位丑角（有文有武，有自由党、保守党，有技术人员，还有上层、中层和下层阶级的成员）干过事，总算没有白干。按照正常的逻辑，不能再要求我相信什么政治家的好心、法官的正

直、官员的忠诚、军人的自尊、技术人员的效率。我在丑剧的看台上生活过六十二年，如今我可以像某位诗人那样高呼：“就是坟墓里的宁静，我也不能相信。”

我当官差的时候，公务繁忙，百事操心，根本无暇了解一下我出生的城市。波哥大和我童年时代熟悉的城市已经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打定主意利用退休的闲暇，在这座通都大邑里四处跑一跑。我和普通旅游者一样，看到一件接一件的出乎意料的东西。什么什么都是新鲜的、陌生的、与往日不同的，屋宇、东西、居民都是这样。我走过几十夸德拉的路，没有碰上一个熟悉的面孔。从我身边走过几百个身穿奇装异服的外国人。男人留着长发，一身媚气；女人容貌粗犷，下身穿着男人专用的裤子。过往行人都推我、揉我、踩我脚，没有一个人转过身来说声“对不起”。他们的表情、动作、言谈都显得很粗俗。他们大吃大喝，大嚷大叫，纵声大笑，当众接吻，互相抚摸，吸印度大麻。口中讲的话，我根本听不明白。祖国母亲的语言被外国继父的语言取而代之。表示同意说 Okey^①，分手的时候说声 Good by 或是 chao^②。波哥大的语汇中增添了数不清的新词儿：mafioso, esmeraldero, raponero, chévere, Churro, sardina, zanahoria^③。迪斯科和格利耶斯代替了文学聚谈会。潘贝莱或拉法埃尔·安东尼奥·尼诺比当年乌里维·乌里维将军或胡里奥·弗洛雷斯还显得重要。一场足球赛比当年吉列莫·瓦伦西亚和安东尼奥·何塞·雷斯特雷波围绕着死刑大辩论还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街角上，“扒手”会偷走一位

① 美国口语：好，对。

② 英语和阿根廷口语：再见。

③ 即“黑手党”、“偷盗宝石的人”、“扒手”、“盖帽啦”、“帅”、“宝贝儿”、“打蔫儿”。

先生的手表，或一位女士的手提包。剧场前面，嗜血的虐待狂和好色的登徒子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捞钱置办东西的欲望激起的张牙舞爪的个人主义代替了古道热肠。有人饿死了，邻居们全然无动于衷。为亲人服丧时断时续，守灵成了热闹的聚会，亲友们不住地为死者长眠于地下干杯。男男女女最高的愿望是有一辆 B. M. W.^①，再好一点，有一辆道吉汽车。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道德、礼貌、雅兴成了准备收藏起来的老古董。波哥大变成流氓的帝国、庸俗的王朝。

龙丘·奥特加曾经风趣地说过，波哥大原是个“狭隘的社会”，而后变成了无可名状的社会。很不幸，他的确言中了。有人说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也是如此，这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从物质上说，波哥大前进了许多公里，而从精神上说，却后退了许多公里。它修建了许多摩天大楼和通衢大道，但是失去了不少聪明才智和威严庄重。这是不是一个留恋过去、抗拒进步的老头子的牢骚呢？也许是吧。不过，谁也不能要求我忘却我童年时代的那座亲切的小镇，它只有二十五夸德拉长、十二夸德拉宽，但却彬彬有礼、风流儒雅。谁也不能要求我欢迎眼下这个流里流气、烟雾弥漫、声音嘈杂的城市。在这里，横穿马路是一桩壮举；从一处走到另一处是英雄行为；带着手表安全抵家则是奇迹。

缅怀过去是老年人的无上乐趣。那就允许我回忆一下我童年时代的波哥大吧！那时候，波哥大面积不大，然而优美动人；外貌丑陋，然而机敏聪慧；市容肮脏，然而风度翩翩。居民以

① 巴伐利亚汽车厂出产的高级轿车。

基督教徒的感情对待生活，他们天生懂得礼貌待人，还有非常细腻的幽默感。请允许我回忆一下那三条皇家大道、那三条弗洛利安大街、卡内罗斯碎石路、阿拉梅达碎石路、独立森林、百年纪念公园、马车和有轨电车、“白玫瑰”、“加泰隆尼亚徽”、“红衣”商店、儿童商店、奥林庇亚宫、法恩萨剧院、波哥大剧院、帕迪利亚喷泉、玻利瓦尔林荫道、戈洛萨山、维纳斯悬索桥、“金雉”、“九国”酒家、“帕蒂亚萨奥”和月亮公园、英吉利咖啡店、维克托·华德理发店、小多罗特亚冷饮店、宝莉娜·格拉西娅饼干店、博博·博达的闲话和霍尔赫·蓬波的拆读、爱德华多·卡斯蒂略和阿尔贝托·安赫尔·蒙托亚的诗歌、查理士·卓别麟、罗多尔福·瓦伦丁和波拉·内格里的电影、《新时代报》、《画报》、《纪事报》、柳叶野黑樱桃糖果、阿美尼亚的纸张、“蓬波尼奥”的粗俗玩笑和库奇库特伯爵的单目镜。请允许我以眷恋的心情回忆一下文明庄重的小镇上那种无忧无虑、安静恬适的生活吧，她慷慨好客、温暖人心，使人觉不出寒夜冷气袭人。

我写的东西到此结束了。这大约可以称之为《官僚杂忆》或《窝囊废回忆录》吧。我从父母不幸地将我带到人世的那个不祥的日子开始，一段一段地讲述了我的生活，一直讲到今天。我诚心诚意地严格按照真实情况讲述了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讲述了六十年间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东西。讲述了我本人的得不偿失的胜利和毁灭性的失败；转瞬即逝的成功和持续不断的挫折；屈指可数的行动和数不清的无所作为。讲述了我本来可以做而未做的事情，我本来可以成为而又未能成为的人物。我勾画了七个曾经利用我的才智的骗子的无知、

贪婪、胆大妄为，在色彩上未加任何夸张。“犛牛”中士、赫雷米亚斯·蒙德拉贡、拉萨罗·马利亚·魏兰迪亚、莱奥维希尔多·梅内塞斯、“钞票上校”、胡安·卡洛斯·德·科多维兹·伊·斯帕盖茨奥内以及赫拉迪诺·埃斯图皮尼安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漫画人物，而是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因此，我不必求助于想象力，而是专靠记忆力。如何看待那些我从远处认识的、从池座上看到在台前走过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这个问题上，我尽量站在和爱与恨等距离点上。我只不过是把几尊塑像从墩座上挪下来，既没有侮辱他们，也没有伤害他们。我没有辱骂任何人，没有中伤任何人。我仅仅是表达我对人和事的观点。凭我的禀性，我不可能成为圣像破坏者。不过，波哥大人好开玩笑，也许我犯了冒犯龙颜的罪行，这是可以原谅的。我并不后悔。说来说去，我写的东西只是发泄发泄闷气而已。到了晚年，我终于把一生中由于胆小而憋在肚子里的话说了出来。奴隶还是有嘲弄主人的小小的权利的。

我的小说既缺乏哲学的深思，又缺乏文学的丰采；既没有灵巧的想象，也没有精采的比喻。唯一的优点是真实。遵照弗德里科·尼采的忠告，我用自己的血写出这部小说，对我亲身经历和感受至深的事物怀有热切的人情味。这部小说是几亿个活动在人间舞台上、被为数不多的胆大的人用提线牵动的傀儡之一的简洁的、直率的、露骨的自白。这部小说是一个为了挣得一小片可怜的面包而年复一年地出赁自己头脑和双臂的人的证词。是受剥削者的自传和剥削者的历史。

我是什么人？是个善良的人，抑或是好好先生？是个中等聪明人，抑或是傻瓜？是老实的公民，抑或是笨蛋？是正直的、效率高的官员，抑或是白痴？是好丈夫、好父亲，抑或是妻子

的奴隶、孩子的牺牲品？是值得尊敬的人，抑或是劣等“卓别麟”？是超级胆小鬼（“民法专家”这么叫过我），抑或仅仅是窝囊废（我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这么称呼我）？

如果说举世公认便是真理的标准，那么我过去是窝囊废，现在是窝囊废，将来还是窝囊废。叫我“窝囊废”的人有好几百，他们不可能都弄错了。第一个赐给我这个雅号的是我父亲。就是我从旋转木马上跌下来那次。当时我才五岁。从那儿以后的五十七年间，我的兄弟姐妹、老师同学、妻子儿女、上司同事、亲朋挚友以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毫无例外地管我叫“窝囊废”。因此，“我是窝囊废”是个无需证明的事实。

不过，假如需要什么证据，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一生是一连串挫折和失败，是任命和辞退的恶性循环，是软弱、屈从和胆怯的大汇集，是一件接一件的窝囊事。

我不懂得什么是荣耀，什么是金钱，什么是爱。任何正常人都会追求这些目标。可是我胆小怕事，在通往这些目标的道路上成为我的障碍。我本来可以在文学上和法学上扬扬名，可我却宁肯把自己摘下的桂冠戴在别人的前额上。我本来可以发财致富，可我却宁肯让别人靠我的努力挣大钱。我本来可以爱人，也被人爱……可我却偏偏和波妮法希娅·雷卡曼结了婚！不用说啦，我按照常规对她一片忠诚，但不完全是出于道德观念，而是出于保守本能。

我压根儿没有享受过住在自家房子里的快乐。一生当中我只进过三次公证处，不是签署什么购房单，而是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我只有一处娱乐场所，那就是“国家公园”。驾驶小汽车的乐趣，我无缘享受；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我没见过大海，恐怕至死也见不到了。香槟酒和鱼子酱不是为我准备的。

我没穿过燕尾服，也没穿过无尾常礼服。从来没进过大饭店、豪华的餐馆和漂亮的俱乐部。我是个没有写字台的作家。这部小说是在一张饭桌上写出来的。我的全部财产仅仅是几件旧家具、几百本书、两件西装、一件大衣、一顶帽子、四件衬衫、三条领条、一双鞋和一把雨伞。

但是，我和所有白痴一样，为尽了义务而感到开心，为给子女留下一个清白正直的名字而感到自豪。

一连六个月，我把这件编织回忆的艰巨任务强加在自己头上。假如有一天小说得以出版，许多读者会从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再现。因为人世间到处是贝纳贝·贝纳尔。只有很少的人（蒙德拉贡们、魏兰迪亚们、梅内塞斯们、“钞票上校”们、科多维兹们和埃斯图皮尼安们）会像该隐站在亚伯的尸体前一样感到内疚，如果他们还稍微有点良心的话。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天气十分寒冷，我也累了。明天是发放退休金的日子。今天，我给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和卢佩托·梅德拉诺打过电话，提醒他们别忘了。明天八点钟，我们会在拉门塔希奥内斯墙下会面。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长队。最后拿到支票，领出钱。我将请他们去喝咖啡。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一定会建议：最好去喝啤酒。卢佩托·梅德拉诺会象往常一样说：“行啊！他妈的！得花钱时且花钱……”我们将一起去到内格拉·伊菲赫妮娅开的酒馆。老板娘热情地向我们问候，然后说：“不过，有一条，现钱交易……其他都无关紧要。我的亏空比政府的赤字还厉害……”安布罗希奥和卢佩托又要无休止地讨论一番政治，我会居中调解，告诉他们“哥特佬儿和自由党是一路货色”。虽然我一听见革命就吓得浑身发抖，可是

世界的前途还得靠马克思主义。内格拉·伊菲赫妮娅又要大谈其风流韵事，再一次充满自豪地让我们看看她的桃色旧战场，又要唱一唱《吃醋的娘儿们》和《监狱姑娘》。我们要喝下许多瓶啤酒，抽掉无数支香烟。晚上十二点，一想到即将和我那位“冤家”见面，我就战战兢兢地向大家告辞。安布罗希奥·冈萨雷斯要第一百万遍说我是窝囊废。我哆哩哆嗦地往家走。我那位“冤家”会骂我、打我。胡安·雅科沃会同情我，莱昂该说我罪有应得。后天，我走出盥洗室，又要迎面碰上我那位“冤家”。她大喊大叫地说：“洗完身子啦！现在该洗洗灵魂啦！昨儿晚上你犯下那么多罪孽，你得好好说一说，忏悔忏悔……！不要脸的酒鬼！”我穿好衣服，走到大街上。登上一辆人们俗称为“公共汽车”的“活动地狱”，来到我的游乐场所。坐在一张长凳子上。孩子们在我身边跑来跑去。我苦笑着回味起往事。我会听到这样一些声音：“你本来可以成为伟人，可你偏偏成了个微不足道的侏儒！”“你本来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塑造成一尊完美无缺的神像，可你偏偏端出个布娃娃！”“过去、现在、将来你都是个穷鬼，你那份聪明、你那些文化知识都干什么去了呢？”“你干吗总用自己的头脑为他人做嫁衣，而不干些于己有利的事呢？”“唉，贝纳贝，贝纳贝啊！说来说去你是个窝囊废！”回音不断重复：“窝囊废！”“窝囊废！”“窝囊废！”太阳落山了，傍晚寒气四起，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沉重地站起来，走上回家的路。生活将永远如此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为造出了我而感到后悔，为了对我表示怜悯，用他儿子在山上答应给予心地善良、精神贫乏的人的那种荣誉补偿我的损失。但愿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写于1975年1月8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窝囊废

作者 = (哥伦比亚) 阿尔瓦罗 · 萨洛姆 · 贝赛拉

页数 = 2 4 9

S S 号 = 1 0 1 7 6 1 9 9

出版日期 = 1 9 8 8 年 0 2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